

引 言

本书主题及其结构

东欧与苏联“政党—国家”体制的崩溃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这个剧烈的解体在一年的时间里横扫了匈牙利 90% 的党的机器，70% 的党员离开了党，剩下的党员也分裂成无数的其他政治党派。但是，这个历史性事件似乎已经沉寂在遥远的过去了，在所谓的工人党（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保守派组建的党）没有在新的、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国会里赢得一个席位的时刻^① 以及社会主义党（HSP）（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改革派组建的党）在第二次选举以前只构成国会中一个弱小的反对党的时刻，这个历史性事件就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

然而，陷入破碎的不仅是党；而且构成体制根本特征的基本运行原则和连结原则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制度系统也消失了。但是，一个体制的基本连结原则的消失并不一定意味

本书对匈牙利的叙述基本上覆盖了 1960 年到 1995 年第二次国会自由选举这个时期，1995 年的选举标志着匈牙利的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令人激动的时期。本书的研究截止于匈牙利民主论坛（HDF）失去支持的时候，匈牙利民主论坛是首届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中的多数联盟伙伴，但是主要由于与转型时期有关的困难，他们很快失去了支持，而在这四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者逐渐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稳住了阵脚，然后在第二届普选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不过，这个时间及其影响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着体制运行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有经济和社会结构、传统、观念、行为方式和策略也随之消失。崩溃意味着所有这些因素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结果造成这些因素要么逐渐消失、要么发生深刻的转变。缓慢的转型表明，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旧的政党—国家体制，而且其残余在转型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残余是政党—国家体制运行的复杂的共同产物。它们既是政党—国家创造的东西同时又是政党—国家抑制的东西。它的普遍特征——它的结构、它的运行方式以及它的崩溃方式，继续在根本上影响着残余发挥作用的方式和及其作用的大小。出于多种原因，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间的差异在决定与转型过程相联系的困难的性质和规模（换句话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深度）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决定紧张状态的程度和矛盾的规模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决定转型导致的不确定性的水平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差异也对转型的动荡水平产生影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成员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产生影响；对学习过程和制度化进程的速度和方向产生影响；对新机会的数量产生影响。结构差异也影响着终将制度化的实验的结果，影响着可能出现的社会集团的种类，影响着其中的哪一种将成为主导的类型，影响着即将形成的集团间的连结方式、行为模式和利益关系。

要理解二十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条件和转型过程中残余的重要性，我们就应当把握过去的体制本身。因此，本书的目的是实证地描述和分析政党—国家结构的基本轮廓、它的驱动力、其解体的机制以及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转型过程的。同时，本书详细分析了前政党—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差异与这些体制在转型过程中呈现的重大差异之间的联系。

第一篇从政党—国家的权力工具衍生出来的利益实施的可能性和依附的角度，集中探讨了决策机制的基本原理。它阐明了体制内在的不平等，并详细分析了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结构背景。

第二篇勾画了政党—国家结构的基本原则和运行方式。它表明，体制内聚力的关键是各个的参与人基于政治理性考虑的行为模式。这些考虑是由依附、期望、压力、利益实施的可能性和决策过程的选择性决定的。本篇还力图描述了匈牙利的机制运行所创造的工具：规范管理（*normative regulation*）、个别对待的再分配和改革，所有这些工具都起到了维护和再生产体制内聚力的作用，即，有助于维护前面提到的行为模式造成的自我支持机制。

第三篇分析自我支持机制内产生的陷阱。这个部分考察了自我支持机制转变成自我毁灭的方式，这种转变发生在如下时刻：由于结构内权力分配的结果，已经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再分配之用；与此同时，外债增长，还债困难加大，面向西方市场（它本身在经受着经济衰退的打击）的调整变得越来越难。本篇对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解体的结构背景的差异作了一些假设，对匈牙利的解体过程则是详加描述的。

第四篇讨论了在所有的政党—国家体制中可以观察到的残余的直接后果——经济危机、数不清的矛盾局面、脆弱的还没有完全成型的制度、模糊不清的利益、多种非系统性的因素以及高水平的不确定性。本篇分析了这个问题，即，由于不同政党—国家体制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它们的转型过程是不同的。这些差异决定了残余的规模，决定了它们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决定了它们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水平和波动幅度。

我将分析在我看来是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运行、解体和转型的普遍特征。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我将集中分析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运行和崩溃。就对匈牙利的分析而言，本书所覆盖的历史时期将近 40 年，从 1956 年暴动后的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分析起，到从 1989 年体制崩溃后 4 年的经验中总结出一些结论为止。

资料来源和方法

我进行了将近 20 年紧张的实证研究，本书是建立在对原始文件、统计数据、访谈以及一系列匈牙利和国际二手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有很多数据是从不同寻常的来源收集到的。我力图分析一个非正式然而制度化的决策体制的运行，分析其中的依附和利益实施渠道构成的网络，而通常的资料来源要么没有充分的信息要么其信息没有多少用处。

我的许多数据来源是党和国家的档案、退休官员那里沾满灰尘的卷宗、部门重组后不再需要的文件、党的宣传手册、不同级别的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会议记录、内部管理手册和规则、党和国家官员的信件、党中央机关访问的企业名单、地方党组织与行政部门谈判的纪要、制定企业计划的研讨会的记录、党的积极分子举行的会议的纪要、我在作为非正式参加者参加的会议上作的笔记、管理部门的电话簿和热线电话簿、部长办公室接待员的日历和记事本上记录的电话及其内容、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任命花名册、公布地方党委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的杂志以及培训班上的纪要。此外，在 1975 年到 1994 年间我还对身居要职的共产党人、党和国家的其他官员以及企业经理共计约 400 人作了访谈。

在访谈过程中，每一次我都尽力理清一件事情的发展，并通过这个方法描绘出与此相关的决策过程。虽然访谈总是事先带着一定的目的去的，但我总是采取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的、开放的形式，以免干扰访谈对象的思路；我在每一个场合保持客观旨在使他们的思想在不受我影响的条件下呈现出来。在一个封闭的体制（不是基于开放和可控的关系）里，这种“开放式访谈”的方法是非常关键的。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才得以逐步获得有关体制运行的各个方面的信息，本来，由于体制的封闭和沉默，我对它们是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随着访谈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我的相关知识也越来越多，并且能够越来越熟练地像一个“内行”一样展开这些访谈。

访谈过程中的电话和其他类似的“打断”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它们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电话中说了些什么，而是体现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方式上，体现在这些事情引起的反应上。有时，通过这些反应，我能够把握体制运行的某些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经理、管理部门的代表及中央和地方党的官员之间本来很沉闷的会议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经常透露出谈判过程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阶段或插曲以及相关人员的行为。从中可以感觉到这些会议谈论的问题的重要程度，分辨出干预的战术、方法和深度，以及这些干预最终的接受程度。在每一个事件背后我都发现了依附和利益实施联系的这样或那样的新领域。在我研究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使我能够感受和观察体制运行中的联系网络。我亲眼目睹了 1980 年初三个部合并成一个部门的过程，看到了最高层制定的最高机密是怎样泄露的，看到了形成最终方案采用的战术，以及伴随新部门的产生而发生的密谋、操纵、权力斗争、困惑、动荡和文件销毁。我看到管理部门失去然后又重建它们的联系以便满足自身的需要

以及环境的需要。我在 80 年代中期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我作为一个观察员参加了引进新型企业管理时期的企业委员会的选举，观察了布达佩斯及其郊区选举前后企业、管理部门和区党机关采用的战术。最后，我密切观察了布达佩斯第 13 区党部在 80 年代末最后几个星期的活动、它的最终消失和新政治组织的萌芽。由此，我能够深入把握政党—国家体制的运行和解体，而如果我是一个局外人，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因此，访谈的方式和内容以及我的调研经历对我把握依附和利益实施关系的来龙去脉是很关键的。实际上，正是这种经历帮助我从这些了无意义的、沉闷的党的文件和小册子、信件、仪式、电话簿和纪要里读出了重要的东西。有时候，看来是技术性的细节如文件下方“报……”和“送……”提供的信息比文件本身还要多，因为它们透露了哪些人有资格知道这些秘密材料，他们被提及的频率，他们的职务，他们参加的团体，以及身份的复杂程度。不仅如此，调研还获得了各种文件和名字（进一步访谈的对象）；如果没有调研，对于局外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封闭的体制将仍然是隐而不现的。

获得文件的方法很多：谈论和交谈、访谈中建立的融洽气氛、帮助、其他非正式的支持以及很多情况下是纯粹的运气，所有这些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在匈牙利是危险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只有一次要求我出示介绍信；其他时候，我只要通报我的职务和研究的课题（每一次考察一个特定的决策过程）就可以了。之所以可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匈牙利的政党—国家体制比较“自由”，这在当时的其他政党—国家体制里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我和传统上孤立的强硬派集团（处理所谓干部

问题的部门，主管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相对自由的环境对我是有利的。我与日益专业化的技术人员的接触很多：律师、教师、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既在党等级体系内也在国家等级体系内处理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事务。渐渐地，随着解体的发展，体制变得更加自由，访谈对象的“话匣子”也打得越来越开，研究工作的开展也就更加容易了。

尽管比较自由，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仍然有许多领域我是无法涉足的。关于区党委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情况，党史研究所的高伯尔·瑟克伊（Gabor Szekely）提供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我收集的数据不是秘密，但它们也不是公开的。还有，如果没有前政治局委员，后来是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吉奥尔吉·阿策尔（Gyorgy Aczel）的帮助，我是不可能查阅由党史文献研究所保管的1956年以后的党的文件的，这些文件只有党员可以查阅。

我的工作关系对我多年来进行政党—国家体制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我在财政研究所工作了13年，这个研究所就在财政部（MF）的大楼里，曾经一度是财政部的附属机构。这个工作关系使我对内接触了很多资料，对外也得到了很多便利。在部里，我可以得到任何部门的口头信息或文字材料，与部里的同事访谈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的回答都是直接的、可信的。我可以阅读保存在高级官员保险柜里的文件，可以读到对事件进行保密处理的报告，因为有时退休的领导人把这些文件扔掉了；我能够通过财政部的文件查到企业财务状况的数据，以及我的专业同事解读这些数据时提出的建议。

财政部的有利背景还使我很容易建立各种联系：银行、国家机构、企业和主管各方面经济管理与经济政策工作的党委会请我去讲课。与他们进行访谈也就比较容易了。由于我的有利

地位和对这个领域越来越熟悉，我能够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经济政策部和其他部门进行访谈，陪同一位副部长到县党部去作简短访问，可以访问部门的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可以采访全国各地各阶层利益在中央的代表，可以访问区和县党委，可以采访企业。从 1960 年起，就有很多人开展了实证研究工作，我的发现大大得益于他们的成果，他们的研究同时也扩展了我的研究的适用领域。这里，我特别要向下面这些人表示感谢：亚诺什·科勒（Janos Kollo）、米哈伊·拉科（Mihaly Laki）、拉斯洛·安塔尔（Laszlo Antal）、安格内什·曹科（Agnes Czako）、尤迪特·费克特（Judith Fekete）、高伯尔·古拉齐（Gabor Gulacsi）、塔马什·霍尔瓦特（Tamas Horvath）卡尔曼·克赫吉（Kalman Kohegyi）、高林纳·兰贝尔格（Galina Lamberger）、巴林特·马扎尔（Balint Magyar）、卡尔曼·莫哈齐（Kalman Mohacsi）、莎拉·帕斯托尔（Sara Pasztor）、吉奥尔吉·舒赫（Gyorgy Such）、恩德勒·席科（Endre Sik）、厄吉贝特·萨莱伊（Erzsebet Szalai）吉乌劳·特勒尔（Gyula Teller）、伊什特万·托特（Istvan Toth）、伊娃·瓦尔赫吉（Eva Varhegyi）、和伊娃·沃斯考（Eva Voszka）。

我的资料和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党史文献研究所（现名：政治史研究所）的新匈牙利中央档案、财政部各部门、财政部部长助理的文件、财政部呈送的保密文件、财政研究所的档案、财政部计算研究所、冶金与机械工业部的档案、工业部的档案、吉奥尔—硕普隆（Gyor—Sopron）县党委的档案，特别是第 13 区党部的资料室、布达佩斯党委资料室、佩斯县党委资料室、布达佩斯企业和省企业的资料室、匈牙利国民银行（HNB）资料室、以及国家计划总署（SPO）。

在讨论、咨询和研究的过程中收集到的大多数原始材料都

以原件、复印件或笔记的形式存放在我自己的档案柜里。我做的访谈也是如此，上面提到的案例研究的手稿以及书中运用的计算也都在我的档案柜里。我收集的材料的一些原件可能在 1980 年部门合并以及在 1990 年横扫全国的党的机器解体的时候销毁了，还有一些原件藏在了我不知道的地方。这使得验证书中材料的真实性变得更加困难了。不过，书中标有 M. Cs. 的材料都在我自己的档案柜里，随时可供查询。

关于本书写作风格的问题，我想就本书的写作作一些说明。阅读本书时，读者会碰到很多概念和表述，有些是我创造的，有些是我对旧词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例如：交叉连线、结构性反馈、封闭的渠道、基本运行原则、连结原则、基本网络、隐蔽力量、自我支持机制、政治理性、内聚力、体制适应性、强制路径、系统陷阱、自我毁灭机制、选择性软预算约束、结构性（相对）资源约束、过度运行、遗产、累积的不确定性、开放的系统以及同构的性质。为了保持本书的完整性，我不打算预先给它们下定义。我觉得，在这些词于书中适当的地方第一次出现时，我再来阐明它们的含义，将是更有成效的。

还有一个与访谈材料和文件的使用有关的问题。为了阐明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性关系和普遍的运行方式，我特意使用了时间跨度很广内容非常庞杂的访谈材料。我希望借此能够更加令人信服地说明，体制的基本结构性特征与所考虑的时间和事务是无关的。当然，关于政党—国家体制在不同时期但同一主题上引用的材料在形式上是一致的。^① 在文件部分——特别

除非特别说明，本研究的“党”指的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东欧国家里的前共产党。

是在访谈的材料里——有许多用得不准确的行话，我未做改动，以便保持原貌。比如文中经常提到计划评判（*plan-juries*）或计划审议（*plan-deliberations*），^① 在后来被更温和得多的计划谈判（*plan negotiations*）替代很久以后，很多人还在用原来的词。访谈都有录音，我没有改变原来的风格，也没有就当时的背景作太多的解释。只有在里面的错误会引起误解时我才作出必要的更正。因此，我对可能引起误解的表达或者在括号里加以说明，或者在脚注中进行解释。

计划评判是一个反复评估的过程，比如，一个企业的短期、中期、长期生产或出口计划，预期的或强制的国内销售、价格、经互会进出口义务、增长等，以便不断根据国民经济计划作出调整。计划评判的频率和严厉性随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控制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匈牙利，与 70 年代相比，50 年代评判的频率就更高，干预就更多；比如，罗马尼亚的评判和干预就比匈牙利的更多）。

序曲：告别交响曲 1989—1990

12月5日：我在布达佩斯第13区研究“政党—国家”体制解体的问题，这使我能够自由出入地方党部大楼。1989年末党代表大会决定自行解散以后，这个党部的工作人员减少到了14人，至于如何工作的问题他们也在等待进一步的通知。每个人都在寻找新的工作。党部大楼从外面看像一个巨大的掩体，但其内部已经完全废弃了。走廊上一点人气都没有。第一书记的办公室空荡荡的。书记们与接待员们都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新的工作。因为没有接待员，第二书记既要接他办公室的电话，又要接大厅里的电话，每次他都冲出办公室，对着刚好是电话里要找的人说：“××，你的电话。”叫完后，他泡了一杯咖啡放在托盘上回到了办公室。我们聊了起来，有时他会接到威胁性的电话，但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几个星期以来，他已经收到了许多威胁，既有来自右翼的，也有来自左翼的，有打电话来的，也有写信来的，通常是匿名的。

12月16日：早上等M的时候，我跑到前第二书记那里。他现在是一家合资企业的经理，但他在党部收到进一步通知以前仍然做相关的工作。合资企业还没有给他安排专门的办公室。他不时往企业打电话处理有关的业务。烧水壶还在原地，但整个楼层已经废弃，空荡的楼里回响着电话铃声。

M以前是第13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CYF）的书记，法律系毕业，CYF解散后转到党部工作。她受托清理地区党部的

房产。我们的谈话不时被电话打断。其中一个人试图占着电话不放，一些油嘴滑舌的人极力掩饰自己好事者的面目，假惺惺地表示同情：“你没有说，亲爱的！接下去会有什么情况呢？亲爱的。”其他人来电话询问椅子和其他家具，询问一切还可以使用的东西。有几个人询问搬进大楼的事宜。

一个清洁工来清理大楼使其有更好的市场形象。这些天他焚烧了布达佩斯区办公室里党的文件，他是带着一封党的介绍信来的。M 觉得他的来头不小，于是在走廊上耐心等到他清扫完毕。因为什么人都可以从敞开的大门进来，M 说一段时期以来房间已经必须上锁了，因为有贼。最近走廊上的一个装灰桶被搬走了。其他地方的花草、蒸汽暖气片、窗帘、花瓶和地毯都已经不见了。

1月2日：终于，宪法法院将搬进这座大楼。必须通知那些租用这里某些房间的人，所有家具都要尽快搬走，大楼移交给法院时必须是空的，因为法院订购了新的家具。忙乱的清理工作开始了。一些家具和值钱的东西搬到其他党部大楼去。前经济政策部主任最近建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和前党与群众组织部的两名官员安排了相关的运输事宜。

M 匆忙开了一个可售财产的清单。对剩下的文件搬运工作加快了速度。废弃的保险箱和橱柜是空的，里面的东西都装进了袋子。留给新成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党（HSP）党委书记的文件寥寥无几。装满东西的袋子堆放在空荡的走廊上，成堆的纸屑和更多的袋子堆放在办公室里。越来越多的袋子集中到地下室——如今大约有 60 个。我瞥了一眼几个袋子里的东西：新党员登记卡、党纪手册、党员记录、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的复印件、全国救护署的文件、警察局的日常报告、关于区里青

年和老人的社会调查报告、干部任命花名册，等等。两名妇女在严寒中做着挑拣工作。（后来，所有东西都不经处理就往布达佩斯党委搬，据说，党委的大厅里堆满了从布达佩斯 22 个区运来的文件。）只有最常用的房间还有暖气。

M 要关照一切事情，从文件的销毁到家具和设备的售卖。一切东西都卖得很便宜：脏兮兮的冰箱、扔掉的消毒柜、窗帘、地毯和家具。什么人都到这里来，从团结工会的人到当地学校的人都来。M 的办公室是那个楼层惟一个什么东西都原封不动的房间。一队清洁工（受雇于即将搬进来的单位）进来。他们打了个招呼，把文件堆到一边，撤下窗帘，清洗窗户，然后去打扫下一个房间的卫生。到 M 回来的时候，办公室已经变得乱七八糟的了。

M 的同事在一层的办公室里收拾东西。食堂在几天前关门了。他们在自己的电炉上花几个小时来熬汤，由于天冷他们都穿着防寒服工作。其中一人把列宁的《集体劳动》交给原材料回收组织。回收价是每公斤 1.80Rt（福林）——比一盒火柴的价格还低。

一个老人常在部门卫的小亭子旁徘徊，他坚持要向宪法法院提交一份请愿。费了很大劲才让他明白，法院至少要一个星期以后才会搬进来。老人终于放弃了，说道：“既然能等 20 年，就不在乎再等几天了。”便蹒跚着走了。

1 月 11 日：我们的交谈是在废弃的大楼主管的办公室里，在成堆的纸张、废弃的打字机和消毒柜具中间进行的。M 已经把自己的办公用具也卖掉了。在楼上的那间办公室已经腾空了。我在那里找她时，走错了地方，我常走的那个走廊的旋转门锁上了。我走了另一个门。一队人马正以飞快的速度给办公

室换锁，他们叫我离开。一个带玻璃门的空衣柜在我们谈话的主管办公室里是惟一剩下的东西。在访谈过程中我忍不住向后看它几眼，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第二天，那个衣柜也不见了。

1月17日：我到党部的时候这里一片混乱。大楼的后门停了数辆卡车。人们进进出出，激动地互相喊叫。几个人在装车，袋子都搬出了地下室。这个大楼里塞满了工人。每个人都在搬着东西：椅子、桌子、灯、花草。几个人试图一次把三把扶手椅同时举到头顶上，但终于拿不住只好举了两把走。破损的家具散落在走廊上，是第一轮清洗后留在那里的。第一层楼成堆的家具瞬间就消失了。在中间楼层，我找到了 M，她被查询者和抢夺者包围着。她的手上抓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大楼各间办公室的钥匙。我走到她的身边，她告诉我，她已经和区房屋维护办公室谈好了，如果他们把满是烂家具和垃圾的房间清理干净，他们的工人就可以折价买到一些东西。但是，她没有估计到，所有的工人都变成了家具的抢夺者。这种情况几乎立刻失去了控制。她请几个人至少照看一下在三个出口都搬走了什么东西。同时，她与当地学校的校长们不断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记下他们将要取走的家具。校长们都很高兴。他们现在至少有一个办公桌了，他们可以把教员室里破旧的人造革沙发扔掉，换上扶手椅了。他们将会有地毯、衣挂、彩电、椅子、小桌子、通知板和黑板。

一群孩子在一个气喘吁吁的老师的带领下冲了进来。他们把东西搬到进门的大厅里，看管起来，不让别人拿走。不过，到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的时候，半数的战利品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找到了地图，兴高采烈地拣到了空的塑料文件

夹，这些东西上学用得着。其中一间办公室还有不多的一些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他们也把这些书拿走了。在一个敞开的橱柜里躺着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夜校课程的笔记本。在孩子们把房间洗劫一空之前，M 就再次锁上了办公室，并在门上贴了一个条：“待售”。

有些房间的灯还亮着。我们没有走进去；混乱状态下还有人在上课。同时，各种组织的人都跑到这里来。在争抢掠夺品的过程中，无组织的个人也跑来了。他们报出一些名字，没有用。他们在四周转了转然后就走了。有一个上了锁的大厅被撬开了，里面孤零零地站着一棵凋零的、曾经是绿色的植物，墙上一张列宁的肖像盯着空荡的大厅。在另一个房间，我看到一个开着门的保险柜里有一堆列宁的半身雕塑：铜铸的列宁、大理石塑的列宁、白色的列宁、绿色的列宁、大的列宁和小的列宁。半身像是党工收集起来放在那里的，有些已经被他们带回家作纪念品了。我听到几个人在大声询问是否可以把它们拿走。墙上其他地方是一些价值不菲的装饰品。所有这些都都得拿走，因为宪法法院不需要这些东西。

328 室是新工人党（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即共产党的保守派）的临时总部。我们走进去，在一大堆纸张和报纸中间找到了两个老人。一尊列宁的半身像放在保险柜的顶上。M 要求他们把文件从橱柜里搬出来，因为橱柜的新主人很快就会来把这些东西搬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人没有作什么争辩，因为他们已经预计到这样了；他们已经找了一辆卡车把文件拉走，只是卡车还没有到。同时，他们还得腾出这个房间。一个妇女来找 M——她是租用了大楼一套房间的一个组织的代表。她非常着急。她告诉 M 他们的合同已经结束了，但他们还没有找到新的地方，他们无处可去，他们将不得不呆到警察

来把他们赶走。M 走在过道上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们包围着她，不停地问问题。很快，破旧的家具也消失了；地上还剩下几张地图、几个小盆、几根水管，还有一个绿色的消毒柜。

1 月 18 日：没有椅子了。我们坐在地板上的一块地毯上，旁边是成堆的家具，这是大楼一层最后一个还有暖气的房间了。大楼已经废弃，只有门卫的小亭里还有人守卫。从门厅吹来的冷风让人觉得发抖，我裹紧身子。我们开始谈话。

第一篇 结 构

第一章 结构的要素及其连结原则

在分析决策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时，我对一系列因素同时加以考虑，即所有权关系、党的作用和依附的性质，这些依附把党和非党组织里的决策者连结起来，并把党组织内的决策者与非党组织内的决策者连结起来。不仅如此，我把利益实施的可能性和结构内在地构建的不平等也一并考虑进去。所有这些因素的和造成了一个运行复杂的权力机制，其共同的基本原则构成了一种同构性的结构（a fractal-like structure）（Csanadi and Lorincz, 1992），^① 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在空间上、深度上和时间内自我相似的结构。不论我们考察的是中国的企业关系（Walder, 1986）、莫斯科与东欧政党—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Bunce, 1985），还是联邦国家内中央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Fainsod, 1958; Hough, 1969）；不论考察的是哪个时期的政党—国家体制，是稳定时候的还是解体之中的，是体制紧密时候的还是体制松弛时候的，我们都要碰到这些相同的基本原则。

共同的基本要素及其连结原则可以用三类关系的同时存在来表述，这三种关系是在决策者之间演变而来的。这些关系是在（1）正规的等级体系之内；（2）等级体系之间；以及（3）

通过考察一个物体在放大不同倍数时的结构可以看到它是否为一同构结构。如果该物体是同构的，那么它在不同的放大倍数下呈现的结构是一样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关于自然界中的同构性，见 Mandelbrot（1983）。

通过结构性反馈的系统演变而来的。

第一节 正规的等级体系

在政党—国家体制内，有两个基本的正规结构：党等级体系，以及所有其他非党的等级体系，^①不那么严格地说，可以称为国家等级体系。后者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组织，并包括了被垄断的经济和国家所有权。图 1.1 用金字塔的形状简要地描述了这两个等级^②结构。这些金字塔是由各个决策者组成的，这些决策者是构成这些结构的制度的组成部分。

图 1.1 勾画两个金字塔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有一个顶峰和一个清晰的底部。在国家等级体系里，顶峰是总理，底部是最下层的国家组织单位（企业、医院、剧院、地方委员会等等）。在党等级体系里，顶峰是党的第一书记，底部由在最下层的国家组织单位里活动的党组织构成。^③因此，在正规的等级体系里，任何一个层级上的行为人都享有各自的级别。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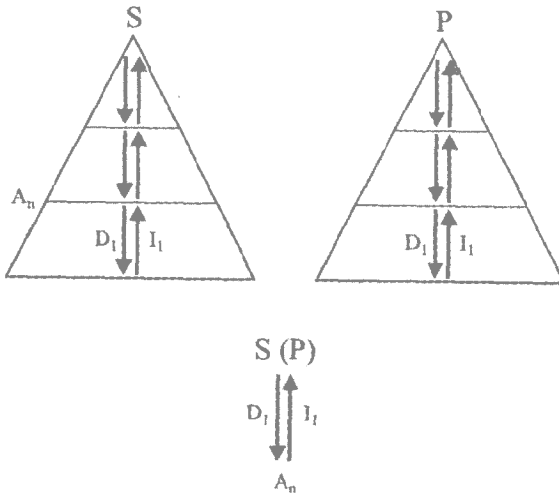
^① 在本书的整个研究里，“国家”这个词是广义的用法，它包括一切不属于党的组织结构的机构、组织和决策体系的命令传递环节，不论它是合作社、工会、部门还是企业。正因为此，本书的用语“非党”也常常作为“国家”的同义词来用。

^②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等级制的原则表明，任何一个问题、任务、冲突，事实上，任何一个要加以决定的社会现象，都拴进了等级的活动链。在一个决策作出以前，必须自下而上经过界限分明的几个阶段。然后在相反的方向上，这个决策通过同一个垂直的制度链条（先前用来向上传递信息的链条）传递到产生问题的底层。”（Bihari, 1985: 115）

^③ 只是为了分析的简化，这个层次才被看作是最底层的，因为在非党机构里还有更小的单位，其中的党组织在党等级体系是更低层的。根据有关的规定，三个党员以上就可以建立一个基层的党组织（Csanadi, 1984: 48）。

的层级上，越往上意味着权力越大。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层级上，所有的行为人都同样程度地依附于更高级别的行为人，同时他们对比他们级别更低的人行使同样程度的权力。等级结构内的依附方向在图 1. 1 里是用 D_1 连线表示的。

图 1. 1 正规的等级体系里 A_n 沿着 D_1 连线可能的利益实施途径



注：

S 国家（非党）等级体系

P 党等级体系

A_n 在结构内第 n 层级上的决策者（行为人）

D_1 等级内的依附方向

I_1 等级内的利益实施途径

图 1. 1 也表明，不同层级上的行为人之间的依附是直接

的，因为各个决策者只有通过这些依附连线（ I_1 连线）才能实施他们的利益。由于两个决策者之间的依附起源是不可改变的，无论这种依附是组织内的还是组织之间的，所以依附是单向的。不仅如此，由于相邻的层级在利益实施的过程中是不能逾越的，所以依附是单线的。

应当指出，在实际运行上，这两个等级体系不是互相隔离的，而是互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情况改变了等级体系的内部特征。

第二节 交叉连线

党和国家等级体系的相互渗透是党在几个工具的帮助下对所有非党的社会领域行使普遍的监督职能的过程中演变而来的。这些工具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利用党员纪律控制大多数关键职位、活动和组织从而控制国家等级体系里的决策者的工具。最重要的工具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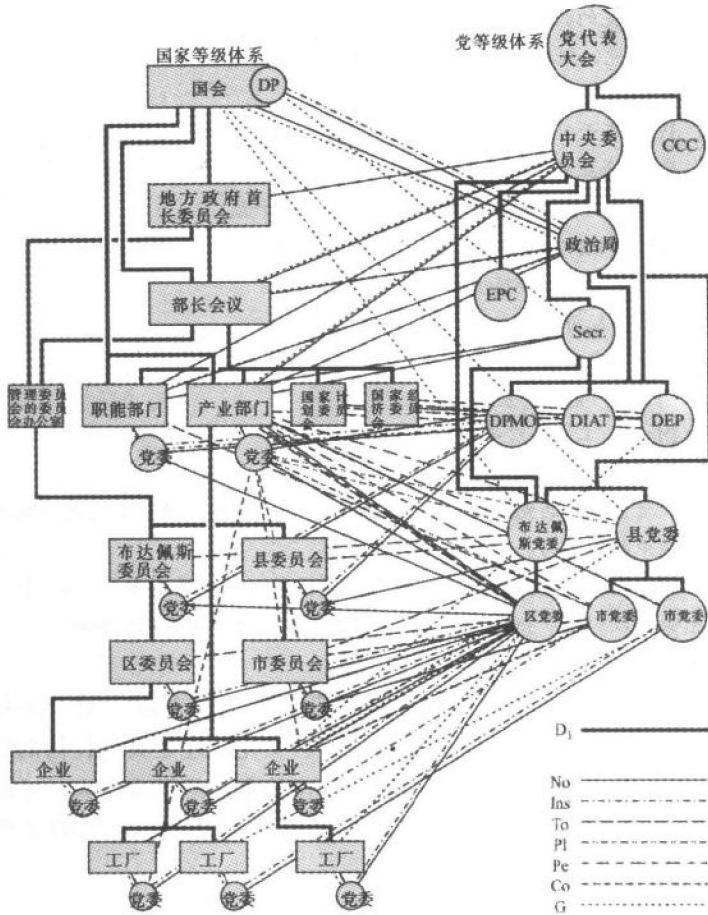
1. 干部任免权（干部任命花名册系统 – *nomenklatura system*）；
2. 事务负责制（归口管理制）；
3. 地区负责制（指示体制）；
4. 党的纪律。^①

通过对这些工具的应用，党的控制达到个人从而能够渗入整个非党的决策结构。这些工具穿过国家等级体系的壁垒，穿过被它垄断的经济（以及文化）体系的壁垒，从几个方向达到

^①关于这里列举的工具的详细评述和应用这些工具的管辖权限的描述，见 Csaradi (1984)。

各个决策者，传递各种预期，同时起到控制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按顺序考察这些工具（图 1. 2）

图 1. 2 基本网络



职、调动、提拔、组合、培训都是如此。^①

让我们以 1980 年成立的工业部（MI）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新的机构是由三个产业部门（冶金与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重工业部）合并而成的，按规定它们应在 6 个月的时间内组织成为一个可以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单位。在这个时期末，部门高级官员逐一访问了各县党委。其中在访问佩斯县党委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对话：

县委第一书记说：“同志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向我们的执行委员会通报我们对工业部的关注，详细阐述我们的经验和观点……6 个月来，我们不得不把工业问题放在一边，其中有些问题是地区党组织负责不了，或者是不愿负责的。让我们先从企业经理加薪这件不好的事情说起。加薪的方式是不合规范的；如果地区与部保持持续的沟通，整个事情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做的。这里有党的关系，部里侵犯了我们的管辖权（就是说，忽视了党在这个方面的制度化的权利）”

副部长说：“要进行的协商太多了；我们希望跟上情况的发展而不浪费太多的时间。如果我们在太多的方向上进行太多的协商，办事的质量要受到损

关于干部管理条例的完整表述载于《党的生活简明辞典》（1984 布达佩斯：Kossuth Könyvkiadó）第 61 页。关于干部管理责任制的诞生、沿革和运行，见 Fainsod（1958）；Csanadi（1984）；Rigby（1988）；Voslensky（1984）；以及 Szakadai（1990）。

注：

D₁ 正规等级体系里的依附

No 干部任命制度

Ins 指示体系

To 党的归口管理制

Pl 党的联络制度：部门领导或其代表与地区党组织的定期协调和

磋商

Pe 在干部问题上党组织与产业部门的人事部门之间的联系

Co 企业党委书记与产业部门党委书记之间的定期协商

G 党以普遍的监督责任的名义实施的干预

DP 国会中的党员议员

CCC 中央控制委员会

EPC 经济政策委员会

Secr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DPMO 党和群众组织部

DIAT 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

DEP 经济政策部

党员应遵守的纪律无法独立地标示，因为它是在所有其他连线的动态过程中起作用的。

关于依附连线实际到达哪些职位的问题，可以参看附录 1 的例子，该附录仅以党的中央机关的一个工具——干部任免为例说明问题。

1. 干部任免权，或干部任命花名册制度（No）。这个制度意味着，任何组织，无论是经济的、文化的还是其他任何的组织里，只有那些事先得到主管该职位的党组织批准的人，才能被选上或提升到那个重要职位上。这些职位上具体人员的免

害……”

县委书记说：“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我们的管辖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与你们都有一定权限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打算放弃我们的管理权限”。^①

但是，不仅党委可以要求享有决定非党组织活动的一定权利。干部任命系统在党等级体系的各个层级都是存在的。例如，1980 年对国家高级领导职务的任命首先是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批准，然后才是得到国家机关相关上级的批准。副部长、部长助理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必须首先经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政治局（PB）的批准；其他的部门高级官员和委员会领导人部分要经过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批准，部分要经过部党委领导的批准；经济单位的领导按规定由相关的地区党委（区、镇或县）批准。因此，不论具体的事务和组织是什么，通过干部任命系统^② 控制关键职位构成的网络，党能够对非党结构内的决策产生影响。

副部长访问佩斯县党委会议纪要，1981 年 6 月（Csanadi, 1985a）。

^② 干部责任系统可以用另一个词来表述。西方与后来的东方学者使用的是俄罗斯的原文，即，*nomenklatura*（干部任命花名册）因此，干部责任系统是这个词的同义词，指的是关键职位和在这些职位上任职的人的名单。当然，干部责任系统（干部任命花名册）不仅关系非党结构里的重要职位，而且关系党结构里的重要职位。因此，布达佩斯党委书记和各县的党委书记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地方党委批准任命；部委的党领导（党委书记和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由相关的县党委和中央委员会的党和群众组织部批准；市级和区级的党委书记由县级和布达佩斯一级的党和群众组织部批准，还要有中央委员会主管经济政策的书记的批准；其他机构的党委书记由该机构所在的区党委批准。许多与人事相关的事务必须得到这些机构的事先同意。

2. 归口管理制。因为党必须实现自我规定的目标，所以就建立了满足党的战略重点先后秩序的归口管理制度，这些重点是对诸如就业、投资、工资、外贸、教育等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定期作出的决定。这些责任分配给权力等级体系中不同层级的党组织，赋予这些组织的成员进行干预、提出建议、制定计划草案以及促使国家等级体系里的相应官员负起责任，而不论执行这些事务的组织类型如何均如此。^① 通过事务责任制，党介入各种非党组织的日常活动中，下面的引文就是一例：

“实际上，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定期，甚至几乎是每天与部里保持联系，这取决于具体事务是否要求如此。如果刚好有某个问题，那么我们会每天保持联系，否则两或三周联系一次。但这种联系完全是定期的。

有些事情的解决方案是由我们制定的。我们建议他们注意这个或那个问题，然后把他们的建议在不同的场合下提交讨论。有些事情是社会和国家机构倡导办理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些事情的解决。最后还有一些已经找到解决办法的事情，我们也会收到准备付诸实施的最后方案的简报……”（中央经济政策部主任，1984）

事务责任的官方定义参阅《党的生活简明辞典》*op. cit.*，第131页。关于事务（归口管理）责任制的详细分析，见 Fazekas 与 Kollo (1985; 1987) 以及 Csana-di (1984)。

因此，通过事务责任体系，党控制着活动的结构从而可以影响和监督决策。

3. 地区责任制或指示体制。在每一个非党的机构里，无论它是一个军事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县或区委员会，还是一所学校等等，当地的党员都要组建一个党的单元。在指示体制内，组织非党机构内的党组织活动的责任被赋予党等级体系里各个级别上的党机关。^① 例如，党中央机关某个部门的一个干部负责产业部门党组织的活动，另一个人负责职能部门党组织的活动，再有一个人负责工会里党组织的活动；^② 而区党机关负责位于其辖区内的党组织的活动或对这些活动的协助，比如对位于区里的所有企业的党组织活动的指导和协助。因此，机关人员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现场”办公的。通过这个方法，代表党的指示发布人不仅能够监督基层党组织的活动，而且通过它们的活动来监督这些党组织所在的非党组织的活动。

下面一份部门党委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递交的报告表明了实践中这些联系是怎样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部门党委应该知晓所有重要的任务，实际上，党委应该能够从政治的角度影

^① 指示体制的官方定义参阅《党的生活简明辞典》*op. cit.*，第 56 页。关于指示体制的更多信息，见 Csanadi (1984; 1987a, b); Fainsod (1958); Fazekas 与 Kollo (1987); Hollo (1987); Horvath (1988); Horvath Szokolczai (1989); Nagy (1987); Urban (1988); 以及 Walder (1986)。

^② 产业部门指的是，如：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MMMI)，重工业部 (MHI)，轻工业部 (MLI)，食品工业部 (MFI)，等等；职能部门指的是，如：财政部 (MF) 外交部 (MFA)，劳动部 (ML)，内务部 (MLA)，以及国家计划总署 (SPO)。

响这些任务。因此，在党委及其执行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上，在头 6 个月的 12 个不同场合上，部门党委处理了重要的工业问题、相关的产业部门问题、以及部门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它主持了修改经济指标及其相关的政治任务的谈判；关于与企业内部组织的授权相关的谈判；关于培养新部门干部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及计划之实施的谈判；以及关于协调中期计划的谈判和关于按照政治局的相关决议在乡村开办工厂的谈判。^①

这份文件还表明，在指示体制的帮助下，通过组织性的结构，党能够在权力结构内生存下来，并且能够影响权力结构内部的决策。

4. 党的纪律 (P)。党员身份意味着一个人有履行和传达党的指令的义务。不论个人的观点、职位或他所属的机构如何，都是如此。^② 因此，与其他的所有手段不同，党还通过个人的服从来施加影响。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1984 年开始实施一种新的企业管理体制，下放了一部分部门决策权。企业相对于监督部门的依附连线 (D_1 连线) 和相对于党组织的依附连线 (D_2 连线) 都被放松了，企业内部的依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车间的四个支柱 (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工会、经理) 都往后靠了，由选举产生的各个车

^① 关于与按照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971 年 1 月 4 日决议制定企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有关的冶金与机械工业部活动的分析，197 年 6 月，(M. Cs.)

^② 关于党的纪律和守纪律行为的官方定义见《党的生活简明辞典》，op. cit.，第 111 至 112 页。

间的代表组成的企业委员会的决策变成是决定性的了。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即为了“罩住”^①企业的活动，中央党组织对企业党组织及其成员发出了以下指示：

在企业领导机构内工作的共产党员肩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责任，他必须在企业决策过程中代表党的观点……企业领导机构内的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此而言，党组织定期评估和指导企业管理委员会里共产党员的工作和选举产生的领导团体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党组织确定的立场必须优先于经济决策，它们在时间上也应该根据规定的决策时限（计划准备、形势报告、损益报告等等）作出调整。党组织应该要求部门负责人和经理人员负起责任。^②

前面描述的交叉连线在决策结构内的任何地方都能够活动起来，只要那里有党员（P），或那个机构内有党组织（Ins），或那里的职位在党看来是值得注意的（No），或那里的事务对党来说是重要的（To）。

“罩住”是党的圈子里的行话，它的意思是，为了使党能够保持足够力度的监督，党机关的内部组织结构，事实上甚至机关内更小的任务型的单位都比照非党组织的结构、活动分工和职能分工来设置；换句话说，就是罩住它们。例如，党中央机关的各个部门经常为了达成“最佳程度的罩住”而一再地重组。不仅如此，国家机构的重组之后，党机构会作出完全相似的重组（Csanadi, 1985a, b）。

^② 《关于与经济有关的党组织活动和与引进新型企业管理模式有关的党组织活动的指导》第 8 至 9 页，1984 年 10 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建工作组出版（M. Cs.）。

这四个工具是实施党的经济或文化政策的保证。亚诺什·卡达尔在 1975 年第 9 次党代表大会上用下面的话总结了它们的运行原则：

党的监督活动必须包括一切社会活动——它必须涵盖经济、国家、科学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党的监督的目标不单是发现错误并惩处相关的责任人，这是自然的。党的监督的实质是帮助党的决议的实施，准确评价某个领域的国家事务，提出适当的建议，改进执行状况，普遍地应用经过了良好试验的技术。^①

后来，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尔帕德·普莱伊（Arpad Pullai）对这个论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在这个报告里，中央委员会强调，我们应当改善党的监督把它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去……应该使每一个人明白，我们并不是出于不信任或要把事情搞复杂才这样做，而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对受监督的企业、机构和个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果情况要求如此，那么就应该要求那些不管不顾和不负责任的人承担起责任，不论他的级别或地位如何；同时必须创造出促使事情得到改进的条件。^②

中央委员会（1975）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与群众组织的活动”的一份报告，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1 次代表大会纪要》（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第 114 页。

“评论”，同上，第 327 至 329 页。

这些交叉连线使党能够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整个决策领域，并且能够同时从一个以上的方向对决策者的行为施加直接的影响：作为职位的分配者（No）；作为组织的代表（Ins）；作为活动的推动者（To）；以及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P）。表 1.1 以工业部为例说明了这种多条连线的影响。

表 1.1 工业部各类工作中党员所占的比例
(1982 年 4 月 30 日)

工作类别	百分率
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	100.0
司局长	100.0
副司局长	90.0
处长	92.0
科长、工作组组长	77.3
职员	33.3
后勤人员	9.4
总计	68.5

资料来源：1982 年工业部干部成分报告。工业部教育与人事处 (Csanadi, 1985a: 211)。

我们看到，越接近战略上重要的职位，党员的比例就越高，他们的管辖权力就越大。因此，决策越重要，与之相连的交叉连线就越多，那些有义务遵守部党委决策的人（通过党纪的约束）所占的比例就越高，那些其任命、免职、调动、评价等等取决于部党委（1980 年起是取决于中央委员会的相关部门）的人所占的比例就越高。

信息交换、协调、监督和合作的日常工作都通过这些连线来实现。通过这些连线进行的活动其强度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不论在整个结构（空间）上还是（每一个交叉依附连线）在时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① 连线的发展从单纯的存在通过合作确定了有约束力的秩序。不同类型的交叉连线只能在理论上作出区分，因为各种责任常常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责任隐藏在另一种责任里；同时，党机器中的单个人也对许多事情负有责任。

有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所保持的联系其密度有多大，让我们考察一下 1981 年为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处理机械工业状况准备的日程报告。从日程上我们看到，在报告修改的过程中，草稿由相关机构至少讨论了两次，而中央委员会的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至少进行了如下的三次谈论。^②

机械工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向经济政策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最后期限：1979 年 5 月 21 日

^① 与实际的事务或事件有关时连线就发挥作用；例如，在执行高层政府和党的决议的过程中就起作用。让我们以 1980 年代工业部承担的责任为例。1980 年与执行和承担政府责任有关的事项总数达到 2343 个，其中四分之一与工业部有关；1981 年高级政府委员会分配的任务，工业部要承担 143 项，其中的 99 项是协调责任，44 条是合作责任。工业部参加了 24 个国际性的委员会，56 个国内委员会，这些都需要承担磋商工作（资料来源：“1981 年工业部活动简报”补充号 2，1981 年 12 月 2 日。Ig. 1985/81）。(M. Cs.)。

^② 在报告和建议不是直接提交给经济政策委员会而是提交给其他更高级别的机构时，干预是比较间接的。间接是指党的机关自动地成为建议的辩论阶段的参与者，例如，一些中央委员会的机构（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经济政策部）的官员和部党委书记是报告提交之前的部级讨论会的当然参加者。通过他们肩负的地区责任或在指示体制的帮助下，同样的这些人也可以要求部领导负责。

日 程

·经各部门领导同意的草案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小范围的部级会议。

·2月12日：把草案第一稿提交给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

·2月21日：讨论草案第一稿。

·3月5日：修改和完成草案第二稿并提交给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与相关组织评议。

·3月20日：索取对冶金与机械工业部提交的草案第二稿的评议。

·3月28日：修改并把第三稿提交给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及相关组织。

·4月3日：在有其他部门人员参加的部级会议上讨论第三稿。

·部级会议后修改草案并把新的草案提交给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

·4月10日：把这份草案提交给副总理级协调会议。

·5月7日：把这份草案提交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经济政策委员会。最后期限：5月21日^①

日常决策的整合和对日常信息的需要不仅在行政部门是这样，在企业部门也是如此。下面的访谈摘录反映了这一点。

部级会议回忆录。主题：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向经济政策部作的报告，1979年1月（MMMI）。（M. Cs.）。

“你提到你们引进了一个新的方法以便获得每天的新信息。关于每天的信息怎样收集有统一的指导原则吗？”不，没有。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法。至今仍是这种状况。有一个专职的同事，他可以打开保存了所有记录卡片的档案柜，有这些卡片他可以告诉你所有企业的所有指标……事实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也迫使企业党委书记去了解企业里发生的事情。有一些工作人员……要求党委书记每天早上向他们简要汇报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这种电话一般花三分钟。我有一个同事，他要照看 4 到 5 家企业。每天早上，他都要开车去访问它们。”（经济政策部前官员，布达佩斯党委，1983 年）

交叉连线（ D_2 ）与正规等级体系里的连线（ D_1 ）很相似——不仅确保了多方向上的影响能力，而且在协调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在多方向上传达利益的作用，即，那些被连线所连结的行为体的利益。某个行为人在特定的形势、时间和事务上能够利用这些连线来表达和实施其利益的程度是现有权力关系的结果。

下面摘录的访谈是关于企业兼并战略的，它表明了现行权力关系和利益实施能力上存在的差异：

“如果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同意，在它们的支持下，我们将与社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接触。即使在这个阶段 兼并还是可以避免的。”

“受威胁的企业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地方党组织同意，那么什么也做不了。”

（冶金与机械工业部，部门主管，1978 年）

通过这种方法以及利益的交流，交叉连线决定了非党决策者相对于党等级体系的代表的关系，决定了后者的期望。因此，按照党的期望作出调整并不是强制的结果，而是追求界定明确的、被认可的利益的结果。

在通过连线实现的交流过程中，党与非党的决策结构变得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结构，我称之为基本网络。图 1.2 展示了这个基本网络的复杂性，其中，在正文提到的 4 种工具以外，还列举了其他几个工具。这些工具是出于以下原因形成的：

所谓党的联络制度（pl）。这是一个关于管理和经济事务以及有关劳工政策问题的定期沟通形式，是地区党委书记们与部党委书记之间以及通过他与部门各高级领导之间的定期沟通形式。

在地区党委的日常工作中有一项事务，就是把与企业 and 中央委员会宣布的国民经济目标相关的那些当前重要的事情放到议事日程上，并邀请相关的副部长出席磋商会议（Co）。

如果某个企业的困难在部级会议上讨论，或者如果一家企业的经理受邀向部里作汇报，那么企业所属地区的党组织书记也将受到与会邀请（M）。

在所有的干部问题上，包括任命、免职、工资、奖金、成绩评估和政治评价问题，地区党委与所有相关部门官员（部长、副部长、人事部门、企业监督部等等）都保持着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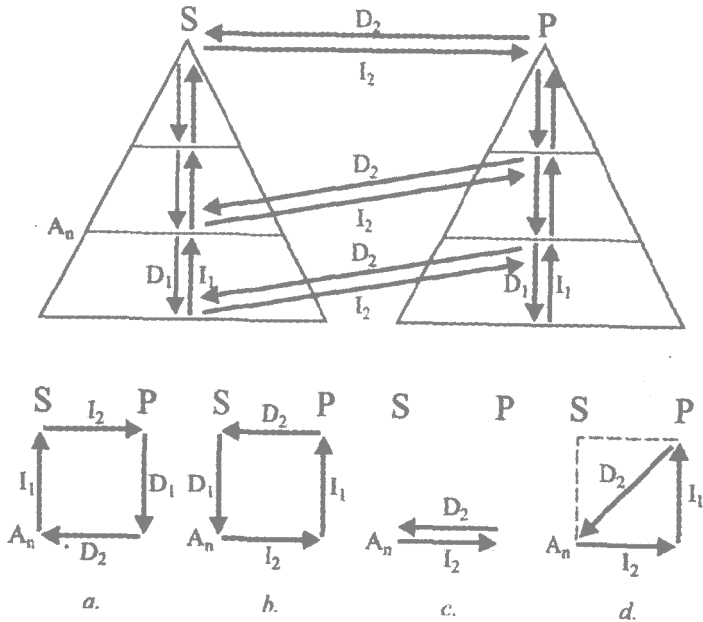
国会里的党员议员，作为一个集团，必须定期与中央委员会进行磋商。

此外，在党对经济负有总（普遍）责任的基础上，党可以

干预任何它认为应当干预的领域 (G) (Csanadi, 1984)。

这个结构是由党和国家等级体系决策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等级体系内的连线 (D_1) 和跨等级体系的依附连线 (D_2) 发展而来的。^① 图 1. 3 展现了基本网络的主要特征。

图 1. 3 基本网络与 A_n 通过 D_1 和 D_2 实施利益的可能途径



注：

S 国家 非党 等级体系

^① Bihari (1985) 把结构在实证上的相互关系称为等级体系的相互陷入 Bunce (1985; 1989) 则称之为经济域和政治域融合。

- P 党等级体系
- A_n 结构内第 n 级的决策者（行为人）
- D_1 等级体系内依附的方向
- D_2 跨等级体系的依附的方向
- I_1 等级体系内利益实施的路径
- I_2 跨等级体系的利益实施路径

至此，基本网络结构只有一个顶峰，位于党等级体系。依附仍然是直接的，因为无论我们考虑的是 D_1 还是 D_2 交叉连线，利益实施（由 I_2 连线所代表）都只能通过它们来实现。依附仍然是单向的，因为无论在正规结构内还是就交叉依附连线而言，依附的起点都是不可改变的。^① 党等级体系派生出来的交叉依附连线的起源的不可逆是政党—国家体制的第一个基本连结原则。

交叉依附连线渗入了整个非党等级体系的依附关系，因此它破坏了正规的等级制度的规则：各机构如今不再仅仅依赖于自己的上级机关了，个体不再仅仅依赖于机构内的上级了。交叉依附连线跨越了组织界限并直接联系到了各个决策人。这种直接联系使得各方对对方活动有着即时的、双向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正是这一点把每一项政治行为都转变成了经济行为，反之亦然：每一个经济行为都转变成了政治行为。也就

就 D_1 依附连线而言，这个论点是清楚的：不是地方政府主席任命部长会议主席，而是部长会议主席任命地方政府主席，企业经理也不能决定哪个部长来监督他们。通过更细致的观察， D_2 连线的单向性质也是明显的：地方政府领导，企业经理，以及部长都不能决定各级党组织的书记，他们也不能要求这些书记对任何事情负责。此外，他们决不可能向所属地区的党委或本单位内的党委发出指示。

是说，一方面，交叉连线使得经济利益和经济活动能够对政策施加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党的利益和决策的追求会产生直接的经济后果。与此同时，交叉依附连线与决策者的直接联系不仅产生了多线的依附；而且造成了决策者的结构性的原子化，即，他们处于结构性的互相隔离的状态。原子化使得决策者在连线控制者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抵抗力量，这些控制者是一支统一的力量，其形态是“党”。

下面摘录的访谈说明了依附的直接性。这个访谈是 1981 年中央委员会机构重组和三个产业部门的合并与重组后做的，这些重组的目的是减少对企业活动的行政干预：

“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停止工作是一个解脱。我们在其属下工作非常费劲，但是，经济政策部开始接手他们的事了。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例如，如果经济部有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他索取相关资料和详细报告，如果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东西，那就会有麻烦了。因此，我会尽量依照他们的愿望去做。例如，如果经济政策部和哈瓦希（Havasi）同志^①到什么地方去，就会要求我们第二天早上准备好对 1981 年和 1982 年工作的评估，对上一个五年计划的评估和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评估。或者：到第二天上午，我们要能够说出（以及用统计数字说明）在执行计划和利润率之间存在着——或不存在——什么样的关系。”（1983 年，工业部，企业监督局）

从 1980 年到 1988 年，Ferenc Havasi 是中央委员会主管经济政策的书记。

图 1.3 形象地概括了跨越制度界限和直接联系到个体决策者的交叉依附连线造成的结果。它展示了个体决策者多向的利益实施途径，这些途径是由他（她）在国家结构及其机构内具有的多线依附带来的。

图 1.3 里的 (a)、(b)、(c)、(d) 四种可能性表明，在交叉依附连线的帮助下，一个决策者能够越过他（她）的直接上级，从而利用新的利益实施机会。

下面的例子说明了存在的各种机会：

a. 一个企业经理可以说服他（她）的产业部门上级 (I_1)，通过产业部门与中央机关的联系 (I_2)，让中央机关发布命令给地方党组织 (D_1)，指示地方党组织召开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把这个企业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地方党委就会要求经理提交有关企业状况的报告 (D_2)。其结果通常是企业得到帮助；

b. 通过地区的指示体制 (I_2) 和 (或) 地区或中央机关的归口管理制度 (I_1)，可以影响产业部门 (D_2)，比如，使得企业的活动纳入某项长期的技术发展计划 (D) (这样的计划总有一批各种类型的帮助，包括预算补贴和优惠贷款)；

c. 通过地区级党组织里主管特定事务的个人 (I_1)，可以获得各种很难得到的产品或原材料，或可以同国家组织或其他企业建立良好的关系 (D_2)；

d. 通过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 (I_2)，一家企业可以试着让自己列入中央机关或中央书记 (D_2) 访问的名单上 (I_1) (在这种名单上的企业未来一般都能得到某种直接的支持)。

让我们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前文所述的 (a)、(b)、(c) 和 (d) 的某种结合。这个例子分别发生在很不相同的两个时期。第一个例子是 1964 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个决议，决议规

定了吉奥尔—硕普隆县党委在完成出口指标方面应承担的经济政策任务，并规定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决议具体规定了党和国家机构内应负责的个人，因此显示了利益实施的机会：

县党委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做经济和政治的监督工作……下月底，县党委要总结阻碍生产和完成出口指标的一切重大问题，要总结超出了地方经济领导层权力的解决方案，并把这些问题和方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工业与国民经济部。

中央委员会的工业与国民经济部要保证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在符合 1965 年计划的框架下消除已查明的障碍。^①

第二个例子在 80 年代早期工业部刚成立的时候。从工业部的活动中撤除了过去产业部门的干预职能，这并没有导致日常干预活动的消除，只是导致了这些活动在网络内发生转移。这个领域里部门的“缺位”使得日常干预和管理任务分配给了职能部门和党组织。下面摘录的访谈也体现了这个过程：

“区党委在 1980—1981 年间有什么样的反应？”

“还是完成经济任务的问题。我们在解决许多内部问题时得到了巨大的帮助。例如，还债日期重新安

关于根据 1963 年 12 月 5 日中央委员会就地区和企业党组织组织经济活动促进出口计划的完成所作决议给 Győr - Sopron 县党委的指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史文献研究所 (IPHA), 1964 年 9 月 23 日。书记处决议 (文献存放单元为 288. 20/47)。

排（推迟债务偿还期限）的问题，区党委和布达佩斯党委在各种场合都提供了很多帮助。其中最重要的场合是布达佩斯党委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能够使大家注意我们的问题。部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区党委有意安排我们作报告，从而使我们的问题让大家知晓。匈牙利国民银行的一位副经理也是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正是这个会议上取得的成果打破了我们与匈牙利国民银行谈判的僵局。在各项措施之中，这个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企业的未来不太确定，企业内的政治气氛已经相当恶化，员工的裁减已经成为关键的问题。（企业党委书记，1985）^①

多线的依附和利益实施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决策者都能享有的。只有那些至少有一条连线把他们与党等级体系连结起来的决策者才享有这些机会。对于那些只有等级体系内的依附的人来说，机会就有限得多了，而对于那些没有制度纽带的人来说，机会就更少了。没有直接的利益实施渠道，他们也就只能任由这个环境摆布了。因此，是这个群体构成了结构的最底层。

交叉依附连线使得结构发生了转化，在正规等级体系里级别相等的机构和决策者中间，在依附和利益实施机会问题上，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变得制度化了，这种不平等渗透了整个体系直至个人。由于这种新型不平等的存在，要清楚地划分国家等级体系内垂直依附和单线依附的层级及其系统就变得更加困

^① 与 Erzsébet Szalai 的访谈材料，并得到了她的允许在此使用。

难了。另一方面，“党”——与非党的活动和结构性的不平等有着有组织的联系——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应具有的特征，而转变成了全面的、囊括一切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

从基本网络的结构和行为人的处境的角度看，很显然，通常认为的存在着社会与（国家、中央）权力两重性的概念是不适用于这个体制的，因为不能仅仅把那些被剥夺了一切制度连线的人看作是社会整体。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不能认为只有产生于决策者的制度关系的结构才是权力体，因为，由于它们自身内部的结构性的不平等的存在，社会和权力结构已经与个体决策者交织在一起了。^① 由于相互的交织，要在纯粹的意义上应用党与国家、政治与经济的两重性的概念也是不可能的。也正是这种相互的交织造成了个人的私人利益与他（她）作为权力结构一员的利益无法区分开来的状况。^②

D_1 和 D_2 连结的主体、它们的连结原则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是所有斯大林主义体制共有的基本结构特征——也就是说，它们是同构结构的要素。这种结构上的自我相似性从这个体制类型在苏联的发展初期^③ 到它在那里稳定下来^④ 都是一直存在的；无论是这个体制“严酷的”还是“温和的”版

由于这个体制内各结构之间高度的相互交织，在各领域界限较分明的其他体制里应该完全分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在这里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例如，权力结构、决策结构、政党 - 国家系统、决策系统）

^② 关于这种相互交织在社会和个人的行为模式中的表现方式，Szabo (1990) 与 Walder (1986) 进行了最好的研究。

^③ 见 Rigby (1988) 与 Schapiro (1970)。

见 Fainsod (1958) ; Grossman (1983); Hough (1969) ; Hough 与 Fainsod (1979) ; 以及 Zemtsov (1985)。

本,^①无论这个体制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是在中国、在匈牙利还是在苏联,都存在着这种自我相似性。^②这个结构特征(或形式)甚至适用于苏联最不稳定和进行残酷清洗的时期以及二十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社会动员时期(Fainsod, 1958),因为自我相似性并没有受到连线两端的行为人是稳定还是动荡的影响,没有受到连线的密度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的影响,或者,事实上也没有受到连线起点的层级的变化的影响。时间上、空间上、严厉程度方面或条件方面的不同并没有改变基本特征,它对所有这些国家来说都是共同的和至关重要的,这个特征就是,基本网络是由共同的要素——等级体系内运行的依附连线和把等级体系连结起来的交叉依附连线组成的,是由根据共同的连结原则造成的依附和利益实施关系组成的,其中,国家对所有权的垄断和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在这种共性之外,基本网络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论是考察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例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或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的变化,还是考察不同地点的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东德或南斯拉夫),我们都能看到差异。基本网络出现差异是因为构成体制的制度结构的结构要素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又取决于交叉依附连线(D_2)的类型,它们的选择性(它们伸入或不伸入某些领域)和密集度,这些连线在党等级体系里的起点所在的层级,网络

见 Bunce (1983); Oi (1986); Staniskis (1992) ; Voslensky (1984); Winieczky (1987) ;以及 Wolchik (1990)。

^② 见 Walder (1986; 1989; 1992); Burns (1987); Bence 与 Kis (1981); Csanadi (1980; 1984; 1985a; 1985b; 1987a; 1987b) ; Fainsod (1958); Rittersporn (1979; 1983); 以及 Voslensky (1984)。

覆盖的非党活动的规模（换句话说，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垄断了资源），以及对与垄断资源分配相关的决策管理权力在结构内进行分配的方式。所有这些都影响了 D_1 与 D_2 的强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对强度，使其出现差异，从而使权力的行使和利益实施出现差异。连线强度在两个方向上的不同体现在通过它传递的信息、要求和影响的数量和频率上——即，体现在对它们的应用的密集程度上。

在交叉连线的基础上，基本网络内的不同权力分配正是以不同的方式从分权的结构演化为集权的结构的。正因为此，基本网络内不同的权力关系也为理解不同的斯大林主义体制“严酷”程度的差异提供了一把钥匙。

这也表明，不能把一切情形下的基本网络都看作是一个集权的权力结构。集权仅仅是基本网络的一个类型。在这个版本里，所有的交叉依附连线都起源于结构的顶峰，所有的资源和特权都是中央分配的，体制的不平等是结构顶峰的人的决策的结果——罗马尼亚就是这个情况。把基本网络和等级结构与基本网络和集权的权力结构或集权的等级权力看作是一个东西，将在考察体制运行的问题时导致错误的理解。所发生的误解是非常广泛的：从西方文献关于全能主义的根本观念到匈牙利过去的专业文献都存在着误解，前者把集权和基本网络混为一谈，或者把基本网络里专断的决策结构与等级制度混淆了；后者则把决策的分权化或基本网络的交叉连线的分权化与等级制度所垄断的决策的多元化混为一谈，从而期望分权化能够带

这里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由于权力的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大差异，以及这些不同的结构里利益分化差异很大，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把这些权力安排称作是专断的。

来自自主的决策。

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献都没能解释基本网络内部结构上存在的多样性，没能解释由这个多样性造成的运行模式上存在的极大差异，因此，它们倾向于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政党—国家体制看作是非常不同的体制。同样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把这些有基本网络的体制与那些没有基本网络只是高度政治集权的体制看作是类似的。因此他们把政治领域的垄断与政治对整个结构的垄断混为一谈了（例如 韩国与中国的情形）。

在垂直的交叉连线以外，还有一个要素使不同结构之间的差异性变得更加丰富：这是第三种类型的、决策者之间直接的个人联系，它扩大了体制内的不平等，并通过这种方式使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体制变得“松散”，从而使体制的运行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把这个要素称为结构性的反馈关系。在自我相似的基本模式之外，是基本要素的不同的总和造成了各体制采用的战略和工具不同，也造成了它们在效率上和局限性上的不同。

第三节 结构性的反馈

前文描述的通过 D_1 和 D_2 依附连线达成的利益实施渠道 (I_1 和 I_2) 可以看作是个体的反馈机会。就决策而言，这些反馈可以发生在具体决策作出之前、之中，也可以在此之后。但无论在哪一种场合下，反馈的目标都仅仅是党或国家等级体系里的直接上级，^① 或党等级体系里控制了交叉连线的上级。但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在这些结构里我们通常会看到越过了行为人的直接上级送达等级体系内更高层级的大量请求、信件和报告。这些请求和信件通常都再次转交给了被越过的人，这些人被认为是最适合于处理这些事务的。

是，还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这两种情形的反馈，它不是直接通过依附连线达成的，而是通过对依附连线的利用，越过连线的控制者；这就是结构性的反馈关系（ I_3 ）。

这些反馈关系有着共同的特征：每一个反馈都是由结构性的特性形成的，并且都是直接的、个体的和私人的联系；因此，它们是原子化的。也因此，它们本身就致力于原子化的利益实施，并对此有内在的驱动。这些在结构的建立过程中形成的联系可以在结构转型的任何时期发生变化或截断。

由于联系的私人性和可变性，行为人的无力防卫状态在各种情形下仍然持续存在。然而，只通过 D_1 和 D_2 连线进行的联系是愈加无力防卫的，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同盟关系只能间接通过行为人的上级达成。但是，那些拥有结构性反馈（ I_3 ）的人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虽然对其他人来说权力是作为一个专断的单位在运行的，对它们来说权力降格为多元利益的一部分，因为它们能够“绕过”那些控制着它们的依附连线的人（见附录 2 图 A.a—A.f）。在利益实施方面还有一个差别，即，第一种实施途径（ I_1 ）只能在本等级体系内实现，第二种（ I_2 ）只能在党和国家的等级体系之间实现，而第三种（ I_3 ）既可以在等级体系内也可以在党和国家等级体系之间实现。前两种（ I_1 和 I_2 ）只能间接地达到比它们的上级更高的层级，而第三种（ I_3 ）则可以直接做到这一点。因此，在结构性反馈关系的情况下，行为人能够累积反馈关系。反馈发生在决策之前或与决策同时发生是 I_3 最普遍的情形。但在实际上运行中，反馈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反馈可以引起另一个反馈，或者它们可以同时融合进建立反馈的同一个行为人或不同的行为人。

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的反馈概念和我在这里使用的（ I_3 ）没有太大差别。二者都描述了决策过程，二者都与决策和那些决

策的结果有关。差别只在时间顺序上。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反馈的意思是，决策和对决策的反应在时间上是分开的，因此它们总是界定为对决策的回应。在 I_3 的情形下，由于决策过程中结构性因素的存在，对决策作出反应的反馈时滞缩短了反应与决策本身同时发生的程度，即，决策和对决策的反应是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应是通过跨越有关的 D_1 和 D_2 渠道实现的。图 1.5 表明，跨越了 D_1 和 D_2 依附连线的结构性反馈系统是怎样建立起第三类利益实施渠道（ I_3 ）的。

图 1.4 对反馈的常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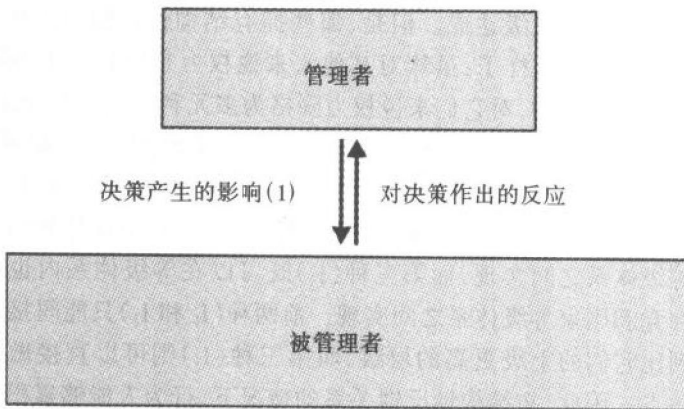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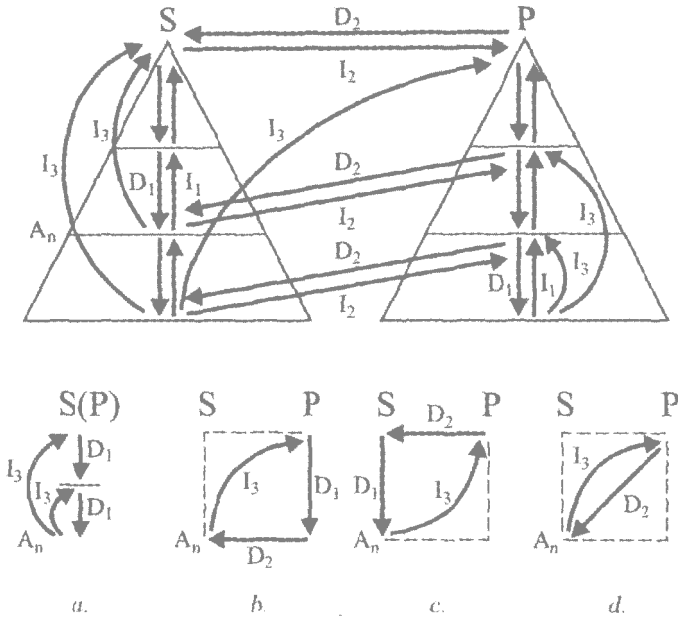


图 1.5 基本网络里的结构性反馈 (I_3) 和 A_n 通过反馈对 D_1 和 D_2 连线的利用可能有的利益实施途径



注：

- S 国家（非党）等级体系
- P 党等级体系
- A_n 结构中 n 级上的决策者（行为入）
- D_1 等级体系内依附的方向
- D_2 跨等级体系依附的方向
- I_1 等级体系内的利益实施途径
- I_2 跨等级体系的利益实施途径
- I_3 反馈的方向

捷径是基本网络里的一些决策者建立的直接联系，要是没有这些捷径，这些决策者是相互孤立的，因为他们不在同一个等级体系里，或者他们在同一等级体系的不同层级上。在结构性反馈机制的帮助下，决策者能够接触决策的更高层级，从而能够直接影响那些在自己的等级体系以及在党等级体系里影响他（她）的那些决策。这样，决策者就深深卷入了决策过程，从而推动了个别的决策（见附录 2）。让我们看一个访谈摘录，它揭示了这种情况：

“如果管理指标发生变化，那么在公之于众之前是否有个别的请求，或者在此之后是否有个别的请求呢？”

“事情一般是这样的，一项措施被采纳了，然后在它的实施过程中谈判就开始了。谈判通过冶金与机械工业部（MMMI）进行。例如，国家物资与价格署（NMPO）决定提价 $x\%$ 。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就计算这个提价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该部门的总产值和净产值。不过，在计算之前，它要求下属企业报告提价对它们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它将决定不同的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将是与财政部谈判的起点，然后是与跨部门价格与产品分配委员会（IMPPDC）的谈判，这个谈判事实上主要是对前面谈判结果的确认，而不是新的谈判。（财政部官员，1978）

在 I_3 连线的帮助下，行为入能够跳过本等级体系里的某些层级，能够接触党等级体系里特定层级上的任何一个决策者，实际上，可以接触到党等级体系里任何一个层级上的决策

者。在 I_3 连线的帮助下，一个反馈回路建立起来了，一边是 I_3 ，另外一边是 D_1 或 D_2 连线或二者的结合。

图 1.5 的 (a)、(b)、(c)、(d) 代表了反馈形成的不同情形。图 (a) 表示这样的情形，即，一个企业经理受邀参加部门会议，或受邀参加一个管理他（她）的活动领域的部级委员会，或受邀参加评议会，在引进一个规范管理指标之前，他（她）与其他企业经理一起评估可能产生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区党组织的第一书记是中央委员，或者被选为高层党组织与下层党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图 (b) 和 (c) 表示两个等级体系和交叉连线的情形，一个企业经理或部长可能成为中央委员（这里的区别是反馈的起点不同）。图 (d) 表示中央委员会的某个部门对某组企业给予特别关注的情形，如 1979 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对亏损企业的关注。

指出下面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国家和党等级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反馈只可能起源于国家等级体系然后到达党等级体系，这是政党—国家体制的第二个基本连结原则。其原因在于，这个反馈回路是在交叉连线 D_2 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交叉连线 D_2 只能起源于党等级体系。因此，如果，比如一个地区党委书记或企业党委书记受邀参加部门会议，或者如果部党委书记已经邀请他（她）参加党的积极分子的会议，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党委书记建立了反馈，而是他（她）代表的企业通过这个书记建立了反馈。

反馈 I_3 ，作为一个结构性的决策特征，为决策过程的缩短提供了结构性的背景。在反馈系统的帮助下，决策者能够直接影响他们的决策。通过这些更密切的私人联系，那些得益于反馈的人能够发出和接受直接的信息，能够承诺给予物质或非物质的回报，能够进行交易，能够为不可避免的决策后果作准

备，能够找到同盟军，能够发现潜在的对手，等等。

例如，一个同时是地区党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①的企业经理这样叙述了反馈的好处：

“这只能意味着有好处。做社会工作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在区一级，我是党委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显然我因此成为党委委员。我同时也是企业党委的委员，此外，我还是党的宣传工作者。因此，在每一个方面，我都能够利用我在专业领域和党的工作领域的区执行委员会里的工作得到益处。这个好处是巨大的，因为我可以立即知道和在第一现场知道中央委员会和布达佩斯党委的决策，这样，与那些不是委员的人相比，我就赢得了时间，他们是要在决策作出三个星期或一个月以后才会知道的。在这个时间里，我可以考虑如何就我们的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其他较大的好处还有，关于什么是不合适宜的想法和观点的问题在我的头脑里变得清晰起来。”（企业经理，1985）

如果为依附连线所掌握的决策者能够通过 D_1 和 D_2 依附连线激起高度政治敏感的问题，以致他（她）能够直接威胁到那些控制连线的人实现指定目标的可能，威胁到他们完成分配给他们的垄断责任的能力，从而威胁到他们保持自己的职位，那么反馈就会形成。主要目标代表了政党—国家体制基本的政治战略重点：维持党的领导地位、维持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维持

^① 附录 2 的图 A. f 表明，一个企业经理在区党委执行委员会里能遇到各种类型的决策者。

经济增长、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对这些目标的追求体现在与苏联的关系上，体现在独裁专制上，体现在对重工业的强调上，体现在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上，体现在国有化上，体现在把组织、活动、职位和干部吸纳进来并为它们解决困境的努力上，体现在交叉连线的形成上，体现在交叉连线在党等级体系里起点的位置上，体现在交叉连线的密度、深度、范围及其变化上。

因此，那些能够引发国家安全问题、经济或政治稳定问题以及经济增长问题的行为人将拥有反馈；换句话说，是那些能够把自己变成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为人，即，那些能够轻易在国内供应、生产、向西方出口或能在满足经互会贸易指标方面形成瓶颈从而使大量投资无法按时进行的行为人享有反馈，或者是那些真的有可能组织罢工和引发相应政治后果的行为人具有反馈。不过，这些行为人同时也是那些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助于缓和危险，就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人。正是威胁目标的能力的大小决定了一个决策者或组织的政治谈判能力。反过来，正是政治谈判能力和引发政治敏感度的能力的联合效应决定了资源分配时的选择标准。^①

正是政治谈判能力和政治敏感的程度决定了引起中央委员会注意的企业的规模。下面的访谈摘录说明了这个情况：

^① 1970 年代末，为了增加预算收入，国家新征收一种普通税，为了维持稳定，收税时遵循了下述的选择原则：“如果我们谈的是有 150 名员工的一个企业，那么整个事情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我们谈的是从一个员工达 10000 人的企业拿走 6% 的利润，那么党委书记会站起来说，同志们，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工人会把我吃掉！我怎么能站在他们面前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呢？不能这样做；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等等”（财政部产业司，1979）

“如果要我总结自己的经验，我要说，地区党委提交的问题一般都与大企业有关。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大企业比小企业更多地得到所在地区的注意。这些企业在较大的地区里在政治事务和其他事务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了杰尔市和米什科尔茨市以外，其他地方的工业化水平没有那么高，也就没有那么多大型企业。可能有三或四家大型企业，因此，地区对这些企业非常关注。大多数工人和一大部分共产党员都在这些企业里，因此，那里也是政治舆论形成的地方。对小企业，他们一般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加以处理，即使它们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但是这些较大型企业的问题已经损害了国家利益，你知道，它们已经影响了供给；大型企业得到照顾是完全有理由的……”（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1982）

因此，反馈关系的出现是有选择性的政治标准的。然而，虽然交叉连线（从一切可能的方向伸展出来）力图覆盖尽可能多的决策者的决策，但是，反馈系统是只有一小部分行为人才

享有的。^① 因此，反馈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获得了引发政治敏感问题能力的行为人来说，他们在体制内累积有直接联系的反馈的能力实际上是无限的。因此，在谈判能力上，结构内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在那些拥有反馈的行为人与那些有 D_1 和 D_2 、或只有 D_1 、或根本没有制度性的联系的行为人之间产生了新的不平等。结构性反馈不仅意味着那些直接满足了相关标准的决策者的政治谈判力量，而且也意味着那些通过 D_1 和 D_2 连线对它们负责的决策者的政治谈判力量。^②

因此，政党—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利益结构和不平等的结构，这种不平等取决于决策者能够通过依附连线激起的政治敏感的程度。他（她）在这个方面的能力越强，党等级体系就会在越高层有越多的连线与他（她）相联系。通过这些连线，决策者就有了不平等的利益实施机会。^③ 他们所引

让我们看看它们将影响到谁。如果我们考虑中央委员会这一级，例如，在 D_2 交叉连线的帮助下产生了反馈，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如果我们略去中央委员会中从国家结构进来的不经过与同级官员的竞争产生的委员（如，内务部长、国防部长、部长会议主席、中央机关各部门主任、中央书记，等等），那么在 150—170 个职位中，还剩下大约 50—70 个职位。因此，只剩下很小的赢得反馈的机会留给大量的人去竞争，我们考虑一下，这里面有 19 个县、22 个区、大约有 700 个管理部门和委员会、661 个工业合作企业、以及 2830 家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农业合作社（中央统计署，1980）。此外还有其他的国家和社会机构（大学、高等教育学院、研究机构、各种委员会、社会团体，等等），它们在原则上也是这 50—70 个职位的合法候选人（Csanadi, 1984: 50）。

② 更详细的阐述，见 Csanadi (1987a, b); Kovacs (1980); Lamberger (1988); Szalai (1988)；以及 Teller (1984—85; 1987)。

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工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准许我查阅他的秘书记事簿上记录下来的每天打进来的电话。这些记录上，有 61 个电话是企业经理在工业部成立的第一个月打来的。这 61 个电话是 27 名企业经理多次打来的。这 27 名企业经理中，有 24 名在 1970 年到 1980 年间曾担任县或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或中央委员会委员。

发的政治敏感度越高，他们跨过依附连线而连接到更高决策层的机会就越大。

但是，反馈的重要性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体制来说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考虑谁拥有反馈，在哪个领域拥有反馈，在哪些职位上拥有反馈的问题是很重要的。^①同时，记住反馈关系累积的程度，反馈所连接的层级和领域，反馈作为决策结构的典型程度是很重要的。最后，还必须考察交叉连线所连结的基本网络内权力分配的性质。让我们看一下，反馈系统的出现是怎样改变基本网络的结构特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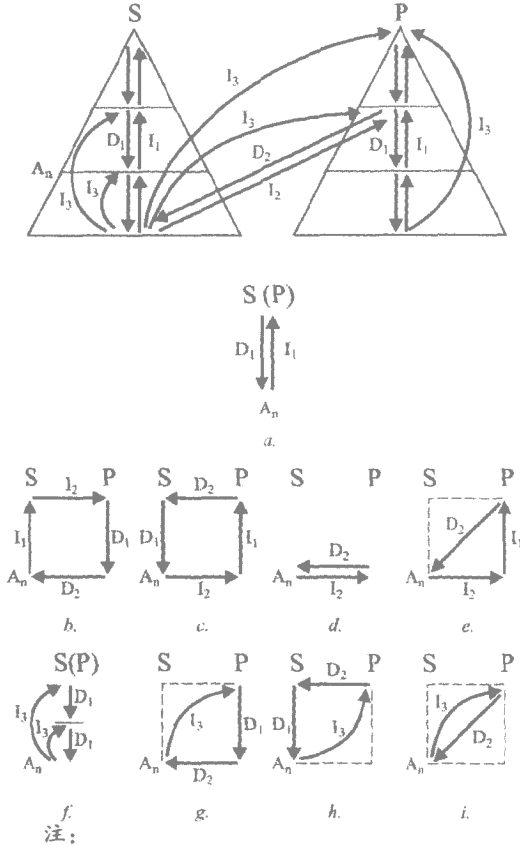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制度化结构的主要特征

等级体系内的依附连线和跨等级体系的依附连线（ D_1 和 D_2 ）以及结构性反馈的系统（ I_3 ）总是同时存在的。基本网络内大量的变异、建立反馈可能性的繁多种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权力，其总和决定了内部的权力关系，决定了结构的运行，决定了各种各样的体制性不平等，并且决定了可能采用的战略及其效果和局限性。图 1.6 总结了政党—国家体制内各种利益实施渠道相结合的情况。与此同时，它也表明了决策

重要程度的差别很大。如果我们仅仅考虑 1970 年到 1980 年间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机构和个人的类型，我们可以这么说：不在部门直接监管下的企业在三届党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完全没有份；只有他们最高级别的一些利益代表才是中央委员。在这三个时期里，2 000 多个农业合作社领导人中总共只有 3 人（农业合作社全国总会的主席不算在内，他也是一个合作社的主席）是中央委员。在中央委员中，部门监管下的工业企业的领导比其他企业的领导多得不成比例。在此之内，工业部门和地区之间还存在着不平等，这表现在以下数据上，即，只有某些区和县的领导才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在这三个时期他们是反复当选（Csaszadi, 1984: 51）。

的结构特征显著性。

图 1.6 政党—国家体制的权力结构与
 A_n 可能的利益实施途径 (a-i)



S 国家 (非党) 等级体系

P 党等级体系

- A_n 在层级 n 上的决策者（行为人）
- D_1 等级体系内的依附连线
- D_2 交叉依附连线
- I_1 等级体系内沿依附连线的利益实施
- I_2 跨等级体系沿交叉连线的利益实施
- I_3 等级体系内和等级体系之间（跨等级体系）的反馈

图 1.6 表明，与正规的等级制相比，不断演变的政党—国家体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基本网络的顶峰在哪里是难以分辨的。权力的顶峰由于反馈连线从等级体系的各个地点连接到它那里而变得模糊了（关于中央委员的情形，见附录 2 图 A. b）。不仅如此，这里也找不到清楚界定的层级了：那些在正规的等级体系里由于级别相同（如，企业或县）而处于相同层级的行为人，根据他们利益实施能力的不同，他们在运行的权力结构内的分布变得各不相同了。惟一能够清楚分辨的是结构的最下层，即由那些没有任何制度化纽带的人构成的最下层。结构内的依附和利益实施能力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可能是单线的也可能是多线的。对于一些决策者来说，利益实施的渠道由于拥有结构性反馈而扩大了。对于一些决策者而言，依附仍然是直接的，而对于另一些决策者来说，由于拥有反馈，他们变得更加间接了。在复杂的结构内，只在一个方面，基本网络的规则与等级制的规则是相同的，这就是，依附仍然是单向

的。^①如今从等级结构中生成出来的东西正好冲淡了等级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多层的、分化的关系结构，其中各个层级相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在这个结构的运行中，具体决策的动态过程展示了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重要程度。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结构内作为一个集体的所谓“精英”是难以清楚地界定的，因为依附关系和利益实施渠道的极其复杂性对精英的概念和方法提出了质疑。^②由于结构如此复杂，所以这个集体的规模、功能和权力等等取决于我们是从哪个角度去考察它的：是根据它正规的或实际的谈判地位来考察，还是将它作为干部任命系统的一部分来考察，还是从实际的“权力中心”的角度去考察。这些集团还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考虑我们考察的政党—国家所处的具体时期是很重要的。权力结构的内部分配是变化的，部分是因为它要跟上现代化导致的分化过程，部分是因为权力的内部关系会发生重新组合。这些集团还随空间的不同而不同，因为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其结构存在着差异。我们还应该考虑结构所处的条件：在一个稳定的结构里，有影响力的集团只会在网络内崛起，但在一个正处于解体之中的结构里，这些集团也会在网络之外崛起。事实上，这个集体是随着每一个决策的不同而不同的，是

结构性反馈在许多情况下强化了这种单向性。例如，如果有问题的个体决策者在“民事”职务之外还担任了某种党的职务（这包括从基层组织书记到兼职的党委书记到无论是地区党委委员还是中央委员的经济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那么在得到特定级别上相应的党委的同意之前，由组织内部的职能或监督职能产生的雇员权利就不能行使。

^② 因此，只有在权力结构是集权的，反馈非常少的情况下，才能够清楚地分辨出结构内的精英。关于利益实施上的结构性差异的分析，见 Csanadi (1993)。

随着组成这个集体的具体人物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决策者为推行每一个决策所使用的连线的不同而不同的。

界定极其复杂和分化的精英，其难度不亚于揭示决策的过程和隐藏在决策者背后的权力。在这个结构内，要指出一个行为人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多大程度上利用他（她）的联系去影响决策是不可能的，要指出他（她）这样做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也是不可能的。之所以如此，主要不是因为这一条或那一条依附连线秘而不宣或不正式，而是因为整个依附连线的结构极其复杂，以及通过这些连线传递的过程缺乏透明度。由于透明度的缺乏，我将这个结构的连线称为封闭的渠道。

下面的插曲发生在我对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进行访谈的时候，它揭示了两个行为之间一个隐藏的 D_2 渠道，其中一个行为人在党的中央机关，另一个在国务院的部委：

（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电话铃响了。我的访谈对象拿起听筒）

“是托马斯吗？……”

“是的，为什么我们必须什么东西都得向你们报告？你的老板昨天和这个 D. A.（工业部的一个部门领导）一起在我们这里。……”

“他也是你的老板，我们向他汇报一切情况……”

① 因此，结构的特性表明，在政党—国家体制里，不存在精英这个词的经典意义所指的集体。只有记住结构特性的前提并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个词，一个研究者才可能实际地使用这个概念，并为他（她）自己意义上的精英概念找到定义的基础。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能把根据其他标准界定的阶层的功能——影响的范围、影响的可能性和获取信息的可能性、进行赏罚的能力——赋予根据某个特定的标准选定的某个阶层。

“他们把有关的信息通报给你了吗？……”

“我们是傻瓜；应该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的。”

（他挂掉电话，嘟囔着）

“糟糕透了。他们什么事都来找我们，即使是最无关紧要事也来找我们。如果需要安排什么事情，部委就来找我们。……但他们不断来，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企业也一样。”（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1983）

凭借着制度化但非正式的利益调解规则，封闭渠道把每一个决策过程都拌在网中，即使是那些完成属于国家机构能力范围内的决策也把它拖入网中。例如，所有的职能部门，包括相关的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都要在为部门所属企业或管理部门会议组织的一切计划审议会议上表述自己的观点。下面的引证清楚地表明了这些机构有哪些：

计划审议这个表述是从指令性计划分解时期沿用下来的，时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加。以下组织受邀参加会议：国家计划总署（SPO）、财政部（MF）、外贸部（MFT）、内贸部（MDT）、匈牙利国民银行（HNB）、国家物资与价格办公室（NM-PO）、国家技术与发展委员会（NCTD）、县市政府。社会组织中，根据需要邀请以下组织：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DET）、相关的县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

企业党组织、钢铁与金属工业工会以及其他组织。^①

其他的例子也表明了相互交织的性质：没有相关的产业管理部门的支持和专业意见，匈牙利国民银行就不会给企业发放投资信贷。管理条例和税收政策的制定，对补贴和其他形式的优惠的分配，是属于财政部的职权范围的，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事先经过有产业部门和一小批经选择的企业参加的谈判才能进行。因此，麻烦、秘密、不确定、难以想象的繁琐以及透明度的缺乏，都是体制的结构特性，而不是“人为混乱”的产物。^②体制的繁琐和透明度的缺乏进一步强化了行为人的结构性的原子化，因为面对每一个行为人的力量中有很多是隐藏在背后的，是看不见的。我把这种令人迷惑的、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权力称为隐蔽力量。某个决策过程中隐蔽力量的内容取决于一系列的事情：决策者的反馈联系恰好在那时起作用了；他（她）目前的盟友，他们的反馈联系及其累积的水平；以及，最后，结构本身令人迷惑的性质。关于隐蔽力量之大，它的环境愿意——或是被迫，相信它有多大就有多大。

行为入嵌入结构越深，他们累积的反馈就越多，这些行为人所拥有的隐蔽力量就越大，因为由于反馈的存在，同样的这些行为入，他们的利益是从多个方向同时加以推进的，其中有很多相近的利益一齐起作用。利用个人联系得到好处并不是个

资料来源：关于 MMTI 机关与企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审议有关的活动分析。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MMTI 党委于 1971 年 8 月 9 日根据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971 年 1 月 4 日决议而作。（M. Cs. ）。

^② A. Gergely 在我的手稿谈论时提到了有组织的混乱的说法。他说，这个概念首先是由 Zoltan Zsille (1972) 在描述企业内部关系时提出的。Gergely 把这个概念扩展到描述整个政党 - 国家体制。

人的精明产生的结果，而是由结构的本来性质加以保证的。因此，滥用体制的可能性不是源于对规则的打破，而是对规则的利用。腐败的机会是结构性地赋予的。^①

这个结构还有一个特征，即，尽管信息是垄断的、渠道是封闭的、行为人是原子化的，尽管存在着隐蔽力量和缺乏透明度，但是，甚至是严密的小圈子里作出的最秘密的决策也会“泄露出去”^②并且迅速扩散到整个结构，直到秘密变成“公开的秘密”。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决策过程与体制的结构特性的相互关系之中。（附录 2 展示了决策过程的结构性背景。）当然，由于这些结构特性的性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有关的信息；因此，秘密对于动议所指对象来说仍然是一个秘密。

这一点还得到了下述事实的证明，比如，在 1981 年不论我问谁关于过去曾是秘密的三个产业部门（轻工业部、重工业部、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准备合并的问题——不论这个人是在新的部里，在相关的部门里，在银行，在党委里，还是在任何一家企业里——他（她）都会开始这样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是预先就知道了”。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提到了他们拥有的某种形式的反馈（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是党员，等等），这是他们的消息来源。用下面的访谈摘录来说明这一点是有意义的：

“他们在准备成立工业部，这事我已经知道有一

一个例子是苏联的黑手党，它利用结构性的联系收罗保护人同时腐蚀他们（Vaksberg, 1991）。

当然，有不同级别的秘密，而且它们的重要程度也有所不同。关于为经济政策决策作准备的最秘密的机制以及军事暴动式实施政策的目标的更详细分析，见 Fekete (1990)。

年时间的。委员会之间的博弈一直在进行，M. 是 H. 委员会的委员，他手下有 4 到 5 个工作人员。我是其中之一。我还记下了一些事情，我们查阅了发下来的材料。知道有争论并且知道争论的主题，这是可能的。（国家开发银行，一位处长，1983）

“我想我要比别人知道得早一些，因为我在筹备重组的分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会里工作……我确信重组要么在 1980 年初，要么在 1979 年底进行。（轻工业部，一位处长）

“确切地说，当他们开始聒噪正在进行严肃的重组筹备工作时，那是在 1979 年中左右。我们首先从部里听到这个消息，但我在党内也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说正在进行筹备工作。（企业经理，1983）

“在专业的圈子里，你会听说到他们在政治领域处理这个问题。后来到 1979 年底 1980 年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会听说已经成立了重要的委员会去准备、分析、评估这个事情，等等……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来自通过某种途径有政治消息来源的人。因此，在非政治圈里或专业圈子里，知道这些事是可以想象的。（财政部，司长，1983）

正是利益关系的特征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结构背景导致了这个状况，即，尽管预先知道了消息，但是仍然不会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或统一阵线。尽管“公开的秘密”在整个体制里的动议所指对象中传播开来，但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子化，体制中的行为人要么：

互相不了解对方，因为他们都是通过封闭的渠道和与特定

个人连结的渠道知道消息的，他们不能确定还有其他哪些人也知道了这个消息；要么

了解对方，但公开地联合起来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就等于他们自动放弃作为动议对象所具有的有利地位，他们通过隐藏的渠道能够更好地实施他们的利益。成为动议的对象本身就反映了渠道的封闭性。如果公开这些渠道，那么这些个人就失去了成为动议对象的必要，从而自动地放弃了他们收集和传播信息的特权。

竞争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联系的惟一占有者，竞争的目标不是为了从这些联系的共同利用中得到利益。利益的缺失也是利益连结的制度背景造成的。没有公开的论坛，这意味着每一个决策者要与信息或其他资源的分配者（面对面地）联系，所有的决策者都有自己的消息来源。此外，也没有合法的协调渠道。正如禁止私人公民组织、联合、发动罢工、建立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组织一样，机构也没有协调行动的合法权利。因此，虽然行为人可能反对这个或那个决策，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通过封闭的渠道采取个别的反对行动，其中封闭渠道的力量取决于个体行为人累积的反馈的水平。^①

决策者不可能，也没有兴趣在结构性的、制度性的和合法的基础上采取公开和统一的行动来支持共同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依附连线的控制者就不处在来自各方面的单向压力的压迫

自然，这些“规则”是有例外的。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 1972 年，在听说管理上要作出不利的变动（将对他们的企业产生不利的影响）以后，一些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在党中央总部前成功地举行了抗议（Szalai, 1982）。绝不能把这种缺乏协调的活动与经济实体紧密的横向互惠行为混淆起来，这些经济实体应用它们的网络资本，互相交换难以获得但为维持生产的继续进行所必须的自然资源，这是短缺经济的特征（Czak 与 Sik, 1987）。

之中，这些压力是由相似的利益驱使的。恰恰是因为反馈系统的存在及其选择性，使得这样一种情形成为可能，即，相互独立的各个行为人动员起各自的压力，但是又从各个地方向同一个方向施加这些压力。这是不可能评估（只能猜测）利益和与之相对的利益的现实力量对比的另一个原因。不可能知道这个或那个动议会遇到多大的反对，或者说，不可能知道这个或那个反抗会取得多大的成功。实际上，参与经济管理的所有组织和所有决策者（包括那些职位最高的人）都面对着隐蔽力量。^①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的谈判能力由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组成：（1）一个稳定的核心（由它自己的力量以及它激起政治敏感问题的能力构成），和围绕在其周围（2）易变的和不可预测的隐蔽力量。由于封闭渠道和隐蔽力量的存在，决策者不能肯定地判断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盟友的力量以及他们对手的实际力量。因此，由于隐蔽力量的作用，每一个行为人相对于所有其他行为人的谈判地位和谈判能力都是不确定的。尽管整个体制内存在着依附和不平等的利益实施能力，但是这种不确定性要求每一个决策者始终保持警惕性、保持活力和作出不断适应的准备。即使事实证明某个职位比较稳定，每一个行为人仍然要不断努力使其保持稳定，从而迫使自己照看好现有的联系并努力创造新的联系。

下面摘录的访谈反映了这种努力：

在中央采取这项或那项措施之前，要进行所谓的试点，目的是摸清情况和试探战略地位更重要的经济单位的反应，以便弥补它们的隐蔽力量引起的不确定性，但实际上，与此同时，试验有意无意地创造了更多的反馈机会和更多的秘密信息。

“过去，事情比较容易理解。有一个中心决定给还是不给。但是现在，你必须找到盟友，同时你也就树立了敌人，我们不得不努力保证在盟友和敌人之间取得平衡。(一家大企业的经理，1978)

同时，决策者有兴趣减少隐蔽力量给自己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有兴趣去维持（或增加）隐蔽力量给所有其他行为人造成的不确定性，因为这样做，他们相对于他们对手的谈判地位就得到改善了。荒谬的是，在即定的环境下，双方的努力使得大家更加紧了对依附连线的利用。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决策者力图扩大操纵的空间。这迫使他们累积反馈和盟友，而盟友本身也在累积反馈。这个过程造成他们背后的隐蔽力量同时增长。

另一方面，决策者对于保持渠道的封闭性有着直接的兴趣，因为没有人知道，如果封闭的渠道被公开，如果隐蔽力量暴露出来，如果利益实施的各个渠道消失，那么他们的谈判地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考虑造成他们有兴趣维持原子化状态，从而使得结构性地原子化的联系运行起来。^①

综上所述，等级体系内具有的正式级别和制度化结构中的谈判地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相等的。在正式的级别上渗入了通过交叉连线 and 反馈机制发展而来的结构性的依附和利益实施关系。结果，这些关系决定了正规等级制里的那些联系的特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同意 Walder (1986) 的看法，他说，作为一个整体，政党-国家结构（他称之为新传统主义）及其运行不是家长式的。虽然结构内两个决策者（一个是依附连线的掌握者，另一个是被依附连线掌握的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家长式的，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个体制从总的来说是疏离的、非个人的、不透明的和不可控的。

征和效率，即，决定了那些在垂直方向（上级与下属之间）和水平方向（相同级别的行为人之间）上演变的联系的特征和效率。^①

因为基本网络的特征和选择性反馈的存在，所以谈不上分开的党和国家，或者分开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或分开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由于体制的特殊特征，这些领域，以及其中的决策和决策过程，变得有机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了。^②表 1.2 概括了正规的等级制度的要素和规则、基本结构以及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要素。

但是，为什么这个会制造不确定性、使行为人原子化的关系极其复杂的权力结构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结构是如何维系的？下一章，我将描述政党—国家体制的一些特殊特征，这些特征为体制的运行和内聚力奠定了基础。

我认为，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还影响了那些促使体制更为有效地运行的非正式关系，这些关系有时抗拒有时利用体制运行提供的机会。这些联系取决于体制的内部特性（交叉连线和反馈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体制的条件，但是在所有场合下，它们都是相对于所描述的体制对象进行理论概括的。横向协调，如易货贸易制度、免费关系（Czak。与 Sik, 1987），亚文化内的关系（Frenteel - Zagoraka, 1990）或市场关系（Kormai, 1989a）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很重要，但是本书没有对这些关系及其反馈对体制运行产生的影响作出分析，因为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② 大量的实证研究从各种角度考察了这种相互联系造成的实际后果。这些研究有 Bodo (1985); Czak。与 Sik (1987); Darvas (1986); Fekete (1984); Kolosi 与 Szabo (1973); Szabo (1990); Fazekas 与 Kollo (1987); Laki (1985); Magyar (1986); Kileyry, Kulcsar 与 Sarkozy (1987); Such (1986); Schustzer (1983); Seres (1987); Szalai (1982); 以及 Voszka (1980; 1984)。

表 1.2 正规的等级体系、基本网络与政党—国家结构

正规的等级制度 (要素: D_1 和国家对经济的垄断)	基本网络(要素: D_1 、 D_2 和直接通过 D_2 与把 D_1 、 D_2 连接起来从而间接通过 D_2 形成的被政治所垄断的经济)	政党—国家结构(要素: D_1 、 D_2 、 I_3 以及通过 D_1 和 D_2 形成的政治地垄断的经济)
党等级体系和国家等级体系内的顶峰都是可辨认的	相互交织的结构有一个顶峰(党)和一个底层(那些非党员的行为人)	只有底层是可以分辨的: 完全没有任何制度化连线与结构相连的行为人。顶峰难以分辨
联系是机构内的和机构之间的	机构内和机构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个人之间的联系建立的	机构内和机构间的联系都是通过个人之间的联系建立的
依附是直接的: I_1 的运行只能通过 D_1	依附是直接的: I_1 和 I_2 的运行只能分别通过 D_1 和 D_2	依附具有两重性: 1. 直接的, I_1 和 I_2 的运行只能分别通过 D_1 和 D_2 ; 2. 间接的, 因为通过对 D_1 和(或) D_2 的应用使之成为反馈回路的一部分而产生了 I_3

<p>依附是单向的:依附的起源和方向是不可逆的(在结构内权力是垄断的)</p>	<p>依附是单向的:被依附的方向是不可逆的(政治性垄断权力)</p>	<p>依附是单向的(被政治垄断的权力)</p>
<p>相同级别的决策者在同一层级上(这里级别等同于谈判地位)</p>	<p>正规等级体系里各个层级上级别相同的决策者其谈判地位是不同的</p>	<p>正规等级体系里各个层级上正式级别相同的决策者其谈判地位是不同的</p>
<p>依附是单线的:在利益实施的过程中,决策者不能越过他(她)直接的上一级</p>	<p>依附是多线的:利益实施过程中,在 D_2 的帮助下,正规的等级体系里的直接上级是可以越过的,但党等级体系里负责掌握 D_2 的行为人是越不过的</p>	<p>依附是多线的:D_1 可以在 I_2 的帮助下通过 D_2 被越过;在 I_3 的帮助下,D_1 和(或) D_2 是可以越过的</p>
<p>单线的依附(D_1)和利益实施(I_1)影响着每一个有制度纽带的行为入</p>	<p>多线的依附只涉及那些至少有一条 D_2 型连线与自己相连(间接反馈)的决策者</p>	<p>I_2 和 I_3 连线仅属于能够满足体制的选择性标准的那些决策者的特权</p>

注: D_1 是等级体系内的依附连线; D_2 是起源于党并把两个等级体系连接起来的依附连线; I_1 是通过 D_1 形成的等级体系内的利益实施连线; I_2 是通过 D_2 形成的跨等级体系的利益实施连线; I_3 连线表示基本网络内的结构性反馈。

第二篇 运 行

第一章 运行的基本原则及其动态过程

第一节 体制运行的基本原则

体制的内聚力和体制的持久性是建立在其运行的基本原则上的。这些原则正如它的基本要素和联系一样——是相当简单的。

1. 虽然决策者有 D_1 控制连线，但是只有党内的决策者才有把他们与结构内所有其他决策者连结起来的 D_2 连线。因此，依附是被政治所垄断的。

2. 通过国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通过把国家与党等级体系连结起来的连线的控制（ D_2 依附连线），产权变得被政治所垄断了。

3. 因为在这个体制内，除了直接或间接地利用 D_1 和 D_2 依附连线，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以实施利益，所以利益实施的可能性也是被政治垄断的。

这三条总和起来构成了为政治所垄断的权力结构的基本运行原则。^① 由于体制的同构性，结构内占有依附连线的每一个

根据这样的理解，为政治所垄断的结构，一方面，通过国家，把国家垄断的产权和所有权纳入其中，另一方面，通过 D_2 连线，同样直接地深入经济领域。不能把这种体制与政治独裁混淆起来，在政治独裁体制里，上面讲的两个特征都不存在，因为经济运行在那里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它排除了这些特征。

决策者都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双重的境地内：它们即是依附连线的控制者同时又是依附连线的俘虏。这种两重性给决策者带来了极其复杂的一套动机和压力，这一套动机和压力构成了行为的结构性动机。

在这个被政治所垄断的权力结构里，决策者——作为依附连线的控制者，不仅能够而且被迫——在结构内的各个地方施加干预。它们不仅能够能够在挖掘资源的时候垄断挖掘的先后顺序，而且能够在资源和特权分配的时候决定相关的先后顺序。实际上，它们能够以“普遍”（垄断）责任的名义在体制内的任何地方实施干预。然而，与此同时，决策者是被迫加以干预的，因为那些在依附连线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人不断地给它们带来压力。要加以干预的压力还因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而增大了。政治敏感性是不仅联结了党的而且也联结了非党的活动的交叉依附连线造成的。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通过交叉依附连线，非党的决策和活动变得具有直接的政治含义，并将引起由政治驱动的反应。由依附连线带来的干预能力和干预的被迫性，结合起来造成了这个体制不断产生持续的、政治性的干预行为。

下面的引证证实了控制着依附连线的决策者以政治为基础的行为模式。从经济的观点看，它们在引文中采用了一种奇怪的决策来与低效率、给予优惠越来越多、短期行为以及浪费的资源分配现象作斗争。

党组织要评估经济活动的效率，并将积极反对旨在不合理地增加国家补贴的努力。在经济管理中加强从长期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各级领导和一般人士都应该牢记的。所有的共产党员和每一个值得尊敬的工

人都要与“从手里拿到嘴里”的生存方式和企业的短期行为作斗争。……管理部门不应该允许社会物质资源被使用到不需要的活动上去，不应该允许这些资源用到完全多余的活动上去。……

这个摘录很好地反映了处理经济问题的政治方法。也就是说，是党和国家组织监督经济活动的效率；他们期望政治斗争能够阻止国家补贴的增长；企业长期行为的形成是政治动员的结果；与短视行为的斗争是依靠个人的品质、依靠共产主义的意识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的，而且这种斗争要求个人对自己的组织（企业）采取一种革命的立场；产品是否有用，是否要选择某种产品，这要取决于管理部门。

干预能力和兴趣背后的政党—国家结构在原则上可以实施任何程度的干预：改变活动和优先顺序，重组各种组织，增加强制的社会流动，在任何一个层级上进行清洗，转移资本、人力甚至重新安排民族的空间分布。上述可能性实际发生的程度随具体时点的不同而不同。

另一方面，作为结构的依附连线的俘虏，决策者既被依附连线的持续存在所剥削，同时又有志于依附连线的持续存在。决策者被剥削，是因为通过各种途径上的依附连线加在他（她）身上的政治期望限制了他们自由活动的空间。同时，决策者又有志于维持这些依附连线，因为在被政治所垄断的体制内，利益实施没有别的途径。决策者专心利用依附连线，以便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1968 年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以及 1969 年经济工作的主要指导原则的决议，1968 年 12 月 4 日（《1967—1970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议与文件》）（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o），第 294 页。

获得资源和特权，因为正是这些依附连线保证了他们的谈判机会。下面摘录的访谈反映的正是这种双重的局面：

“但是企业终于发现，大多数的事情都得靠职能部门，即，依靠（或者通过指令系统或者通过归口管理）属于我们的国家组织。因此，如果它们想要从国民银行、价格办会室和外贸部得到什么，它们一般都来找我们。（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1984）

为了能够利用这些依附连线，行为入必须尽力满足通过这些连线加于它们身上的期望。依附与利益的双重作用是使得决策者适应政治理性要求的原因。这也是它们进行合作，以及它们必须持续地通过各不相同的依附连线原子化地实施利益的原因。因此，根据下面的引文所说：“绝大多数企业经理需要政治指导，需要党组织的组织工作和监督工作，它们实际上是高效率的经济活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①

适应政治要求的敏感性是这样强，以致有时甚至只要党的机关的代表在场这一点就足以保证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保证谈判各方达成最理想的结果。这一点得到了下面这个访谈摘录的证实，这是与党的中央机关一个参加过某个部长级会议的官员

中央委员会报告，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75）Karoly Nemeth 批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1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Budapest: Kos-suth Konyvkiado），第 233 页。

进行的访谈：

“中央机关在哪一个阶段开始介入？”

“很不幸（我这样说是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不能这样说，对于重要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直到问题得到解决，而在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只是在最后阶段才参与进去。……很不幸，我们有时卷在细枝末节里，那些事本来是不应该由我们来管的。”

“你为什么被迫要去做这些事呢？”

“如果一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们就会被迫介入其中去解决它。”

“像现在这样的时刻 解决问题有哪些方法？”

“哦，我们参加讨论并尽量迫使他们作出决定。最后的决定是他们早就知道了的东西；我们只是帮助他们走到这一步而已。”

“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像我所说的 参加这些讨论。”

“但是 你出席会议以后怎样参加讨论呢？”

“出席本身就足够了。不过我们也尽量参加辩论。出席会议本身就表达了某种观点。”（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1980年）

前面已经指出，在部门和其他国家组织制定战略和撰写报告以及举行相关讨论会的时候，中央机关相应分管官员和地方党组织的书记都会受到正式的邀请。事实上，我在冶金与机械工业部的一个条子上看到，部党委书记每个星期都收到一个会议日程的清单。

能力和压力、依附和主动的兴趣相互之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在整个结构内决策者遵循政治理性的行为模式。同时，它们构成了结构运行的驱动力，并且通过这个驱动力，形成了这个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的内聚力。

让我们通过一个产业部门官员关于他在命令体制时代的活动和地位的访谈来说明权力与依附结合的效应，虽然这个例子有点儿极端，但是很能说明问题。他的叙述揭示了那个时代企业经理的状况与行为模式：

“那真是旧日的良辰美景啊！我监督军事装备的生产，手中操着生杀大权。事实上，甚至今天的军事工业都还是建立在与我那个时代的中央直接管理一样的模式的基础上的。什么事都要经过我们，即使企业要一台打字机也要请求我们的批准。那真是旧日美好的时光啊！我帅气、年轻，而且大权在握。像 H 那样地位的人要跪在地上爬到我的脚下求我批准说他们的计划已经完成了。^①

有一次，他们在新年前夜求我批示他们已经完成了计划，他们说，一切必须做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只差一个零件装进机器里就大功告成了，但这个零件苏联没有按时供应。但我不相信他们。我对这种事一般都不相信，要这样骗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于是，我

^① 这个时期，计划就是法律，没有完成计划要受到各种制裁——纪律处分、关监狱或处死刑（见 1950 年第 4 号法令）。然而，同时，完成计划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Komai, 1957）。因此，就由计划执行情况监督官去决定一个计划是否可以看作是完成了；不过，他（她）也可能会被谴责在搞破坏。

主管的部门有三拨企业领导人都因为这类或大或小的错误关进了监狱，而我仍然牢牢地坐在我的位置上。我的方法是，不能仅仅根据报上来的情况就批准计划已经完成了，必须亲自去考察以后才能给予批准。我总是不断地到企业视察，并且是一项一项地批准计划的完成情况。（冶金与机械工业部计划司，1977年）

一方面，为了满足不断加在他们身上要求他们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压力，也为了获得那些可供再分配的资源，决策者——作为依附连线的控制者，不断地被迫进行干预和汲取资源，这在另一方面又促使决策者——作为依附连线的俘虏，再次以乞求者的身份利用这些连线，并继续上述的过程。

反馈在体制内的建立没有改变体制的运行而是改进了体制运行的效率。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它们成倍地增加了决策者影响那些会对自己造成影响的决策的机会；另一方面，反馈使政治权力结构的关键利益得到考虑和监督成为可能，从而缩短了对决策的反应时间。决策者角色的双重性在于：他们既是权力的乞求者同时又是权力的支配者。

在这种结构性背景的推动下，决策者作为乞求者为了获得更有利的谈判地位，便力图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建立反馈。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有能力激起更高水平的政治敏感性。这就要求他们累积资源，从而导致他们不断地攫取资源。这种通过依附连线寻求支持的驱动，反过来迫使他们满足通过这些依附连线加诸他们身上的期望。满足这些期望同时意味着接受了对他们行使的权力。下面的引文表明了它的结果：

较高层领导人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是很深的。

他们参与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技术组织、科学组织以及体育组织的工作。他们在这些组织中的作用非常广泛，从当组织的主席……到工作委员会执行官不等。……受调查的大多数企业经理都要参加 7 到 12 项社会活动，这种过重的负担妨碍了他们经营企业的效率……许多经理受到党、地方议会以及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委托，参加了各种委员会，要做许多监督工作，这些事情在工作时间之外是不可能做的。这些任务和相关的报告撰写占去了许多工作时间。（Rudas 与 Kovacs, 1977: 17）

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强制而是决策者自己仔细考虑过的作为乞求者的利益，迫使他们满足上级的期望，迫使他们接受现实的权力结构，以及迫使他们认识到依附连线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呢？作为依附连线的俘虏，不这样做等于决策者自动放弃了他们的谈判机会，换句话说，就是放弃了他们可以获得信息和促进自己利益的渠道；他们等于把自己的组织、活动乃至自己的职业生涯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作为乞求者的经济行为是政治理性的。下面摘录的访谈很好地说明了如果企业不愿意利用可以得到的帮助，它们将失去什么样的机会：

“如果一家企业没有完成计划，管理部门可以对它作出什么处罚？”

“如果这不是企业的错误，管理部门就会提供帮助。例如，它会请县党委帮助解决问题，因为县党委毕竟是一地之主。我可以举一个县党委提供帮助的例

子：一家农业企业的一个投资项目没有按时完成，因为签合同的建筑企业转去建住宅了。但这个投资项目是很重要的：出口业务要靠它。他们干得很慢，而且出现了资金困难。因此县政府和党委前来提供帮助了。（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某司长，1979 年）

另一方面，作为权力支配者，行为不断地被淹没在各种要求之中，忍不住要进行干预，即使政策目标本身就是减少干预时，干预也抑制不住。对资源的渴求驱使行为不断地竭力掠夺资源，加剧了有选择的资源分配。不仅如此，即使是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力图抑制自己不要加以干预时，这种情况仍然会继续发生：

“我相信什么样的进步？我相信这样的进步，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消灭这些干预的行为。但是，让我强调一下，中央政府和中央党组织的行为将是非常重要的，它要确保，在目前进口供应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在进口增长缓慢和重组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只有最必要的干预是可以保留的。除了我们以外没有人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发动必要的变革，或者生活是否会迫使我们做我们还不能预见到的事情。

我一直相信，在一套敏感的价格与管理体制里，在指标的制定是正确的条件下，效率不是中央政府的事而是企业的事。中央的干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1986 年）

但是，如果他们不加以干预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一个被政治所垄断的体制里，他们等于抛弃了一批行为人，这些人来求他们并把他们视为惟一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因为在这个体制里，没有其他的利益实施渠道。在这个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里，被抛弃不会导致自治的增长，反而加深对剩余的依附连线的依赖，并受到剩余的依附连线的更严重的剥削。而且，它还会导致一场权力再分配，在此过程中，那些继续控制着连线的行为人将得到好处，而那些切断了连线的行为人将处于不利地位。也就是说，权力的掌握者将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地位。工业部建立初年的经历是一个生动的例子（Csanadi, 1985a）。下面概括了有关事件：

建立工业部的想法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那时，由于经济形势紧张，未来的信贷供应出现了危机，经济决策者竭力要迅速地缩减预算开支和把决策权集中起来，中央干预的强化和改革的意向同时出现，权力机关为合并的三个产业部门：冶金与机械工业部、轻工业部和重工业部——创造了一种内部和外部的环境，以防止新的部门干预经济事务。为此，

- 人员减少了一半；
- 留下来的人当中，70% 转入职能性的司局；
- 监督企业的权力授予部长，禁止部长把这个权力分派给其他组织或团体；
- 过去要求产业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任务暂时转交给职能部门；
- 在职能部门，他们打算裁减产业司局的规模，以便减小工业部的同盟的潜在权力；
- 这也是撤消中央委员会的产业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

输部)的目的；

·他们希望，撤消了中央委员会的产业部，把党对部门的监督转移给中央委员会的职能部门（经济政策部）以后，以及有计划地关闭一些大型企业以后，在经济形势困难的情况下，寻求部门帮助的压力会减少；

·要达成这些目标，他们指望得到地区党组织的合作。

而且，他们还指望环境发生变化，即，

·产业部门的重组会扩大成为对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紧缩政策造成的必要的直接管理只是暂时的；

·行为模式将会发生普遍的变化：中央领导机构会保持自制，不干预部门工作，产业部门的领导也会直率地拒绝可能的干预；

·他们相信，决策者会认识到，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在中央的严格管理下，过去的谈判的作法不再是有效的了。

这些想法是 1981 年开始付诸实施的。除了前面指出的决策以外，还选任了一位非常有决心的部长，他把成功地实施这项改革看作是自己的政治任务和挑战。部长全身心地投入到以新思路为基础的部门的职能上。在企业经理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宣布，经理们不要再指望部里会保护他们的利益和进行调解工作。他竭尽全力拒绝来自其他经济管理组织的干预要求，同时尽量公正地满足党提出的“咨询的需要”。但是，这个部门开始逐渐地被迫适应“现实世界”了，开始满足党、国家和经济加在它们身上的期望。起先，在部门的组织结构内部开始非正式地适应这些需要，而在对外方面，部里仍然极力表现自己拒绝对它们提出的要求。接着是部里承认它无法坚持下去。最后，部里完全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并且在饱尝了各种经

验教训以后，完全从过去的防卫性姿态变成了主动出击的姿态，开始全心全意地满足要求它们进行干预的需要：换句话说，它被现行决策机制“驯服”了。

同时，权力关系的变化还鲜明地表明，该部融入现行权力结构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其谈判能力的下降——即，权力的内部分配已经改变了。不过，由结构性动机驱动的功能仍然保持不变。尽管由于裁员而不得不每天工作 10—14 个小时，但是，由于它们想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满足加在它们身上的需求，所以新部门的工作负担还在不断加重。由于经济形势紧张和新部门拒绝干预，企业早就把建立隐蔽力量和谈判能力的渠道直接转向了银行或财政部（这些机构里的产业司局不仅没有撤消，反而扩张了）。地区党委和中央党组织在利益促进和选择性的分配过程中的作用更大了。因此，作为对运行环境和企业压力的回应，党委主管经济政策的部门（司局、工作委员会、书记）扩充了工作人员，使自己变得更重要了，也使自己在经济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专业了。在党中央的产业部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被取消时，该部门人事和业务主管职权都转移给了经济政策部，由于经济政策部来监督和要求新部门对相关的业务和人事安排负责。在内部权力关系重组的过程中，新部门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在职能、内部组织、存在的问题和具有的联系方面与先前被取消的那个相似。

因此，很清楚，是体制本身创造了驱动决策者有必要进行干预，有必要取得资源和有必要去适应的条件，即，结构性的动机。这种行为模式的根基是由基本网络、反馈机制和结构被政治所垄断的特性造就的。在政治垄断的条件下，这些行为模式是政治理性的，同时它们具有维系结构的效果。我把这个自我维系的过程称作体制适应性。我们在考察工业部的命运时看

到的正是这个体制适应的过程。

第二节 自我支持机制与体制适应性

前面叙述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我支持的机制。体制运行的基本原则和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动机，加上建立在政治理性基础上的不断努力，在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内创造了一个自我支持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行为人都被纳入封闭的渠道，因为除了利用依附连线以外没有别的利益实施渠道；
- (2) 为了确保有利的谈判地位，必须不断增加反馈；
- (3) 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个单位就必须成为战略上重要的实体，这就要求增长，即，要求资源；
- (4) 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源的乞求者不断地依赖依附连线；
- (5) 为了再创造权力行使的物质基础与保持选择性再分配的作法（努力满足对资源的持续渴求）持续地汲取资源是必要的；
- (6) 这又一次驱使行为人利用依附连线。

因此，正是自我支持机制的结构性背景导致了对汲取资源的持续争夺，导致了决策过程中的干预，导致了对特权和资源的争夺，以及导致了拼命的增长（其中包括对投资的饥渴、对人力资源的饥渴和对投入品的囤积）。同时，导致特定的选择性资源分配和优惠分配的政治考虑，以及满足期望的努力，都有结构性的背景。因此，这些行为模式不是由独立于结构性背

景的主观动机^①造成的，而恰恰是由结构性动机造成的：因此，它们是驯服于体制的。

我认为，由于结构的同构性，体制运行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体制特征的再生产，是内部权力分配各异的被政治所垄断的结构所共有的，也是这个结构的各个单元在国际关系中所共有的，无论这个单元的规模——从政党—国家体制中最小的组织单位，到国家权力结构，到国家间的权力结构（既包括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东欧成员国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均如此。政党—国家体制的不同版本影响的是体制运行的效率、它的内部动机和工具以及它的寿命。但是，基于政治理性的行为模式的结构性原因，是普遍存在于各种版本的政党—国家体制的。

总之，由于体制运行的基本原则的存在，干预的能力、干预的被迫进行、无力防卫以及决策者的既得利益同时作用以维持这种状况，就排除了（不论一个体制的内部权力分配如何）能够控制或抑制这种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的自我支持机制的因素出现的可能。

工业部第一年的经历（Csanadi, 1985）不仅是体制适应过程的很好例子，也是说明这个过程不可控制的很好例子。这意味着，只要体制的基本特征不变，不管在人事上和环境条件上采取了多么严厉的组织措施和发生了多么影响深远的变化，前文描述的再生产机制都将不断地循环往复下去（Csanadi,

这是为什么我不同意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的观点的原因，他在该书中用企业经理拼命要增长的“自然的天性”来解释拼命增长的结构背景。（见科尔奈，1980：78，204-206）。后来科尔奈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综合论著里修正了这个概念（科尔奈 1992b），因为，他把这个现象归结为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和国家所有权的垄断造成的后果。

1984), 因此, 这些再生产机制的特征正是不可控制的体制适应性。从而, 如果机制运行正常, 那么每一个采用的措施都将适应于体制。

下一章, 我将讨论自我支持机制在吸纳改革和使之适应于体制过程中的作用, 讨论体制内的改革和间接工具的作用, 并以此解释体制的特性。所举的例子是始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匈牙利的改革进程。不过,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必须简要讨论一下匈牙利的政党—国家体制在 1956 年以后发展起来的主要结构特征。

第三章 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第一节 1956年以后结构转型的主要特征

我的目的不是评价 1956 年以前的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不是对导致 1956 年崩溃的事件进行分析，也不是对崩溃本身进行分析。而是为了给 1956 年后结构的分析提供一个参照，我将指出以下几点。

1956 年以前的结构是根据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这个模式是苏联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建立并稳定下来的，其结构特征是集权的交叉连线与强制性的计划，秘密警察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①

这个准备好了的处方以无情的速度和决心被应用到所有的东欧国家（Peto 与 Szakacs, 1985; Mezei, 1989; Szakadat, 1990）。财产关系、生产结构、制度结构以及对外经济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结果，在短期内，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就发生了改变，职位结构和社会结构重新组合。延伸至各国及其组织的依附连线，确保了对莫斯科的依附，这种依附也反映了政党—国家结构的国内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在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变松弛了。他的去世骤然削弱了匈牙利体制的隐蔽力量，削弱

我们可以从许多分析那个时代的体制的著作中得出这个结论，例如，Fainsod (1958); Hough (1969) ; Hough and Fainsod (1979) ; Grossman (1983) ; Ritter 国家计划总署 m (1983) ; and Rigby (1988) 。

了那些在此基础上积累了隐蔽力量的人的权力。结果，过去隐而不现的体制内权力冲突公开化了，累积的社会不满暴露出来。因此，结构在 1953 年开始解体。

随着 1956 年起义的发生，基本网络内的 D_1 连线和 D_2 交叉连线断裂了，地区党组织和地区党组织内的各机关，以及它所享有的军事和警察力量的支持，都在几天之内崩溃了。在苏联的帮助下镇压了起义后，在苏联指导下上台的政治领导层很快重组了党的等级体系并建立起基本网络。重建过程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中期。

下面的清单列举了制度重建和基本网络的交叉连线重建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阶段。我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史研究所的档案中收集到的党的决议，和从该所公布的文件中收集到的决议，记录了这些事件和阶段。^①

1956 年

11 月 11 日：临时领导集体成立了一个政治权力广泛的组织委员会。其目标是：组织党；推动群众组织开始工作；解决与建立新的党机关有关的个人的组织问题。^② (D_2)

1957 年

1 月 28 日：关于建立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会委员会的决议。

^① 这里列出的决议只是与这个时期有关的大量文件中的一小部分，对所有的文件进行整理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这里的注解中提到的参考文献收在我的自己的档案柜里。

^② IPHA 288 f. 6/1, 3. s. u. 引自 Sandor Balogh (编) (1993),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领导集体纪要》 (Budapest: Intera Ltd), p. 59. 该文本涵盖了 1956 年 11 月 11 日到 1957 年 1 月 14 日该个时期。

(D₂)

- 2月5日：关于党的干部工作的决议。
- 2月20日：关于铁路运输部门党组织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决议。(D₂)
- 3月5日：关于建立书记处的决议。
- 3月13日：关于布达佩斯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任命。(D₂)
- 4月8日：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干部管理职能的决议。(D₂)
- 7月9日：关于与内部反动派斗争的一些工作决议。(D₂)
- 7月9日：关于党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的决议。(D₂)
- 7月30日：关于经济组织中党组织的任务的决议。(D₂)
- 8月23日：关于与派往各省的干部有关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决议。书记处。(D₂)
- 10月18日：关于工人运动的老同志汇入社会和国家生活的决议。书记处。(D₂)
- 11月12日：关于党对内务部及其各机关的监督职责的决议。
关于党对匈牙利人民军的领导和监督职责的决议。
关于党对国防部的领导和监督职责的决议。
(D₂)
- 11月21日：关于加强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 (HPPF) 的决议。
(D₂)
- 12月3日 关于干部工作中一些组织事务的决议。(D₁)
- 1958年
- 4月24日：内务部组织内活动的党组织的权利与责任。
- 6月13日：较大型机械仓库里党聘任的秘书的地位。(D₂)
- 7月25日：1958年国会和地方政府统一选举中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准备和完成。(D₂)

1959 年

- 2月13日：关于1959年干部改组的决议。书记处。(D₂)
- 4月7日：关于在农业合作区建立党组织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的决议。(D₂)
- 10月22日：关于在管理部门和其他中央权力机关运行的党组织扩大干部任命职权的决议。(D₂)

1960 年

- 2月23日：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干部任免职权的决议。(D₂)
- 11月29日：关于地区党委在组织经济生活中的活动的决议。(D₂)

1961 年

- 2月21日：关于“干部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的计划。(D₂)
- 4月25日：关于人事问题书记处撤消以后对领导职位和保密职位上的干部进行监督的计划。(D₂)
- 8月15日：关于干部重组体制的修正案。(D₂)

1962 年

- 11月2日：企业合并后党的领导问题。(D₂)

1963 年

- 2月5日：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任免职权的决议。(D₂)
- 6月25日：关于中央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干部任免职权的补充决定。(D₂)

1964 年

- 2月6日：关于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干部登记工作的决议。书记处(D₂)
- 2月10日：关于提高党的工作质量和增强领导人的政治团结的决议。Hajdu 县党委(D₂)

5月13日：关于党机关的组织、工作方法和工作计划以及党机关的组织构成的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任务、其工作方法的规定以及改进其效率的决议。

(D₂)

6月2日：“关于在大型投资项目建立党组织，实行党的领导和关于中央党组织者的管辖权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中央委员会建设与运输部。(D₂)

11月4日：关于修正中央委员会管辖权的决议。(D₂)

11月5日：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业部的组织、任务和管辖权的决议。书记处。(D₂)

1956年后反馈系统的结构及其得以强化的政治条件，是1956年事件的教训和苏联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变化的结果。以下的战略步骤可以从新政治领导层的决议中观察到，这个新领导层在赫鲁晓夫时代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性：

1. 出于安全、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以及使体制运行更有效率的考虑，党决定把集中的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下放。结果，一部分中央决策职责转移到了等级体系内较低的层级上。地区党组织和管理部门内运行的党组织开始起到更大的作用。

2. 不过，与此同时，内务部与国防部、军队及它们的党组织改由党中央直接监督。当时的干部任免清单表明，中央委员会任免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政治局决定军队党委书记、内务安全力量党委书记、前线卫队党委书记、布达佩斯警察局长、工人纠察队全国总司令以及内务部和国防部的副部长与司局长的任命，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任免清单包括从内务部和国防部较基层单位的司令和领导人到县警察局长的职位。这

些部门的其他地区组织由同级的党委主管。^①就内务部而言，这种作法意味着：

内务部的一切活动都直接受控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定党组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务就是指示内务部的工作。内务部的布达佩斯分部、内务部的县、市和区组织在与实施内务部有关的党和政府决议的问题上由相关的党委会监管。党的这些组织指示内务部各机关内运行的党组织怎样工作。^②

3. 新的政治领导层同时决定减小政治机关的规模：临时执行委员会将机关人员的数量减少到 2 075 个——即，为原先规模（6 225 名政治工作者、956 名管理人员和 1 079 名技术人员）^③ 的 37%。实际上，1957 年新机关的规模为原来的一半大，但到 1959 年 7 月 1 日，其人员增加到 3 693 人。^④

4. 缩小党机关权力的意向和主要内容，在临时执行委员会与 12 月 23 日的会议上以及临时中央委员会在 1956 年 12 月 28 日的会议上就已经作出。^⑤ 这些举措并不仅仅是 1956 年事

关于党对内务部及其机构的监督。政治局决议，1957 年 11 月 12 日，IPHA (288, 5/49 s. u.) (1967 年 3 月 7 日再次通过)

政治局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干部任免职权的决议 (288, 5/171 s. u.)

^③ IPHA (288, f. 5/1, s. u.)

详细的人事数据参见 Sandor Balogh (编) (1993),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领导集体纪要》(Budapest: Intra Ltd.), 第 68 页和 235 页。

同上, 第 274 - 至 298 页。

件的结果。类似的行动也可以在苏联发生的变化中观察到 (Bunce, 1983)。为了限制个人的决策权力, 决策的权限从党机关分散到党的各种机构上去。

这是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减少党和群众组织部的管辖权的目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裁减了这个部从前的决策和指令权力, 把它转变成有关这个部监督的组织和干部的一个咨询性机构。^①

5. 随着党机关权力的缩减和下放, 一个权力延伸的过程开始制度化, 并通过交叉连线的数量不断增加来得以完成。这意味着分散的社会集团汇集到可控的组织里, 这些组织的建立有, 比如, 法律顾问工作中心的建立, 把私营农场集中到各种类型的合作社里, 企业尖兵和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的加强。同时, 他们力图做到有能力控制这些集团的利益。

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决定建立工会委员会, 使它在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工会委员会委员的任务是与各个工会组织内的党的集团保持联系, 与中央领导下的党的集团保持联系, 同时, 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参加党的集团的会议, 将在工会里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观点传达给中央委员会, 把地方工会组织领导下的好的作法传播出去。^②

6. 他们不仅试图通过交叉连线的延伸, 而且通过反馈的建立来控制重大的战略利益。因此, 在党的机构内, 那些代表了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巨大的政治利益的人在集体决策的过程中

^① 1957年4月8日书记处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干部任免问题和关于委员会结构问题的决议。IPHA (288/20/49. s. u)

^② 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与中央委员会并肩战斗的工会委员会的公报, 1957年1月28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IPHA (288. 20/1 s. u.)。

权力越来越大，这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的一个例子是 1957 年 7 月 9 日政治局关于党对地方政府的管理的决议：

布达佩斯、县、区和村的党委第一书记必须经由相应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和党的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是相应的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政府里的非党领导人也应吸纳进来参与这个或那个重要问题的解决。^①

反馈的政治基础由于符合体制规范的行为将获得奖励的措施的再次制度化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政治性的选择标准决定了工业的空间布局：“地点的经济可行性必须从长期的角度考虑：不仅要考虑企业的建设，还要考虑企业的运行以及相关的成本。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政治上表现优秀的地方。”

下面的这个条令也反映了类似的考虑：“在各种国家事务上（职务任命、住房问题、孩子上大学），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在条件类似的情况应该获得优先的照顾。”^③

7. 奖励之外，惩罚也反映了选择的政治基础。有一条党的条令规定，要始终坚决地消除可能引起不稳定的“因素”。这些标准的达成要通过政治驱动的理性化程序来实现，这个程序是一步一步地随着法律顾问工作中心的成立加以实施的：

^① IPHA (288. 20/9 s. u.)

政治局关于工业的地区布局的决议，1958 年 10 月 29 日。IPHA，布达佩斯（20/59 s. u.）

^③ 1957 年 10 月 18 日书记处关于为工人斗争中的老同志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找到适当位置的决议。IPHA (288. 20/13. s. u.)

随着社会主义组织形式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律师的名单要不断地修改。在每一个县，都要由一个五人委员会进行评议，这个委员会由以下人士组成：立法会议的管理官员或它委托的一个律师、县党委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县政府执行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和产业部门提名的主席……法律专业队伍必须把那些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不适合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清除出去……根据 1957 年第 66 号法令不得担任重要职务和秘密职务的人、不得下达行政命令的人都不得加入法律顾问工作中心，不得从事这里的工作。^①

这些政治步骤采取以后，通过交叉连线建立起来的反馈系统就在政治上变得合法化了，而重新建立的 D₂ 连线——与过去的情况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分权化了。这个分权化的过程后来还持续进行着。^②

决策的经济背景，或者换句话说，经济领域的反馈的增强，是伴随着从 1958 年末到 1961 年初的农业集体化的进行而出现的。^③ 随着集体化运动的展开，交叉连线征服了新的经济

^① 1958 年 2 月 18 日党委关于律师问题的政治和法律解决办法的决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IPHA (288. 20/17 s. u.)

^② 这反映在，比如，1964 年 5 月 5 日书记处给政治局的报告上，这个报告总结了为适应党机关组织的组织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规则变化的新形势而作出的自我管理和组织努力所取得的经验教训。IPHA (288. 2/64/371, s. u.)。

见 Peto 与 Szakacs (1985)以及 Ungarszki (1989)。

领域。^① 通过这个过程，许多农业组织及其地区组织和全国组织，或在国家等级体系内或通过交叉连线，获得了更强的政治谈判地位。随后横扫农业领域的合并运动使政治谈判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并在各个层级上促进了发端于经济领域的反馈的出现和强化。

下面的指示表明了这种制度化的进程，表明了体制的成长，表明了随之而来的反馈机会的增加。虽然这是有关村的指示，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在党等级体系更高的层级上，类似的指示也是存在的：

把所有基层组织的书记选进村党委会，把地方国家、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共产党领导人选进村党委会，这是一件好事。农业合作社进一步统一了，党的机构也应该合并。

在 1959 年到 1964 年间，工业领域也进行了类似的合并运动。^② 由于工业企业的合并，固定资产的集中，管理这些企业

例如，从 1960 年 2 月 12 日起，根据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势与改进其工作的决议，全国 70% 的可耕地已掌握在国家组织和农业合作社的手里，并且，正是这个方法把这些领域并入了网络，并使之置于党的监管之下。IPHA (288. 20/12, s. u.)。

^② 1959 年 4 月 7 日政治局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建立党组织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决议「必须在 1959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这是在文件空白处手书的批注）」IPHA (288. 20/26, s. u.)。

^③ 见 Peto 与 Szakacs (1985); Schweitzer (1982) ;以及 Voszka (1980; 1984; 1988) 的著作；并参见重组赖以进行的基础性文件——1959 年 3 月 10 日的政治局决议：“关于为工业组织和经济领域的变化作准备工作的委员会的任务、成员及其工作计划的决议”。IHPA (288. 20/68, s. u.)。

和资产的决策者的权力进一步增加，他们于是在国家和党等级体系的各个层级上建立和发展了反馈。

这可以，例如，从中央的干部任免清单上看起来。如今，在政治局的清单上（与过去只有大城市的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不同）许多大型企业的独立党委书记也由中央任命了；^① 根据 1963 年 2 月 5 日政治局的条令，企业领导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也由中央任命，^② 根据 6 月 25 日政治局的条令，又有 25 家企业的经理加入了中央任免干部的清单。^③

反馈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在大型投资项目开展工作的独立的党组织者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他们要向中央委员会的党和群众组织部，以及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报告最大 20 个大型投资项目的情况。^④

到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新权力结构的主要特征已经成型，并使体制保持了长期的稳定。这个稳定性的基础是，通过 D₂ 依附连线和普遍的组织变迁，体制有了渗入新的经济领域的可能，从而可以汲取新的资源，使得体制的经济基础得到了

① 1960 年 2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干部任免职权的决议。IPHA (31/1/211 s. u.)。

② 1963 年 2 月 5 日政治局关于中央委员会管辖权的决议。IPHA (288. 20 / 257 s. u.)。这个文件列举的企业只包括一部分其经理是中央委员的企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7 次和第 8 次全国党代表大会（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第 545 页至 550 页与第 412 页至 418 页）。

③ 1963 年 6 月 25 日政治局关于中央委员会职能的补充规定的决议。IPHA (288. 20/257 s. u.)。

④ 1961 年 8 月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IPHA (288. 20/34 s. u.)。

加强。与此同时，反馈系统确保了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经济利益能够溶入基本网络，确保了基本网络对它们的监督和考虑。

在主要的结构特征发展起来的同时，为适应新的结构特征而进行的经济管理上的转型也加快了速度。维持机制的结构性动力有着自己特有的工具，这些工具又是由权力结构的特性造成的。因此，比如，在交叉连线的起源集中，反馈系统的经济背景弱小的情况下，只有直接的工具——不断的动员、直接的命令、威胁、清洗和运动——才能帮助机制运行下去（Soos, 1986; Fainsod, 1958）。在反馈的经济背景强大，并且体制运行的结构性动力也因此更有效率的时候，应用直接工具的必要性、直接工具的可行性以及直接工具的重要性都减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以及与之相伴的间接动力，成为主要的工具。这正是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的情形。

强经济反馈的网络使得体制的结构性行为的动机更有效率，这使得体制有可能逐渐弱化强制计划指令的模式，从而转变成间接管理体制，这是 1968 年实行新经济机制时引进的体制。^① 由于进行了管理改革，逐渐转变的权力关系稳定了下来并变得制度化了。但是，权力结构的内部转变并没有使政党—国家体制的基本要素及其连结原则发生变化。

下面，我将探讨 1968 年经济改革历史中与自我支持机制、与对即定结构的体制适应性以及与改革所起的作用有关的部分。这意味着读者将不会在这里看到改革史、经济史、社会史

间接管理意味着中央不再对各个经济单位进行具体的、个别的管理，而是对整个经济进行一般的、原则性的管理，通过发布一般性的原则和条令进行管理。各种文件对原则和条令作出了详细的解释，《经济体制改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5 月 25-26 日会议（布达佩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调查与宣传部）（M. Cs.）。

和经济政策史。改革前经济学界的辩论、有关经济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与 1956 年以前的辩论的比较、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与改革的停滞之间的关系、以及实施改革以前的经济形势都不是我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节 体制适应性与 1968 年的改革： 决策与强制路径

1968 年 1 月 1 日，匈牙利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管理改革，用“有指导的市场模式”取代集中管理模式或曰“指令”模式。新经济机制（NEM）建立在间接管理的基础上，用一般指标（作为工具）进行管理，所有的经济行为人都必须参照这些指标展开经济活动（例如，税收、工资条例、信贷标准等等）。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市场的作用，增加企业的自主权，促进企业适应市场。这场改革既要求那些管理经济的人根本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也要求那些管理企业的人根本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还要求根本改变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到那时为止的直接而紧密的依附意味着企业受到了很大的保护，从而很少受到经济的影响。随着这种保护的减少，政治领导层希望经济能够加大对企业活动的影响：

在政治工作的范畴内，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确保在 1969 年增强对企业的经济压力。应该清楚地声明，经济压力与改革的理念是一致的，经济压力不产生于别的原因而是产生于我们新管理体制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可避免地扩大的结果，它决

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集中管理的体制上去。^①

在实施改革措施的同时，改革者们也在管理体制当中融入了一些特殊工具，或者说作了一些豁免（即为企业躲开一般规则铺平了道路），它的目的是帮助企业在初始阶段适应市场条件，以及弥补^②国内供应方面的短缺和帮助解决完成社会主义国家互助贸易义务方面存在的困难。^③但是，特殊豁免的作法很快就扎下根了，并且在决策体制里传播得越来越广：在利润率低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税收豁免和补贴（Deak, 1972; Csana-dine, 1979; Csanadi, 1980; Antal, 1985）。不仅如此，如果一个企业被认为有超额利润，就有可能对它征收特殊的税收，但也可能在企业没有满足借款条件的情况下得到贷款，或得到贷款的企业竟不需要自己拿出部分资金进行投资，或企业没有满足还款标准的情况下得到贷款。允许偏离规范管理的临时措施迅速增加。因此，获得特殊的待遇，获得金融优惠以及其他优惠，是可能的。

同时，实际计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根据规范管理应该制定的计划，以及实际的结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人们的期望，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一套统一的评判标准。一种优待将持续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1968年 12月 4日会议公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967 - 1970年的决议与文件》（Budapest: Kossuth Konyvkiado），p. 263。

关于个别的、特殊的补贴和给予补贴的原因的详细分析，见 Csanadi (1980)。发放补贴的第一个官方标准可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1966年 5月 25 - 27日会议的文件上找到（见《经济机制的改革》，如前所引，第 138, 153 和 206页。）

这里指的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双边贸易协定的基础上一致同意的贸易数量。

多长时间以后必须加以干预，在干预的时候，在给予特殊照顾的时候，可以使用哪些不同于新发布的规范管理的手段，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状况造成的影响在经济紧张状态给管理机构带来较大压力的时候明显地在这些机构最初的不稳定行为中表现出来。

通过 D_2 连线，紧张状态、压力和不确定性传递到了党的身上，党很快就作出了政治反应，并在各个层级上要求产业部门迅速进行干预：

经济管理规则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促进了经济生活的普遍发展，并且帮助管理机构开展工作。但是，它们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管理机构，包括产业部门，可以消极地对待令人不满意的情况，教条地遵守这些一般规则，无所事事而不采取行动，只解释发生的扭曲而不去消除这些扭曲，或者在它们本应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消极地等待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监督机构应该密切关注它们主管的企业，以便确保这些企业严格遵守经济活动的有关规定和价格制定的有关规定，在这些规定没有得到遵守的时候，监督机构要采取行动纠正这些错误。无论对国营企业还是合作企业都应如此。^①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0 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党的运行及其将来的任务的决议。1970 年 11 月 27 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966 - 1970 年的决议与文件》（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第 697 页。

布达佩斯党委准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材料，其语气同上述材料是一样的。它反对产业部门可以让企业管理脱离它们的监督，让企业有太多的自主权，即使在这种状况的消极后果已经引起了它们注意的时候还允许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下去：

改革以来，国家机关误解了它们在企业管理问题上的作用，它们没有对企业提供足够的帮助。例如，它们没有鼓励企业采取更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没有促进企业内部机制的成长，没有帮助企业提高生产率。布达佩斯党组织过去曾经多次反对这种状况，但是，只是在 1969 年 11 月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①

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要求部委注意的正是这个问题。根据决议，管理部门不应该对企业活动放任自流；它们应该对企业行使所有权；在它们采取行动的过程中，不干预的一般原则只能有选择地加以实行，因为完全消极的态度对国民经济利益是有害的：

管理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新型关系以及新管理方法的采纳进展比较缓慢。绝大多数问题是由产业部门的责任引起的，由所有权固有责任的行使和企业自治权理解之间造成的矛盾引起的。许多部门和高层管理机构都没能干预企业的活动，甚至在这些干预有利

关于 1966 年以来已完成工作的报告（讨论稿），布达佩斯党委，1970 年 7 月（M. Cs.）

于国民经济的情况下都没有进行，而这些干预对企业本身的长期发展是绝对必要的。^①

其他文件清楚明确地命令产业部门抛弃实行新经济机制以来表现出来的麻木迟钝：

必须克服某些国家和管理机构的迟钝现象，它们的作为好象时间已经停滞了似的；它们犹豫、等待，在解决已经长期存在的问题方面行动迟缓。必须打破对本身正确的经济管理规则的盲目崇拜，在明明看到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时候，我们不能麻木地站在一旁等待结果的降临。^②

第三节 体制适应过程的结构背景

我们似乎能够预见到工业部在 1968 年改革进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这个改革是在“有指导的市场模式”下采取措施促进非干预主义的管理。然而，情况表明，要求加以干预的压力太大了，干预很快就合法化了。与最初的改革目标相对立的动力得到加强，其背景不是偶然的：它可以追溯到相似的结构原因，追溯到自我支持机制的运行和这个机制内在的政治理性行为模式，可以追溯到体制适应性的过程及其结构背景。下面

^①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0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如前所引第 201 至 220 页部长会议主席和政治局委员 Jeno Fock 批注。

^②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亚诺什·卡达尔的讲话，《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0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如前所引，第 123 页。

论述的正是这个过程。

1968 年发动改革的同时，并没有作出会损害上述基本联系原则和运行原则的权力结构方面的变革，没有作出会损害行为的基本的结构性动机的权力结构方面的变革。实际上，这些基本原则和动机反而得到加强了，虽然，就党的领导而言，情况显然表明，他们决心抑制党的干预型控制。

1966 年，领导层要求党机关消除党的活动与国家活动相互重叠的现象，要求党机关减少干预。^① 在强调采取规范管理的必要性的同时，他们也采取实际步骤实施这个纲领：他们按照重组产业部门的模式改变了党的中央机关的内部结构，取消了过去行政管理部，并建立了经济政策部取而代之，以促进一个更加规范（非干预主义）的管理体系的建立。在经济管理人员应该满足的所谓“三个标准”（政治可靠性、道德纯洁性和专业能力）当中，专业能力的经济专门知识^② 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但是，与此同时，交叉连线不仅得到了加强，而且还向更

“中央领导机关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和执行指导性的原则，制定和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改变党和国家的专门机构对相同的经济和文化问题以相同的方式平行地开展工作的局面。……党的工作应该加强经济领导人的自主性；它应该提高每个人的责任心，同时要避免对经济的实际运行施加繁琐的干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9 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1966 年 11 月 28 日到 12 月 3 日。“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地位”（1968），《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963-1966 年的决议与文件》（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第 561、560 与 562 页。）

^② 同上。第 563 页。

广更深的领域延伸了。^① 虽然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受到了抑制，但是计划进行的制度体系的变革并没有在经济管理的领域中发生，也没有在企业的组织结构上发生，增长冲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Voszka, 1980; 1984; and Schweitzer, 1982）。随着间接管理的实行，到那时为止建立起来的反馈变得甚至更加重要了，因为，由于没有了直接命令，只有通过反馈才有可能改进干预机构和资源乞求者之间的联系，所以反馈的作用在两个方向上得到了推进。在原先的反馈的之外，无数新的反馈建立起来了（Csanadi, 1980; 1984）。^②

各种文件证实，通过通常的依附连线进行的报告系统持续运行着。报告中新老问题都有，党和国家的管理机构就这些问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这些问题包括：企业和管理部门的组织转型产生的效果，为实行新经济机制所做的准备工作，新经济

^① 1967年，地区党组织与部门之间的信息连线，即，所谓的产业部门的“党联络系统”，被更新了（“人事工作进一步发展的行动计划”。冶金与机械工业部教育与人事司，1967）其他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任命经济领导人时做好自己的干部任免，更严格地承担自己的干部任免责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如前所引第492页）。1970年起，更详细、更广泛和更经常地制作统计报告的要求进一步扩展到地区党组织也必须开展这项工作（冶金与机械工业部管理条令1970年第36号。关于1970年统计报告制度的补充规定）

^② 这些新反馈包括：计划审议（在部门的直接监督下制定企业计划的过程），它在党的中央机关批准后随着间接管理规则的引入被取消，但在一年以后产业部门的活动又开始重新有了计划审议，不过它在形式上不那么严格了（Csanadi, 1984）。这种所谓的“制定计划过程中的谈判”有时在部级、副部级和司局级上进行，具体在哪个级别取决于具体企业在战略上的重要程度，这一点也表明了选择性的待遇。不仅如此，被选上的企业还有机会在制定中长期国民经济计划时提交自己的基本发展规划。某些企业具有特殊的统计地位，一些企业在中央制定长期的技术发展规划时起着关键的作用，还有一些企业可以越过批发商直接从生产商那里获得投入品，如此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企业具有的特殊优势。这些可能性后面将要详细讨论。

机制的实施效果，产品结构的变化，对苏联的出口，以及一般的经济和政治活动 (Csanadi, 1984)。

所有这些行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新经济机制的引进和运行是通过熟悉的依附和利益实施渠道并根据政治理性的标准进行的；因此，干预和乞求的被迫性——自我支持机制的特征——仍然完好无损。

以上论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内为推动和监督新经济机制的准备工作而成立的操作委员会。^① 监督是通过平常的管理渠道进行的，这反映在一份文件的名称上：“向新经济机制转轨的最初日子里部门监督下的企业的经验”。^②

早在 1968 年 2 月第二个星期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个操作委员会就提交了一份有关工作经验的报告，产业部门也接到了通知，要求它们向新成立的旨在处理规范管理问题的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报告工作情况。^③ 在政治组织等级体系里流转的每周一次的“士气报告”也证实了同样的事情。地区党委进行着与产业部门相同的调查工作：“根据地区党委执行委员会的要求，企业内成立了机制委员会，企业要精心准备行动计划，以确保过渡能够顺利实现。”^④

这个委员会在 1968 年 1 月 15 日开始工作，会议在部里和在企业里召开，主题是改革的头两周里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经验，这个会议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M. Cs.)。

副部长 Jozsef Kocsis 关于新经济机制的引进的经验档案 (1968 年 1 月)，新匈牙利中央档案。

^① Nepszabesag, 1968 年 2 月 11 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向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作的报告，冶金与机械工业部，1968 年 8 月 (M. Cs.)。

^④ 围绕改革实施的经验，1968 年 12 月 16 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5 区党委 (M. Cs.)。

规范管理与牢固把握企业管理的必要性之间产生了矛盾，经济政策管理不得不面对这个日益激化的矛盾，而这又强化了各种机构采取行动介入企业事务的强制力。对企业管理的控制正从他们的手上滑落。不过，在依附和利益实施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仅仅依赖他们并不能阻止这种局面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各管理机构之间对对方活动的不满情绪发展起来。相互之间的不耐烦情绪造成了不良后果，促使党机关加强监督力度和加大压力以便较迅速地解决问题。下面的访谈摘录与此有关：

“在 70 年代初期，情况就很清楚了，这（规范管理）是不够的。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地区经济发展部。我认为，不断地发生迅速的机构重组的原因是新成立的部门难以适应一般管理机制。……我们的整个决策系统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是什么东西向党表明，它不能只是处理意识形态问题，而且还要处理其他问题？”

“日常生活。当情况清楚地表明，每天的生活正在向我们提出一大堆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回答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彻底清楚了：仅仅站在一般化的层面上，这是不可能的。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很多问题通过国家机关提交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帮助解决，有些甚至可能在准备决策的阶段，各方面就提出了问题。也许这种情况是不得已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以后，经济必然要与越来越多的矛盾作

斗争，这必然会带来了这些变化。”（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1976年）

自然，部门的活动也受到了不断地来自企业、地区党组织和更上层党组织的不满情绪的刺激。产业部门对这些情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主旨：要求产业部门干预企业。借口：企业的行为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可能不和谐，与既定的长远计划不一致，因此间接方法的作用看来是不够的，规范的经济管理看来只适合于达到短期的和谐状态。^①

因此，情况变得很清楚了，不能把自主制定计划的权力“下放”给企业，必须实施更严格的指导和进行更紧密的监督：

第一次信息交换（1968年12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信以后肯定要更经常这样做；不仅如此，我们将不得不选择某种更加直接的方法介入企业计划的最终制定。一开始，企业的机会与利益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不和谐，超出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这种情况表明，产业部门除了起到交换信息的作用以外，还将在指导企业制定计划方面起到更加“具体实在”的作

关于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对各企业在1971年1月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的基础上制定的第4个五年计划所作的评议活动的分析，第6页（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党委撰写）（M. Cs. ）。

用。^①

这种要发挥更加“具体实在”作用的愿望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只表明在所有的产业部门中间，冶金与机械工业部是作出最快反应的。但是这种对“时代的标志”作出反应的“局部行为”如果没有高层的政治铺垫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计划审议方面你可以与谁一起进行协调工作？”

“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工业部的支持。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让我们一起看看情况会怎么样。’他们说，无论何时在县级突然发生什么大事，我们都应该向他们报告，他们会处理这个事情。但这并不是必要的。党的工业部后来很能利用不断汇集到他们那里的信息。（冶金与机械工业部交通设备制造司，1976年）

从上面提到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县一起“处理事务”的必要性从来没有成为现实。不仅县党委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而且——大概是因为分派给它们的经济政策任务和从上下两个方面对它们同时提出的日益紧迫的要求——县党组织还参与了对企业计划更严密的监督：

^① 关于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对各企业在 1971年1月4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的基础上制定的第4个五年计划所作的评议活动的分析，第4页（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党委撰写）（M. Cs.）。

在进行了第一次的计划审议以后，党组织（特别是县级党组织）对部委做的这种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许多县党委感到其他部委最好也有这样的作法。这种作法有积极意义。如果党组织和有关的机构都来参与，那么讨论的效率还可以提高，而且还可以使各方面很好地了解企业和产业部门的问题。^①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第二手材料上推断，地区党组织早就与部委一起对至少是比较重要的企业的中期计划进行监督了。^②

在当时发展了的环境条件下，由于累积的不耐烦和不确定性，金融机构本身也不再坚决地反对冶金与机械工业部的动议；在行动上，它们的表现先是积极参与，然后是抵制，后来是消极应付（Csanadi, 1984）。

党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不仅同意了新的干预，而且发动了一场广泛深刻的动员，把整个结构调动起来对经济利益进行监

关于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对各企业在 1971 年 1 月 4 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的基础上制定的第 4 个五年计划所作的评议活动的分析，第 6 页（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党委撰写）（M. Cs.）。

例如，县党委书记向主管监督工作的副部长发出的邀请有这样的内容：“亲爱的 Gy. 同志，县党委经济委员会正在讨论呈送给您的题为‘关于企业为第 4 个五年计划进行经济和政治准备工作的报告’的材料。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1970 年 6 月 2 日）

督。^①除了产业部门以外，中央委员会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也要求国家计划总署收集有关企业和合作社各种意见的信息，并把收集的结果报告给经济政策委员会。事实上，经济政策委员会也向自己的机关以及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和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开展同样的工作。其目标是对企业管理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督：

经济政策委员会认为，由国家计划总署组织有关企业和合作社目标的信息收集和评估工作是必要的。国家物资与价格办公室要对相关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然后在 1971 年 1 月向经济政策委员会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经济政策委员会要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准备一份决议，阐明地方党组织、企业党组织和合作社党组织在这些经济组织制定中期计划过程中的监督任务。^②

经济政策委员会还提出，1966 年的文件里规定的管理

下面摘录的注释证实了中央机关的积极活动对产业部门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经济政策委员会在议事过程中有着决定性的重要地位，在议事过程中，他们强调指出，经济政策委员会认为，监督机构持续地帮助、监督和评估企业的中期计划的制定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他们将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要求经济领导人为计划的组织工作和计划的内容负起责任，收集信息以便进行评估工作，对一切与企业计划有关的必要信息进行分析。部委必须确保企业制定现实的中期计划，确保企业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和它们的内部储备去实现它们的目标，确保它们不浪费资源，不为此要求过度的投资或比全国计划的分配额更多的发展贷款和国家补贴。”（关于冶金与机械工业部机关的活动的分析）（M. Cs.）

^② 经济政策委员会在企业 and 农业合作社制定中期计划过程中的作用（1970 年 11 月 18 日）MF（M. Cs. ）。

“纯粹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务，对于党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够的。1970年各种文件不再强调这种角色。干预主义的强化有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即，国会的发言和决议越来越频繁地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监督工作。

重点的转移也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增强监督和加强中央管理的必要性在论及企业自治、党内民主和促进地方利益的同时总是要提到的。从各种文件中可以看出，通过对加强监督的强调，他们竭力（依据政治理性的利益）把企业和地区利益的实现过程置于可控制的渠道，从而把它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上：

党内民主与中央管理的加强是相辅相成的。……新经济机制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减少而是意味着增加对生产的监督；然而，地区党政组织和企业组织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只是在一旁无所作为。……一般来说，党组织是敏感的，能够正确理解企业对管理部门的要求，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中央就企业问题从全国利益出发所作的考虑。党的更加有效的监督应当促进这样的企业自治，即，既有利于全国利益又有利于工人利益的企业自治。^①

在强调执行机关应加强监督和管理活动的同时，党和国家领导层还强调，应该增加那些——根据党的意见——“扭曲了经济政策”的人应负的政治责任。从而：

^① 第 10 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发挥党的功能”，《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0 次党代表大会纪要》，op. cit., 第 490 和 492 页。

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过去和现在都在经济政策原则的制定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推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这些执行机关应该加强党的监督，党的监督在一段时期以来松懈了。定期地进行典型调查，检验中央采纳的原则是否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执行，这是很必要的。对那些扭曲了经济政策的人必须采取措施；如果指示与行动不力，那么他们就得逞了。^①

然而，指出以下一点是很必要的，即，所要采取的行动不是针对制度，而是在定期的、个案监督的基础上，针对那些“扭曲”了经济政策的个人。下面的警告不仅是对企业管理人员说的，而且也是对工人说的。

基层和中层党组织的领导人……要监督党员领导工厂、企业和合作社所做的经济工作。必要的时候，应当要求他们改变决策。如果在他们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他们不能够纠正与党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条令相冲突的不适当作法，他们应当向上级党组织寻求帮助。^②

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后来在讨论自己的活动和行为以及未来决策行动的文件里，反映了相同的观点：

亚诺什·卡达尔的报告，同上，第 122 页。

^② 第 10 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发挥党的功能”，《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0 次党代表大会纪要》，*op. cit.*，第 490 和 492 页。

保护国民经济利益正在成为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要和显著的工作。1968—1969年间的远距离观察和只进行警告的行为已经越来越多地为积极的干预所取代，有些情况下，干预采取了下达具体指令给企业的形式，这些指示的目的是阻止企业采取对国民经济有害的措施。这种作法还不够有规律，缺乏连贯性。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深入监督企业行为的角色。我们在这方面的具体弱点是没能使企业经理为他们对企业造成的损失负起责任来。我们对此还不够勇敢。虽然我们强烈希望管理人员公平地惩罚利用企业设备谋取私利的工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工人、毫无章法地主持投资项目的企业经理，但是糟糕的产品开发和给企业造成几百万福林损失的交易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对违反纪律的事情作了一些警示性的惩罚，但是，我们应该可以使企业领导人更守纪律，也可以提高管理部门的威望。^①

特别是经济领导人，各方面都提醒他们要满足政治上的期望。太大的独立性、过多地强调地方经济利益和使经济领导工作与政治工作分离都是不恰当的：

经济管理领域内的专业化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规律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的经济领导人永远都不能

管理部门对中央全会制定的指导原则的反应和评价，国家管理职能发展的指导原则，以及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建议。“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党员积极分子会议纪要”，1971年11月（M. Cs.）。

忘记，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框架内进行工作的。他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些经济规律应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够把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导同政治分离开来。^①

政治理性怎样贯穿于经济利益和经济活动的问题，可以在那时制定的关于企业价格政策方面的要求上得到最好的体现。这些规定要求企业在追求利益时“自愿放弃”局部利益，它包括以下内容：对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定价）的约束建立在企业经理和更上级的管理机关的政治考虑和道德考虑之上。这个原则体现在对有道德行为所作的大量呼吁上，比如，“社会期待着”；“不能认为那是适当的”；“应该受到谴责的”；“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他们如果这样做就对了”；“这是令人厌恶的”，“国家领导人表达了整个社会的愿望”，等，关于这些要求有不清楚的地方，企业应当咨询有关的监督机构，等等。这点还体现在下面这段摘录上：

关于企业定价行为的规范，总而言之，必须强调指出，新管理体制之所以在定价问题上赋予企业那么大的独立性，是因为国家信任企业的领导人。我们的社会期待企业领导人在制定价格的问题上承担应有的责任，特别是在企业利益与普遍的定价政策和国民经济利益明显发生冲突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期望，通过

^① *Bela Biszku*（中央委员）的批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0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如前所引第 237 页。

与监督机构进行预先的协商，企业能够妥善地解决这些定价问题。经验表明，协商的过程对企业进行决策是很有帮助的，不过，这当然不等于说企业的责任就取消了。^①

一方面，基于政治考虑的道德要求被强加在经济组织身上，同时，政治组织还要承担监督经济工作的责任：

在新形势下，区党委领导区里的政治和经济工作的责任大大增加了。必须改变党的控制方法以适应这种要求和责任。相应地，党委现在要花比以前多得多的时间去帮助各单位实现经济政策规定的任务，去调查经济管理指标的效果，去详细评估已经完成的工作。它们应该经常帮助企业发掘它们还没有看到的资源。^②

实际上，它们已经把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它们强调，在经济领域没有哪个地方不需要有党在场并接受党的领导，因为“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这个论断（其本身在即定的体制内是正确的）成为党的控制力应囊括一切的原理

^① NMPO 主席关于企业定价政策应该遵守的规则的意见。1/1970. [AT] 28. [ATB], 《价格管理与产品流通》第 28 号, 1970 年 8 月 7 日, 第 325 页。一段时期以后, 他们不再满足于发指令和政治警告, 而是觉得有必要制定措施来抵消规范管理造成的不确定性。

^② “关于 1966 年以来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报告”。讨论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党委, 1970 年, 第 59 页 (M. Cs.)。

由，使党能够制约企业的决策权：^①

即使是今天，工厂党组织组织经济活动的功能，其特征和内容在众多场合仍然是人们争论的问题。一些经济领导人认为，党的监督妨碍了他们利用改革提供的机会进行决策的自由。但是，在党组织内，人们坚信“纯粹的经济问题是没的”首先因为党应该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起领导的作用；其次，因为经济工作和改革都是党的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每一项经济活动都受到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也会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②

因此，不存在“纯粹的经济问题”。经济领导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成员”，因此，应该在政治上“期待”他们能够超越自己的私人经济利益，采取与社会的利益和国民经济的利益相一致的行动，并且正是这个原则应该成为他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然而，这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指导性的原则和一些提醒就能够实现的。所以，各种管理机构认为，加强监督和增加干预是合理的。这些文件表明，到这时为止，产业部门和地区与中央党机关都在新决策体制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布达佩

^① 我们不应忘记，在这些普通评论的背后隐藏着交叉连线，这些连线代表着依附关系和干部任命系统，一个人的生活是很容易依靠这些关系和系统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党的纪律，因为大多数经济领导人同时也必定是党员。1970年5月有一个部门进行的调查反映了这种情况，根据这份调查，冶金与机械工业部主管的388名经济领导人中，81.5%是党员（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2332/1970）（M. Co.）

^② “关于1966年以来已经完成的的工作的报告”，如前所引，第60页。

斯党委的一份文件里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经济改革之初，我们党组织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在新关系的框架下改变党的工作方式？今天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是没有必要作根本改变的，但是新的特征已经丰富了党的工作的实际作法。例如，党组织的工作比以前更独立了。这是因为更高层党机关的决定更清楚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对更长时期的工作作出了指示。另一个新特征是，党机关是在细致地收集和分析了数据的基础上作决策的。它们越来越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处理经济问题。党组织已经得到了一项新的任务，即，把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国民经济的利益协调起来；它们应该怎样解决矛盾的提出。^①

关于规范管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中央机关某个工作人员提到的正是这种认识，他概括了这个时期遇到的困难：

“回头来看，我认为，我们可以冷静地再次指出，在 1967 年或 60 年代中期的各个时候，他们都带着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都把经济管理看得过于简单化了。许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一点，但是在 60 年代中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今天也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特别是在金融部门，他们对规范管理指标的期望过高。我一直是这种间接管理方

^① “关于 1966 年以来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报告”，如前所引，第 58 页。

法的支持者，但我从来不认为，只要应用了这些规范管理指标，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得不到帮助，要进行管理是很困难的。（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1980年）

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气氛和这种认识，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任务是调整部门组织的工作以适应经济机制要求的委员会会议被取消了。这个委员会不仅没有对产业部门的改革提出什么建议，反而觉得维持现状更重要，甚至认为应该强化这些产业部门。

应该把产业部门的大量工作看作是新管理体制下的一种现实情况。由于在我们的体制里市场的运行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所以在可见的将来我们不能大大减少部门的责任。在我们的利益范围内，现在和将来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从国民经济利益的角度看，这就要求在许多场合部门或中央还是应进行干预。但在构成当前任务之一大部分的国际合作的情况下，对国家管理活动的放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它们（产业部门）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上，努力提高部门管理的效率，这是很必要的。^①

根据这些文件的指示，改革组织或改革它们的工作方式或作法是没有必要的。虽然规范管理是正确的方向，但是，经济

制造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管理的现代化。国家管理委员会，MF 下属的第3委员会，1969年10月3日，第44页（M. Cs.）。

“不应该自主运行”，对经济管理指标的后果进行监督和纠正是不容或缺的，而这正是国家和党领导的任务。

对这些理由的承认，尤其是对干预的存在的必要性的承认在那个时期也反映在产业部门官员的行为上。在经济过程中加强监督，迅速地进行干预，解决企业间的冲突，这些看来都离不开他们。下面的三个例子证实了这种情况。第一个案例是一个副部长采取的一个行动，第二个案例是一份有关企业领导人的会议的报告，第三个案例是一份有关部党委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告的一部分。

1.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副部长指示上半年没有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出口计划的 7 家企业提交报告，解释它们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这个副部长详细地说出了可兑换货币卢布准确的短缺量，企业必须准备好回答这样的问题：“能克服障碍吗？”“这些债务什么时候能够还清？”“下半年它们准备怎么做？”“它们有没有其他替代商品可以弥补这些亏空？”以及“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前景如何？”^① 这些问题都是经常提的，因为部门本身也在半年行业出口任务的问题上“对外和对上”负责。但是，加紧企业与管理机构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发生在出口领域，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2. 有一个副部长在企业经理的会上代表部长作了这样的发言：

我已经指示主要的几个司局更迅速地进行干预
以便解决企业之间的争吵。我已经指示各个企业要把

^① Gyula Gyorgy, 副部长, 第 12 箱, 新匈牙利档案 K-6447/71, 1971 年 8 月。

这种争吵及时汇报给相关的主要司局，不得拖延。我还指示主要的司局要特别仔细地监督重要的企业定单，以便及时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①

3. 也是在这个时候，产业部门党委的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个会议，邀请了 9 个大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参加，就与部门的监督工作相关的问题交流经验。下面是有关此会议的报告的一段摘录：

合作的纪律和合同的约束都变得不严格了，因此有必要加强部门的协调功能，来解决在生产关系中产生的问题。部门作为所有者应该加强监督的力度。除了提供一般的指导以外，还有必要在经济过程中进行及时的干预，必要的情况下要进行行政性的干预，使得企业不仅能够良好的环境下完成任务，而且能够制止企业偏离国民经济目标的发展方向。^②

产业部门认为特殊的管理和个别对待的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只有它们才持有这种观点。职能部门也被迫进行至少是同样多的干预。尽管价格、收入、成本和规范管理的扭曲恰恰是它们自己提供的补贴造成的，但它们还是进行了干预。它们也批评补贴，认为补贴使企业没有了适应市场的压力

^① 给 Gyula Horgos 的关于由 Jozsef Kocsis 副部长主持的企业经理人员会议的报告，新匈牙利档案，K箱 J. 115/10, 1972 年 11 月。

^② 向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党委的经济委员会作的简要报告。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在企业党委经验基础上的监督活动，1971 年 9 月 (M. Cs.)。

(Deak, 1972)。然而，切断补贴的每一次尝试都遭到了失败 (Csanadi, 1980; 1984)。

金融领域也发生着有选择的干预。虽然一般的信贷政策指南宣布发放信贷的根据是效率，但一大部分金融资源实际上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偏好因而效率不是第一位的项目耗尽了，可以用来放贷给满足效率标准的企业的资金越来越少，逐渐减少了对满足了目标的活动的支持。（标准的应用是这样严格，以致在每一类国家重视的项目中，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够申请到贷款，甚至常常只有一家企业能够满足标准。）当时的一个分析指出：

对于国家没有给予照顾的项目来说，已经没有长期贷款了，平均的还款期限缩短了，利率升高了，已经开始要求申请资金的项目的利润率达到某个最低水平，要求企业在申请贷款的项目上有一定比率的自有投资。它们保证把信贷分配给国家重视的项目，特别是中央和产业部门的重大项目，而在给这些项目发放贷款时，上面提到的要求是一条也不考虑的。因此，在 1968—1970 年，有 20%。1971 年是 40%。1972 年是 60% 的信贷资金都发放给了与产业部门有关的项目，如果把与职能部门有关的项目也算进去，那么这个比率在 1971 年和 1972 年就分别为 55% 和 70%。其结果是，在最近的几年里，发放的贷款增加了，还款的期限拉长了，债务的负担加重了；同时，债务变得

还不了了。^①

不仅在贷款资金的分配上实行个别对待的作法。虽然管理机构在采取坚定的措施减少投资和阻止企业获得资金，并且不断发布规范管理的指示，但是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在转向个别对待的干预。

关于企业必须有 30% 的自有资本投入的普遍规定^② 的讨论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规定是 1971 年制定的信贷政策的指导原则。争论的焦点是：企业必须有自有资本的要求是否应该完全取消，还是对一些企业取消而对另一些企业仍然有效。很典型地，产业部门、匈牙利国民银行和财政部发现，它们处在一条反对其他职能部门的“统一战线”上：

在最初的谈判过程中，国家计划总署反对国民银行的作法，国民银行没有坚持 1971 年以后贷款发放时应该遵守的规定，即，每发放一笔贷款，企业都必须有最少 30% 的自有资金投入，这是企业得到贷款的一个必要条件。外贸部希望取消必须有自有资金的规定，而财政部和国民银行则认为，30% 自有资本的要求是否执行应该看具体情况来定。

我建议，在这个问题上，部长同志支持财政部和银行的观点，因为在目前紧张的投资条件下，无条件

^① 处理物质利益、收入管理和国家财政发展有关问题的工作委员会的第 4 分会。金融分配系统（即，分配补贴——M. Cs.），1972 年 2 月，第 91 页。国家计划总署 - MF (M. Cs.)

^② 信贷政策的指导原则 420/1971, HNB, *Penzügyi Kozlony*, 1971 年 12 月 17 日，第 25 期，第 473 页。

地普遍取消企业必须有自有资本的规定是不切实际的。^①

到那时为止，不仅是在投资和国家协助的领域里，干预的强化和个别对待的决策至为明显，而且在价格管理上，1968年引进的自由定价政策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央限制的损害。

1972年，中央委员会作了一个关于价格稳定更加重要和更多地利用价格工具减少价格变动的决议。此后，价格机制、行政上对自由定价的指导、加强对合同价格的遵守、价格核算指导原则的制定、对不当得利的管理以及价格监督的扩大，这些问题都受到了重新的考虑。^②

1972年，这些干预的实施变成是个别对待的了。下面的论述用市场概念为这种个别对待的干预进行了辩护：

对价格和市场过程进行监督的新手段是操作性的市场控制，这是在部门间价格与产品分配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通过操作性的市场控制，我们不仅观察价格，而且观察影响供给与需求的因素。我们早在生产、进口、出口的阶段就尽力解决和防止紧张状态和

^① 给部长 Gyula Horgos 的备忘录，1972年8月经济委员会会议。主题：关于1968-1971年增加投资信贷促进有效的出口生产问题向经济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M. Cs.)

价格变动的影响和对价格变动的控制 (1968-1974年)，价格与消费税务司，财政部，1974年，第11页 (M. Cs.)

意外情况的出现（例如，由于生产时间的减少、进口的不足、过度出口导致的短缺和相应的价格上涨，紧张状态和意外情况就可能发生）。^①

党中央机关一名官员的回忆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气氛：

“与 1968 年产业部门找不到位置的时期相比，那时的形势变了。它们以为它们的任务仅仅是专业管理，其他业务都要移交给职能部门。到 1972 年，事情变得很明显了，这种观点（规范管理）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对具体企业实行个别对待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就会陷入一种可怕的情况，整个产业和国民经济都承受不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1978 年）

这段回忆包含了这个时期的两个重要特征：听任规范管理（规范性）的失败，相信加强监督和增加在个别对待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的作法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紧张状态的进一步发展，管理和分配部门向具体单位提出的个别协助要求作出反应的行为方式越来越得到理解和接受。下面摘录的访谈反映了这种倾向：

^① “关于生产者价格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析”，NMPO，1972 年，第 59 页（M. Cs.）。

“让好的企业发展得快一些，其他企业尽自己所能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但是，如果我们的大批企业同时破产，那么，国民经济是会崩溃的。”
(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 1979 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领域不断发展的紧张状态使得党中央机关变得越来越耐不住性子了，使党中央机关更严格地去控制要为经济形势负直接责任的管理部门。

“我们的国家机关、地区权力机关、国家计划总署、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各个部门、以及高层权力机关应该敢于实践自己的权利，勇于承担与中央的管理相关的职责。在必须进行干预的时候，它们不应该犹豫不决；在需要下命令的地方和需要下命令的时候，它们不应该瞻前顾后：例如，在目前的形势下，战略物资和产品的供给有限，对这些物资和产品的内部分配就应该加以干预。如果我们发现，一个过去有效的经济管理指标或条令，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如今已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那么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纠正它。不时地进行纠正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恰恰是灵活的经济政策要求这样的管理。”^①

就中央委员会而言，要求干预的呼声到 1972 年底已经变

亚诺什·卡达尔的讲话（1975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1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第 95 页。

成实际和详细的行动纲领了，这个纲领规定中央委员会主管管理机构，在政治上为这些机构的运行负责：

这是必要的。它们应该采用特殊的措施来保障为达到理想的效果所必备的条件……为了能够做好推动工业生产现代化的工作，应该保障企业有充足、良好的劳动力，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很重要的……在生产条件现代化以外，要做好内部劳动力的更换和再培训工作，其中包括在专门规划的发展区制定合适的收入政策和创造适当的劳动条件……在制定合适的收入政策时，全国范围内每一种职业的工资奖金都必须作为全国工资晋级制度的组成部分来考虑……应该保障国家计划总署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产业部门和其他高层机构在确保计划草案的现实性、确保技术发展的方向、以及促进计划工作的现代化方面负起更大的作用；应该加强监督以促进计划的实现；应该改进、扩大和加强对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二者的监督。应该扩大价格变动的义务报告范围，不合理的提价不应该得到批准，把消费者和生产者联结起来的合同价格系统应该建立起来。^①

在观察企业和经济管理机构行为模式的变化时，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在自我支持的过程中（背后的结构性动机导致了

^①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1975年11月14-15日会议公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70-1975年的决议与文件》（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第376-381页。

政治理性行为)被政治所垄断的结构逐渐吸纳和改造了改革的成分。这是因为,尽管起初的改革有很不一样的目标,但是自我支持机制迅速地再度激起干预和乞求的行为模式。

体制适应的过程在实践中表现为规范管理的失败:这些失败逐渐削弱了人们对实行规范管理和减少干预会产生良好效果的信念,同时也损坏了规范管理支持者的地位,这些人在1972年实际上遭到了压制。这个过程可以在经济政策和反改革思潮有节奏地复兴这两件事情上看起来。不过,从体制运行的角度看,1972年对改革的镇压是体制适应过程的表现,也是匈牙利有着强大反馈结构的特殊模式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看,伴随规范的引进而采用的特殊工具不应看作是间接管理或决策体制失败的标志,或看作是改革的逆转。事实上,这个过程是规范管理体系被体制所吸纳和驯服的标志,是个别对待的特殊工具加以应用的标志。我认为,1972年实际上是1957年以来内部权力关系的演进到达发展的顶峰的一年,到这个时候,在匈牙利特殊的结构模式(相对分权并有强大的以经济为后盾的反馈)下,基于政治理性的分配已经变得一清二楚。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使得那些积累了反馈的人的地位公开得到加强的一年,是个别企业个别对待的干预和措施必须实行得到公开确认的一年。产业部门和地区党机关被赋予了发展实际和具体的经济过程的责任,大型企业被单独列出,它们的活动要受到产业部门和地区党机关的严密监督并得到它们的大力支持。^①

实际上,规范和特殊干预的手段都能与权力结构的运行相容:它们都有助于自我支持机制不受干扰地运行。在这种背景

^① Antal (1985); Csanadi (1980; 1984; 1987a, b); Szalai (1987).

下，规范管理体系的作用是发掘和汲取资源。它把行为人引向隐蔽的渠道从而（为资源分配者）提供权力行使的基础（和必要性）。另一方面，特殊的、个别对待的工具起着这样的作用，即，把资源有选择地分配给那些满足了体制的政治标准的行为人，从而为行为人符合体制的行为创造了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为体制适应性过程提出一个替代的公式：在体制运行的过程中，自我支持机制剔除了那些在机制看来是不需要的改革成分，同时保留了那些能够保证资源的汲取、乞求和权力行使机会得以持续下去的改革成分。

第四节 体制适应性过程中规范管理体系与特殊工具的作用

尽管对间接管理的信念削弱了，但无论是改革者还是改革的反对者都认识到，规范和特殊工具的功能并不是由预想的市场条件决定的，而是由被政治所垄断的决策机制的特殊权力结构决定的。因此，他们很难接受这个观点，即，特殊管理工具的运用和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活动是符合体制的，不是出于对市场的反对的（乔纳蒂，1980；1984）。没有认识到特殊工具符合体制的性质，这一点可以从1966年以来的文件和访谈中看出来，这些文件和访谈不断重复着旨在抑制发放个别补贴现象的政策设计，这些设计都准确地体现在经济政策里：

1. 经济政策的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分析了补贴的存在和扩张；
2. 他们相信补贴是过渡性的，他们深信，在制定理想的统一价格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后，补贴就会

取消了；

3. 他们抑制补贴；然后

4. 他们再次意识到，在经过短暂的间歇以后，
补贴又将再次出现。

这种行为模式多年来重复不已是因为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市场环境下实行优惠待遇只是为了帮助克服在适应市场的过程中出现的过渡性的困难。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取消不必要的补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是一个采取合适的管理方法去取消它的问题。但是，补贴不是在市场环境下运行的，而是在一个为政治所垄断的环境下运行的，并且，它们已经成为基于政治理性的长期选择性作法的一种工具（Csanadi, 1980; 1984）。

我对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与加工工业进行了分析，从中得到的一些例子在数量上证实了这观点。^① 第一个例子，我们按照企业固定资本规模分类计算上缴的税费与固定资本加总工资的比考察定额利润税与固定资本加总工资的比，以及国家补贴与固定资本加总工资的比，然后比较各类企业的相应指标与平均值之间的差距。这样可以部分地揭示再分配的标准，同

^① 数据来自 ‘Dependence, consensus, and selection’ (Csanadi, 1984) 与 ‘Som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fferentiated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inancial subsidies’ (Csanadi, 1980)。一部分数据——补贴、用固定资产衡量的企业规模、特别利润税、总收入以及净收入——来自各个企业和产业部门向统计署和财政部递交的会计报表。我截取了一些指标然后对这些统计数据作了进一步的计算。这些运算包括表格下方标明“资料来源”的“财政部统计司数据”。这里分析了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 453 家企业的数据，其中包括在此期间停止运行和新建立的企业。在数据来源不是会计报表而是其他来源时，我在相关的表格下方的“资料来源”处注明了出处。

时部分地揭示调整过程中乞求者的目标。第二个例子，我们考察相关的各种规模的企业利润率状况的最初不同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汲取过程后的变化，其次是进行补贴以后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分配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第三个例子，我们仔细地分析企业各年度相对利润率的变化方向，把它与企业得到的相对补贴率的变化方向作比较，其中的分析和比较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来分类的。这可以揭示补贴制度的反应，它们发放补贴时的选择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的行为模式。

我用企业固定资本总值的 10 年平均数来给企业分类：机械工业部门在 1970—1979 年间运营的每一家企业的资本存量的平均规模（运营期间累积的固定资产价值除以运营的年份）；然后根据一定的规模标准把这些企业分为 12 类；按照阿拉伯数字 1 到 12 类的排列其资产价值是由大到小的。我把这些 12 类分成三大类，即 I 类（大型企业）、II 类（中型企业）和 III 类（小型企业）。后面的数据分析用的也是这种分类。用平均资本价值作标准的优点也得到了这个事实的证实，即，用这个方法对企业进行的分类与用固定资本的年度规模为基准进行的分类其结果是一样的。通过这种方法，我可以在以下各种情况下使用企业分类，即我可以讨论每年的、10 年或累计的、或年平均的、或 10 年里某些年份的补贴和国家税收状况。表格所表现的年份是 10 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最重要变化的年头。

表 3.1 表明，较大型的企业在上缴利税总额方面享有优势，因此在承担特别利润税义务方面的选择性上和补贴问题上都享有优势。这种模式的资源分配促使企业拼命挤进第 I 类——即拼命想成为大型企业，因为税收负担与企业规模是成

反比的。在征收特别利润税^①的时候也存在同样的倾向，不过形式更为明显，而在分配补贴时却是规模越大补贴越多。’

表 3. 1 机械工业企业的总支出*、超额利润税与补贴
(机械工业平均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1970			1973			1975			1978			1979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总支出** C+W	95.0	110.7	158.1	65.8	111.2	161.8	95.2	103.2	185.5	90.5	109.7	169.9	88.2	112.7	183.3
特别利润税 C+W	22.3	72.7	303.6	18.3	249.7	263.1	124.6	54.9	33.6	83.5	114.3	237.3	87.6	106.1	232.7
补贴 C+W	127.3	50.0	181.1	126.3	52.6	44.7	124.2	51.5	50.5	117.1	65.8	58.5	119.7	63.6	49.6

注：

* 总支出不包括折旧

** $C+W = \text{总资本} + \text{工资总额} \times m$ ($m = \text{各个产业部门不同的官方工资乘数}$)

资料来源：根据财政部计算机中心提供的数据编制。

表 3. 2 更加形象地表明了这个倾向，同时也揭示了企业税收和补贴的实际功能。这里，我们来考虑 3 个利润指标：
(1) 最初的利润，(2) 上缴税收后剩余的利润，(3) 可支配的

^① 1975 年在特别利润税的问题上情况很特殊 (Antaloczy, 1994)。正是在这个时候，特别利润税的征收具有了一种新的功能，即，帮助国家把出口企业由于社会主义集团内的出口价格结构而得到的超额利润搜刮走。因此，当年向社会主义集团出口的规模和比例仍然影响了特别利润税的水平。

利润，即补贴发放以后的利润额。

表 3.2 补贴和税收对机械工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年净收入 * 的影响 (机械工业平均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1970			1973			1975			1978			1979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净利润 ** C+W	88.5	110.3	190.2	81.0	122.7	198.7	89.4	111.5	164.0	87.4	113.2	190.6	84.3	118.5	201.5
总支出 *** C+W	95.3	100.7	158.1	65.8	111.2	161.8	95.2	103.2	185.5	90.5	109.7	169.9	88.2	112.7	183.3
剩余利润 C+W	51.7	158.6	351.7	33.3	186.7	406.7	67.3	140.8	271.4	69.4	133.3	302.8	62.2	180.6	305.9
补贴 C+W	127.3	50.0	18.1	126.3	52.6	44.7	124.2	51.5	50.5	117.1	65.8	58.5	119.7	63.6	49.6
可支配利润 C+W	84.3	111.8	207.8	85.3	111.8	204.4	90.2	104.9	182.9	94.8	97.4	172.7	55.5	118.9	207.8

注：

* 税前利润 = 余额 + 不包括折旧的税费上缴额 - 补贴

** C+W = 总资本 + 工资总额 × m

*** 总支出 = 总支出 - 分期还债额。

资料来源：根据财政部计算机中心提供的数据编制。

在考察的年份里，各类企业税后利润 (2) 与平均值之间的距离明显比最初的净利润指标 (1) 大得多。其原因在于：尽管 II 类和 III 类企业支付的总税收与固定资本存量和工资总额的比例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而 I 类企业则远低于平均水平——交税率与平均值之间的距离小于最初净利润与平均值之

间的距离。因此，在交税以后，与平均水平相比，I类企业的收入状况比税前更差了。

这同时产生了使各类不同规模的企业的收入差距稳定下来，这种差距重复出现并被强化的效果，并且由此影响企业与管理机构之间的选择性关系。在这个效应的影响下，这个机制既为补贴分配的“强制”方向（固定路径）“奠定了基础”也为干预“奠定了基础”。

税后利润（2）水平的巨大差距由于有选择的补贴分配而大大减小了——补贴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歧视性的，高度偏向大型企业。由于分配中实行这种选择性，不同类别的企业在可支配利润（3）上的差距减少到几乎与它们起初的差距相当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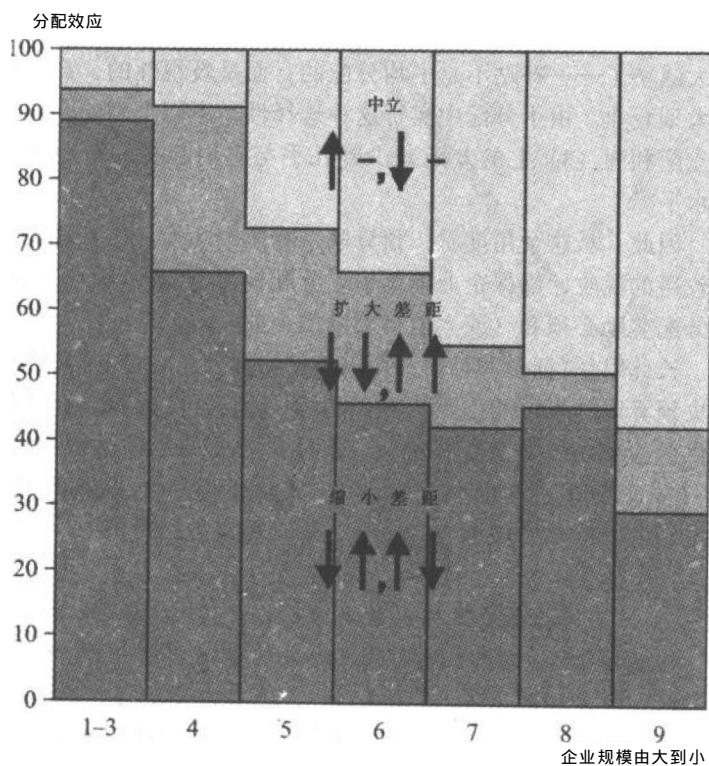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预算联系有两个功能：（1）通过征收较高的税收，确保企业继续依赖分配权力，（2）以不同的补贴分配奖励必须和（或）值得奖励的企业。

长此以往，征税和补贴并用的体制必然使企业意识到，除了中央预算以外不可能得到资源，而且甚至不值得花力气在已经提供的途径之外寻求资源，当然，条件是企业的规模是恰当的。另一方面，管理机构也不断被迫要去关心这些企业，因为正如一大堆别的因素早已显示的“经济并不是孤立地运行的”：

“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里 没有中央的帮助 很难想象企业的行为会与工业政策的普遍目标协调一致。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找到一条道路去帮助它们，否则生产能力就会消亡，国民经济将无法承受这一点。”
（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1977年）

如果我们将利润率的年度波动与补贴率的变化相比较，那么有选择的“分配”偏好的保护功能与推动功能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图 3.1 表现了各种规模的企业相对波动方向。

图 3.1 各种规模的企业利润率*的变化与
利润中补贴所占比例**的变化***



注：

左侧箭头：利润率的变化方向。

右侧箭头：最后利润中补贴所占比例的变化方向。

中立：尽管利润率发生变化但补贴的比例不变。

扩大差距：补贴比例的变化方向与利润率的变化方向相同（即，增长时鼓励缩减时制裁）。

缩小差距：补贴比例的变化方向与利润率的变化方向相反（即，增长时抑制增长，缩减时弥补缩减）。

利润率 = 净利润 / 资本 + 工资。

利润中补贴所占的比例 = 补贴 / 利润。

本图不包括停滞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补贴率的变化方向看作是金融管理对利润率波动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将有三种类型的“反应”：中和的“反应”、扩大差距的“反应”和中立的“反应”。这里我们看到，企业的固定资本价值越大，与波动方向相反的中和反应的比例就越高，直到最后，这类反制的反应实际上变成了普遍的类型。^①另一方面，企业的固定资本价值越小，利润率波动时补贴率保持不变的情况越普遍。如果我们把表 3.3 的利润率

选择样本的方法与对数据的详细评论载于乔纳蒂（1980: 161-4）以及本书的附录。我用与前面相类似的原则对企业按规模进行了分类。这里的企业数只有 62 家，只有这些企业在调查的各个年份里是机械工业内各子类企业中得到三笔最大的信贷分配的企业，其中有一些企业在所调查的 7 年里没有得到任何补贴，因此它们的利润中补贴所占比例是零。中立一类的企业是这样的企业，它们得到补贴，但尽管利润率发生了变化各年的补贴量是不变的，同时包括那些根本没有得到过补贴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利润中补贴的量始终是零。企业分类依据的价值不完全是一样的，我把前 3 类企业作了合并处理。因为我想突出表明这种倾向仅仅是以企业的规模为基础的，一致性的缺乏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实质上的问题。

数据和清算数据加进去考虑，那么我们会看到，补贴一般并不能使企业的收入和地位稳定下来，但是可以使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的个别企业保存下来。同时，它们保障了这些企业的稳定性，只是它们的收入水平较低。

表 3.3 1970—1979 年间机械工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利润率
低于平均水平和结束运营的比例（各类规模的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I.	II.	III.	合计
企业关闭的百分比	7.0	17.6	39.9	30.9
利润率低于平均 水平的百分比*	57.2	33.8	16.9	平均 利润率

注：* 与机械工业 10 年的平均利润率相比，各类规模的企业中低于平均利润的企业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财政部计算机中心提供的数据编制。

但是，这两种效应同时又产生了促使企业增长的影响：企业要增长首先是能够为稳定的企业，其次是为了能够得到优惠待遇。不仅如此，它还可能使大型企业意识到，利润率不过是一个谈判工具，增加利润率是不值得的，因为那只会导致补贴的减少。但是，在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获得援助是肯定的——企业要做的只是提出援助的请求。

第三种情况：扩大差距——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没有引致特殊的行为模式，可以忽略不计。

这几个表格和图 3.1 表明，在对管理体系进行两次重大调整期间，规范管理体系和补贴都在不断地使政党—国家体制合法化。我们把它们看作是促进自我支持机制运行的工具。因

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作这样的推断，管理体系的重组可以看作是新一轮的合法化。如果事情正是如此，那么，这个情况也是很可能的，即加快管理体系的改革意味着合法化的危机在加深。^①

第五节 体制适应性的反复出现

本节分析选择性机制在资本、产品和劳动力分配中运行的方式，同时分析它在 1970 年到 1979 年间其他经济政策领域里的表现和影响。^② 在实际资料基础上，本节揭示了具体的经济决策适应体制的方式。它阐述了体制适应性的要素：一方面是利益实施能力的条件和利益实施的结果，另一方面是选择标准和再分配的方向。这四个要素的总和构成了干预和乞求背后的驱动力，它们加起来构成了体制的自我支持机制。^③ 本节还证明了分配的强制路径的发展方式，这种强制路径的发展是因为这个机制中的选择性使再分配在同一个方向上反复发生，这种情况又为反馈系统进一步强化。本节证明，正是与强制路径相容的行为模式确保了体制适应性过程的实现，也保证了体制适应性过程是在政治理性造就的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考察了 1970 年到 1979 年间 7 项经济政策决策的结果，这些结果都直接或间接地包括了一组企业在物资、战略和关系上的优势。这些不同类型的优惠待遇都是不同的机构根据不同

例如，直接与营业额挂钩的补贴，与出口业绩挂钩的补贴，为促进生产的补贴，等等。

^② 本节的计算引自 (Csanadi, 1984)。

对基于政治理性的分配和对反馈的竞争的详细的实证分析是 Csanadi (1980; 1984; 1985a, b) 文章的主题。

的规划出于不同的目的给予的。我考察了这些决策给 453 家机械工业企业带来的结果。这里的分析涉及的企业都是在 1970—1979 年期间隶属于机械工业部门的（其中当然包括在这期间新成立的企业也包括在此期间停止运营的企业）。这 7 类优惠待遇是：

1. 财政部发放给企业的生产性补贴。
2. 匈牙利国民银行发放的短期和长期贷款。
3. 中央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分别于 1972 年和 1973 年通过的决议规定，一些企业接受统计调查。
4. 企业越过批发商分配者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获得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的可能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国家计划总署和价格办公室规划的大型项目和特殊项目能够顺利进行。
5. 国家计划总署在制定中长期国民经济计划时指定一些企业提交计划草案以便纳入国民经济计划。通过这个途径，国家计划总署把与中央政府的经济目标有关的初步信息透露给这些企业。
6. 国家计划总署和国家技术发展委员会指定了一些关键企业，目的是为了保证长期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现。
7. 财政部和其他相关产业部门允许一些企业在这个时期兼并其他企业。

关于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使用是从受这些工具影响的对象——企业的角度来分析的。因为这些工具的使用常常伴随有

间接的物质利益，这些利益无法直接衡量，我也无意这样做。^①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最合适的，因为，一方面，通过这个方法，我可以最准确地考察到那些受到来自经济领域的反馈影响的企业，并指出反馈的标准，另一方面，这是多种工具能够有效地放在一起分析的惟一方法。^②

分析优惠待遇的分配标准和获得优惠待遇必须具备的条件，我从三条很不同的途径展开了相关的工作，即，综合考虑政治敏感性的标准、政治谈判能力以及前面描述过的行为的政治理性。通过分析得出的这些标准是：

1. 企业在产业部门内的规模（绝对规模）；^③
2. 企业在地理区域内的规模（相对规模）；^④ 以及
3. 企业经理是各级党委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首先，让我们单独考虑这些经济政策决策根据企业规模进行的应用所产生的分配结果。

我主要使用四类指标：优惠的程度、数量、频率和强度。受优惠的企业数除以企业总数是一般的优惠程度。另外，各类企业内的优惠分布也可以计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本类企业是 100%）。因此，在分析优惠程度时，我不考虑一家企业享受多种优惠的情形。

揭示即定的经济政策决策工具需要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收集数据。补贴的问题，我通过计算机对企业会计报表进行的数据加工揭示了许多工具以及它们的分布状况，其他工具是通过手工运算得出的发现，有些来自原始资料，有些来自第二手资料。资料来源都在各个表格下方加以说明；数据加工的方法则在适当地方在脚注里作了说明。

关于根据企业规模进行分类的方法，见上一节。

在即定区域——区、县内的最大型企业，以及（或）这些区域内不属于最大型企业的企业。

为了简单起见，我把这一条称为有政治地位的企业，这虽然不太精确，但方便了分析并对结论没有太大的影响。

第一种途径：企业在部门内的规模与选择性的再分配 国家补贴的分配

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补贴的分配、它们的功能及分配的标准，这些都在间接经济管理的框架下于 1966 年宣布如下：

有关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和外贸结构的经济政策目标，可能要求实际的价格结构与由生产成本同自由市场评价相结合的价格结构有所不同……

补贴的发放必须在彻底考察环境以后才能进行，而且补贴的分配必须根据严格的条件来进行……必须遵守提高效率的严格要求……在 4 到 5 年内得到补贴和价格优惠越来越少的企业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即，要么它克服了最初在出口生产中的低效率，要么它的总生产是亏损的。^①

补贴逐渐深深地扎根在体制里，补贴的数量不断增加，对补贴分配的需求每年都在不断提出。如果补贴取消了一——尽管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取消补贴，那么到时候，它们又会重新出现，而且不论哪一种类型的补贴^②其分配的方向都没有变化，提供补贴的机构也没有变化，提供补贴的理由也没有变化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1966 年 5 月 25 - 28 日会议材料。《经济机制改革》（布达佩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传与调查部），第 204 页（M. Cs.）。

^② 例如，直接与营业额挂钩的补贴，与出口业绩挂钩的补贴，为促进生产的补贴，等等。

(Csanadi, 1980; 1984)。绝大多数补贴都发放给了大型企业。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支持就越多（表 3.4）。

表 3.4 1970—1979年间机械工业部门各类规模的企业获得补贴的分布状况（各类规模的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得到补贴的企业数	11	10	22	43	18	21	29	18	86	3	2	1	0	0	6	135
企业总数	11	10	22	43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得到补贴的企业占总数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87.5	74.4	47.4	72.2	11.5	6.7	1.7	0	0	2.1	29.8

资料来源：根据财政部计算机中心提供的数据编制。

表 3.4 表明了中央支持的方向，这种支持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央的支持分配给了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表 3.3 也强调了这一个特征。不过，这个表格还表明，企业关门的机率与企业的规模是成反比的，同时，企业规模越大，利润率处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就越多。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一方面，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维持运营与高利润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一定规模以下的企业，它的关闭与它利润率是否很低没有必然的联

系。^①

我们不能断言，各类企业内关门企业的数量与该类企业的总数量之比同该企业总数量与该产业部门的企业总数量之比相同，因为从表 3.5 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前两类企业里，在这 10 年期间关门的企业与继续存在的企业之比过低，而在第三类企业里，这个比率是过高的。

表 3.5 机械工业内各种规模的企业分布状况及遭清算的企业分布状况 (企业总数 = 100% 遭清算企业的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I.	II.	III.	合计
企业的分布	9.5	26.3	64.2	100.0
清盘企业的分布	2.1	15.0	82.9	100.0

资料来源：根据财政部计算机中心提供的数据编制。

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仅在补贴的获得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企业的规模与获得其他类型的优惠待遇上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却难以同低利润率联系起来（补贴的分配与此是相关的）它更多地与经济政策决定的特性有关。

信贷的分配

除了企业自有资源足够维持再生产的情况以外，1968 年引进新经济机制以后，资源的分配仍然控制在中央的手里。除

企业的清盘和成立与经济政策重大转变之间的关系甚于与企业利润率水平的关系 (Lake, 1983)。

了国家大型投资项目的资本需求有国家计划的保障以外，用以发放信贷的中央基金是根据当时的信贷政策指南和在竞争的基础上向企业发放贷款的。贷款的投向是给希望适应市场要求的企业认为是重要的项目。

在我们考察的 10 年时间里，机械工业有 137 家企业得到了贷款。^① 关于竞争力和效率要求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由于企业领域里，固定资产高度集中，各种项目只可能在极少数企业做，所以，国家的每一个目标都成了特定企业的直接任务。结果，贷款的长期分配必要集中在特定的领域，同时这意味着得到贷款的那些企业长期享有好处，得不到贷款的那些企业比较而言处于一种长期的劣势。

那么，在融资方面享有特权的是哪些企业呢？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数据表明，在这个问题上选择过程的结果与国家补贴问题上的结果非常相似。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 10 年期间，贷款的分配与这 137 家企业的规模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以及各类规模的企业获得贷款的次数有多少（表 3. 6）。

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向企业投资项目发放的中长期贷款。因此，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证明其中存在的规律，在分析贷款量的过程中，我考虑的是 1968 - 1979 期间发放的总贷款，以及各个企业所得贷款所占的比例。因为单个年份的贷款发放是不确定的，10 年的贷款综合起来考察不仅能够更准确地分析贷款的批准，而且还可以看到每个企业在这段期间获得贷款的次数。这里的数据不包括从合作社共同基金或地方政府渠道获得的贷款。（后来，再想如此清晰地考察每一笔贷款就不可能了，因为数据转移到计算机处理，一方面，企业只保留总数，另一方面，企业的数据是减去了分期还贷以后的数据。）

表 3.6 1970—1979 年间机械工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获得贷款的情况 (各类规模的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获得贷款的企业数	11	9	18	38	16	20	24	13	73	5	6	8	7	0	26	137
企业总数	11	10	23	44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获得贷款的企业占总数的百分比	100.0	90.0	78.3	86.4	88.3	83.3	60.0	39.5	50.0	19.2	20.0	14.0	6.3	0	8.9	30.6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部，1970—1979 年间对各个企业的贷款发放记录

表 3.6 清楚地表明，在这个时期里，贷款分配与国家补贴的分配方式完全一致。固定资产规模越大的那组企业里，获得贷款的企业占该组企业总数的比例就越高。^① 表 3.7 显示了各个企业类别里每一家企业得到贷款的次数，它进一步鲜明地表明了上述的规律。固定资产规模越大的那组企业，得到贷款发放的次数越频繁。

未获得贷款的企业包括贷款申请未被批准和从来没有递交贷款申请的企业。

表 3.7 1970—1979 年间机械工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各个企业获得贷款的次数（每一类企业获得贷款的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获得贷款的次数	53	43	103	199	49	61	55	13	178	7	8	9	10	0	34	411
获得贷款的企业数	11	9	18	38	16	20	24	13	73	5	6	8	7	0	26	137
企业总数	11	10	23	44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获得贷款的次数与全部贷款发放次数的比	4.8	4.8	5.7	5.2	3.0	3.0	2.3	1.0	2.4	1.4	1.3	1.1	1.4	0	1.3	3.0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部，1970—1979 年对各企业的信贷发放记录。

上面所看到的规律还完全没有透露出贷款额有多么集中。让我们来看一下贷款的发放是否集中，以及如果是集中的，那么它往哪个方向集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该考察补贴和固定资产规模的数据。

表 3.8 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前面的规律。固定资产规模较大的那类企业，其获得贷款的数额占机械工业获得的全部贷款总额的比，始终高于该组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占机械工业全部固定资产总额的比——与国家补贴分配时的情况一样。

表 3.8 1970—1979 年间信贷、补贴和固定资产在机械工业各类企业中的分布状况（各指标的总额分别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信贷的分配	46.2	13.5	16.8	76.5	7.8	8.3	5.0	1.6	22.7	0.1	0.3	0.3	0.1	-	0.8	100.0
补贴的分配	48.8	13.9	16.2	78.9	9.4	4.5	3.5	1.8	19.2	0.4	1.5	-	-	-	1.9	100.0
固定资产的分布	33.5	12.3	18.1	63.9	9.9	9.0	8.4	4.1	31.4	1.5	1.3	1.3	0.6	0.0	4.7	100.0
企业数	11	10	22	43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资料来源：根据财政部计算机中心提供的数据，以及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部 1970—1979 年对各企业的信贷发放记录编制而成。

产业部门官员发表的支持较大型企业贷款申请的观点与数据反应出来的偏好分配模式取得了一致：

“在分配信贷时我们遵循两条主要的标准：效率和规模。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我们确实期望）出口额年增长 20% 的成绩，我们就必须有规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它们（大型企业）需要钱的时候支持它们的原因，它们得到了钱，我们取得了 4 千万美元的出口。同时，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能卖好价钱但总利润却不大 那么它来找我们是没有用的。（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司长，1977 年）

不过，这个规律不仅存在于信贷分配这个方面。而且在免除获得贷款的企业必须投入自有资金的要求方面也存在着同样

的规律。^① 一般说来，投资贷款的批准条件是借款人自己必须至少投入所需的全部投资的 30%。表 3.9 表明，在第一组企业里，企业完全免除了这一要求的执行，或者是 69% 的企业投入的自有资金低于这一要求；在第二组企业里，是 57% 的企业投入的自有资金低于这一比率；第三组为 47% 的企业投入的自有资金低于这一比率。^②

表 3.9 1970—1979 年间机械工业各类规模的企业投资项目自有资金占投资总额的比率 * 的情况
(每一类规模的企业所得贷款总额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合计
低于 30%	75.8	80.9	60.2	68.7	75.0	58.7	42.5	46.1	57.0	42.9	57.1	40.0	50.0	0.0	47.0	62.0
30%	10.4	7.2	14.8	12.1	10.4	12.7	18.6	7.7	14.0	14.3	0.1	20.0	20.0	0.0	14.8	13.1
高于 30%	13.8	11.9	25.0	19.2	14.6	28.6	38.9	46.2	29.0	42.8	42.8	40.0	30.0	0.0	38.2	24.9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注：* 这些数据是根据批给企业的贷款额计算出来的。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部 1970 年到 1979 年间对每一家企业的信贷批准记录。

还有，我们看到，在为促进特定中央目标的实现而发放的

“匈牙利国民银行关于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的报告”，载于 *Penzügyi Közlöny*, 匈牙利国民银行 1971 年 12 月 17 日，第 25 号，420/1971，第 473 页。

^② 我是这样计算这个比率的：我对每一个组别各个企业在这 10 年间的每一笔贷款逐一进行了考察，看企业自有资金在总投资金额中所占的比率。

投资拨款的分配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规律。^①在第一组 44 家企业里，21 家企业获得了总共 38 笔拨款；在第二组里，19 家企业获得了 26 笔拨款；在第三组里，两家企业在这 10 年里各自获得了一次这种拨款（表 3.10）。

表 3.10 1970—1979 年间机械工业获得投资拨款的企业数与获得拨款的次数（各组企业内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得到拨款的企业数	5	4	12	21	5	8	5	1	19	2	-	-	-	-	2	42
企业总数	11	10	23	44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得到拨款的企业占总数的百分比	45.5	40.0	54.5	48.8	27.8	33.3	12.8	2.6	16.0	7.7	-	-	-	-	0.7	9.3
得到的拨款的次数	8	7	23	38	7	11	7	1	26	2	-	-	-	-	2	64

注：这些数据就记载在信贷记录的后面

资料来源：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部 1970 年到 1979 年对每一家企业的贷款记录。

无论我们考察的是获得贷款的能力、获得贷款的频率和金额、自有资金应占比率还是拨款的分配，都清楚地显示，企业规模越大，银行给予优先照顾的机率也越大。根据数据显示，即使是在有特权的类别里，银行也把多数贷款和拨款分配给一个小的企业圈子。这个规律与国家补贴的分配模式是一致的。

国家开发银行为各家企业逐一确定了配给的标准，有利的标准是获得贷款的基本条件。

在另一个经济政策决定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模式：某些企业接受特殊的统计调查。

企业的统计地位

根据 1972 年 11 月党的指令，国家计划总署、财政部和劳动部提交给经济委员会的决议草案阐述了选择一些企业接受特殊的统计调查任务的标准：

要密切关注指定的工业企业的活动，由于这些企业的规模，它们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它们对总产值的贡献 它们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①

决议草案认为，要对以下情况给予特别的关注：

指定的企业应当在一般的经济管理体制内运行。它们应当遵守普遍的计划规则和管理规则；在管理方面，企业有此任务不应成为得到特殊照顾的依据。不仅如此，有此任务本身不应成为在获得国家投入、预算拨款和信贷发放、义务免除、让步方面的特殊照顾或其他方面好处的理由。^②

但是，尽管如此，统计调查任务的选择标准本身已经预示

给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主题：国家计划总署、财政部及劳动部关于对在工业产值中占很大比重的 40-50 家企业进行特殊观察的建议，1971/1/36，第 2 页 (M. Cs.)

同上，第 2 到 3 页。

了这一决策将产生的结果。经济委员会 1973 年 2 月的决议公布了一份名单，指定 50 家企业接受统计调查。表 3. 11 以规模为标准按顺序列出了分派了这个任务的机械工业企业。

表 3. 11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各类规模的企业中接受密切的统计调查的企业数量和相关的比率
(各类规模内的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受到统计调查的企业数	11	7	4	22	1	2	2	-	5	-	-	-	-	-	-	27
企业总数	11	10	22	43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受统计调查的企业占总数的百分比	100.0	70.0	18.2	51.2	5.5	8.3	5.1	-	4.2	-	-	-	-	-	-	6.0

资料来源：经济委员会决议 1/1973, II. 20。

尽管中央的统计调查并不是有关的企业免除普遍义务的条件，它也无意变成可以获得额外照顾的某种特许状，然而表 3. 11 表明，这种情况仍然发生了。统计监督的任务分派与资源分配的模式紧密相关。这个任务分派仅仅是把前面建立的分配选择模式给制度化了：在机械工业部门，1973 年初指派要进行调查的企业在 1970 年、1971 年和 1972 年从中央获得的援

助分别占该年中央对机械工业企业全部援助的 69.1%、47.6%^① 和 67.8%^②，除了两次例外以外，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内得到最多贷款的企业。

如果我们在此之外，把中央委员会 1972 年决议对国家管理机关和分配机关提出的要求考虑进去，那么情况就非常明显了，这些要求与再分配的一般方向是一致的。较高层的管理机关到那时为止对企业活动非正式的与自发的关注，如今由这个决议转变成为一项制度化的政治任务了。^③ 从中央委员会，到财政部、国家计划总署、外贸部，到国际经济关系委员会，都任命了专门的领导和官员密切关注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他们要定期提交有关企业状况的报告，定期准备统计报告和口头报告，在决策高层讨论企业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

下面的访谈摘录反映了成为统计调查对象在政治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种调查是一个好主意，它使国家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能够掌握工业发展的节奏。50 家企业是比较容易把握的，因此持续地把情况稳定下来，使之保持良好的秩序就有可能了，也因此他们就有可能集中精

^① 1971 年的比例较小是因为当年中央支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国家补贴构成了对利润税发放的总补贴的绝大部分，从而无法从帐目上分辨出来（“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的指导原则”，3/1970（VIII，9）经济委员会，载于 *Penzügyi Közlöny*，第 20 期，1970 年 8 月 12 日，第 363 页）。这种结构的优惠到 1973 年就取消了。

^② 这个比例与这 10 年期间补贴方面的比例 67.7% 差不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1972 年 12 月 14-15 日会议宣言，载于《1970-1975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议与文件》（Budapest: Kossuth Könyvkiadó），第 376-381 页。

力于这些需要受到比一般企业更多注意的企业了。”
 (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官员, 1976年)

实际上,正是这些决议使较高层的机关后来按照已经形成的选择性原则对企业进行的干预合法化、制度化了,正是这些决议为一批企业建立反馈扫清了道路。

递交初步发展计划的要求

有意的选择方向不仅体现在直接的分配决策上,而且还体现在国家级的经济政策决定作出之前的事件上。国家计划总署要求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在总署制定中长期国民经济计划之间递交企业的发展计划以供参考。把要提交“计划前的草案”的企业按照规模进行分类,我们会看到其中展现出与前面三个经济手段的决策同样的规律(表3.12)。我们考察的该组企业的规模越大,该组企业要向国家计划总署递交计划前草案的机率也就越大。

表 3.12 1970年到 1979年间机械工业各类规模的企业要在国民经济计划制定前提交企业计划的企业比率 [各类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合计
须提交初步计划的企业数	11	7	4	22	2	2	3	-	7	-	-	-	-	-	-	29
企业总数	11	10	22	43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提交初步计划的企业占总数的百分比	100.0	70.0	18.2	51.2	5.5	8.3	7.7	-	5.9	-	-	-	-	-	-	6.4

资料来源：“必须制定初步发展纲要的企业名录”，载于 Tervgazdasági Ertesito, XXV (5). 3/1973, OT, 第 51 页；XXX (6). 103/1978, OT, 第 103 页。

每一个管理机构都收到一份计划前的草案，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也更了解了一些企业。除了有更大的可能和更多的动机对这些企业加以干预以外，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在选择性分配的过程中倾向于这些企业，支持这些企业作出的反应、要求的利益、所处的形势和面对的环境。

提交计划前的草案也牵动了计划监督过程，这是监督企业的产业部门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相似的选择模式。我们看到，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反馈机会，因为，最大型企业的计划审议会议是由应负监督责任的产业部门的部长主持的，中型企业的由副部长主持，小型企业的计划审议会则由相关的司局长主持。而最小型的企业只能收到阐明部长观点的信件。表 3. 13 显示了计划审议中最重要的因素：企业规模与主管机构的级别。^① 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考虑的相似的选择模式，通过计划审议的结构性的体制适应过程中部门联系的选择性，进一步强化了选择性的反馈机会。

有选择地检查企业的计划并对其进行评议的作法已经是多年来的一个“传统”，自从 1969 年以来，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就要求最重要的企业提交它们的中期计划；然后把这些计划分发给主要的司局征求意见，它帮助这些企业在这些司局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促进企业在获得物资和其他资源时与部门的合作，保证企业完成对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出口任务，也保证企业完成国内供应任务。

表 3.13 有关 1971 年 7 月 15 日结束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
审议会议以及参加审议的企业的数据 (1970 年的数据)

指标	计划审议 的企业数	审议的 次数	审议的 结果*	须进行计划审议的企业(1970 年的数据)			
				产值(10 亿 福林)	比例** (%)	从业人员 (千)	比例*** (%)
部级	10	10	100	37.3	26.4	148.2	23.2
副部级	61	43	70	68.9	48.9	229.1	35.7
司局长	75	47	63	21.4	15.2	104.7	16.3
保密计划	-	6	-	2.3	1.6	13.7	2.0
合计	146	106	73	129.9	92.1	495.7	77.2

注：

* 计划审议数 = 100%

** 社会主义工业生产 = 100%

*** 社会主义工业从业人员 = 100%

资料来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党委，关于冶金与机械工业部与根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书记处 1971 年 1 月 4 日决议进行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审议工作有关的活动的分析 (M. Cs.)。

对于提交计划前草案的企业来说，提供信息的任务使它们得到了利益，因为，经理人员要写好计划并检验企业对即将实施的管理措施的反应，他们就必须在其他企业知道之前早早地知晓许多信息。这给企业带来了很多好处：(1) 对管理措施的变化作出准备；(2) 影响管理措施的制定；(3) 提出反对意见；(4) 对特殊照顾的可能性进行事先的调查，或采取抵消这些措施的行动，如获得与这些措施相反的特殊照顾和获得同盟军，等等。下面有关国家计划的访谈摘录也强调了这一点：

“企业对所知道的管理上的变化作出的反应应该在这些会议上反映出来，正是在这种信息反馈的帮助

下，中央机关才能分析企业的行为是否与国民经济计划相一致，才能确定管理体制上的方法和措施作多大程度的改变才是有效的。这样，就引发了一个复杂的分析过程。（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司长，1978 年）

技术发展规划

对那些被某个中央资助的经济技术发展规划宣布为关键性企业的企业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参与了其他重要的发展规划的企业来说，重要投入的获得几乎是不费力气自动送来的。因此，把企业的计划前草案与某个重要的中央规划联系起来是明智的。主管计划制定的产业部门也极力使企业的发展目标往这个方向上靠：

“这样说吧 在国家资源要付诸使用的地方 最有希望的目标是有可能把自己纳入某种经济技术发展纲要或某个中央发展规划的目标 因为如此一来 这些目标就肯定要报送国家计划总署和（或）国家计划委员会。在那里这个目标是已经定下来的了，其所需的资源已经列入了国民经济计划。因此，获得国家资源的机会就比那些在后来提交申请的企业大得多。……在这些规划和纲要制定的过程中，有关目标和保证目标实现的手段都已经确定下来。其形式有，重大的国家投资项目 特殊优惠计划 对国家或企业投资项目的预算支持。”（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司长，1977 年）

让我们考察一下，规模不同的各组企业在 1975 年纳入国家

计划总署批准的为实现特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计划^①的比例。

表 3.14 表明，绝大多数为统计调查所“指定”的企业（80%）都参加了中央发展规划。数据表明，这里也呈现出我们在前面发现的同样的选择模式。在参加的 35 家企业里，26 家（74.3%）属于第 I 组。剩下 9 家企业属于第 II 组，而第 III 组却没有一家企业参加了这些发展规划。

与前面分析的所有选择工具一样，这不仅意味着企业赢得了一定的优惠，而且使得企业能够进入经济政策的决策领域，从而能够在将来享受进一步的好处。

表 3.14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
不同规模的企业参加长期技术发展规划的情况*
(各类规模企业的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参加技术 发展规划 的企业数	11	8	7	26	3	5	1	-	9	-	-	-	-	-	-	35
企业总数	11	10	22	43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参加发展 规划的企业 占总数的 百分比	100.0	80.0	31.8	60.5	16.7	20.8	2.6	-	7.6	-	-	-	-	-	-	7.7

注：*本表没有显示一个企业是否同时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发展规划。

资料来源：关于有选择的发展政策的实现情况的公告，1977年3月，II/表2，第18页，冶金与机械工业部（M. Cs.）。

冶金与机械工业部提出了 30 个长期技术发展规划，在听取了职能部门的意见以后，国家计划总署批准了其中的 19 个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参见 Casanadi(1984: 286 的附录 16。

至此，不仅投资项目的融资纳入了正式的选择性渠道，而且最重要的产品的分配也进入了这种渠道。

产品分配（流通）

从 1975 年起，国家开始通过这个办法来促进主要投资项目（政府宣布为特别重要的项目）的完成，即，每年指定一部分企业可以为完成生产计划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获得重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企业都属于哪一个规模类别（表 3. 15）。

表 3. 15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中从生产商那里直接获得物资的企业数量和比例 *
(各类规模的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直接进货的企业数	11	7	17	35	10	11	24	8	53	-	-	-	-	-	-	88
企业总数	11	10	22	43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直接进货的企业占总数的百分比	100.0	70.0	77.3	81.4	55.6	45.8	61.5	21.1	44.5	-	-	-	-	-	-	19.4

注：* 资料包含了所有指定的企业，是 1975 年到 1980 年的累计数。

资料来源：“国家物资与价格办公室主任关于促进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加快更有效的产品结构的发展的命令”，载于 Tervgazdasagi Ertesito 1975 年，(2) (5/1975. (XII. 30.) AH sz.)，第 30 页；1976 年，(1) (11/1976. (XII. 24.) AH sz.)，第 9 页；1977 年，(1) (5/1977, (XII. 28.) AH)，第 6 页；1978 年，(2) (8/1978. (XII. 30.) AH)，第 30 页；1979 年，(8) (102/1979. (AT 39) AH)，第 85 页。

结果与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选择模式是一致的。企业固定资本存量越大，该组内就有越多的企业可以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获得产品。^①

属于这个小圈子，不仅意味着更容易得到物资，而且能以更优惠的价格得到这些物资，因为其他的企业都只能通过所谓的生产物资批发企业（这些企业也有责任确保足够的库存）取得必要的物资，这个过程中，批发商将物资的价格提高了 12.5%，它们得多付这笔钱（当然，这些物资是在满足直接购买企业的需求以后才提供给批发商的）。下面的访谈摘录道出了选择指定企业的标准：

“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当然有优惠供应的作法。……在国家计划总署与相关部门制定、讨论和评估下一个五年计划时，它们是这样开展工作的，它们首先满足最重要企业的目标。它们对产品供应进行这样的分类：首先是政府的大型项目（住宅建设，公路等等）；其次是部门的大型投资项目；再次是企业的投资项目。（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司长，1979年）

这种决策作法在当时是并不新鲜的。上面的访谈摘录中提到的供应分类是从 1968 年以前的体制继承下来的，它反映了各项事务重要程度的顺序安排，在进行新经济政策机制改革时

实际上，特殊照顾的产品分配办法已经实行了好几年了，因为外贸部和产业部门的贸易司多年来就一直在对从资本主义市场上进口的商品进行内部分配（Gacs, 1980）。

是作为过渡性的特征保存下来的。^①然而，这种作法不仅没有停止，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被广泛地制度化了。正是计划审议的过程，决定了企业的责任、企业活动的方向、企业生产的水平、以及企业成长的速度。

企业兼并的“分布状况”

劳动力的流动是新经济机制改革之初惟一没有试图加以行政性控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力日益增长的流动性，终于导致政府对工资政策和劳动力政策领域的干预，加强了对区域发展和企业发展领域的干预。^②

“从那时起，我们成功地大大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我们结束了自由招工制度，并对劳动力进行有组织的控制。这些措施产生了成果。一些中央颁布的措施得到了更严格的执行，在有些情况下，阻止了这种过高的劳动力流动性。然而，没有适当的企业工资政策，对不同的工种和职业没有适当的报酬，不解决企业内部的工作变动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冶金与机械工业部人事司，1978）

但是，中央的措施不仅是要制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且

^① 1967 年第 25 号政府令以及 1967 年有关产品流通的第 2037 号政府决议。

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从 1971/1972 年起要抑制农业合作社以及辅助工业的普通消费与销售合作社的发展，为什么对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人实行优惠工资，以及为什么对企业发展的可能性和招收劳动力的可能性进行有选择的控制（例如，把企业分成 A、B、C 类，A 代表规模要扩大的企业，B 代表规模保持不变的企业，C 代表规模要缩小的企业）。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要严格控制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下面的摘录反映了这种作法背后的动机：

“把工业企业布置在地区的枢纽地带（工业发展中心），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这里才具备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通过对劳动力进行有系统的调配，在过去的 3 年里，28 000 到 29 000 人已经得到了重新安置，他们去了工业政策选定的发展地区。这些人中的 80% 都在部门选定的最有发展活力的企业组织里找到了工作。”^①

调配劳动力的另一种方法是企业兼并，通过企业兼并阻止企业劳动力规模的下降，或迅速增加生产。表 3. 16 表明，1968 年到 1979 年间，不同规模的企业中，哪一些企业是吞并其他原先独立的企业或其生产工厂的。

表 3. 16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中主兼并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各组企业的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主兼并企业的数量	10	6	4	20	8	8	7	-	23	1	1	-	-	-	2	45
企业总数	11	10	22	43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主兼并企业所占的比例	90.9	60.0	18.2	46.5	44.4	33.3	17.9	-	19.3	3.8	3.3	-	-	-	0.7	9.9

资料来源：沃斯卡（Vozka, 1980, 1984）关于 1968 年到 1979 年企

冶金与机械工业部（1977），《机械工业选择性发展政策的成果与经验指南》摘要，3 月，第 2 页与第 15 页（M. Cs.）。

业组织变迁的研究以及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1977 年作的一项分析报告的附报告中的表 1, 该报告的题目是: “关于机械工业执行有选择的发展战略的成果与经验的报告”。

兼并其他企业的主兼并企业的数量, 在第 I 组与第 II 组里是一样的。但是, 这个数字是第 I 组企业总数的一半, 是第 II 组企业总数的五分之一。在第 III 组里, 只有两家企业兼并过其他企业。如果我们对下面两个因素同时加以考虑, 那么我们将得到更清晰的认识, 它们是, (1) 被兼并企业分布的集中程度, 以及 (2) 不同规模组的企业里每个主兼并企业兼并的企业数 (表 3. 17)。

表 3. 17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被兼并企业 (a)
和主兼并企业 (B+) 在不同规模的企业组里的分布状况
(不同规模组里主兼并企业总数 = 100% 被兼并企业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被兼并的企业数	28	12	6	46	12	5	9	-	26	1	2	-	-	-	3	75
被兼并企业 与主兼 并企业之 比(a/B+)	2.8	2.0	1.5	2.3	1.5	0.6	1.3	-	1.1	1.0	2.0	-	-	-	1.5	1.7
被兼并企 业的分布	37.3	16.0	8.0	61.3	16.0	6.7	12.0	-	34.7	1.3	2.7	-	-	-	4.0	100.0

资料来源: Voska (1980) 和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1977) 编制的有关被兼并企业与主兼并企业的清单和数据, 如前所引。

很显然, 企业兼并的程度是非常集中的: 每家主兼并企业所兼并的企业数, 在最大型企业的那一组里, 是最高的。总体来看,

第 I 组企业兼并的企业占了被兼并企业总数的 60%。^① 通过对企业兼并状况的考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兼并进一步强化了前面讨论的各种经济政策工具所形成的分配模式。通过兼并获得的劳动力都集中到了大型企业，我们也可以看到，企业获得优惠待遇的机会并不是这个或那个管理机构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地区党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各种中央管理机构的党组织和委员会复杂的协调活动的结果。下面的访谈摘录谈到了这一点：

“有时候 想法直接来自上面——来自国家计划总署的主管和冶金与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或者，有时候，是县委员会提供了兼并的机会。企业自身很少有可能发起兼并的谈判 因为要避免主观性 它们是在兼并过程的最后时刻才知道这些事的。当然，我们要让主兼并企业知道相关情况，因为我们需要它的详细情况。有关的计划完成以后，副部长会与有关的地区领导联系。但是 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向党中央机关请示——如果它们同意，我们就执行计划；如果它们不同意 计划就取消。”

“一家企业能否防止自己被兼并呢？”

“它无法防止 不过 如果它过早地发现兼并计划，那么有可能使得兼并对各方都不利，因为人们害怕变化 并且在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形势下 它们可以打起背

^① 经县政府的同意，被兼并企业算 A 类企业——即，要进一步发展的企业。工资优惠使得这些企业能够赢得劳动力，同时相应的贷款又切实保证了发展机会。根据报告的叙述，职能部门各机构在实现这个战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同上，第 15 页）

包走人。如果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那么兼并的一个最重要的动机——获得劳动力，就消失了。这些因素促使部里尽可能地推迟信息的披露，但这不是总能做到的。这里有地区的利益，有时候它们把口袋里的猫放跑了……（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企业监督司，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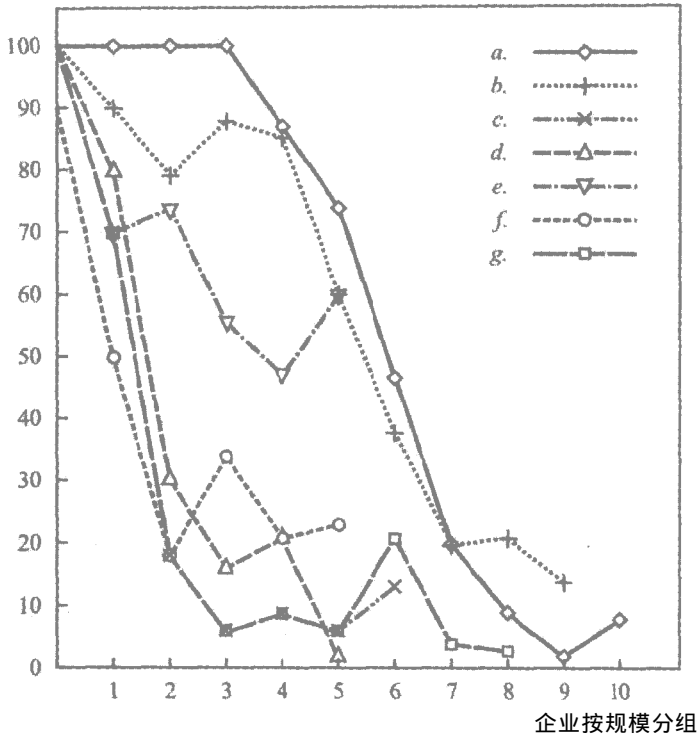
现在，让我们综合起来考察一下这 7 个经济政策工具执行的结果（图 3. 2）。

对经济政策工具实施过程中的选择性的定量分析表明，管理机构给予优惠待遇的选择标准是倾向于较大型企业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高层权力机关关注的核心是大型企业，无论是生产性补贴的发放，物资采购机会的给予，兼并的进行，还是中长期发展计划的执行，等等，都倾向于大型企业。

但是，数据也表明，除了最大型企业外，许多大型企业并没有获得前面讨论的各种优惠待遇，同时，一些相对较小的企业却能够享受到这些优惠待遇中至少一种优惠。这通常是该企业与其所在地的其他企业相比较的相对规模决定的。下面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重要的因素。

图 3.2 1970 年到 1979 年间各种优惠待遇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的分布状况 (每一个规模组里企业数 = 100)

优惠待遇



主兼并企业

直接从制造商获得产品的企业

参加长期技术发展规划的企业

在国民经济计划制定前提交企业发展计划草案的企业

接受统计调查的企业

- f 获得贷款的企业
- g 得到补贴的企业

第二种途径：企业在本地区的规模 (相对规模)与选择性的再分配

我们已经论述过，一个企业实施利益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所在地区利益实施能力的大小有关，^①与当地政府对促进该企业利益的重视程度有关。例如，下面的摘录谈到了利益实施的标准，谈到了这些标准的目标与特征：

亲爱的副部长同志，

在工业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企业 M 在我市建立了一家大工厂供应本地市场。按照我们的计划，它将成为我市最大的工业单位。因为我们准备深化现有的联系，我们已经邀请了县党委第一书记和总经理同志参加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如果副部长同志能够参加这个友好的会谈，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县党委书记，1968 年 10 月）

我无法对地区进行全面的分析。因为我手头只有各个地区机械工业企业的数字，我不能判断机械工业企业与地区内其他产业部门的企业相比较的地位，也无法对各个地区之间进行综合比较。例如，如果一个地区有一家大型的机械工业企业、一家小型的机械工业企业或没有机械工业企业，这并不表示该地区有或没有其他工业部门的存在，不表示该地区基础设施的状况，不表示该地区具有的财经资源或大型国家投资的状况，也就是说，它不意味着该地区具体能够提供什么机会，不意味着在争取中央资源方面有什么样的谈判能力。

新匈牙利档案，冶金与机械工业部，部长 Gyula Gyorgy 的文件，“通信”档案，第 14 箱，1968 年。

这个时期，机械工业的绝大多数企业的总部都设在布达佩斯，这是众所周知的。这给企业带来了许多好处（例如，靠部里更近、更方便的采购、发达的基础设施等等）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布达佩斯管辖区内，为获得优惠待遇展开的竞争是更激烈的。其他方面的考虑促使企业设在这里，但是各种优惠待遇也就有了多得多的竞争者。第 I 组的企业 70% 都把总部设在布达佩斯，这很能说明获得优惠待遇的条件。总部设在布达佩斯是一个优势，如果同时又是一家大企业，那就更有优势，规模的庞大使地理位置的优势更为突出。

单独分析不同地区内的最大型企业^①（R+），考虑所有前面分析的各种优惠待遇，我们发现 90% 的各地区最大型企业至少享有这种或那种优惠待遇。在所有相对最大的企业（R+）当中，只有 4 家企业没有得到任何优惠待遇。^② 因此，在一定规模的范围内，地区的影响力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最大型企业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而对最小型企业来说，则根本没有它的事。

一旦我们考察相对大型企业在获得优惠待遇方面的机率，同时对照企业的绝对规模，那么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表 3。

我对布达佩斯与各县的企业根据企业的规模进行了排序。我根据 1968 年和 1979 年中央统计办公室和匈牙利国民银行年度刊物发表的匈牙利企业地址，按照企业总部所在地，确定了企业的地理位置。我对企业的考察只到县一级的原因，只是因为关于企业的第三个指标的数据——其政治地位，只到这一级为止了。

其中，3 家的规模属于第三组——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因素比它们使该地区最大型的工业企业这个因素更重要。在这 3 家企业里，两家是托拉斯的成员企业，一家是机械工业的边缘企业。第四家企业属于第 II 组，它处在如此不利的地位，以致被另一家企业兼并了。

18).

表 3. 18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企业在地区中的
规模与获得全部优惠待遇的关系 (百分数) *

指标	按规模分组			
	I.	II.	III.	合计
地区内最大型企业(R+)	85.0	38.1	0.0	57.5
不是地区内的最大型企业(R-)	54.8	30.4	1.4	11.6
合计	68.1	31.7	1.4	15.6

注：* R+ = 40; R- = 413。

资料来源：由表 3. 1 到 3. 17 编制而来。

我是这样计算企业获得优惠待遇机会或曰谈判能力指标 (B) 的：如果一组企业有某种的特征，如，是相对最大型企业 (R+)，那么我将优惠待遇的种数 (即，7) 乘以该组的企业数 (n)，即， $7 \times n$ (R+)；然后将这个数字用这组企业实际获得的优惠待遇数 (A) 去相除。也就是说， $A / 7 \times n$ (R+) = B。(B 的值为 0 到 100。)

例如，如果有一个组有 6 家企业，其中 6 家都得到了补贴，4 家得到了贷款，4 家作为统计调查的对象，2 家兼并了其他企业，剩下三家没有得到任何优惠待遇，那么， $A = 6 + 4 + 4 + 2 + 0 + 0 + 0 = 16$ ；我把它除以这组企业可能得到的全部优惠数，即 $7 \times 6 = 42$ ；得， $B = 16 / 42 = 38.1\%$ 。

我们正在考察的是相对大型企业 (R+) 优惠待遇的数量，我们可以计算出企业实际获得的优惠与它们在理论上可能获得的全部优惠的比例，我们也可以为相对小型的企业 (R-) 计算出同样的数据，还可以按照绝对规模，即在本部门里的规

模分别计算 $R+$ 与 $R-$ 的数据。^① 数据显示在获得优惠待遇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选择性：相对最大型企业（ $R+$ ）得到了 60% 它们理论上可以得到的优惠待遇，而相对小型的企业（ $R-$ ）只获得了 12% 的优惠待遇。而且，可以明显看出，最大型企业（第 I 组）获得优惠的机率比地区内最大型企业（ $R+$ ）获得优惠的机率大，这表明，地区的谈判能力比与全国范围上看的企业规模相联系的谈判能力要弱。但是，相对规模在这里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考虑那些在第 I 组然而不是地区内最大型企业的企业（I. $R-$ ），并把它们（I. $R-$ ）与那些是地区内最大型企业（ $R+$ ）的情况相比较，就会看到，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只是略为小了一些。

不过，地区内的规模仍然是起作用的。无论如何，非常明显，那些既是机械工业内最大型企业又是企业所在地区最大型企业的企业（I. $R+$ ），其获得优惠待遇的机率比第 I 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优惠待遇的机率，以及那些在全国范围看是大型企业但不是地区内最大型企业的企业（I. $R-$ ）获得优惠待遇的机率相比，前者要大得多。那些在第 II 组的企业也呈现同样的规律：是地区内最大型企业的企业（II. $R+$ ）比只是作为一个中型企业（II）获得优惠待遇的机率高得多。^② 但是，地区内规模的重要性没有绝对规模的重要性大，因为，很显然，第 II 组企业中相对规模最大的企业获得优惠待遇的

我是用下面的方法进行计算的：我把地区内的最大型企业根据它们在本部门的规模进行分组（I. $R+$ ，II. $R+$ ，III. $R+$ ），然后把不是地区内最大型企业按照它们在本部门的规模进行分组（I. $R-$ ，II. $R-$ ，III. $R-$ ）。之后，我根据它们的相对规模（ $R+$ ， $R-$ ）把它们综合起来。

这里必须指出，其中一些生产具有战略重要性产品的企业属于这个类别。因此，是这个因素，而不是规模，可能是它们获得优惠待遇的原因。

机率，比那些不是地区内最大型企业但是该部门最大型企业的企业（I. R-1）获得优惠待遇的机率小。

因此，相对规模的作用较小，但仍然是有偏好的再分配过程中与绝对规模一块起作用的属性。^① 情况表明，相对最大的企业与本规模组的企业相比对决策有更大的影响，它既可以应用自己的力量，又可以与地区行政部门联合起来，发挥影响力。

作为地区内最大型企业，地方上会给予企业很多好处：在获得地方资源方面它们具有优势，不论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劳动力的分配、企业兼并、地方工业能力建设的分配方面，还是获得地方的合作，或进入地方权力精英圈方面，这些企业都有优势。相对规模最大还增加了与高层党和国家机关保持联系的地方党委的兴趣和关注。这种情况促使企业极力吸引地方权力机关的注意，尽量保持和活跃与地方权力机关的联系。同时，由于地方上的最大型企业能够享有特权，大型企业就保持或获得了增长，从而更直接地介入决策。

另一方面，总部在某地区的企业的规模越大，地区经济政策领导层的隐蔽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谈判能力也越大。实际上，这是地区领导的一个武器，用它可以在获得特权、在与地区有关的中央资金分配、在劳动力政策、在地区发展、在地区的地位等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地区有大型企业），可以获得更高层的保护人，关于稳定可能受到威胁（内部供应问题、经互会贸易任务实现不了、政治局势紧张，等等）的意见可以得到更大的重视，而无论这个地区是一个县还是布达佩斯的一个区。因此，支持这些企业的

表 A. 1 给出了各类规模企业的详细数据。

增长也是地区党组织的利益所在，支持这些企业获得尽可能多的反馈机会也是地区党组织的利益所在。同时，它们能够对这些企业施加更大影响以便把这些企业保持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这也是很重要的。实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把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整合到地方政治精英中来。

第三种途径：政治整合与选择性的再分配

前面提到的每一种优惠待遇的机会都造成了融入决策机制的可能性。国家与政治决策机制非常紧密地相互纠缠在一起，这种纠缠是制度化的，并且其中存在着永远不平等的利益实施机会。这使我们得出结论，即，渗入政治决策机制的规律不应该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选择标准有什么不同。

让我们看一下固定资产规模不同的企业，它们的领导人或官员是企业所在区或县级党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是更高层党机关成员^①的情况（表 3、19）。

数据显示了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在优惠待遇的分配模式方面同样的（而且是更严格的）选择规律。在这个更小的圈子里，并不是所有大型企业的经理都有优越的政治职务，而有时一些较小型企业的经理却得到这样的职务。

我只能分析在布达佩斯各区和县级企业领导是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因为我能够获得的数据只到这一级。此外，我考察了企业领导担任布达佩斯经济委员会委员，布达佩斯党委委员以及中央委员的情况，还考察了 1975 年他们的工作地点和职务。这些数据我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后来我用前面分组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由于数量太少，我无法考虑职务累积的机率，也无法考虑这些职务在党等级体系里的具体级别，虽然很明显，就利益实施而言，它们是很重要的。

表 3. 19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不同规模的企业拥有政治职务 (P+) 的企业的数量和比例
(各组企业的总数 = 100%)

指标	按规模分组													合计		
	1.	2.	3.	I.	4.	5.	6.	7.	II.	8.	9.	10.	11.		12.	III.
有政治职务的企业数	10	5	10	25	9	7	6	-	22	-	-	-	-	-	-	47
企业总数	11	10	22	43	18	24	39	38	119	26	30	57	111	67	291	453
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占总数的百分比	90.9	50.0	45.5	58.1	50.0	29.2	15.4	-	18.5	-	-	-	-	-	-	10.4

注：* 那些在一定级别的党组织里拥有政治职务的企业 (P+)。

资料来源：财政部计算机中心的数据，区党委根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史研究所的要求提交的报告；布达佩斯党委和党委经济委员会的文件；中央与地方的日报中关于选举的报道、关于县党委经济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单位的报道以及关于中央委员的报道；以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1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1975（布达佩斯：Kossuth Konyvkiado），第 536—542 页。

产生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地区利益的实施：在布达佩斯的 22 个区（其中之一没有机械工业企业）中，15 个区里相对最大的地方企业都有上述的政治职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益实施的机会只是开放给地方的最大型企业的，这只是表明，在企业经理能得到政治职务的地方，当地的最大型企业总是得到政治职务的企业之一。

在布达佩斯之外，企业领导拥有政治职务的比例非常低：在 19 个县里，只有 9 个县里有企业拥有政治职务。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位于布达佩斯的企业领导有更大的机会

整合进地方政治里。另一个原因是只有那些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企业在县里的附属企业（在许多方面，这些通常是县里最重要的企业）才进入县委执行委员会。因此，政治职务倾向于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企业。同时，通过它们的附属企业，一些以布达佩斯为基地的企业不仅进入了相应的区政治精英层，而且进入了许多县党委的执行委员会，进入了布达佩斯党委的执行委员会，甚至还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

自然，企业整合进党等级体系的级别越高，信息交换的机会就更直接，政治职务就累积得越多（虽然这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企业拥有的机会就越多。

关于企业领导是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能够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的问题，一家企业经理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我可以举很多实际的例子。……区党委决定制定劳动力管理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并决定在区和企业的层级上实施这个计划。……我们的计划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因为我早就知道了执行委员会里的辩论，知道计划有什么要求。……其次，我总是能够从经济委员会的日程上知道什么时候执行委员会要对我们进行检查。我能够进行准备以达到要求的结果。其他事情上的便利有，例如，我提前一天知道他们要来检查。关于经济政策问题，我得到有用的信息，而如果我不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的。我已经在第 13 区其他企业那里学到了很多，因为我正巧出于党务到这些企业那里去（在讨论这个或那个日程之前做实地调研）……或者是因为，在我的党务工作中，我经常受托参加这个或那个视察。最近

的一次视察是去朗格机械厂。我们一年后视察同样的议题，结果发现企业经理必须被革职。……今年区党委的领导从没有来我这里视察过。他来干嘛呢？他非常清楚，我已经知道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每一件事情。（企业经理，1985）

下面我们要考察其经理拥有政治职务的那些企业和其经理没有政治职务的那些企业在获得前述优惠待遇方面的机会。下面的访谈摘录反映了这种职务上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一系列影响：

“重要人物不会是小型企业的领导。这既不是工业政策问题也不是科学问题，企业的机会受到企业领导人联系范围的强烈影响。这一点比企业本身的性质还重要。两个同样有效率的企业，其经理有某种政治职务的企业与另一个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国家计划总署 工业局，1978）

在 47 家其领导人担任一定政治职务的企业当中，只有 2 家企业在 10 年时间里没有得到前面分析的 7 种优惠中的任何一种，而其中有 12 家企业得到了全部 7 种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在那些其领导人没有担任任何政治职务的企业里，只有 1 家得到了全部 7 种优惠待遇，而 268 家这类企业没有获得任何一种优惠待遇。

让我们详细考察一下优惠待遇的分配与政治职务之间的联系（表 3. 20a 与表 3. 20b）。

表 3. 20a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
受惠和未受惠企业与企业经理
是否有政治职务 (P+) 或 P(-) 的关系

优惠待遇	K+			K-		
	P+	P-	合计	P+	P-	合计
得到补贴	32.1	67.9	100.0	0.9	99.1	100.0
获得信贷	29.3	70.7	100.0	2.2	97.8	100.0
直接从制造商购货	37.0	63.0	100.0	3.9	96.1	100.0
主兼并企业	63.7	36.3	100.0	6.1	93.9	100.0
参加发展纲要	71.4	28.6	100.0	5.3	94.7	100.0
提交初步计划草案	77.4	22.6	100.0	5.7	94.3	100.0
接受统计调查	88.5	11.5	100.0	5.9	94.1	100.0

注：* K+ 表示它们获得了优惠待遇；K- 表示它们没有获得优惠待遇。

资料来源：如表 3. 3 至 3. 18。

选择越“严格”或范围越小，那些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入选的比例就越大；而在那些没有获得任何优惠待遇的企业当中，没有政治职务的占绝大多数（表 3. 20a）。不论我们考虑的是哪一种优惠待遇，表 3. 20b 表明，在有政治职务 (P+) 的那一组企业里，获得优惠待遇的比例远远超过没有政治职务 (P-) 的那一组。

表 3. 20b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
受惠和未受惠企业中有政治职务 (P+) 和
无政治职务 (P-) 企业的分布状况

优惠待遇	P+			P-		
	K+	K-	合计	K+	K-	合计
得到补贴	93.6	6.4	100.0	22.9	77.1	100.0
获得信贷	87.2	12.8	100.0	24.3	75.7	100.0
直接从制造商购货	78.7	21.3	100.0	15.5	84.5	100.0
主兼并企业	53.2	46.8	100.0	2.4	97.6	100.0
参加发展纲要	71.4	28.6	100.0	5.3	94.7	100.0
提交初步计划草案	51.1	48.9	100.0	1.7	98.3	100.0
接受统计调查	48.9	51.1	100.0	0.79	99.3	100.0

注：* K+ 表示它们获得了优惠待遇；K- 表示它们没有获得优惠待遇

资料来源：如表 3. 3 至 3. 18。

在更深的层次上，同时考虑它们的规模和政治职务，让我们考察一下每一个企业在每一种优惠待遇分配的过程中入选的机会。让我们考虑几个前面提到的优惠待遇的分配。下面的表格指示的是补贴和贷款的分配（及企业投入自有资金的状况），以及企业兼并的情况。^①

选择上面的优惠类型有两条基本的依据：（a）与其他种优惠相比，它们的机率大得多（因此选择不是那么小），从而组内的分组也可以进行统计上的评估；（b）其中的一些统计能够特别清楚准确地显示出有或没有政治职务所造成的差异。分析其他类型的优惠，同时表明了类似的选择规律的表格见 Csanadi (1984) 的附录 18 至 25。有关全部优惠的分配的详细数据见表 A. 1。

让我们首先考虑补贴机会的分布状况 (表 3. 21a 与表 3. 21b)。

表 3. 21a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在规模和政治职务的基础上得到补贴与没有得到补贴 * 的企业分布状况

按规模分组	得到的(S+)			没有得到的(S-)		
	P+	P-	合计	P+	P-	合计
I.	59.5	40.5	100.0	-	100.0**	100.0
II.	21.8	78.2	100.0	9.1	90.0	100.0
III.	-	100.0	100.0	-	100.0	100.0
合计	32.1	67.9	100.0	0.9	99.1	100.0

注：

* S+ 表示得到补贴的企业，S- 表示没有得到补贴的企业。

** 仅有一家企业

资料来源：如表 3. 3 至 3. 18

表 3. 21b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在规模和是否得到补贴的基础上拥有或不拥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分布状况

按规模分组	有政治职务(P+)			没有政治职务(P-)		
	S+	S-	合计	S+	S-	合计
I.	100.0	-	100.0	94.4	5.6	100.0
II.	86.4	13.6	100.0	69.4	30.6	100.0
III.	-	-	100.0	2.7	97.3	100.0
合计	93.6	6.4	100.0	2.9	77.1	100.0

资料来源：如表 3. 3 至 3. 18。

在表 3. 21a 的左边，我们看到，第 I 组里——各类企业中累积了最多政治职务的一组——得到国家补贴的企业中，企业拥有政治地位的比例大于没有政治地位的比例。在表的右边，可以看出，没有得到补贴的企业当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企业拥有党的职务。表 3. 21b 表明，所有有党的职务的第 I 组企业都得到了国家补贴，第 II 组里得到这种支持的所占的比例也很高。在表 3. 21b 的右边，在那些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当中，第 I 组里只有一家企业没有得到补贴。这意味着规模的大型足以使企业拥有享受这种国家支持的特权。自然，这种支持在量上的大小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在表 3. 22 上，我们也能看到，在国家给予整个机械工业的补贴里，在这个规模组里，有政治职务的企业所占的比例是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所占比例的 4 倍。

表 3. 22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在企业是否拥有党的职务和企业规模的基础上补贴与贷款量的分配状况

按规模分组	机械工业得到的全部补贴*			机械工业得到的全部贷款*		
	P+	P-	合计	P+	P-	合计
I.	63.9	15.1	78.9	60.3	16.2	76.5
II.	5.0	14.2	19.2	6.2	16.3	22.5
III.	-	1.9	1.9	-	1.0	1.0
合计	68.8	31.2	100.0	66.5	33.5	100.0

注：* 10 年时间里得到的补贴和贷款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财政部计算机中心的数据，1975 年县与中央的报纸，党史研究所有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区执行委员会的数据，《匈牙利社

会主义工人党第 11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1975 年，布达佩斯：Kosztly Konyvkiado ,第 536 至 542 页）以及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批准局的数据。

回到表 3. 21b, 我们看到, 在第 II 组里, 只有 14% (3 家) 有政治职务的企业没有得到国家补贴。这些企业只构成了这组里没有得到国家补贴的企业的 9%, 并且只是所有各组没有得到国家补贴的全部企业的 0. 9%。(在所有有政治职务的企业里, 这 3 家企业是这 10 年时间里惟一没有得到国家补贴的企业。)

在表 3. 21a 上, 我们看到, 在国家发给的所有补贴里, 32% 给了那些有政治职务的企业。(这个 32% 构成了所有有政治职务的企业的 93. 6%。见表 3. 20b) 如果我们考虑国家补贴量的分配而不是考虑得到补贴的企业个数的分布, 那么这个比例将提高一倍 (68. 8%) (见表 3. 22)。这个表还显示, 在这 10 年期间分配给机械工业的国家补贴总量中, 三分之二的补贴给了 10% 的企业——那些有政治职务的企业。

表 3. 22 中显示的有关贷款总量的分配表明了同样的比例。即, 在这 10 年期间发放的贷款总量中, 66. 5% 的贷款发放给了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在这个期间, 只有 6 家有政治职务的企业 (P+) 没有得到贷款。这 6 家企业都在第 II 组, 它占全部没有得到贷款的企业的 1. 9%。

如果我们在规模和政治职务的基础上分组考察对企业自有资金要求 (必须达到总投资的 30%) 的全部或部分豁免, 考察 30% 自有资金的严格执行, 或甚至要求高于 30% 的情况, 那么上述特权分配趋势将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 (表 3. 23)。

表 3. 23 1970 年到 1979 年间匈牙利国民银行发放
贷款时对机械工业部门不同规模的企业和是 (P+) 否 (P-) 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在自有资金方面的要求的不同

按规模 分组	自有资金所占的比例 P+(%)				自有资金所占的比例 P-(%)				自有资金所占的比例 P+ 和 P-(%)						
	0	0—30	30	30—	合计	0	0—30	30	30—	合计	0	0—30	30	30—	合计
I.	51.4	30.8	4.7	13.1	100.0	32.6	21.7	18.4	27.2	100.0	42.9	26.2	11.2	19.7	100.0
II.	29.8	38.3	14.9	17.0	100.0	36.8	15.0	15.0	33.1	100.0	34.6	20.8	14.8	29.8	100.0
III.	-	-	-	-	100.0	47.1	2.9	14.7	35.3	100.0	47.0	2.9	14.7	35.4	100.0
合计	44.8	33.1	7.8	14.3	100.0	36.4	15.7	16.1	31.8	100.0	39.6	21.9	13.1	25.4	100.0

资料来源：财政部计算机中心的数据，1975 年县与中央的报纸，党史研究所有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区执行委员会的数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1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1975，布达佩斯：Kossuth Konyvkiado，第 536 至 542 页）以及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批准局的数据。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企业自有资金在各种贷款中所占的比例的情况（见表 3. 23 的最底下一行）。首先，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发放给机械工业企业的各笔贷款中，只有 40% 实施了自有资金应占投资总额 30% 的规定（包括要求自有资金所占份额高于 30% 的情形），在多数情况下，企业自有资金的要求都豁免了。^①

现在让我们在企业的代表是否拥有政治职务的基础上考察这个问题（见表 3. 23 左边与右边的总数）。考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数据，我们看到，有政治职务的企业享有的优势极其

我不评判自有资金的原则是否合理的问题，只是考察银行在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发放贷款时是怎样偏离这个规定的。

明显。与 60% 的总体水平相比，银行对这些企业的自有资金要求的全部或部分豁免达到了将近 80%。对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豁免的比例为 50% 左右。也就是说，对于 48% 的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企业自有资金要达到 30% 及其以上才能得到贷款，这个比例是有政治职务的企业两倍。

把规模和政治职务综合起来考虑时，这些差异变得更加惊人。在得到贷款的机会、获得贷款的次数以及实际得到贷款的数额方面，这种差异的显著性渐次增强，在豁免企业自有资金的要求方面，这个差异甚至更加明显。即使在第 I 组里，在有政治职务的大型企业与没有政治职务的大型企业之间，对这个要求的豁免程度都有所不同。在第 II 组里，也存在着同样的差异，只是这组企业无论有无政治职务，得到企业自有资金要求部分或全部豁免的次数都比第 I 组里的企业少。这样的对比在第 III 组企业里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组企业的领导人都没有政治职务。^①

对第 III 组里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在自有资金方面的全部或部分豁免仅仅略少于第 II 组的企业，这是有实际原因的：由于与改善对外贸易平衡有关的原因，1979 年许多小型企业不必投入自有资金也能得到了贷款，以便它们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机械产品。

同样明显的差异出现在企业兼并其他生产单位的情况下(表 3. 24a 与表 3. 24b)。

表 3. 24a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主兼并企业(B+) * 与非主兼并企业(B-) * 在规模与政治职务基础上的分布

按规模分组	主兼并企业(B+)			非主兼并企业(B-)		
	B+P+	B+P-	合计	B-P+	B-P-	合计
I.	85.0	15.0	100.0	34.8	65.2	100.0
II.	21.7	78.3	100.0	17.7	82.3	100.0
III.	-	100.0	100.0	-	100.0	100.0
合计	48.9	51.1	100.0	6.1	93.9	100.0

注：* B+ = 41。

** B- = 412。

资料来源：财政部计算机中心的数据，1975年县与中央的报纸，党史研究所有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区执行委员会的数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1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1975，布达佩斯：Kossuth Könyvkiadó，第 536 至 542 页），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批准局的数据以及沃

大约有一半被兼并的企业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有政治职务的企业的工厂。在兼并的背后，县、部委和有强反馈的企业之间一定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活动，这反映在下面的访谈摘录里：“每一个县都想建立 Y（一家大型企业）部门。但这在 X 县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会减少企业 Z（另一家大型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劳动力。简单说来，就是抢了这些企业的饭碗。通过一个部门条令，我们禁止 X 县办 Y 企业。我们请求中央党组织向 X 县党委解释这个情况。我们不能把一个地区工业发展纲要置于无法实施的境地；例如在这个情况下，吸走劳动力是不能允许的。最后，我们达成了协议，Y 不能在 X 的南边建分厂。作为交换，X 得到企业 Q 和企业 Z 的一个工厂，这实际上对它是更有利的：在那里建立不是安排不当的工厂。而是在投资额上与它想要发展的规模一样，但却是生产经验丰富的工厂”（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司长，1986）

斯卡 (1980, 1984) 的数据。

表 4. 24b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政治职务在企业规模与企业是否为主兼并企业的基础上的分布状况

按规模分组	有政治职务(P+)*			没有政治职务(P-)**		
	P+B+	P+B-	合计	P-B+	P-B-	合计
I.	68.0	32.0	100.0	16.7	83.3	100.0
II.	22.7	77.3	100.0	18.6	81.4	100.0
III.	-	-	100.0	0.7	99.3	100.0
合计	46.8	53.2	100.0	5.7	94.3	100.0

注：* P+ = 47。

** P- = 406。

资料来源：如表 3. 24a。

如我们先前看到的，兼并其他企业的机会属于很小的一个特权圈子，453 家企业里只有 41 家有此特权。尽管只有不到一半的主兼并企业有政治职务 (3. 24a)，另一半主兼并企业没有政治职务，但是在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里只有 6% 能够兼并其他企业 (表 3. 24b)。

如果我们按照主兼并企业的规模和政治职务状况对兼并的情况进行分类，那么形势会变得更加明朗 (表 3. 25a)。

表 3. 25a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被兼并企业 (a) *
在主兼并企业 (B +) 的规模和政治职务基础上的分布状况

按规模分组	被兼并企业 (a)		
	P + B +	P + B -	合计
I .	92.2	7.8	100.0
II .	84.3	15.7	100.0
III .	-	100.0	100.0
合计	63.7	36.3	100.0

注：* 被兼并的企业数是 75

资料来源：财政部计算机中心的数据，1975 年县与中央的报纸，党史研究所有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区执行委员会的数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1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1975，布达佩斯：Kossuth Könyvkiadó，第 536 至 542 页），匈牙利国民银行信贷批准局的数据，冶金与机械工业部关于兼并的数据，以及沃斯卡（1980，1984）关于兼并的数据。

我们发现，64% 的被兼并企业都被那些有政治职务的主兼并企业 (P + B +) 所兼并。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 16% 的被兼并企业 (13 家企业) 有政治职务 (表 3. 25b)，但是几乎 70% 的被兼并企业都落到了本身有政治职务的企业手里 (表 3. 25c)。

表 3. 25b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被兼并企业 (a) * 的政治职务拥有状况及其在各规模组的主兼并企业中的分布

按规模分组	(aP+) 并入	(aP-) 并入	合计
I .	21.6	78.4	100.0
II .	10.7	89.3	100.0
III .	-	100.0	100.0
合计	16.1	83.9	100.0

注：* 被兼并的企业数是 75。

资料来源：如表 3. 25a。

表 3. 25c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有政治职务的被兼并企业在不同规模和不同政治职务的主兼并企业中的分布

按规模分组	(aP+) 并入		合计
	P+ B+	P- B+	
I .	91.8	8.2	100.0
II .	-	100.0	100.0
III .	-	-	100.0
合计	69.3	31.7	100.0

资料来源 如表 3. 25a

在第 I 组企业的表现特别突出。我们从表 3.24b 中知道，第 I 组里有政治职务的企业 (IP+) 的几乎 70% 在这 10 年里都兼并了其他企业，它们占了第 I 组全部主兼并企业的 85% (表 3.24a)。它们吞并了 92% 的被第 I 组兼并的企业 (表 3.25a)。

22% 的被第 I 组企业兼并的企业是有政治职务的（表 3.25b）其中的 92% 是被第 I 组里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兼并的（表 3.25c）。

总之，在补贴的分配、贷款批准、自有资金要求和兼并机率方面都清楚地表明，有政治职务的企业比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数据还显示，政治职务本身还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有政治职务的企业都排入了受优惠的行列。然而同时，没有政治职务的企业实际上也获准进入了特权集团。

如果我们按照企业是否有政治职务与企业在各自地区的相对规模进行分组，然后一项一项地考察各类企业获得某种优惠的比例（表 3.26a），同时集合地考察企业获得补贴的机会与企业是否有政治职务以及企业的相对规模（表 3.26b）之间的关系。

表 3. 26a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企业获得各种
优惠待遇的情况与企业是否有政治职务以及企业的
相对规模之间的关系 *（各组企业数 = 100%）

指标	P+R+	P+R-	P-R+	P-R-
补贴	95.6	92.6	63.2	20.5
信贷	90.5	81.5	52.6	20.2
直接向制造商购买	80.9	70.0	52.6	12.7
参加发展规划	76.2	37.0	15.7	2.3
提交计划草案	61.9	33.3	5.3	1.8
接受统计调查	71.4	29.6	5.3	0.3
主兼并企业	76.2	25.9	21.0	4.2
企业总数	21	27	20	385

注：* 相对规模 = 在给定地区是最大型企业的为 R+，不是最大型企业的为 R-。

资料来源：由中央统计署 1968 年到 1979 年每年的出版物，匈牙利国民银行的资料以及匈牙利企业地址的资料编制而成。

表 3. 26b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企业获得优惠的机会与企业的相对规模及企业是否有政治职务之间的关系

指标	P+	P-	合计
相对最大型(R+)	78.6	36.4	57.5
非相对最大型(R-)	55.0	8.6	11.6
合计	65.0	10.0	15.6

资料来源：如表 3. 26a。

无论是表 3. 26a 关于每一项优惠的详细数据还是表 3. 26b 的总和数据都表明，没有可以用来建立反馈的机会（R-P-）（R+P-）或（R-P+），就意味着在得到优惠待遇方面非常不利。同样明显的是，在获得优惠待遇方面，企业在即定地区的相对规模是很重要的。但是，更有影响的一个因素是企业是否拥有政治职务，如果相对规模与政治职务相结合（R+P+），那么进入有优惠待遇的小圈子的机会会是最大的。

在表 3. 27 里，我对 1970 年到 1979 年间的机械工业企业按照它们是否拥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选择性标准：绝对规模、相对规模和政治职务进行分组，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组企业及其组合在获得优惠待遇方面的机率。

表 3. 27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内企业的
不同特征与企业入选享有优惠待遇的机会^{*}及
企业的谈判能力的差异之间的关系 (%)

指标	P+R+	P+R-	P-R+	P-R-	P+	R+	R-	P-	合计
I.	90.5	74.3	64.3	40.8	84.0	85.0	54.8	46.0	68.1
II.	42.9	43.7	36.3	27.7	43.5	38.1	30.4	28.9	31.6
III.	-	-	-	1.4	-	0.0	1.4	1.4	1.4
合计	78.6	55.0	36.4	8.6	65.0	57.5	11.6	10.0	15.6
企业数	20	27	20	386	47	40	413	406	453

注：* 见前文关于谈判能力指标的计算方法。

可以看出，正式的等级体系里级别相同的企业，当它们能够激起政治敏感性的重大问题，从而获得建立反馈的机会，并增加它们加强联系网络的能力和利益实施能力时，它们获得资源，获得各种货币与非货币利益的能力就会急剧增加。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它们是本部门的最大型企业（I.），或它们是所在行政区的最大型企业（R+），或它们的经理是地区或中央党组织的这个或那个层级上的官员（P+）。那么它们就能够享受到前面讨论的优惠。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出，当企业符合 3 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标准时（I.、R+、P+）企业获得某些特权的机会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就大大增加。如果符合其中的两个（I.、P+、I.、R+、P+R+），那么获得优惠的机会继续增加；如果企业符合全部 3 个标准（I.、P+R+），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该企业一定能够获得某种特权。

得到资源的能力是选择性的不是普遍性的，它不是由组

织、正式公布的工作重点、单位的正式背景、资源管理的工具和正式的分配标准决定的。上面描述的再分配的选择标准与此相结合，表明软预算约束不应看作如科尔奈所说的，是政党—国家体制运行的根本的、普遍的特征。^①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体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资源分配是选择性的，企业的预算约束是选择性地软的，而这种选择性又是在政治标准的基础上形成的。

选择性的政治理性背后的动力，是试图维持经济与政治的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持续的政治控制以及通过再分配来使权力合理化。这些标准使决策者的长期谈判能力产生差距，同时这些标准也表明了那些保证自我支持机制运转和维持结构的内聚力的驱动力。这些结果表明，企业扩张的欲望、对增长与投资的饥渴、寻找保护人的努力以及维持关系的行为主要不是人的本性造成的结果，不是需要由工作来证明自己、要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渴望获得认可、渴望扩张的内在冲动、渴望权力、渴望获得财经上的认可（科尔奈，1980：78、205、220）等等“人的自然本性”造成的结果。这些行为是由适应这种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的运行的选择性标准造成的结果，因为适应这个选择性的标准是获得利益的条件。因此，对增长的饥渴是体制造成的行为，它也反映在利益实施的努力方向上。科尔奈认为：

关键的问题，不是什么动机促使了对数量的渴望
… …扩张的压力。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反方向的

科尔奈在一系列著作里解释了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其中包括 Kornai (1980；1989a) 和 Kornai 与 Matits (1983)。

作用力，能够导致生产的领导人自愿抑制住它们对投入品的需求……？（科尔奈，1980：79）

他的回答是不存在这样的力量。根据科尔奈的分析，缺乏这种力量的原因是企业领导人不是受到效率的约束，因为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软预算约束使他们可以沉溺于他们内在的增长欲望，从而使短缺加剧，并使得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压力上升。但是，基于前文的分析，我认为这些要素不是互相因果的，二者都源于权力结构本身的特性。为政治所垄断的结构运行——被利益和强制所驱使——的基本原则，在干预行为和对资源的乞求行为方面，都产生了政治上理性的行为。分配是在选择性和政治考虑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预算约束仅仅是有选择地软的，同时，扩张是为了满足选择的要求，以便能够进入受到优惠对待的行列。对于那些预算约束并不软的企业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它们也想满足选择的要求以便获得资源。在被政治垄断的经济里，短缺是为政治所垄断的关系所创造的动机导致的结果，是这些动机造成的体制适应性行为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对效率考虑的忽视不是直接源于软预算约束或短缺本身，而是源于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里选择性再分配的政治标准的原因。因为，如果企业经理要抑制自己满足这些标准的努力，那么他（她）就放弃了在这个机制内获得资源的机会。因此，另一方面，没有效率考虑的约束不是短缺所强化的软预算约束的结果，而是政党—国家体制运行的基本原则的结果。因此，这个约束的缺乏从根本上是这个体制的特征，并且仅仅是在体制特征的基础上才是个体决策者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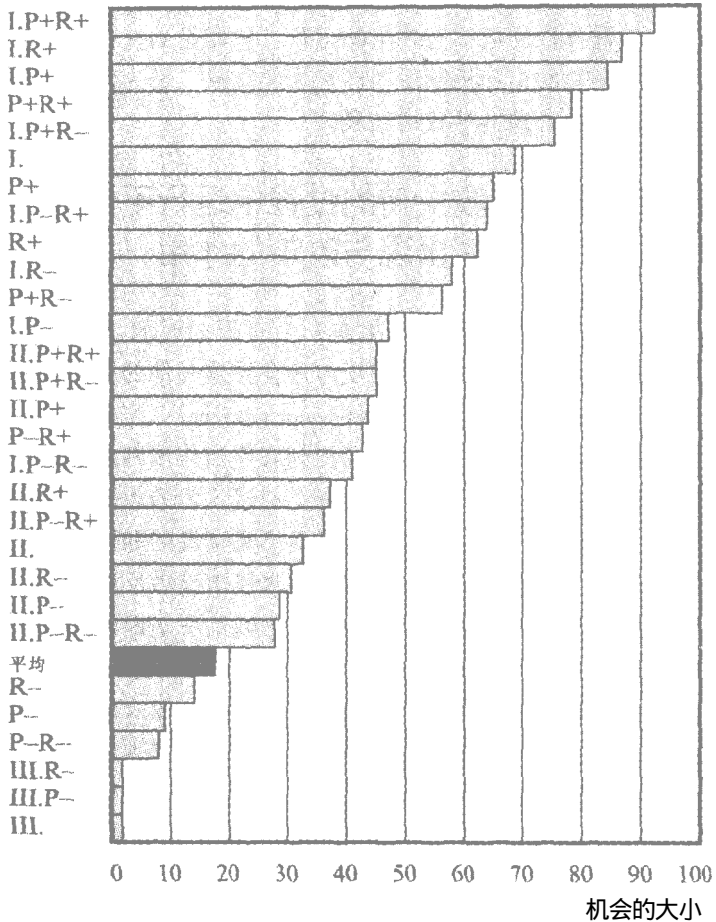
分配过程中长期选择的政治标准，以及资源乞求者为满足

这些标准所做的努力，造成了一个同一的、反复出现的分配方向，其结果导致了强制路径（forced path）的形成。这些强制路径保证了体制适应过程的方向。在内聚力得以维持的同时，即，在即定的权力分配下还有资源可供再分配时，保持原子化（以及个体利益因此通过隐蔽的渠道来实施）是理性的行为模式；利益表达和共同行动对那些在结构内有制度化个人化的联系的行为人来说是不利的。只要体制能够汲取到可供再分配的资源，每一个行为人都被迫力图与其他行为人分开，因为他们正在竞争完全相同的资源；不仅如此，保持隐蔽渠道的秘密性、增加隐蔽力量的权力、得到资源和对资源进行再分配，将保证原子化得以维持，保证对体制的适应，以及保证自我支持机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如果我们把表 3.27 里各组企业获得优惠待遇的机会画成直方图，那么如我们通过图 3.3 看到的，情况变得非常清晰。这个图最直观地反映了由依附和利益实施关系演化而来的结构的资源汲取和体制适应性特征。优惠待遇的“程度”也表明了什么是体制的价值观，而强制路径作为资源分配的方向始终保持不变的结果，正是在自我支持机制内根据这样的价值观发展起来的。图 3.3 清楚地显示出，优惠待遇是根据政治理性的选择性考虑进行分配的，这种考虑独立于决策者、机构、目标与手段。利益实施的能力是由满足这些政治标准的程度和对这些政治标准的适应水平决定的。

图 3.3 1970 年到 1979 年间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按入选的机会（谈判能力）分组所展现的体制适应性模式（以表 3.27 为基础）

企业组别



安塔尔（1985：277—284）详细地描述了体制适应过程中

的谈判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关于计划、指标和价格的谈判，是指令性计划的分解体制的模式基础上的“指标分解体制”。谈判过程意味着对规范指标的偏离。这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在特定的权力分配及其运行的过程中，规范指标与个别的优惠待遇选择性的运行与共生的运行。它们是选择性标准、选择性的软预算约束和机制适应性行为的结果，是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里的政治理性导致的结果。

第六节 自我支持的过程中运行不良的反复出现与改革的作用

前面描述的维持机制只能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顺利地运行。汲取资源的压力与增长的压力还会导致其他的结构性的行为模式（*structure-conforming behaviour patterns*）：它们迫使决策者不断地囤积物资，隐瞒利润，把利润率当作谈判的工具，抑制效率的提高，储藏劳动力和物资，制造认为的短缺，把投资的主要目标仅仅定位于资源的获得而不是资源的利用，花费掉他们的收入，以及对资源分配者的要求作出灵敏反应而不是对消费者的要求作出灵敏反应，这些是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里短缺现象产生的复杂原因。

在即定的权力分配下，这些结构性的行为模式及其结果造成了运行不良的反复出现，这种运行不良反复出现对资源的汲取上，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的行使上，因为在满足对资源的要求上会反复出现困难。^① 这给体制的自我支持过程造成了困

^① 这个状况可以看作是自我支持机制间歇性的过度运行，换句话说，是由缺乏经济控制造成的过度分配（Soos, 1986）。

难，削弱了分配者及被他们赋予特权的人（入选的人）；人们熟悉的干预与请求的惯常渠道变得没有效率了，结构的内聚力削弱了。

随着内聚力的减弱，高度结构化的权力关系里会出现一个真空：一些连线暂时或长期地削弱了，从而这些连线两端连结的职位也被削弱了。^①这个过程导致了权力关系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不一定带来制度性的权力结构的转型。要使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就要在依附连线的密度、起点、终点等方面发生实际的变化，或在反馈的起点、终点方面发生变化，或拥有反馈的人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就对资源或干预的请求而言，权力关系的变化反映在对依附连线的利用的重组程度上。由于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发生了差异，一种危机的气氛与改革的要求就会同时出现。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为更新的主张开了绿灯，使得改革观念得以出现，而发掘与汲取新资源的迫切需要又增强了实施改革的机会（Csanadi, 1985a）。

这种共生现象的结构背景与运行背景为更细致地定义改革提供了可能。我对改革动议出现的原因与它们的目的以及它们在即定体制内实施的功能效果进行了区分。即使是后者，区分改革对社会、权力与经济结构的影响与改革对它们的运行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正是通过这些角度，我们对伴随着 1968 年以后的体制运行出现的改革动议与改革的失败进行了评价。

根据改革的内容可以将改革划分为许多类型。例如，可以是经济政策的改革（管理指标的改变、新企业管理方法、工作

关于权力真空与经济管理中的结构变迁和权力变化，见 Csanadi (1985a) 与 Voszka (1984; 1988)。

申请制度的实施），经济管理手段的改革（从指令性计划向间接管理指标转变），经济管理组织的改革（新经济管理机构的建立、新影响领域的建立以及其他机构和领域的转型），经济组织的改革（企业的重新组织、企业的拆分、企业单位的关闭、分支企业的建立），经济活动模式的改革（分小块土地给私人耕作、建立补充的部门、第二经济、发展小工商业），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国会选举中实行差额选举、选举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书记和工会书记时实行差额选举、对当选人实行任期限制、实行连任限制、下放干部任命的权限）。这些改革一般并不是互相孤立的，它们的特点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类型。

我们也可以根据改革对政党—国家体制的自我支持过程的影响来给改革分类，换句话说，改革是否能够创造新的可供再分配的资源？如果能够，又是怎样创造的？据此，改革的模式可以是，例如，资源调配型的（产品结构的变化、企业的兼并、农业合作社的合并、经济管理机构的重组，等等），资源解放型的（实行所得税制度、广泛引进世界市场价格、引进企业税、解散企业、严格执行资源汲取与资源分配的条件、削弱产业部门、引进新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及实行双层银行体制），或资源创造型的（分小块土地给私人耕作、建立补充性的产业、发展第二经济），或是不产生可供再分配资源型的（国会差额选举、干部任命权限的下放）。当然，即使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改革，不同类型的改革也是有相互重叠的。

分析改革的第三个角度是看改革对权力结构及其要素产生的主要影响。以此来看，这些改革或通过调配、或通过解除束缚、甚或通过创造可供再分配的资源维护了体制的运行。同时，随着行为结构、组织结构和职位结构的分化，它们也会降

低依附连线“罩住”党与非党结构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说，它们会使体制发生松动，或者，通过直接削弱结构的基本要素，它们会使它陷入混乱状态。

因此，权力关系的改变是由改革之前的权力结构的削弱引起的，这种改变不一定会使后面的改革导致权力结构发生转型。改革的过程中，权力结构可能更新自己的力量，或权力关系自身可能发生暂时性的或永久性的转型。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结构的状态、取决于内部的权力关系、取决于在释放新资源方面取得的成功程度，等等。^①

把改革的效应通过上面的三种方法区分开来，这只能在理论上做到，它们的目的仅仅在于帮助分析的进行。在实际生活中，这三种效应是同时展开的。这类或那类改变之所以需要和可能，是由现行权力结构遇到的具体问题带来的。每当体制的内聚力因为即定的权力结构在释放新资源方面遇到困难而削弱时，变化的需要和可能就会出现。^② 因此，推动改革的意图是很复杂的。相反方向的意图——维持和改进，会与改革的意图碰巧汇合并加强改革的可能性，就像我们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看到的那样^③ (Antal and Suranyi, 1987)。

实施改革的过程是同样复杂的。没有一项改革措施，即使是意在改良的措施，能够与社会权力复合体的相互交织的结构

后面将讨论不能释放更多资源导致的结果。

这是我们在 Ungarszki 关于经济政策主流的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导致工业部建立的事件——三个产业部门运作职能的取消与合并，就是一个例子，拆分大型企业的计划是又一个例子。一方面，这是限制利润和投资的保证，是经济委员会建立以后中央管理活动的保证。另一方面，这个行动要加强对产业部门和大型企业利益实施能力的抑制，是要加大压力促使它们适应市场 (Csanadi, 1985a)。

和运行分割开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干预手段的取消并没有减弱干预意愿的本身，它只是削弱了使用这些手段的机构的地位而已。因此，体制的运行需要那个机构或另一个机构的干预。取消干预机构不会促进企业的自治，只会导致企业在余下的机构面前更加地无力防卫，导致它们重新寻找机构去乞求资源。通过切断再分配来解除对资源的束缚并不会导致企业积极地去适应市场，反而会导致瓶颈问题、破产问题和就业的发展，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紧张状态拖长、扩散并累积，因为资源的取得没有其他渠道。决策的分权化不会导致企业自治，只会导致地区隔离和对地方的依附。因为自我支持机制“吸纳与改造”了改革措施，通过前面讨论的强制路径把改革措施消化掉，它逐步地把改革中“偏离体制”的要素中立化，把那些将来有助于提高其资源汲取能力的要素保存下来。所有其他的要素都消失掉，或在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化。^①

因此，每一项改革措施可以同时是进化的、维护性的和引起混乱的；从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看，它是进化的；从它对自我支持机制的影响看，它是维护性的；从它对权力结构的影响看，它是引起混乱的。进化是因为，它促进了小工商业部门的发展，扩大了在传统的制度结构里建立横向联系的可能，它带来了更多的结构性的利益、行为模式、所有权关系和价值。同时，就体制运行而言它是维护性，因为它创造了新的可供汲取的资源，从而暂时性地消除了体制再生产的障碍，而又没有改变这种为政治所垄断的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由于它们释放或

前述产业部门的合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Csanandi, 1985a），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银行系统的转化过程（Antal 与 Suranyi, 1987），拆分大型企业的努力（Voszka, 1988），以及对与合作社有关的法律的修改（Teller, 1987）。

创造了资源，这些改革为自我支持机制提供了新的资源，它们重振了体制的内聚力，使资源乞求再度合法化，从而使权力的行使再度合法化，使得这些行为再度具有了合理性。最后，改革也给权力结构造成了混乱，因为分化的程度越高，“罩住”经济组织网络与经济活动结构的难度就越大，从而减少了传统的控制渠道和影响渠道，增加了通过传统的依附连线来实施利益和适应的障碍，而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制度性控制机制又没有发展起来。

因此，从体制运行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内聚力的削弱导致了改革，改革加强了内聚力，在改革的过程中，体制吸纳和改造了改革，从而使得体制在其权力结构发生微小变化的情况下获得了稳定。规范与区别对待的、特殊的工具——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都是为了使体制沿着即定权力结构下即定的权力关系连线保持内聚力，而改革则在权力真空内已经改变了的权力关系上重新创造内聚力。

正是这些资源释放的工具、内聚力的削弱以及内聚力的重塑使得体制具有内在的结构性的弹性。但是，也正是这些工具，通过体制的内在弹性，造成了体制的长期刚性，也造成了体制作为一个整体的持久存在，尽管其中的经济效率是极其低下的。对改革的这种认识，对补贴和征税在体制运行中的作用的这种认识，与那些认为规范管理和改革是绝对进化的过程的观点是不相同的。

前文描述的体制的功能性特性——经济政策决策的吸纳和

这最清楚地体现在科尔奈的推理中。他把改革看作是从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向市场调节的体制迈进的步骤（Kornai, 1989a）。但是，正是同样的措施使得经济管理机构在几十年里维持了同样陈旧的行为模式（Csanadi, 1984）。

体制适应性——既存在于微观领域也出现在宏观层次上。它也体现在决策者表面上精神分裂，实际上顺应体制和具有政治性的思维方式上，例如，在制定一项新的总规则时考虑到那些对豁免的企求。“在制定指标时，你可以感觉到哪儿会出现特殊对待。不断会有人敲门要求作例外处理。有趣的是，这些都是其领导人是中央委员的大型企业。”（财政部，行政官，1977）

同样的结构性运行特征（吸收和体制适应性）反映在各个组织和机构的行为模式上，^① 在经济政策的形成及其实施的模式上，^② 在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的命运上，^③ 或者在莫斯科与东欧政党—国家体制之间运行的依附连线内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的命运上。^④

这些相似性是同构结构运行的结果。相似的过程（不论在宏观层次上还是在微观层次上）在决策上都有一个为结构所界定的非常特殊、重复出现的、同一的行进路线：紧张状态—决策—冲突—承认—适应体制。体制适应的模式（在仍然有内聚

我们发现，最好的例子就在各种经济管理组织（匈牙利国民银行、国家计划总署、财政部、国家物资与价格办公室）宣布的一般目标及其特殊规定上；在财政部最初防卫性后来主动性的态度上：一开始，财政部拒绝一切干预和利益调解的压力，后来认识到避开压力是不可能的，于是它屈服于这些压力并开始积极进行干预。

^② 这里，我们参考一下补贴发放的原则和作法；信贷政策的指导原则和信贷的分配；密切的统计观察在理论上的中立性和其实际影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对其进行行政分配的努力；以及为了所谓的“困难企业”采取的措施。

例如，1980年的价格改革；也在1980年引进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这次改革的开场是三个部门的合并；80年代中期新企业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实施过程；以及始于1968年到70年代初注定要受到挫败的更全面改革。

后者的这些相似性反映在邦斯（1983；1985；1991；1993）关于苏联改革和苏联与其东欧卫星国关系演化的著作上。

力和新创造的内聚力的情况下)总是一样的。它会依据自我支持机制的内在选择过程,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这个自我支持机制是由即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特性决定的。^①

在这个行进线路上,决策者、决策、经济政策工具以及改革是互相依赖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它们创造了政党—国家体制自我支持机制运行的条件,即,体制适应的行为和资源的释放。在这个意义上看,体制适应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固化在参与者“精神分裂”的行为模式里,在决策实践中,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在组织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决策的机制内。

在由结构创造的统一的行进路线上,思考在政党—国家体制还有内聚力的时候,经济政策的活动空间有多大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②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与这个机制相反的个体行为有多大的活动空间的问题,例如自我约束的可能性有多大、成规模的抗拒的可能性有多大、或利用这个机制的可能性有多大等问题,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解答这些问题非常困难,因为决策的展开是由现行的权力关系决定的,由于渠道的

^① Szalai 揭示了体制适应过程的一个方面,他分析了经济管理机构在它们的决策过程(反馈系统构成了决策的结构背景)中“考虑”(整合)较大型企业利益和行为的方式。根据 László Antal 的描述,这个谈判过程的结果是管理和价格的分解(Szalai, 1989: 218)。

^② 机制内抵抗的可能性很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1981 年工业部失败的斗争,当时,工业部极力避免干预企业的日常事务,力争满足不干预的正规要求(Csanadi, 1985a)。关于机制的过度剥削问题,齐奥塞库、斯大林、拉科西等的领导活动,以及苏联黑手党的活动(Vaksberg, 1991)都是例子,匈牙利狩猎协会的运作是一个较温和的例子(Szasz, 1984)。抗拒压力的失败和过度剥削都是机制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我认为这个机制是如 Szabo (1990)描述的,政党—国家体制内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结构背景。

封闭性和隐蔽力量的大量存在，这个过程是不可测量的，并且也取决于结构的状态。

体制的内聚力和内部的弹性虽然把改革的尝试吸收和改造到自己的基本特征中去，但它们也意味着，通过加强反馈，体制能够在自我支持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强制路径，这是体制的长期（持续）选择模式的结果。这些强制路径是由各种压力和利益所创造和再生产的，这些压力和利益又是结构性动机、结构性动机形成的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以及主宰着分配过程的反复出现的选择标准的产物。

第三篇 解体

第四章 自我消耗的过程

第一节 陷阱与结构

维持体制运转与再生产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创造了具有体制特性的陷阱，垄断结构所产生的利益和强迫及这些利益和强迫所造成的行为模式、出现在分配过程中的特有的选择性、选择性的软预算约束及其导致的自我支持模式，这些都同时创造了具有体制特性的陷阱。陷阱之一是体制的运转导致强制路径的形成。陷阱之二是，由于缺乏经济效率的控制，所以没有内生的、基于经济考虑的因素可以控制由政治理性引发的固有行为和利益，从而不能制止自我支持机制的过度运行（over—running）。

强制路径的发展在第三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有关数据表明，分配制度是强制性的，并且不断地重复发生。强制路径还表现在控制特殊待遇的努力毫无结果上，表现在顺应体制的、有选择地限制资源过度利用上。所有这些都是体制适应性过程的一部分。

当权力运行所需要的资源超过了即定的权力结构下可以获得的资源，从而导致资源的短缺时，过度运行就发生了。这里有两点需要着重指出。第一，过度运行不是指当前的状态，而

是指权力运行所不断存在的可能性，是指未来的状态。^① 第二，体制的资源约束是由即定权力关系的现行结构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把这种类型的短缺称为“结构性短缺”。

把由社会制度的一般特征造成的资源短缺（Komai, 1980）与由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造成的资源短缺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后者指的是政党—国家体制里即定的权力分配下可以获得的资源的限度。而前者的一个例子是科尔奈所说的“资源约束的经济”，它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是硬预算约束，所以它是“需求约束的”。然而，上面的这些约束都应该与自然资源的极限区分开来，自然资源的极限意味着与即定国家的社会制度无关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极限。

当体制内出现过度运行时，资源就会发生暂时或长期的、结构性的短缺。过度运转导致同构体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的紧张关系同时发展。这种紧张关系造成了经济政策的实施日益艰难，受到的阻碍日渐增加；决策变得更加集权化；组织结构和职务结构的改变也更加频繁起来，或者，换句话说，它促使体制改变权力分配以发掘新的资源。

权力的内部分配决定了体制特性的资源极限与该国的一般资源极限相接近的程度。在一个垄断的权力结构里，如果反馈的系统高度发达并且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从而利益实施的可能性更大，那么变革的努力就会更早地遇到阻碍；如果权力分配

以下情形在我看来不是过度运行：所使用的资源比当初以为是必要的数量还多，但是在即定权力结构下的权力关系界限内还可以吸收更多的资源；所使用的资源比当初预计的多，在即定权力结构下的权力关系界限内不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但是更多资源的需求可以从外部来源中获得满足。

中反馈的机会很少，利益实施的可能性很小（即，基本网络占主导地位），那么变革的努力就会较晚遇到阻碍。因此，通过改变即定结构来发掘资源的能力在前者比在后者更得多就达到了极限，结果，内聚力的长期下降在前者也比在后者出现得更早。在没有反馈或反馈很少而高度原子化的政党—国家体制中，通过重组来获得资源的能力甚至可以导致该国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例如，罗马尼亚）。

强制路径既在基本网络占主导的情况下发展起来，也在存在经济上强反馈的情况下发展起来。但是，在基本网络占主导的体制下，由于缺乏强大的反馈，过度运行将仅仅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在即定权力结构的框架下，自我支持机制只是暂时性地运行到资源极限。随着运动的严酷性的增加和新运动的不断发动，与此相伴的是一次又一次新的重组努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更多的资源被发掘出来。摆脱强制路径是不可能的，而且这里也没有摆脱强制路径的必要。但是，结构性的动机也在这里创造了陷阱：它们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干预的增加，而随着干预的增加，自由选择的空间就减小了，经济努力的政治化程度变得更高，分配的政治选择性程度更大，体制对外界的适应能力持续下降。

在有着强反馈的政党—国家体制里，增强严酷性和使决策进一步集权化的努力只能在发掘新资源方面获得局部的成功^①，因为随着反馈的增强，运动式的措施是有选择地开始生

关于这一点参见 Soos (1986)，包括后面关于运动作为暂时摆脱日常管理的手段论述，参见 Fazekas 和 Kollo (1985; 1987); Bodo (1985) ；及 Gulacsi (1987)。

效的。^① 如果所实施的措施将增加参与人的反馈的力量，那么这些措施不仅会成功实施而且会实施得超过所需要的强度（自我支持机制的一个正反馈）。但是，如果相反，措施将或者被忽视，或者作出适应现行权力关系的调整（或被“驯服”）。

措施被过度实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1975 年合作社的合并运动，这个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计划进行的时间长得多，并且只是在高层拼命警告以后才停止下来（Bodo, 1985）。（合并之后的合作社越大，合作社本身及其所在地区的谈判能力就越强，就会创造更多的反馈机会。）

体制适应性也有很多例子。其中之一是 70 年代初为了使日常干预合理化所采取的特殊的经济政策。政策的驯服反映在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里。一开始，政策在所有产业部门的管辖范围内得到实施，后来只是在工业部门得到实施，再后来局限在仅仅三个工业部门里得到实施（Csanadi, 1985b; Varhegi, 1986）。1984—1985 年引进企业管理新方法的历史也明显反映了同样的驯服过程，这个方法的目的是增加企业的独立性，一方面，企业自治获得了法律保障，同时，在另一方面，国家机构和地区党组织实际上通过一些附带措施的方法限制企业自主决策的空间。这个时候，企业单位也具有了打破旧形式的可能，通过在地区权力关系下企业脱离旧体制的成功和失败的情况，我们可以观察到同样的体制适应性的一般趋势（Bossanyi, 1986; Csanadi, 1985a; Havas, 1986）。

最后，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一个运动的例子，这个运动在 80 年代企业分权化运动的短暂历史中胎死腹中，事实证明这

参见，例如，Janos Kollo 和 Karoly Fazekas 关于 Győr - Sopron 县劳动市场运动的方法、目标和结果的著作（Fazekas Kollo, 1986; 1987）。

个运动直接损害了一个享有反馈的部门（Voszka, 1988）

在有反馈的系统里，当即定权力结构的框架下对资源的持续吸收遇到了长期障碍时，陷阱就变得不可躲避了。当过度运行变得持续不断，脱离强制路径的努力又一再失败时，系统内部的内聚力就会发生长期的下降。被拖长了的内聚力的损失要求连续不断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在以下条件下实施的：结构性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经济平衡恶化，生活水平下降，利益结构、行为结构和所有权结构日益分化。由于存在着陷阱，所以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系统仍然无法脱离强制路径。

在强制路径发展的内部机制之外和之上，陷阱存在的持续性还因为系统的对外经济关系而强化了，这种关系是这些为政治所垄断的体制所特有的决定性特征，它们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

（1）与西方的政治对立相伴随的是孤立和专制的经济安排，无论是在一个国家的层次上还是在“集团”的层次上都如此；

（2）以政治理性为基础的运转形成了一个自然的障碍，阻碍了经济体去适应和融入世界经济。产品的结构和质量，集团内部的贸易以及内部供给也是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根据苏联的进口需要发展起来的。这些结构作为集团内苏联和匈牙利再生产机制的产物而确定下来。来自西方市场的经济信号迅速地被这些以政治理性为基础的体制的再生产机制所“转变”、吸收

和调整，就像改革所引起的反应一模一样^① (Csanadi and Lorincz, 1992)，这种方式阻碍了它们作出适应市场的调整；

(3) 与上述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特殊的外部约束因素，是与体制运行建立在政治理性基础上的极其敏感而复杂的关系 (Bunce, 1985; Csaba, 1985; Gati, 1990; Fejto, 1991)。源于苏联具有大国地位的这种关系的结构，由于它的同构性，可以通过本书第一部分所讨论的被政治所垄断的体制的结构要素加以理解；这个结构的内聚力及其下降可以通过前文描述的基本运行特征来加以解释。^②

下面的论证将进一步支持这些论断。在这个结构中，交叉连线（代表着基本网络中单向的依附关系）连接的是苏联集团成员国与建立在苏联的政治权力和作用基础上的基本网络，交

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考虑世界经济变化引起对外部门经济危机时国家“暂时地挑起”负担的情形，例如 1975 - 1977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时，中央预算承担了价格上升的后果；还可以考虑后来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引进，以及它通过让世界市场价格所产生的效应有选择地向经济体渗透的方法分担负担的方式 (Falubiro and Galik, 1981; Mohos, 1981)；我们还可以考虑强制性地增加出口的情形，这发生在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和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条件下国家促进出口结构的努力的过程中；或者著名的“帐户行动 (account - action)”，为了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他们计划通过制定计划的办法获得 500 000 美元的赢余 (计划与经济部的主要工业工作组，MI，提交部门会议的报告。主题：1983 年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所提出的要求所作的比较，MI, 1983 年。致国际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团的一封信，2 月 8 日，1984 年，转引自 Szalai (1989: 143))；或者，实际上，我们可以考虑自我支持的机制从西方借来贷款然后在那些有反馈的单位中进行分配等等情形。

对这个主题进行详细分析需要进行一项独立的研究。这里的叙述仅仅是简单的总体假说。我作假设的基础是 Bunce 的文章 (1983; 1985; 1989; 1991; 1993) 中提到的那些经济、政治和社会学分析的结论。在这些文章中，Bunce 分析了与勃列日涅夫改革有关的苏联及其与东欧不断变化的关系，分析了扩张时期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政策，她描述了扩张、停滞和解体的机制与后果，及其引起的反应，这些过程与我描述的结构的一般运行和特殊运行非常接近。

又连线在这个结构中也呈现了出来。集团内的交叉连线渗透到各个国家、各个系统和各个组织的框架里，囊括了重要的战略性的国内职务（No）（军队、内务、外交、党的中央机关等等），囊括了组织结构（Ins）以及沿着苏联的模式创造出来的行为结构（To）（Mezei, 1989）。在这些交叉连线的帮助下，苏联通过国家所有制、原材料的依赖和对资源的需要垄断了分配体系，同时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互助贸易义务、集团内各国的直接投资和出口信贷等垄断了资源汲取的过程。这个结构里交叉依附连线（即，权力的分配）是集权化的。通过这些连线，苏联不仅能够垄断依附关系，而且垄断了利益获取的渠道和选择的标准。正是通过这些连线，各个政党—国家体制里的决策者找到了获得优惠的渠道，发掘出避免资源被汲取的途径，并且在这个背景下找到他们自由决策的空间。

不论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如何都实行统一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结构，加上集权化的交叉连线，这两者使得通过这些连线与苏联相连接的政党—国家体制原子化了，并且，只要资源的供应得到确保，这些连线就能维系它们的依附关系以及它们对维系这种依附关系的兴趣。由于依附关系是垄断的，所以第二篇讨论的自我支持过程在这里也是在结构驱动的行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资源的争夺、乞求，调整和干预的需要、强制和兴趣。在政治性地垄断的网络里发展起来的谈判机制内，隐蔽力量（phantom force），及其相伴随的各个体制通过依附连线发展起来的谈判能力，是由苏联的直接政治敏感性加以确保并通过依附连线发展起来的。从而，一个国家的战略地位，这个国家内持续的政治与经济稳定带来的利益，废除共产党之间合作关系的潜在危险都能成为谈判的筹码（Bunce, 1989; 1993），也就是说，成为成员国的隐蔽力量。苏联对于其谈判对手的隐

蔽力量由于它对权力的垄断而得到了保证，它有能力进行军事和经济干预，还可以“关掉龙头”，即，它可以中断原材料的供应和撤消各种优惠。

垄断化及在其中演化的行为模式被下列因素维持着：国内和集团内的专制，军事依附，东欧各系统中自我相似的内部运行机制。这些系统被连结到了连线的终端，并且是在它们共同（同构）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①

体制的基本特征、权力的内部分配以及为了行使权力而汲取资源的能力所激发的行为模式具有不变的性质，这种不变性为融入西方树起了长期的壁垒。由于同构模式的存在，一个系统承受资源消耗的能力能够维持多久，什么时候它将被迫向世界市场开放以获取新的资源，取决于它自己的内部权力结构，取决于该社会主义国家在集团内的战略地位，以及它在网络内拥有的隐蔽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同构性造成了下列因素对成员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苏联权力体系的运行，它在其内部权力分配的约束下汲取资源的能力，它对在结构性资源短缺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寻求西方资源的需要，以及成员国支持相似的行为模式的部分。

由于模式的同构性，70年代末的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压力同时出现的结果：（1）位于社会主义集团权力结构顶端的

^① 1956年以前，匈牙利的垄断化及相应的行为模式的直接保障是所谓的苏联顾问结成的网络，他们散布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家机构里，在1953年以前一直有广泛的权力，但其后就减少了（Csendes and Gellert, 1993）。（1953年他们管辖权的减少与当年斯大林的死亡有关，由于他的死亡，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准备以及在西方前线建立堡垒国家的战略和工作就被放弃了；与此同时，苏联内部有关军事力量的战略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是赫鲁晓夫战术思想的变化所引起的（Janos Szanto 上将，社会学系主任，军事科学院，布达佩斯）。）

苏联内部；(2) 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以及(3) 各个国家自身。由于这个同构结构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压力也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不同的压力之间是相互强化的。

(在这个过程中，苏联的角色既是一个系统又是集团内资源的垄断者和分配者；而其他各国则既是一个系统，又是集团内资源的乞求者。)

开放过程中同构的相互依赖性可以描述如下。苏联内部机制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资源约束，因此，由于它本身的结构性资源短缺，作为集团内的分配者，它的运行和对权力的行使变得更加困难了。由于各个成员国的内部机制也遇到了相对的短缺，作为集团内资源汲取者的苏联的效率也下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集团的自我支持机制同时碰到了结构性的障碍，从而各个政党—国家在集团内索取资源的成功率也变得不确定了。

开放以后，在政治性选择标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要用市场的标准来衡量了，衡量的结果是它们都很不合格。同时，西方市场的衰退、需求的减少和由此引起的竞争普遍地更加激烈，这些都恶化了它们的形势。出于政党—国家体制内部自我支持机制的运行和为了符合西方标准所作的出口产生的进口需要，它们被迫进一步向西方市场借款。^①

在政党—国家体制内，由于结构性动机的存在，干预、资源汲取和乞求的被迫性即使在它们遇到严重的资源短缺时也不会停下来，与这种变革相关的浪费资源的行为模式不会停下

^① Istvan Hagemayer (1975) 的文章谈了开放政策及其后果，谈了国内部门对其效应的躲避；Sara Pasztor (1987) 的文章谈了经济开放和强制路径与开放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

来，对此时从西方获得的资源进行选择性地分配的强制路径也不会停下来。^① 由于这个原因，在利用这些资源的过程中，权力结构的僵硬程度并没有减轻，出口生产并没有变得更有竞争性，生产方面没有发生结构性的调整，而对从西方进口的利用却因为这些国家的开放和出口的被迫性而增加了。（Antal, 1985; Koves and Oblath, 1981 ; Pasztor, 1987; Csaba, 1985）。

各个国家形成了双重的依赖：一方面，依赖苏联的原材料；另一方面，依赖西方的贷款和进口，由于同构结构的相互依赖特征，它对集团成员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成员国来说，债务的增加、为了满足原材料进口需要满足苏联的资源需求，以及偿还到期债务的义务，导致了内部的不稳定。系统的内聚力逐渐下降。由于各个成员国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日益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需求的不断增长，苏联的内部稳定也开始受到了威胁。这个形势还因为内部的资源汲取遭遇困难的同时，苏联对外的资源需求仍逐步上升而进一步恶化了。^②

由于内部机制是自我相似的（同构性），解体的过程在各国独立但平行地发展（Csaba, 1985; Szamuely, 1986），与此同时，由于集团内的依赖关系（即，这个同构结构的特殊性），

一个例子是 1975 年到 1979 年间匈牙利国民银行创造和分配的为出口产品的增长进行融资的特殊信贷（Greskovits, 1986）。

^② Antaloczy 在谈论经互会内部谈判机制解体的文章中对这个过程作了有力的分析。她认为，1987 年初情况就很清楚了，继续保持经互会系统早年的合作形式是不可能的。苏联越来越频繁地宣布，以早期的条件进行能源和制成品的交换对它是不利的（这是上面提到的内部困难及其对苏联在同构的框架下保持对外分配的影响的实在表现）；对于匈牙利来说，对苏的可兑换卢布的盈余日益成为负担，它们实际上成为匈牙利对苏联的无息贷款（这就是我们在强调更强烈的汲取时所指的意思）。结果，匈牙利的金融措施变得更加严格，但是以管理人员希望企业借此避开不利后果的方式实施的（见体制适应性）（Antaloczy, 1994）。

解体的过程又形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① 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同构结构和它的特殊特性早期释放的益处和解体的过程中使苏联以及它们自身陷入了深深的陷阱（Bunce, 1985; 1989）。由于自我相似的结构性原因，这些机制一旦建立就会自我运行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同构结构的特征了解体的过程也产生了影响。

由于同构特征的存在，一系列的陷阱增加了内部改革、外部撤退、资源节约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连线的松动，同时减少了隐蔽力量的压力。但是，由于权力的内部分配各有特点，所以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其进程是不同的。在这个过程中，在反馈占主导的体系里，内部与外部资源供应的减少削弱了内聚力，从而增强了改革的努力。^② 另一方面，在反馈不够强大的体系里，可用资源的减少将导致内省，导致继续强制性地抽取资源，并由此导致紧张关系进一步增长。

在有着强反馈的体系里，一轮又一轮新的改革并不能更新权力结构的内聚力，而是实际上推进了它的崩溃。由于在资源创造方面存在着困难，意在保持自我支持机制的改革的效果减弱了，而它们使结构松动和使秩序破坏的效应却增加了。由于这个原因，同时由于权力关系不断的内部重组和强制路径的继续存在，改革造成了内聚力的持续下降；并由此导致了体系的解体，因为改革促使体系的活动和制度构成、利益关系、行为

这个同构性的具体属性和这些政党 - 国家的地理位置合起来可以解释，一方面，尽管各个国家的运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在解体过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同，但集团的所有国家都同时崩溃了，另一方面，集团外的、地理上遥远的那些国家，如中国、古巴和越南，它们的运行和内部权力分配也非常不同，但它们没有崩溃。

^② 关于债务与改革的互相关联的关系，参见 Salgo (1989)。

模式和权力关系发生分化；改革还导致传统的利益获得渠道逐渐失效。

同构结构的特殊特征（相互依赖）造成的结果是，这些机制不仅引起了它们自身的解体而且互相引起对方的解体。由于各个结构权力的内部分配不同，引发解体过程的各个因素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总体上也导致了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解体和崩溃。下面描述的是匈牙利体系的解体过程。匈牙利的基本网络是比较分权化的，同时存在着比较丰富的、有着强大的经济后盾的反馈。

第二节 日常的限制

由于没有适应外部约束的必要，1956年以后演化的匈牙利权力结构，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制直到1976年都运行得非常平稳，但是在此期间，它消耗内部和外部的资源供应。在1975年到1979年间，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低利率政策使得匈牙利很容易获得西方的长期贷款，这些贷款在为匈牙利以政治理性为基础的自我支持机制的再生产提供资金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几个因素标示了枯竭的进程：日益频繁地过度运行超过了苏联资源供应的极限，为了利用西方资源非常有必要适应外部环境，同时在解决为适应所作的努力相关的困难时，日常的、即定体制内的措施持续失效（Antal, 1985）。因此，从1985年起，匈牙利开始了明显的解体。

下面，我将从强制路径的运行的角度，强调在枯竭期间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解体刚开始的时候重要的经济决策。首先，我将阐述紧张关系是怎样在自我支持机制过度运行超出了边界时，即，发生结构性资源短缺时——表现自己的。其次，我将

概括这种过度运行是怎样导致经济决策作出普通的日常反应的。第三，我将指出常规措施不断失败、债务增加、摆脱资源短缺无望时出现的转折点，它迫使变革成为头等大事。最后，我描述下述情形，逐渐的资源短缺首先引起了权力关系的变化，然后导致了实际的改革步骤，随着资源短缺状况将减轻的前景的出现，改革的范围也缩小了。^①

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的解体始于 1978—1979 年。^②正是这个时候持续的过度运行的信号开始呈现出来。它们是：

(1) 大约在这个时候，苏联贷款和西方贷款不断涌入的局面结束了。

(2) 这个时候标志着进一步获得西方贷款遇到困难的开始，这个困难的背后实际上是苏联在汲取内部资源和向西方开放方面遇到的困难。不仅如此，正是这个阶段，匈牙利开始进入了债务偿还的时期。

(3) 大约在这个时候，经济政策的领导层被迫公开承认经济领域的产品结构调整纲领失败了，^③而增加从苏联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内部和外部障碍又非常多。

(4) 也是在这个时候经济政策领导层被迫改变工作重点。经济平衡取代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第一要务。这对再生产机制的资源汲取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 正是在这个时期，作为对资源短缺和结构性问题之反

关于这个时期深入的经济分析，参见 Antal (1985)。

^② Antal (1985) 认为这一年是转折点。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匈牙利长期对外经济政策和产品结构的发展的指导原则的决议，10月20日，1977年。1977年12月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会议公告，发表于《1975—1980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议和文件》(布达佩斯：Kossuth Könyvkiadó, 1983)，第662和630页。

应的日常对策变得不再有效，因为发达的权力结构已经使得这些决策不再可能得到连贯的实施。这些日常反应包括加强约束、加强决策的集权化、经济结构和管理的转型，以及（或者）注入新资源以推动结构转变。最后

（6）抽取剩余资源的不可能性的前景导致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实施，这反过来加快了经济结构内活动、组织、职务、所有权、行为和利益的分化步伐。^①

与过度运行相联的紧张状态在经济管理和决策领域很早就被人们看到了。实际上，早期的政治—经济路线的动摇就可以从官方文件对这个效应的直接和间接提及分辨出来。

这可以追溯到 1977 年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内容，该决议谈论了前一年的成败。决议认为，贸易条件比计划的预计恶化得多，投资的增长快得多，消费也超过了预期，而且“有效地改进生产发展的进程并没有出现”。^② 因此，不可能用内部资源来弥补不利的效应，而：

由于贸易条件恶化所产生的一大部分亏损被国家预算暂时承担了。……因此，我们只有比预计的更多地使用外国资本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内部平衡。^③

文件反应了旨在加强严重削弱的内聚力方面作出的日常反

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商业开始出现，第二经济开始发展，最后以世界市场价格的逐渐渗透为基础的价格体系被引进，接着开始了双层银行制度的发展，引进了新的企业管理体制，发展了收入税制，制定了新的集会和社团法，等等。

^② 1977 年 12 月 1 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 1978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指导原则的决议，《决议与文件》……如前所引，第 630 和 632 页。

同上，第 630 页。

应：实行紧缩政策（预算约束），收紧再分配，改变管理和人事，等等：

（1）他们要求更严格的工作纪律；

（2）他们要求完善调节器，同时认为对 1976 年引进的管理体制“进行根本和深远的变革是不必要的”；^①

（3）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提到的政府行动纲领宣布，对投资的缩减实行差别对待；^②

（4）1978 年 3 月中央委员会对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作出了评估，要求注意把中央决议与地方的特殊条件结合得不够的问题，注意抑制不统一的必要性，注意表达不同意见或个人观点的危险性，注意正确理解操作性问题（即，他们对非党组织加以干预的正确程度）的必要性；^③

（5）为了减少地区利益的差别和规范大型企业的行为，大型企业的核心党委会对各个工厂的协调权得到了加强；^④

（6）对国家、社会和政治职务进行了人事变动，它们在内聚力下降的过程中被削弱了。这些职务中首先重组和重组力度最大的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经济政策委员会，以及党组织内与经济政策事务相关的职位。^⑤

这些文件表明，陈旧的老办法已经不行了。到 1978 年初

“关于 1978 年进行经济管理改革的建议”，国家计划总署 - MF SPC 联合报告，1977 年 8 月。

② 1977 年 12 月 1 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决议……如前所引，第 639 页。

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建工作组对党内工作方式和方法的一些现实问题的意见（1978 年 3 月），见 1983 年，《决议与文件》……如前所引，第 364 - 368 页。

④ 1977 年 12 月 5 日主席团决议，见 1983，《决议与文件》……如前所引，第 644 页。

⑤ 1978 年 4 月 19 - 20 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参见以上，第 756 页。

为止，资产流动性的持续下降和经济领域里的过度运行再次成为各种问题的一个重要源泉。过度运行引发的问题——例如资源短缺、预算赤字、选择性的软预算约束、投资过度、高水平的消费、固定资产增长、比预计少的出口增长、比预计多的进口增长、巨额外债——全部都是自我支持过程中的选择性和行为模式的后果。

然而，报告没有看到是机制本身造成了这些问题，它们没有寻找问题的根源而去谴责那些表面的症状。让我们看一下几个例子：“管理部门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前后不够一致”；“党与国家的干预太多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内和国家与党的领导机构内重叠的职能太多”；“决策过于集权化了”；“权力机关对来自下级的压力过于软弱”；“官僚机构阻碍改革”；“特殊利益压倒了国民经济的利益”；“中央的无数任务只有在牺牲其他任务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统一（规范）的管理措施制定得很糟糕，补贴太多”；“价格体系没有作用——它没有提供足够的动力”；“经济激励的效率不足”；“大型企业太多，小型企业太少”；“企业不朝满足市场需要的方向调整”；“权力机关的专业水平和工作作风很差，工作作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腐败盛行”等等。

问题的发现引出日常的反应：必须减少投资需求，必须采取普遍的措施改善经济政策和经济机制，必须减少补贴，在进行选择性地分配优惠待遇时要更加严格地开展工作，并且要求更大范围地使用更可兑换的货币基金：

1977年出现的趋势迅速发展：生产和国内积累持续地快速增长，不以卢布计算的外债继续快速增长……外贸增长减少了……委员会认为今年再增加税

费是不合理的，但同意采取措施约束各种补贴的发放和其他优惠的给予，这应当能降低投资能力并引导企业放弃没有效益的投资项目改进投资的效益。但是，这些措施还应当在不增加需要特殊待遇的企业数目的条件下实施下去。^①

1976—1980 年间国民经济的发展表明，我们的对外经济形势比第五个五年计划预计的发展较为不利……我们的所有外债都是可兑换货币计算的……为了解决用可兑换货币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日益增长的矛盾，必须在经济政策领域和经济机制上进行良好的协调工作和采取全面的补救措施。为了能够成功地实施重建经济平衡所需要采取的措施，新的长期的可兑换货币的贷款是不可缺少的。^②

但是，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过去熟悉的道路和方法已经没有用了。经济结构的僵化、为赶上新形势采取的结构政策的失效、资源的短缺、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赤字、继续应用苏联贷款以弥补对苏贸易中恶化了的贸易条件的前景的消失、为能源进口的增长进行融资的资源缺乏以及对本国可能失去以优惠利率从西方货币市场上获得贷款的担心，所有这些都迫使领导层采取更坚决、更有力的经济政策措施 (Antal, 1985; Csaba, 1985; Csanadi, 1985a)。领导层不得不面

^① 关于实施 1978 年国民经济计划头三个月的经验的报告。1978 年 5 月 22 日 EPC 会议的材料，由经济政策部 (DEP) 的官员撰写，第 21 页，MF (M. Cs.)。

^② 《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金融形势的发展前景与我们同国际金融组织关系的发展》。1978 年 5 月 22 日 EPC 会议上的材料，由 MF 和 HNB 官员撰写 (M. Cs.)。

对几年来的经济失败。人们被迫抛弃过去根深蒂固的观点——保持持续增长的能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的、固有的特征（Bauer, 1982）。

第三节 激进的紧缩措施，战略重点的变化与体制适应性

到 1978 年下半年，提交给政治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基本上都讲到两件事情，一是到目前为止所用的手段是不够的，二是必须改变战略重点的先后顺序：

经济发展的失衡迫使 1979—1980 年的经济政策作出改变。各种改革建议的实质是对各个经济政策目标的轻重缓急重新评估。恢复经济平衡和把可兑换货币的债务在短期内下降到一个安全的水平上将是绝对的第一要务。经济增长步伐及……那些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关的目标必须作出调整以确保第一要务的实现。^①

这个认识也反映在国家计划总署提交给部长会议的 9 月报告里。尽管报告反复强调要改善经济管理，但是这个文件还是对计划的目标，对 70 年代中期以来实施的经济管理方法和采取的经济政策提出了质疑：

^① 提交给 EPC 的关于前 6 个月国民经济发展与 197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经济政策思想的报告，1978 年 8 月 14 日，DEP63/a/8 (M. Cs.)。

我们不应当继续采取事后认可的方式，它使我们一年比一年更偏离计划，每一年都在上一年修改过的基础上制定下一年降低了要求的计划...从 1979 年起（根据现在的估计，它甚至还可能持续三到四年）应该对经济政策领域和管理组织的行为方式方面作出重大的变革。^①

解决这些问题（降低由于过度运行所引起的紧张状态）所采取的战略，其目的是重新组织权力结构，发掘新的资源。把决策集中起来，抑制体制的结构特征引致的行为模式。采取措施对再分配进行严格的控制，一方面减少被迫进行干预的情况，另一方面避免要求集权化的压力，减少要求再分配的压力；换句话说，就是减少“资源乞求”的频率。（中央委员会正是想通过这些措施来削弱而后普遍控制反馈系统。）此外，它们还使得那些政治谈判地位一直就较弱的地区和部门的状况逐渐恶化下去（例如，社会、医疗保健和教育部门就是这种情况^②）。但是，这些事件都是沿着我们所熟悉的、反映政治理性的精神分裂的行为模式发展的，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过程：规范的决策——对约束的认识——个别对待。实际上，引起体制适应性过程的精神分裂的行为模式（schizophrenic behavior patterns）甚至也发生在改革目标是摆脱强制路径的时候，或者，换句话说，在目标是避免要求特殊豁免的时候也发生着精

给部长会议的报告，国家计划总署，1978年9月4日，第2页与8页（M. Cs.）。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领域里运行的正是这种“资源节约机制”，为了减轻负担，他逐渐撤出阿富汗和东欧，最后宣布不干涉的政策。

神分裂的行为模式。所有这些都表明自我支持过程，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强制路径和体制适应性过程的运行是不变的。下面我们看看这个过程的一些例子。

可以想见，对紧缩政策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企业部门：

中央领导人推动实施自己的措施时，它们需要“保卫”自己……很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在熟悉了变革措施以后，企业会给政治、社会和国家管理机构施加非常强大的压力……以便自己能够不必执行（那些措施）^①

对来自企业部门的压力感到担心是有原因的。那时，政治局早就有了一份报告，是国家计划总署和财政部根据 1977 年 10 月 20 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起草的，^② 该报告指出了经营效益低下的 80 家工业企业。^③ 这些企业中的一部分享有强大的反馈：其中的 64 家是国有工业企业，其中的 41 家或者是生产军事用品的企业和出口苏联的制造业企业，或者是在国内市场的供应上占有垄断地位并且是各自部门内最大的企业；在这

给部长会议的报告，如前所引，第 9 - 19 页。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匈牙利长期对外经济政策和产品结构发展的指导原则的决议，1977 年 10 月 20 日见《决议与文件》（1983）——如前所引 第 561 页。

政治局在 1978 年 11 月 20 日讨论了这份报告并作出了决议。报告中，委员会指出了三个类型的效益低下：（1）利润水平等于或低于它们获得的中央补贴的水平；（2）企业层次上看不出效益低下，但企业的出口活动是无效益的，而出口占其总销售的份额很大；（3）不包括中央补贴的年收入没有接近期望的水平（与固定资产相联系的利润率大大低于部门或行业的利润率）。（MF 关于效益低下的企业的报告，1978 年）（M. Cs.）

80 家里，有 9 家是县建立的工业企业。这 80 家企业的领导人中，5 人是中央委员，另有 8 人（如果把其中一些工厂的领导人计算在内，则为 12 人）是县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企业的大部分在它们所在的各个县里都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只有 19 家企业的领导人是中央委员，57 家企业的领导人是县执行委员会委员，那么它们的特征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些企业的特征与进行选择性的再分配的标准是相符合的。

这些企业获得强大的隐蔽力量的原因在于这个结构的具体特征，对效益低下和亏损企业的生产采取的措施和紧缩经济政策导致了一系列紧张关系，这些可以预见的紧张关系又给企业带来了暗藏的力量。隐蔽力量的显性化和经济紧缩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宏观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对付无效益行为的措施显然是“逻辑上分裂的”，在我们考虑所推荐的紧缩措施可能遇到的反对时尤其如此。由于要与结构的特征保持一致，所以造成无效益活动的原因主要在于企业以外的因素，是企业所不能左右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甚至无法通过中央决策加以影响（价格、社会主义的偶然事件、军事生产、产品分配、为列入中央计划须承担的义务、供给责任、效益低下的出口，等等）。然而，这早已造成被迫对企业进行个别对待的局势，换句话说，也是被迫陷入体制适应性的过程：

必须记住，经济条件的变化会使一些企业管理人员把效益低下的活动归罪于企业以外的因素，使他们寻求不合理的中央补贴来解决问题。在这种形势下，

政治上安全的解决办法是一贯地反对这些压力，把合理的补贴与是否满足清楚界定的条件联系起来。

当企业和经济单位不能在合理的中央补贴的帮助下利用自己的资源改善自身的状况时，当它们不能适应进一步的发展时，在必须结束经济单位运行的问题产生时，就会产生政治问题。^①

行为分裂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政治局准备的报告把当前的经济形势归咎于经济管理，归咎于经济管理过程中决策者的行为模式，归咎于这些行为模式所造成的决策体制。^②这就出现了另一个两重性：虽然报告谴责了决策体制，但是在现行的垄断的关系中，依靠同样的决策体制来克服压力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报告认为党的机关是问题的关键，它既是措施实施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又是压制住由下至上压力的缓冲器，这并不是偶然的。在预备要克服强烈反对的经济政策战略中，抵挡持续压力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为经济政策工具的地区党委会应该成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的同盟，而不是成为“保护”企业利益的工具。^③在限制地区党委会利益实施活动的同时，可以预见，企业压力的一个重要调节者就被消灭了，从而削弱了企业部门的谈判力量。同时，可以预见，党委会自我审查的行为将使自己成为经济管理组织进行选择的工具：

给政治局的关于经济实体活动的评估报告。关于对付低效益企业和合作社应采取的措施的建议。1978年11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谈论，第18和19页（M. Cs.）。

同上，第4和18页。

国家计划总署提交给部长会议的报告（CM），1978年9月4日，第24页。

随着预料中的大量的豁免要求的出现，职能部门必须制定一套统一的，具有良好的意识形态基础的行为规则，但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承诺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地方党组织也要提醒更高层次的党组织注意一些问题（并且仅仅是注意这些问题），事实证明，即便得到了地方的全力支援，企业也付出了全部的努力，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地方的层次上得到解决，这就需要中央的干预。^①

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作出的政治局决议保持了与上面描绘的体制运行方式的一致性，对问题中各项事务的政治紧张状态作出了典型的两重性的反应：

(1) 政治局决议列出了可以采取的暴露和解决效率低下的原因的合理措施。

价格与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补贴的抑制，一些生产活动或生产单位的终结，对无效益的出口活动的抑制，在严格的效率考虑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投资的抑制。实际上，如果所有这些都证明是无效的……监管组织以及他们建议的其他国家机构也非常需要各种帮助才能终止有关的企业。^②

^① 国家计划总署提交给部长会议的报告（CM），1978年9月4日，第16页。

^② 1978年11月28日关于经济组织活动的评估和关于解决低效益企业与合作社问题的建议的决议。第7页（M. Cs.）。

(2) 同时，考虑到造成当前形势的各种原因与为了消除无效益状况要作出的牺牲，出于国内供应、国际义务和国防需要的考虑，必须继续保持对一些企业集团实行特殊对待。

因此，一方面，决议强调要严格考虑效益问题，另一方面，对某些企业的问题的解决却提交给更上级的国家与政治决策机关，从而使它们不必执行普遍的规则。通过这种方式，决议为那些能够挑起政治敏感问题的企业创造了反馈的可能性，同时，消除了发生激进变革的一切可能性。它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平台；由于跟过去的作法是一致的，它削弱了解除压力的能力，通过准官方的利益实施渠道，它把压力制度化了并认可了压力的合法性。正是这种方式，使得起初意在提高市场力量作用的措施变成了通过更多更深的反馈来重新干预和加强强制路径的工具。

这个决议不再提起企业的关闭，然而它提到，国家计划总署和财政部应当在与相关的监管部门、相关的利益团体和其他组织协商后提交一份报告，详细阐明在全部经济领域内展开一场行业和企业的削减开支运动的最好方法，这份报告应当提交给政府，如果必要，还应当提交给相关的政治组织。决议提出，大规模的开支削减必须在国民经济计划的框架下进行，国家计划总署将在确保开支削减运动符合计划方面承担起主要的任务；国家计划总署的主席和财政部长要定期向政治领导机构报告取得的成果；部长会议要密切监督无效益企业的状况，要对那些效益之低下已经影响到整个生产形势的行业部门提出必要的措施。关键

领域（纺织工业、制鞋工业、食品工业和食品加工工业的各个部门）的形势和预备采取的措施应当报告给经济政策委员会审议。停止无效益的经济活动和监督其执行的任務将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生产和出口效率状况的分析，关于未来任务的分析，将通报给县党委，但不通报给企业。^①

因此，在被政治所垄断的网络里，为缓解紧张形势制定的紧缩措施，以及为躲开抗拒这些措施的压力所作的努力，都同时伴随着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是通过增加受信任的机构进行的干预以及通过重组企业的依附关系来实现的。

一方面，决议把过去国家机器也追求的实行个别对待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机器里。通过这种方法，中央委员会能够控制住过去仅仅属于国家机器管辖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委员会要考虑的政治问题包括的范围更广了，所以它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渗透器，通过这个渗透器地区党组织能够把判断各个问题的政治严重性的事务提交给中央委员会。所有这些都对那些有能力通过各种连线建立反馈的企业有利。

在施加压力的过程中必须有更强的选择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和地方党委在指导经济政策时增加干预。由于选择性的增强，经济单位对问题移交的依赖性更大了，地区政治组

^① 1978年11月28日关于经济组织活动的评估和关于解决低效益企业与合作社问题的建议的决议。第24页（M. Cs.）。

织对本地的指导也增加了。这些措施根本没有使得经济活动摆脱强制路径，反而导致了加倍的强制路径。

1978年12月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决议可以看出中央所作努力的政治化方面。^① 决议否定了到那时为止实行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政策实践，而且并不掩盖形势的严峻性：它宣布将在好几年内实行紧缩措施（限制投资活动、提高消费品价格、建立一个考虑世界市场价格的价格体系、限制进口）；它强调造成当前形势的共同责任，强调必须建立统一的行为模式；同时，为了实现经济目标，而不是各个经济部门自己的经济利益，决议呼吁党和国家的决策者要保持崇高的道德：

国家管理机构、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应当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持那些用恰当的行动和创造性解决任务的领导人、合作社以及行为方式。让他们制止那些由于少数经济组织的不利形势和社会政治紧张状态导致的对中央的措施、经济政策及经济管理的不信任。

他们应该制止企业得到不合理的让步。要采取坚强的措施打击自私的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只有符合严格的条件、符合解决长期问题的纲领的情况，才可以向中央寻求支持。得到这种援助的企业领导人不应该得到党或政府颁发的道德认可证书或奖金。^②

^① 1978年12月1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的指导原则的决议，见《决议与文件》（1983）……如前所引，第901-914页。

同上，第925到926页。

激进的紧缩措施的实施实际上给经济管理机构加重了负担。1979年初执行组织经济活动措施的要求增加了指令的数量，也增加了各部门干预的强度：它导致了对各个企业的研究、消费管理的紧缩措施、对具体企业的罚款、对企业层次的储备水平的监管、个体区别对待的罚款、对能带来可兑换货币的物质资源所占比例的审查、对用可兑换货币进口的商品的使用的监管、逐个审查是否可能用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口来替代使用可兑换货币的进口、个体化的能源节约计划以及个别地对所有这些情况向上级报告。

但是，相关的产业部门并不满意日益增加的进行干预的需要。经济形势在逐步恶化，干预的结果只能非常缓慢和非常零散地满足中央领导人的希望，他们在寻求解决紧张状态的办法的过程中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对产业部门管理的不满增加了，产业部门的谈判能力下降了：它们受到没有足够有效地执行措施的批评，同时作为紧张状态的结果，它们的利益传导行为变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在实行紧缩措施的一致努力的过程中，产业部门以它们的显著地位与企业部门和党的机器一起，变成了权力结构中阻挡管理措施之加强的第三个障碍：“情况表明，经济管理过程中对经济活动的组织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管理机构对企业的管理仍然非常松动。”^①

因此，中央领导层一方面极力寻求有效地执行措施的方法，另一方面又在克服障碍的时候求助于一套新的常规措施：管理决策集权化，同时重组管理部门的作用。当前的权力关系不起作用，是因为由于内聚力的下降，早先的经济政策路线已

关于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实施有关的事项向CM作的报告（国家计划总署，1979年5月），第4页。

经行不通了。伴随着这条政策路线的明显失败，由这条路线所滋养的那些企业的地位就削弱了。

由于这种双重的削弱，产业部门也逐渐失去了依靠，因为它们的隐蔽力量的源泉被削弱了：大型企业的前景突然变得很不确定，过去支持它们的经济路线已经垮台了。正是权力关系的这种改变为权力的重新组织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些产业部门的管理权力被分解归并到 1980 年重新建立的国家物质与价格办公室和经济委员会。所有这些都为决策的进一步集中和即将来临的三个产业部门的合并奠定了基础（Csanadi, 1985a）。下面摘录的一段采访道出了这些变革的动机：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经济在脱离轨道，无论我们花费多少国民收入，都见不到经济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年复一年，我们并没有按照五年计划的纲领前进，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种平衡都处在倾倒的危险之中，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资源的消耗飞速增长，日复一日，产业部门继续向它们管理的企业拼命供给资源。我们实际上已经碰到墙壁上，没有地方可以走了。这迫使决策者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达成某种改变，以使这个地区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想法与机制的发展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完全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当然，它后来适应了基本的指导路线，并迫使这种决策得以实施。”
(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官员，1981年)

第四节 资源枯竭与改革的推动

根据政治局委员会的命令，与紧缩措施同时进行的是一项分析工作，在政治与政府的最高层分析经济管理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一方面，这些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肯定了采取紧缩措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们把危机局面的出现归结为经济决策和管理体制的整体运行。下面摘录的采访与驱使委员会作出结论的形势有关：

“我相信这个报告与以前的报告有很大的差别，过去我们总是仅仅谈到管理混乱的问题……但这一次我们接到了考虑一切因素的要求，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除此之外，我们感到了压力，即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有不同类型的担心和不同类型的问题等待解决。我们不得不面对经济管理的整个体制，去衡量一下它在实际上是否能够用老的方法、组织、手段和权限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整个研究工作背后的推动力。”（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官员，1980）

把问题集中到改革的阻力上而不是实施紧缩政策的阻力上，就必然会发现一批比管理本身范围更广的结构性问题：

充分的企业自治及其相伴随的责任没有发展到适当的水平，中央管理的效率没有改善到人们希望的程度。企业自治明显地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制约：

·组成中央经济管理和监督机构（产业部门和职能部门、地区与中央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分散网络的各种决策；

·企业内政治与社会组织的活动；以及

·经互会内部联系的特点，它的制度，它运行的方式和方法。

经验表明，在即定的条件下，对经济决策后果负责的责任感已经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获得超出了合理水平的保护。……有时，糟糕或错误的思想造成的消极后果可以通过经济决策转移给整个国民经济。^①

在经济政策部提交的讨论协调经济政策的目标与手段的报告中，也谈到了理清产业部门角色的问题，谈到了它们的组织结构和它们的人员膨胀的问题。^②事实上，除了产业部门以外，还谈到了职能部门和国家计划总署的问题。不过，报告的意向是要加强国家计划总署的作用，以及建立一个更高层的组织（经济委员会），以改善中央决策的协调性：

“决策常常导向不同的方向，协调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比人们期望的低。因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花园耕耘……政府官员并不是在‘用一个声音歌唱’。

关于经济政策的评估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的考察（经济政策部，1979年2月6日），第3页（M. Co.）。

^② 同上，第12页。

这就是分割高度集中的、过度协调的政府结构的思想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我们将通过国家计划总署这个政府委员会来组织计划和长期的决策，我们将有一个委员会来协调更重要的措施：经济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官员，1980年）

在评价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的同时，出现了理清角色的必要性：

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经济管理中的任务必须加以分析（如果有必要，应该加以重新界定）。由于它们担心与必要的经济变革相伴随的社会紧张状态，它们将力图把经济状况的稳定提升到一个不合理的水平，从而维护局部的（而非全国的）利益，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政治领导层必须为解决地方政治冲突作好准备，或者，我们必须理清什么应当视为是“政治的”（简单、局部的利益和可能的较容易的解决方案常常被提高到政治的高度）。^①

在这些紧张状态下，改革者和那些要求紧缩的人的不同动机同时出现。所有的关切都认为产业部门的合并、大型企业的解散和对党委会利益调解功能的限制是达成他们各自目标的必要措施：保守派想通过这些实现集权，改革派想通过这些促进市场导向的调整。然而，在通往不同方向的努力和活动的背

关于经济政策的评估与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的考察（经济政策部，1979年2月6日），分别在第14页和第12页。（M. Cs.）

后，人们可以看到的正是权力关系的转化。下面摘录的反映改革派观点的采访体现了这一点：

“这些争论使人们注意到，组织问题必须解决，目前的管理概念必须加以改变。权力关系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每年的 12 月中央委员会都要开年终总结会。一年一年地过去，等待已久的变革没有实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削弱了那些早先主张这些措施的人的权力。我们被迫承认庞大笨重的巨型组织不能解决大型企业的严重问题及其相关的紧张状态，我们被迫承认，与早先加强集权的措施相反，我们应该加强分权。对经济管理负责的机关的高度集权没有使我们获得进步。在许多领域，不同的派别互相争斗，所以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意见。经济状况不支持保守派的观点，因此，是改革路线和那些主张实行灵活的经济管理的人占了上风。（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官员，1981 年）

报告在谈到内部和外部失衡的同时指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79 年 2 月政治局收到了中央委员会的经济政策部提出的观点。在描述未来可能汲取的新资源的主要前景以后，文件建议应在战略重点的轻重缓急的调整和改革的问题上作出政治决定：

我们外债的比率和规模已经变得非常关键。1979 年引进的贷款（中期与长期贷款）甚至已经不足以我们的还债义务融资了，而在当时我们认为足

的、现实的。……1978 年底，我们的国际储备还能维持三个星期的支付。今年 1 月储备又减少了 3 亿美圆。……我们的还债能力已经变成必须依赖于我们借入短期贷款来弥补支出的能力，……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还债数量是我们出口收入的四倍。这使我们的经济非常脆弱，如果出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的原因，我们暂时无法从西方借入贷款，那么我们将根本无力还债^①

综上所述：“当前，我们不能指望有限的借款能力能缓解我们的金融问题。基于这样的金融现实，我们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二者都需要作出政治决定。”^②

这两种选择是，要么从苏联获得硬通货的贷款，这已经被视为不现实而被排除了；要么引进西方资本，这就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作出重大的变革。人们认为，匈牙利可分配的国民收入和经济政策应该依靠能够引进的外国资本的净数量（首要是用于还债）

到那时为止实行的经济政策与这个结论是不一致的，因为制定那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刚好相反的。在 1978 年评估金融形势时，评估和制定国内目标的基础不是外部约束的硬化，而是以增加国外贷款、实现预定的国内目标为出发点的。同时，与资源扩张必要性相关的论点和体制内谋求更多资金的资源乞求

^① 《关于匈牙利获得国外信贷的可能性和 1980 年消费品价格体系的计划向政治局作的报告》，DEP-HNB 的联合报告，1979 年 2 月 4 日，第 11，14 和 18 页（M. Cs.）。

同上，第 23 页。

者或分配者给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要是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给经济发展刹车，这将导致生活水平和投资的停滞和（或）下降，将延缓长期平衡的实现。”^①

在新采纳的制定经济战略的出发点的基础上，即，在给定的外部约束的基础上，对内部消费大幅度压缩，包括与生活水平相关的政治目标的重新确定，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年前财政部关于匈牙利应在经济崩溃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再次浮现出来：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努力达到与经济平衡相适应的目标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持续改善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②

因此，尽管由于资源的匮乏，1978年底1979年初领导层被迫执行的紧缩措施很可能再延续好几年，但是经济政策制定者还是把它们看作是暂时的措施，是全面的改革措施的一部分。迫使体制进行改革的纯粹是而且显然是资源的重大短缺和对西方的依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全面改革措施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出现了一种改革的气氛，尽管与此同时，集权化的管理和激进的、区别对待的紧缩措施已经直指各个企业。当然，改革气氛的出现还由于此前的一系列发展：

(1) 1977年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宣布了长期的对

经济政策委员会向政治局提交的报告（1978），《我们的国际金融形势和我们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5月31日），第17页（M. Cs.）。

^② 同上，第29页。

外经济政策与战略，职能部门和产业部门试图与结构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但它们的努力失败了。暂停这个导向的活动清楚地表明了旧政策路线的失败，旧的路线是通过传统的集权方法，委托行政管理部门去决定哪一些产品从长期看是最有前景的。

(2) 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确立一个把国外市场考虑在内的新价格体系，从而使竞争性形成的价格的渗入成为可能，并且随之出现一个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动选择。向世界市场的调整同时意味着放弃经济管理政策领域里专制的原则。

(3) 产业部门的管理任务被削减了，并被转移到一些职能部门。人们认为，在价格机制更灵活和对市场反应更敏感的条件下，这些职能部门更能起到符合市场需求的作用，更少地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

(4) 已经开始了一项对大型企业组织和托拉斯组织进行的评估。除了增加了大型企业本身的不安全感（这些企业的谈判地位已经由于资源的突然减少和支持它们发展的经济政策路线的突然失败而动摇了）以外，这个过程还为那些在组织上有较大能力作出灵活反应的较小型企业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5) 出于同样的目的，这些坚决的措施采取了规范的调节指标，以便促进经济管理中的统一性和减少差别优惠待遇发生的机率和广度。

(6) 1978年12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创造了一个类似的气氛，对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及他们的保护人采取了坚决的反对立场，这些管理人员及其保护人总在谋求“不合理的让步”，他们把本地利益放在全国利益之上，试图不正当地把他们个别的困难描写成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这个立场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为取得管理上的一致意见提供政治上的支持

(7) 这个立场也体现在实际的步骤上：1978年12月28日的政治局决议把关闭不赢利企业的问题提高到了官方政策的高度。这表明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严肃性。还有其他一些迹象表明了同样的政治决心，它们变成了影响气氛和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到1978年底，许多企业的利润水平已经不能满足年终利润分享基金（profit-sharing funds）的要求。由于中央决议的通过，这些企业及其背后支持它们的大量的隐蔽力量没有得到帮它们度过金融困境的支持。

(8) 1978年政治局对经济管理体制运行的全面分析也可以视为准备作出影响深远的、全面的长期变革的信号，这个分析对政府领导、地区党的领导、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银行系统、职能部门和产业管理体制、企业组织体制，等等，都进行了考察。

(9) 1979年7月的党委决议还可能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希望，它宣布，在中央经济管理和企业部门里，应该创造出促进经济政策目标之实现的组织条件、决策条件和人力资源条件。决议考虑了影响整个体制结构的重大改革，包括大型企业和托拉斯的内部结构、统一的工业部、双层的银行体系和企业领导的民主化。

第五节 新资源与体制适应性

在改革气氛发展的同时，同样的措施促进的另一个过程也逐渐地变得明确起来：通过权力关系的调整，激进的紧缩措施为系统提供了新的资源，从而使改革开始一种体制适应的过程。

到这个阶段，下列因素早已成为推动体制适应性的组织转

型过程：

(1) 对大型企业和托拉斯进行组织评估，认定它们是反对紧缩措施的最重要的基础，委员会后来的工作把这些企业和托拉斯分解成了 11 个较小的大型企业和托拉斯。

(2) 开始确定产业部门的合并原则。

(3) 创立经济委员会以便把对经济管理的行政干预活动集中起来。

(4) 各级党委的经济政策工作和选择活动都增加了。^①

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会议加强了限制措施和体制适应性的过程，它强调了继续执行紧缩纲领的必要性，以及继续维持各级党和政府的经济管理组织的必要性：

今年开始的经济管理进程将在 1980 年继续执行下去，经济管理活动应该巩固下来并将持续进行。政治工作的完成要求明确的立场和持续地密切领导。必然会产生的局部利益必须从属于国民经济的利益。^②

那时还通过了一项同意发展第二经济的决议。这个决议可能与持续的密切领导相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从体制的自我支持机制的观点考虑问题，我们将发现它与这个必要性是一致的：在限制措施发掘了更多的资源并减少了需求之外，第二经济为过度运行造成的资源约束形势的缓解提供了新的可汲取的

由于参与了相关的实际工作，Eva Voszka (1988) 对围绕经济委员会的建立的环境和协调委员会处理企业合并的工作作了第一手的说明。

关于 198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指导原则以及对经济调节机制进行改革的建议，1979 年 10 月 22 日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会议，DEP/46/a/10, 1979 年 11 月 8 日；information material (M. Cs)。

资源。

经济政策委员会 1 月 28 日的会议上关于第二经济活动发展的决议已经清楚地指出了它是一个潜在的取得资源的渠道。决议指出，认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即，这些第二经济的活动应该“受到更积极的对待，因为它们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展开了有益的活动，并且为我们的发展建立了另一个获取资源的渠道”。^①

这个决议的采纳不仅为结构的再生提供了又一个新的资源来源，而且它也促进了结构的松动，因为它启动了所有权、职能基础、组织、利益和社会的分化。在传统的简单结构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依附连线已经很难触及这些领域。

在实施紧缩纲领期间，引进一些外部资源的可能性也在 1980 年初出现了。匈牙利国民银行行长在经济政策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的声明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匈牙利获得了一笔 4 亿 5 千万美元的 7 年期贷款，经济部门领导必须对此作出迅速的决策。^②

到 1980 年初，严厉的紧缩措施和有更多可用资金（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的前景缓解了紧张状态，激活了自我支持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体制的内聚力，并且由此开始了使改革措施适应既有体制的过程。高层经济领导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即，对改革的热情变得温和多了。

1980 年 3 月，即得到西方贷款的可能性增加的时候，关于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的报告的草案定稿已经清楚地表明，财政部领导的委员会委员已经不再准备依靠全面改革的推

① 1980 年 1 月 28 日经济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MF），第 2 页（M. Cs

② 1980 年 2 月 12 日经济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MF），（M. Cs.）。

行。例如，最后的报告没有提到原先关于增加银行系统作用的计划，也没有提到原先关于进一步发展银行组织的计划。^①

体制适应性过程的发展进一步反映在党的最高层领导的一次会议的记录上，由于紧张形势的存在，这种会议定期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希望缩短决策的过程：

与此同时，行政管理部门在许多方面对企业作出让步，特别是在价格调整、贷款、补贴的分配……许多迹象表明，企业在资源乞求方面的抑制正在逐渐消失；然而，与此同时，效率水平低下的企业在管理方面以及对这些企业所采取的措施方面都没有发生什么可喜的变化。^②

到 80 年代中期，原先关于全面改革经济管理的决定被搁置了，并开始发生了选择性的消失。^③ 只有那些促进决策集权化和资源汲取的改革措施才保留下来。经济委员会的成立

关于财政部领导的工作组受托对与政府管理经济有关问题进行细致研究的情况向政治局所作的报告草案，1980 年 3 月 2 日，He/6/80 (M. Cs.)

② 总理 Gyorgy Lazar 与有关领导会晤的记录，1980 年 5 月 3 日 (M. Cs.)。

到 80 年代中期，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管辖权问题，关于国家物资与价格办公室和部门间价格与产品市场营销委员会 (IMPPMC) 的市场监管功能的问题，关于改革外贸部活动的问题，关于企业外贸自主权利的问题，关于国家金融管理体系的问题，关于银行系统的问题，关于过去有政府授权的政府委员会和跨部门委员会的问题，都没有公开颁布的决议。计划进行的三个部门的合并多大程度上是产业管理的组织和职能转变的前兆或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这是不清楚的。还有，先前受批评的产业部门中哪些将保留下来，新组织是否执行原先由产业部门执行的与利益保护和企业合并有关的企业建设的职能和解决问题的职能，这也是不清楚的。

(Voszka, 1988), 三个产业部门的合并 (Csanadi, 1985a), 大型企业的解散 (Voszka, 1984), 以及第二经济的发展 (Fekete, 1984), 都是这种体制适应性的明证。

随着紧张状态的缓解, 以及改革措施实施范围的缩小, 对改革的要求也减少了。这反映在一份备忘录上, 该备忘录记载了高层领导在一次关于建立统一的工业部的讨论会上的观点:

哈瓦希同志: “我们没有必要去干扰国家技术发展委员会 (NCTD), 也不应该去干扰两个贸易部门 (一个管理国内贸易, 一个管理对外贸易) 我们应该对商会的运行作最小的变动, 我们应该首先集中于它们的利益代表活动的问题,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 激进的变革是不应该有的……”

拉萨尔同志说: “我同意哈瓦希同志的意见, 在目前情况下, 我们不应该急于变革; 对国家技术发展委员会、商业部和商会来说, 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全面的重组, 而是使它们的行为和谐起来。我们不应该大规模地改变它们的职能。……有车间层次的民主是可以的, 但只应该停留在理论上; 随着工业部的组建, 实施这些措施是完全不可以的。(拉萨尔是在谈论企业经理的任命权下放到企业的问题) ①

在紧张状态缓解、改革范围缩小和保留改革的资源创造因素的过程中经济政策行为的变化表明, 一方面, 伴随着结构性

① 协调委员会为组建统一的工业部于 1980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会议的备忘录 (M. Cs.)

资源短缺的发生出现了紧张状态，即，过度运行超过了极限，改革获得了复兴；另一方面，通过外国贷款或其他手段获得了资金，从而促进了改革的体制适应性过程；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第六节 持续的过度运行与解体

然而，紧缩措施和改革带来的资源创造效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旨在进一步集中决策和资源努力很快就遇到了现行权力结构和自我支持的强制路径的反对。与权力结构碰撞的标志是，只有那些与拥有反馈的行为者的利益相一致的措施才得到了实施或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它们适应了体制。这种碰撞（体制适应性）有一系列的表征：关于 1980 年旨在逐渐引进世界市场价格的价格改革的第一份报告发表了，报告阐述了一开始发生的一次性收入差异效应，并阐述了微弱的初始差异出现之后很快发生的收入拉平现象（Falubiro 和 Galik, 1981; Mohos, 1981）。这意味着世界市场价格只能选择性地站住脚，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生产、企业、收入和出口结构方面的强制路径的形成。除了少数成功的例外以外，计划进行的分解大型企业的努力全部归于失败。由三个部门合并而来，在人员上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同时剥夺了这三个部门管理职能的工业部，其行为在一年之内就变得与它的前身一模一样了。由于企业的直接乞求活动，职能部门（匈牙利银行、财政部、国家物资与价格办公室）的行政干预范围减少了，但地区和中央党的机关的经济政策和组织活动增加了，这些机关的人员也增加了。

自我支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行为模式，以及通过强制路

径进行的权力结构的再生产，在日益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难以为继，但是很快就导致了又一次过度运行，然后是实行新一轮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很快陷入另一场过度运行，之后是又一轮的紧缩措施，如此循环往复。^①

过度运行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并逐渐变成了持续不断的现象。陷阱开始主导体制的运行。由于经济结构的僵化，系统能够动员的内部资源越来越少 (Pasztor, 1987; Szamuely, 1986)。在西方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偿还外债和利息的义务，以及为了满足进口的需求，迫使经济实施一种强制的出口导向的纲领。^② 苏联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的不规律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由于匈牙利对苏联出口的贸易条件的恶化，向苏联出口同样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从西方的进口越来越多。同时，由于不能适应西方市场，出口结构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很不合格 (Koves 和 Oblath, 1981; Salgo, 1989)。结果，为了继续履行还债义务，匈牙利被迫借入越来越多的短期贷款。外债和强制出口对社会和经济决策者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加，这种压力没有导致重组和激活经济，而与此同时，由于内部条件的恶化和世界经济的衰退，获得更多贷款的机会却日益减少。

所有这些迫使国内消费减少，价格上升，就业机会萎缩造

我认为，这就是 Laszlo Antal (1983) 所说的“限制螺旋”、Judit Fekete (1990) 所说的“我们危机控制的危机”、以及 Karoly Attila Soos (1985) 所说的“‘财经计划人员’的重复行为”的结构背景。我认为，这几位学者描述的现象，是匈牙利具有强反馈的结构和 60 年代以来与改革相伴相随的运动所造成的机制运行的结果。

^② 出现强迫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前面提到的 1983 年发起的“经常项目行动”，其目的是增加出口避免外贸赤字，方法是保证给予特殊的让步、施加压力和发布个别命令，到那时为止，政府不仅通过这个行动强迫国有企业耗尽它们所有的储备，以实现出口计划，而且还强迫小型合作制企业也这样做 (Szalai, 1989: 143)。

成的紧张状态加剧，生活水平下降，改革动议不断被提出。但是体制的运行一步一步地吞噬了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新的资源。然而，与此同时，在体制内却没有任何基于经济效率的因素，能够刹住自我支持的过程。因此，在过度运行持续不断的阶段里，自我支持的过程变成了自我毁灭。这个过程的前进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结构的内部分配呢？

在过度运行和外债不断增加的形势下，由于同构的特点，被政治所垄断的体制的防卫反应都是相似的：力图重新创造内聚力，它们都试图再次将自己与世界市场隔绝开来。

孤立意图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各个系统实施孤立意图的能力也各不相同。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不同的政党—国家结构中内部权力分配的性质。是否可能为传统的经济结构取得新的原材料，无论是通过国内资源还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双边贸易协定去获得，这个问题都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在从经济领域里发展出来的反馈较弱，或者只有少数行为者能够在 D_1 和 D_2 的交叉连线上建立反馈，并且 D_2 连线主要是起源于权力的最顶峰的结构里，系统可以内向地（inward）重新创造系统的内聚力。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决策者的原子化程度实际上是无限的。因此，他们利益实施的机会和影响决策的能力微乎其微。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保护渠道，反复的向内挖掘和对外债的偿

这种相似性源于内部运行的特性而非共同的战略，这一点也得到了 Csaba (1985; 1991) 对 1978—1980 年间的发展所作分析的证明。他的文章对我关于这些系统的同构结构的观点是一个支持。Salgo (1989) 从债务与改革努力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同样的问题。

以下事实加强了这个论断——即，经济危机既在东欧发生也在苏联发生，尽管该集团的许多国家是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

还可以通过强制的、集中的资源调动来实现，调动的方法是通过交叉连线来加强压迫。这正是罗马尼亚和东德的情形 (Salgo, 1989)。

在各个级别的机构都有相当大的决策权，反馈有很强的经济后盾，由 D_1 和 D_2 连线组成的回路比较频繁的结构里，传统的工具不能成功地重新创造内聚力。由于权力结构的僵化和反馈带来的强制路径，通过增加集权的程度来增加资源是不可能的。^① 这正是为什么脱离世界市场、进行选择时更加严格、以及把更重的负担强加给社会的努力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体制结构类似于此的国家发现，它们比那些基本网络是集权化的国家更受世界市场的左右，因为它们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它们不能重新创造支持体制的内聚力。这种情形在匈牙利和波兰是非常清晰的 (Salgo, 1989; Csaba, 1988)。

因此，可用于再分配的资源（这是权力运行的工具和乞求的对象）的长期短缺对被政治所垄断的、反馈丰富的体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可用于再分配的资源是体制运行的根本特征和条件，在缺乏这些资源的条件下，政治垄断开始发生松动。这个过程的表现是：

- (1) 政治的稳定性开始下降；
- (2) 公开宣布的意识形态重点与实际结果之间出现明显的矛盾；
- (3) 权力运行的传统手段失去了锋芒，从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

关于应用“看得见的手”的管理方法来提高集权程度和实施更严格的再分配的无效性，参见 Antal (1985); Bauer (1982); Csanadi (1985a); Laki (1985); Szalai (1987); 以及 Voszka (1988)。

(4) 遵循政治理性的强制适应和利益驱动的行为管理停止了，决策者的合作意愿也随之消失；

(5) 体制的隐蔽力量开始消解，其合法性也随之成为问题；

(6) 未公开化的、隐蔽的权力冲突开始显现出来；

(7) 权力结构内部和权力结构外都开始形成水平组织。

系统的内部灵活性消失了：它已不能汲取更多的资源，不能制定持续的改革路线，这些改革是由内聚力的逐渐下降引发的。因为在缺乏资源的条件下，传统的谈判渠道和方法失去了价值，变革产生了新的利益、制度和所有权关系，为行为入提供了“体制外”的运作和行为的替代性选择。改革的加速越来越大地限制了体制的基本要素的运行。在一种慢性的过度运行的状态下，对权力的垄断成了公开的问题，体制于是逐渐地陷入混乱和解体。

体制的解体速度取决于内部结构和 D_2 的交叉依附连线所囊括的领域和范围，取决于反馈的结构和经济力量，取决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等等。网络覆盖的范围越小，从经济领域生成的反馈越强，经济的开放程度越大，解体过程的开始和结束就越快。不过，不应该把这个过程的速度与崩溃的速度混淆起来。我认为，在内部结构的特征与前述相反的情形下，崩溃的速度会是最快的，因为在那里，并不存在着一个伴随紧张状态的增加而发生的逐渐解体的过程，那里仅仅存在着紧张状态的增加。因此，一个系统越集权，其崩溃的速度也越快，并且也越暴力。

匈牙利的解体过程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完成的。它始于 1978—1979 年 (Brody, 1979)，那时，权力运行的可能性、乞求的对象、以及调整都碰到了内部和外部的约束。然而，解体

在早期阶段仍然是隐蔽的，因为这个过程仍然限制在被政治所垄断的结构的隐蔽渠道里。只有在最后几年，这个过程才显现出来，那时，许多领域的垄断已经“摧毁”了，这种状况加上资源的短缺造成了交叉依附连线的断裂，同时党的等级内的依附也在日复一日地失去效率。

解体过程由多个性质不同的阶段组成。在第一个阶段，决策者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他们在结构内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第二个阶段，连接国家等级和政党等级的交叉连线变得越来越稀薄乃至最终的断裂，同时，独立的政治与利益集团发展起来。在第三个阶段，组成体制的许多基本要素——政党等级、国家所有权和国家等级——逐渐解体或发生转型。

在实际过程中，权力结构的解体是来自各个方向（既有内部的也有外来的）以不同强度向整个结构施加的一致压力造成的。下面的章节将同时从两个角度考察压力的累积性结果：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匈牙利体制的角度，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角度。^①

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考察各种结果，是因为地方权力结构的解体的原因与背景是相似的，由于各种连线相互交织和同构的特征，它们与整个权力结构的危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

^① 我对解体过程一步一步地进行实证考察的地方是所谓布达佩斯工人阶级堡垒的 Angyalfold。当时，这个地区的人口是 140 000，在那里工作但不一定在那里居住的人口有 65 000 人。这个地区有 106 家企业、34 家工业合作社、100 多家小型的商业合作社、以及大约 2 000 或 3 000 家私人小商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3 区党委关于实施 1987 年 7 月 2 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情况与政治工作经验的报告（第 13 区党委，1988 年 7 月 29 日）]。这个地区许多传统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在 80 年代中期，党员的数量达到 20 000 人；1988 年党员还有 17 000 人。那时，90% 的党员是该地区各单位的工人，10% 的党员是该地区的退休人员。

此，地方权力中心完整地反映了整体的解体过程。对地方层次的解体过程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有用的，即，它填补了一般分析留下的空白。存在这些空白的主要原因是事件的连续发展令人应接不暇，使人们无法开展全面与详尽的实证工作。^①分析是通过与地方权力中心的代表进行访谈及对所有收集到的文件进行整理来展开的。有些数据是通过访谈得到的，因此没有给出文件来源。

据我所知，1989年的时候几乎没有作什么实证分析，没有人在党与国家的既有关系的背景下试图去考察已经展开的解体过程。不过，A. Gergely (1989) 关于三个党组织的研究，Kollo、Fazekas 和 Koltav 关于 Miskolc 和 Ozd 的研究 (Fazekas 等，1990) 是这样的研究。在一定的程度看，我们也应该把 Horvath 与 Szakolczai (1989); Keri (1990); L. Lengyel (1988); 以及 Szalai (1991) 的研究看作是实证研究。

第五章 衰落日记

第一节 解体的成分

如何能够清楚地看到垄断结构内的解体过程呢？我们可以从本书开篇论及的干部任命系统开始谈起。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匈牙利干部任命花名册上记载了多少个职位，以及哪些人担任这些职务的情况。

(1) 干部任命体制是政党—国家体制里的一个网络，它包含了党组织和非党组织里一切重要的职务。1989 年中央统计署统计了政党—国家系统各级领导职务共 307 099 个。^①

(2) 我们还应该把另一部分官员加到中央统计署的数据中去，这些官员（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官员、议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虽然不是官方的领导人，但他们的职务早就是通过党的干部任命花名册来任命的。

(3) 还有，在党的各级组织的非领导职务中，不属于前面提到的机构（如国会、地方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和党委会的成员也归入了干部任命花名册。

^① 中央统计署把这 30 多万个职务在“党和群众组织领导人”大类下细分为 225 个国家职务类别，大类下分为下面几块：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党和群众组织领导人、四类企业领导人、其他经济组织领导人（6 类）技术管理人员、其他技术领导人（5 类）、主任医生、主任药剂师、护士长、教育机构领导人（3 类）、文化与科学组织领导人（中央统计署，《就业与收入状况 1989》），1990。

(4) 这些职务的范围还应扩大，1989 年党的中央机关聘任了 237 人，各级党组织的“党的执行机关”聘任了 4 989 人为其工作 (Gazso, 1993)。^①

(5) 干部任命花名册还包括一些兼职的没有领导职务的党务工作者，在正式职务之外，他们还对党员数量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里的党组织的领导工作负责。

机关的委员和各级党委的委员正是通过干部任命体制控制了前文提到的各级党与非党组织 30 多万个职位的。

在这些仅仅与干部任命体制有关的数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党的等级制度和交叉连线的解体的后果是多么重要和广泛，因为随着解体的发展，一个又一个职位从被政治所垄断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从而利益实施的渠道也一个又一个地消失了。基本网络作为一个整体的解体过程对其他交叉连线的影至少有这个过程的影响那么大。下面，我将详细地描述这个解体的过程。^②

1985 年，第 13 区党部有 26 名委员。这个党部是区党委和党的经济委员会集体决议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党委的 60 个委员中 80% 的委员是企业的代表。经济委员会的 13 名委员是党委在同级委员中选出来的。除了 4 个秘书以外，剩下的 9 名委员中有 7 名是企业的经理，另外两人中一人是区议会的主席，另一人是一个校长。这两个组织的干部任命清单有 250 个

这些数据存储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计算机数据库里，在出于研究的目的交给 Ferenc Gazso 时删除了具体的名字。

^② 在此，我对 Sandor Kurtan 和 Maria Simon 深表感谢，Sandor Kurtan 主编了 1988 年的《政治科学年鉴》，Maria Simon 主编 1989 年和 1990 年的《政治科学年鉴》，他们向我提供了“十二个月大事记”部分的原始材料，使我能够准确地确定事件的时间，并且提醒我注意许多重要的事件。

职位。^① 干部任命花名册包含的职位很广，从区政府主席到区警察局长到 53 个企业经理都在这个名单上。^②

其经理是区党委经济委员会委员的企业一般是区里最大的经济单位；事实上，有些是布达佩斯最大的企业，并且是本部门类最大的企业。因此，这些企业有许多连线（既包括区内的也包括区外的）把它们与决策机制连接起来。根据它们重要程度的不同，这些企业当中有些企业的经理在中央党部的干部任命花名册上，有些属于布达佩斯党委管辖。渗入更高层级的机会和在这些层级实施利益的机会加强了这个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对它在利益实施过程中的谈判力量形成了重要的影响。这些企业及其经理在区里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可以把自己关心的问题直接提交给区党委书记。^③

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进一步增强了区党委的谈判能力，即该区与党的高层领导的直接联系。根据口述历史的记载，1956 年以来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亚诺什·卡达尔曾经是第 13 区最大的企业之一（匈牙利船舶与起重机械制造厂）里的一名工人。卡达尔实际上还做过该区的第一书记，后来是该

下述事实也表明了同构结构的存在，工厂的党组织与地区党委会（如区党委）对不属于区党委管辖的那些职位的权威是类似的。区党委一份蜡纸印刷的文件记载了 16 类职位，另一份文件记载了 21 类职位，它们应当是属于经济、人事、党和群众组织领域的单位（如企业）内的党委管辖的。另一方面，企业的党委书记是在区党委的干部任命花名册上的。在党员数量很多的单位，党的书记是全职的政治工作者（经费由企业或区党委提供），他直接属于区党委书记的管辖（M. Cs.）。

② 第 13 区党委与经济委员会干部花名册（第 13 区党委，1982 年 2 月 12 日）（M. Cs.）。

单位内党委书记的任免权属于区党委书记管辖（第 13 区党委，1986 年 1 月 6 日）（M. Cs.）。

区在国会的代表 (MP)。即使在他提升到中央政府里,成为中央的干部任命花名册上的一员以后,他还继续每月到第 13 区访问一次,这给该区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他们无论出于个人的需要还是出于作为组织的领导人的需要都能够得到特殊的帮助。

由于同构的特征,区党委是垄断的政治结构在地方层次上的体现。通过交叉的依附连线,区党部能够监督所有的地方权力机关、文化和社会组织、司法机关,以及经济组织和群众组织。这种监督还得到了季度统计报告的促进,这个报告是指定的企业和合作社作的,他们有义务向区党组织提供这样的报告。^① 报告由指定组织的党委会撰写,他们每周还向区党委作口头和书面报告。

区里也保持着持续的、直接的政治监督。区工人纠察队由区党委管辖(纠察队队长及其代表也在区干部任命花名册上)。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政治危机的地方,区党委就指示纠察队采取行动。党部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和国家机构、与其他区的党委之间都有热线联系着。^② 布达佩斯警察局长每天给全国警察总局的报告也送交一份给区党部,其中详细说明当天首都发生的犯罪行为。地方和更高层的非党组织定期向党部报告辖

提交统计数据不仅仅是对区的义务,而且在 1971 年由于产业部门一项条令的颁布而同时成为对部门的义务。(1971 年 000/71 MMMI. 1971 年冶金与机械工业部的统计报告制度。《冶金与机械工业部通报》,第 1 期,1971 年 1 月 8 日,第 22 页,专门号:39-128-133/1971。)

与区党部有热线联系的有产业部门人事领导,以及以下组织:国家计划办公室、邮政总局和布达佩斯邮政局、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总部及其布达佩斯分部、工会全国委员会、信息通讯部、交通部、布达佩斯市议会、所有的区党委,以及布达佩斯最大型企业的党委 (M. Cs.)

区内党员所犯的罪行，因为在启动对党员进行司法审讯之前必须获得区党部官员的同意。^①除此之外，党委会知道区内的每一件官方事件，因为区里的每一个组织每个月都必须送交计划于下月开展的活动的活动时间表。自然，这并不意味着党委在这这么多的方向上都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干预，但在紧急时刻，这意味着它的手头已经有了详细的、及时的信息。

第二节 解体的方式

1985—1986 年间，第 13 区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出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的依附关系的变化。这个时期全国层次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

(1) 社会紧张状态在整个体制的各个角落都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2) 经济领导反复声明的目标没有实现，改革措施的益处从来没有实现。

(3) 伴随改革措施而来的紧张状态加剧了，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带来的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各个政党—国家的总的隐蔽力量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衰弱了。

党员纪律处罚信息系统（布达佩斯党委纪律委员会，1982年8月2日），这个系统的建立还有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958年2月14日的决议起初是为了确保对内务部决定的监督：“为了防止1945—1953年间反犯罪组织内发生的违法事件再次发生，为了防止用行政的手段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关于内务部调查机构和公共检察部追查渗入特定党组织的政治破坏分子的管理条例。主席团决议（1956年8月决议修正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IPHA 288. 20/18, s. u.）。

(4) 许诺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① 经济在萎缩而不是有力地发展；资本没有促进加工工业的发展，而是继续流入重工业；价格上升而非下跌，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出现了就业问题、供给问题和瓶颈现象，易货贸易开始流行起来；许诺要实现的内外财经平衡没有实现，实际上外债和预算赤字不断增长。②

一系列的失败和日益增长的紧张状态导致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明显下降。然而，在紧张状态发展和不断失败的条件下继续剥削资源的被迫性仍然顽固地存在，另一方面，内聚力的下降导致了一轮又一轮新的改革，二者到此时已经开始侵蚀体制的基本特征。这些导致了权力结构的加速衰弱以及雪崩式的垮台。

在紧张形势的逼迫下，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把重新认识党在经济中的作用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③ 委员会一方面强调各级党组织在取得中央制定的经济目标方面的责任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启动了一个使权力结构合理化、简单化、分权化和多元化的进程。这些措施无意中导致了党为保持对政治权力的壑

差距的扩大反映在中央委员会负责经济政策的书记的报告里：Ferenc Havasi (1985)，“我们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纲领；第七个五年计划——1985年11月12日中央委员会会议”，*Partelet* 第12期；Ferenc Havasi (1986)，“集中精力改善经济绩效——1986年6月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Partelet* 第7期；Ferenc Havasi (1986)，“更好地利用资源是我们取得进步的关键——1986年11月1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Tarsadalmi Szemle* 第12期。

② Szalai (1988) 认为，外债和预算赤字的持续增长是危机的表现，每一个措施造成的结果都与采取这个措施想要达到的目的相反。L. Lengyel (1988) 作了类似的评估。

③ Karoly Nemeth (1986)，“关于党的干部的工作——1986年3月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Partelet* 第4期。

断所依赖的工具的受限和削弱。

合理化指的是党和国家等级体系内的组织改革。委员会宣布，有些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五年应更换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党和工会选举中应引进多个候选人的机制，非党员应该也可以担任重要职务，通过正式申请决定职务任命的岗位的范围应该扩大，这些任命应该有确定的任期。^① 所有这些措施都促进了新的有能力的人才的流动和吸收 (Gazso, 1990; Gy. Lengyel, 1992a, b)，但是，它们也削弱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职务的稳定性，削弱了把这些职位与党连接起来的依附连线的稳定性。

分权化指的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下级的党组织，通过这种方法改变 D_1 和 D_2 依附连线的起点。例如，选举区第一书记不再需要事先获得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只需要获得布达佩斯党委会的事先批准就可以了。这个决定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区党委主席团从中央领导那里获得了更多的一点自主权。另一方面，区党委主席团失去了一条重要的连线，它不再能够通过这条连线实施自己的利益，以及它们在决策结构的更高层里所代表的那些单位的利益。这个损失在第 13 区得到了弥补，因为该区党组织的第一书记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② 在这些情况下，成为某个层级上的党的某个委员会（党委会、临时执政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意味着他在那个层级的干部任命花名册上，不论他在日常工作中是什么职务（区第一书

^① Karoly Nemeth (1986), “关于党的干部的工作:——1986年3月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 *Partelet* 第4期。

^② 1985年3月28-29日中央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纪要, 1985 (布达佩斯: Kossuth Könyvkiadó)。

记，或企业经理或报社的编辑）。

党通过交叉连线实施控制的能力由于国会选举在那时引进的差额选举而进一步削弱。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区党委的传统控制力。虽然，根据党的文件，区选举委员会的主席还是地方党委里群众组织部的部长，虽然选举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是区党委推荐的（不要忘了候选人提名是必须事先征得地方党委同意的），但是它们的影响仍然由于差额选举规则而不如从前了。^① 对政治垄断的打破反映在这个事实里，在这些议会选举的 870 名候选人中，有 176 人是由公众推荐的；并且其中的 74 人最终成了正式的候选人。^②

国有企业引进的新的管理形式也对交叉依附连线的废弛产生了类似的推动力。^③ 产业部门监督企业的权利被取消了，企业经理不再由它们任命。经理的职位向竞争开放，经理的任命是由一种企业委员会完成的，其成员由企业领导和企业内各个部门的代表组成。

地方党部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竭力保持从前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根据中央党部的建议，^④ 企业党委应该在企业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开会。这个时间顺序是很重要的，因为企业党委的决定是所有的党员都必须遵守的。因为企业委员会里大约

^① 制度的实施是根据 1958 年 7 月 25 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进行的：“关于为完成 1958 年统一的国会和地方政府选举进行政治和组织准备工作的决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IPHA, 288, 20/21, s. u.）。

^② 1985 年国会选举的经验（布达佩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科学研究，1988, 第 14 页）。

^③ 5007/1984 SPC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发展的任务的决议，1984 年 3 月 7 日（M. Cs.）。

关于与经济有关的党组织工作的指导以及引进新的企业管理形式的指导（布达佩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党建工作组）（M. Cs.）。

80% 的委员都是党员——他们尽量派他们认为有能力影响企业内最高层决定的人作代表，所以党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力。

新成立的企业委员会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一个一个地撤换以前的经理。但在经过一段短期的瘫痪以后，由于产业部门的强烈干预，党领导取得了这样一个局面，在绝大多数场合，决定不是针对各个经理的留任还是解职，而是确认他（她）的职务。通过这种方法，区里 75% 的企业经理都得到了确认。党还要求，新的管理职务候选人必须首先经过区党委的考核与挑选，在他们得到任命以后，他们被纳入区干部任命花名册，而不管这个职务原来是否是由竞争决定的。

尽管做了这些努力以保持控制，但是经理职务的差额选举、选举时秘密投票、经理任期限制、^① 企业党委书记不得成为企业委员会正式委员、以及经理独立于产业部门等措施的引进还是逐渐削弱了党的监控力和影响力，也使党与产业部门里的人事部门之间的密切关系变得不合理。经理们有了两个新的优势，一是可以将他们的目标作为委员会集体决定的方式呈现，另外他们本身也是集体选择 [包括他（她）的提名] 的结果，这使得通过熟悉的交叉连线施加影响变得更困难了。

因此，在结构内保持依附和实施利益的可能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访谈清楚一致地表明，党的影响力在一切方面都在下降。原有的依附连线正在明显地变得越来越细小，因为作为利益实施的渠道，它们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有些连线甚至完全断裂了。许诺与实际效果的差距日益扩大，在党员中

关于转向新的企业管理形式的经验和问题向 ECS 作的报告 (MF, 1986)
(M. Cs.)

造成了失望、不信任和矛盾的增长。此外，伴随党员身份而具有的物质上、信息上和职业上的好处的逐渐消失强化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加剧了不满和不信任的情绪。政党一国家被迫放弃许多迄今还被视为公理的传统的优先事项，比如中央计划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和良好基础、充分就业、生活水平的稳定增长、所有公民都能参加文化和艺术活动、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物价稳定、国家养老金稳定的购买力、国家供应住房、国家所有权的优点和重要性、工人的权利、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排斥，等等。^①

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越来越多的党员退党。^②不满的扩大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党员退党和吸收新党员越来越困难上。1988年在第13区，退党党员的数量是1985年的10倍，吸收的新党员只有1985年吸收数量的三分之一。^③

传统优先事项的重要性的下降，改革努力的不断失败和汲取资源的新措施无休止地出台，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散布到整

这个过程在匈牙利和整个东欧明显发生的迹象首次是由 Bauer (1982) 在模式危机的文章中表达出来的。

^② 1988年和1989年，布达佩斯20% (43 702名)的党员退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布达佩斯党委预备委员会关于布达佩斯党组织现状及其变化的报告) (布达佩斯党委, 1989) (M. Cs.)。

^③ “1985年以来的组织变化”，手稿，第13区党委，1989年3月 (M. Cs.)

个结构的严重的矛盾、不信任和不确定性，^①已经在许多方面使得党组织的活动瘫痪了：作为现在无用的依附连线的控制者和作为它们的受控制者两方面的活动都瘫痪了。它变得无力传递、协调和选择利益。因此，乞求者从前合理的想法：（1）利用这些依附连线，以及（2）满足通过这些连线加在他们身上的期望，^②逐渐消失了。

中央预算赤字和总体的再分配问题导致中央预算对地方党组织提供的经费也减少了。后来，中央的经费持续削减。一开始工作人员的数量由中央控制，后来，经费的缺乏使得工作人员的进一步减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③这也增加了实行控制和施加影响方面的困难。

除了连线的数量和强度在减少、监督与控制受到的制约在增加以外，施加影响的机会由于所要监督的制度结构日益复杂而进一步受到了削弱。改革的加速造成了组织上、职务上、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上出现巨大的差别和多元化（Andorka, 1992; Laky 与 Neuman, 1990），这使得对传统的交叉连线进行有效利用成为不可能，因为，如我们所知，总体上复杂的政党

^① Laszlo Bruszt 和 Janos Simon 作的调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间接指标，调查揭示，在 1985 年到 1989 年间，公民对（SO 代表制和政治制度的期望急剧下降。对于“国会代表你的利益吗？”的问题，1985 年 66% 的受访人回答“是”，1989 年只有 40% 的人作此回答。对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代表自己利益的问题，回答“是”的人在 1985 年和 1989 年分别为 66% 和 23%。对于工会，肯定回答分别是 66% 和 25%；对于地方政府，相关数字分别是 43% 和 21%（Bruszt 与 Simon, 1989）。

这种情况反映在以下从不同的角度在各个县所作的案例研究中：A. Gergely (1989); Fazekas 等 (1990); Horvath 与 Szakolczai (1989); 以及 Urban (1988)。

在第 13 区里，包括书记在内，1985 年与 1989 年党部的工作人员分别是 26 个和 19 个。

一国家结构是建立在比较清楚和简单的所有权、行为、组织和职位结构的基础上的。^①改革的加速不仅分化了从前的结构，而且分化了财富的社会分配、行为模式、生存战略以及依附关系。^②

除了分化以外，旨在吸引国外资本的新法律与旧的监督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在实施国家行政机构改革过程中明显地表露出来（Kilenyi 等，1987）。此时，党在这些机构中的活动受到了质疑，按照党员的居住地而不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来组织党员的意见首次提了出来，这都不是偶然的。

这个时期是区党部工作人员大规模轮换的开始。1985 年到 1989 年间 80% 的人员都被替换了。结果党部里专业人士的比例增加了。^③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结构变得更开放和松弛了，一部分是因为要对付越来越多元化的环境。这个趋势在全国都可以看到，^④它不仅出现在党的领导里，而

例如，交叉连线不直接连到私有工商业。一方面，这些企业的中上层经理人员不是党员，因而党的纪律是不能在这里应用的；另一方面，这些领导人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他们的职位或者是由集体挑选的——可能是私人投资者组成的集体。因此，干部任命的责任也不能加以应用。还有，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党组织，没有什么活动和指示可以把这些企业与党连接起来。

根据 Katalin Gonczol 的计算，1985 - 1987 年间每一万居民的犯罪比率大幅度上升，1991 年又翻了一番。正是从 1985 年开始，随着工商业阶层的发展，与产相关的犯罪占到了主要的地位，同时针对外国人的犯罪率也逐渐增加（Gonczol, 1993）。

“关于组织变化……”，如前所引。

根据 Ferenc Gazzo 提供的数据，与 1981 年相比，进入党部的专业人士的比例，包括国家和政府的部长、经济管理人員，以及党的精英到 1989 年上升了 20 个百分点：分别从 40.2% 提高到 62.4% 从 32.6% 提高到 56.4%，从 21.1% 提高到 44.2%（Gazzo, 1993）。

且出现在国家和经济领导里 (Gy. Lengyl, 1990; 1992a, b)。另外, 区里各种组织的党委书记中大约 40% 的党委书记换了人, 更换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日益增长的压力和矛盾, 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上级对他们的工作感到不满意。

作为上面提及的直接和间接因素的结果, 大多数决策者已经不能依靠依附连线来实施他们的利益。从而体制失去了人们在其中运作的意愿, 从那些根本没有制度联系的人开始到那些不再能够通过 D_1 和 D_2 连线以及相关的反馈来实施利益的人, 都不愿意理会体制了——即使在他们能够造成巨大的政治敏感问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因此, 决策者对通过隐蔽的渠道以原子化的方式实施利益的兴趣和活动急剧下降, 从而也导致了体制的合法性的下降。^① 于是, 体制很快失去了它受政治利益驱动的行为模式的内聚力。

在汲取资源方面存在内部和外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 加速经济发展的政治决定、苏联的政治发展和戈尔巴乔夫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战略——即, 更大程度地容忍各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在这方面采取的实际步骤 (Bunce, 1989) ——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结构的内聚力不仅在匈牙利而且在其他东欧国家进一步衰弱。权力精英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大量的隐蔽力量, 因为体制的功效很差、干预的实施及其失败的责任已经不再能够轻易地转嫁到一般的外部因素上了, 紧张状态也不能通过外

1989 年 (59. 6%) 比 1985 年 (17. 2%) 有更大比例的受访人否定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垄断地位的安全性, 这间接地表明交叉连线的断裂。由于这种否定是与职位和社会形势相联系的, 所以它增强了调查结果的意味。受访人的社会地位越高, 否定共产党垄断地位的可能性越大 (Bruszt 与 Simon, 1989)。

部干预的办法轻易消除。这种形势进一步促使党内和党外的人都把体制弃之一边。它增加了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活动空间，使党内开始出现不同的派别，并且出现公开的冲突。

只有那些积累了大量的反馈的行为者的行为模式才仍然保持着与体制的一致性，但是这些却加速了垮台的进程。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已经萎缩到那些累积了反馈从而其行为模式在强制路径上继续为政治理性所决定的小圈子里。然而，这些行为者顽固地坚持过时的、僵化的生产、出口、进口、职业和社会结构。因此，通过依附连线垄断的普遍责任，权力精英在较早的时候用来确保实施干预、汲取资源和进行有选择地再分配的特权所激发的普遍责任，开始报复他们了：正是这些连线束缚了权力精英使他们动弹不得，因为无法把导致普遍危机的责任转嫁给任何外部的因素。[由于相似的结构和体制的特征，当戈尔巴乔夫为了缓解国内矛盾，摆脱成员国内矛盾发展的责任而把不干涉作为政策的基石时，苏联和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况（Bunce, 1985, 1989）。]

政治领导层不愿意公开承认危机的全面性。党机关里较年轻的一代（大多数是党的技术官僚）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领导层面对危机，并清楚指出保守的领导要对危机负责。共产主义青年联盟（CYF）、工会以及国家机关较年轻的、提拔起来的技术官僚也施加了同样的压力（Szalai, 1994）。独立的科学界和知识界利用普遍的不确定性公开表达他们的批评观点。所有这些迫使党不得不在 1988 年 5 月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那次会议上，对危机的反应发动了旨在使党组织民主化的改革。这些措施使得交叉连线和党内的依附连线进一步变细、变弱和

减少，从而进一步恶化了政治垄断的条件。^①会议上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发生了一场政变，亚诺什·卡达尔被撤除了第一书记的职务，被选举为党主席，这是一个名誉职务；另一个是把大多数老人和最保守的人从候选人名单上撤下来，从而阻止他们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根据党章的规定，大会只能建议而非命令下级党组织召开类似的会议。但是，由于下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害怕被解职，所以许多地区的书记都推迟召开这种会议。他们的拖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党的中央领导的隐蔽力量减少了。因此，这些会议的召开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经过了很长时间后，这样的会议才传遍整个结构。布达佩斯的地方会议几乎是在一年以后才召开的。在党委书记比较强有力的县，斗争用的手段更加粗野，更加堕落。地方党组织里的腐败开始在全国范围揭露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这些情况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地方领导的声誉并迫使他们召开地方党的大会。这些方法对那些希望撤换地方领导的人来说是有利的，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点燃了早已有之的公众对党的怒火。

不仅如此，在不满和危机发展的同时，干部任命体制在继续分权化。中央委员会干部任命花名册上的职位越来越少。分

决议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继续使干部任命分权化，减少干部任命花名册上的职位，促进党组织的民主化（例如，下层党组织实行秘密投票、差额选举、向更高层的委员会直接委派代表的可能性）。这些措施的目的之一是让党从直接的国家活动中撤出来，使得党只能通过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党员来影响国家的活动。它们强调了信息自由的必要性、制定集会与结社法律的必要性，以及取消对传统的工会组织的垄断影响的必要性，等等（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公报，中央委员会宣传与调查部第 1 号，1988 年）（M. Cs.）。

^② 1988 年 7 月 14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Nepszabadsag, 1988 年 7 月 15 日，第 3 和第 4 页。

权化的同时简化党委会以提高效率。^①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企业的党委书记被解除职务。同时持续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导致新当选的书记不再是全职的党务工作者。所有的书记都竭力找到或保住自己在企业里的业务岗位。被更换掉的书记或者离开企业或者在企业里从事较低级的工作。

1988年7月，中央委员会决定进一步下放干部任命的权力，^②但仍然保留对435个最高层领导职位的任命。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意味着下级党组织的干部任命责任要进一步下放，它宣布，某个层级的职位应该由那个层级的党组织来任命。促成这个发展的原因有许多。不过，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资源约束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党的中央领导想摆脱对危机的直接责任。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想增加地方党组织在处理日益尖锐的矛盾时的权力，减少由现实生活的日益复杂与基本网络的传统控制手段的有限能力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不透明性。而且，这可能也是用适应体制的措施来平息向上流动的党的中层精英的不满的一种方法。(Csanadi, 1989)。这个趋势在1988年10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当时的布达佩斯党委取消了它的整个干部任名单。^③这个行动进一步侵蚀了区实施自己利益的可能性。这种情况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地位，导致了进一步的分权化。到那时为止，第13区党委执行委员会把所有53个企业经理的位置从它的干部任命花名册里取消，下放给了下级组织，

从1988年3月到年底，区里每一个党委下的机构都在减少，从双机构（党委会和经济委员会）的单位改成单机构的单位。

^② 1988年7月14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如前所引。

这是布达佩斯党委在通知区委书记有关决议的信中的内容（第13区党委会，1988年10月18日）(M. Cs.)。

这些经理的位置还包括那些上级组织下放来的职务。^①

一开始，区里的大多数企业经理都很恼火，因为属于更高层级的党组织的干部任命花名册意味着权力、声望和实施他们利益的能力。但是，渐渐地，他们开始认识到新办法的好处：他们的决定不再直接取决于更上层的政治期望，而且过去与高层政治联系所能带来的好处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如果不仔细考察，我们可能会以为，随着干部任命权力的下放，企业党组织的影响力将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它们的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在不确定性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所有全职的党委书记都竭力把党务工作变为兼职，同时力图保住他们在企业里的工作，所以他们的生存变得依赖于企业经理了。当区里各个组织的党委书记从区干部任命花名册上撤下来时，这种依赖关系就完全确定下来了。另一个原因是区党委的权力已经不足以像过去那样建立足够强大的隐蔽力量来实施利益，或者像过去那样抵抗企业经理或企业委员会了。

由于内聚力的飞速消失， D_2 交叉连线上的封闭渠道向外开放了。隐蔽在各个地区、各种活动、各种组织和各个决策者背后的隐蔽力量或部分或全部地消失了。个别领域从被政治所垄断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由此，过去被体制的内聚力隐藏起来的扭曲，由于改革措施被同化和改革的体制适应所造成的扭曲，或者对非政治的决定进行基于政治理性的考虑所造成的扭曲，现在都公开暴露出来了。这样，迄今为原子化所抑制的积

^① 一个例子是第 13 区党委书记给医疗保健部部长的一封信，部长来信希望区党委同意给区里一家医院任命一位新的经理，区委书记回信说经理的职位已经不再属于区干部任命花名册的管辖（1989 年 5 月 23 日）（M. Cs.）。

累起来的矛盾因无法再掩盖下去而浮出了水面。

连线断裂、扭曲暴露和如今掩盖不住的矛盾的明显标志是横向组织的大量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规模的压力集团的出现，^① 它们的建立或者是应用了旧制度里长期遗忘了的权利，或者是应用旧制度之外的权利。这些集团越来越有力地在官方组织内、官方组织之间、或者在官方组织之外提出自身的利益和要求。

在这些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党失去了影响经济的一切能力。处理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问题的党务人士根本不起作用。影响企业决策的连线只剩下指示体系与身居重要职务的党员和企业里衰弱的党组织里的党员对党纪的遵守，而指示体系本身在 1986 年也大大弱化了。^② 这些情况表明，通过剩下的依附连线，党的命令和期望已经不再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因为干部的升降职已经不依赖干部任命花名册，这些人不需要遵守党的命令；而且也没有动力去遵守党的命令，因为通过这些连线已经不能得到资源。随着党的影响力的衰弱，基本网络内的大量活动从传统的交叉连线向国家等级体系内转移（Szalai, 1991）。这样，交叉连线的持续削弱就改变了结构内的权力关系：它增加了国家等级体系的权力，增加了那些与国家等级体系的高层

^① 改革纲领、改革界、Bajcsy - Zsilinszky Endre 博爱社、左派选择、多瑙河协会、Munnich Ferenc 学会、Nagyvaros 委员会、信息自由协会、Recsk 联盟、共和协会、新三月阵线，等等（《匈牙利政治年鉴（1988）》，第 699 页）。

^② 1986 年，第 13 区的指示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个企业内的党组织取消了发布指示的职位，把相应的任务分派给区党委的某个书记，当党员有问题时，可以找这个人索取信息和要求给予帮助。

有反馈联系的主体的谈判力量。^①

党等级体系内 D_1 依附连线衰弱的加速和扩散进一步加剧了权力结构的迅速崩溃。随着交叉连线的断裂，如今多余的党的机器开始解体。与这个过程齐头并进的是，所有那些利用交叉连线或党等级体系内的 D_1 依附连线建立起来的反馈都不起作用了，从而开始了衰落的过程。

党等级体系内 D_1 依附连线的解体还由于这个因素而加速发展，即，随着垄断的结束和内聚力的下降，党内斗争开始公开化、激化并在党的整个等级体系内扩散开来。^② 在党内利益分化的基础上，伴随着权力结构的解体，党内本身也出现了政党建制的进程。利益分化一开始表现为观点的不同，然后是取向的不同，再后来是通过具体的纲领来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党的分裂已为期不远，为制度结构的所有权展开的斗争非常激烈 (Keri, 1990)。

至此为止，交叉连线和党内连线的断裂变得不可阻挡：决定的作出已经无法跟上事件的进程。党机关的工作人员减少了，全职党委书记的制度也取消了，因为它的影响力早已大为衰落。一旦不同的派别开始公开组织自己的群众追随者，就正式宣告党内可以建立不同的纲领。一旦新政党发展起来，共产

最显著的标志是银行与企业互相持股形成的交织在一起的关系 (Sandor, 1989 引自 Szalai, 1993: 126)。

^② 内部斗争可能的发展方向间接地在一次以中央和省党部的领导人为对象的调查中反映出来 (Bruszt 与 Simon, 1989)。关于满意程度的回答中，(a) 对于最高层组织的活动，1.8% 的党精英表示完全满意；(b) 对于国会的活动，是 0.9%；(c) 对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 1.8%。但是，内部斗争还反映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类型的集团上：改革运动自下而上组织起来，后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纲领，政治舞台上成立了左翼和右翼的组织与政党。

党的合法性问题就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只要一大批新的、独立的社团、工会、经济与社会利益集团在没有交叉连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党在实际运行中对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和职位的决定权力的合法性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许多特殊优惠措施都取消，只剩下极少数人还能继续享受这些特殊供应。在它们的影响力和调解能力大为衰落以后，非党组织内建立党组织的合法基础开始受到质疑。党的机器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功能，其成员也在忙于寻找其他的、非党的工作，而中央也没有给党的机器在即定的条件下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提出正式的意见。最后，有关党的干部任命体制的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①因为这个体制所起的作用与起初要达到的目的完全相反：干部任命体制所建立的直接联系不再能够使党控制资源，反而成了普遍的危机形势的牺牲品。

到 1988 年底，交叉连线已经无力“覆盖”经济领域了，至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就更不用说了。作为对所有这些变化、压力和不稳定性的回应，1988 年 10 月，政治局对新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表现出了更大的容忍：它对党接受不同的运动设立了很低的标准，允许党员参加这些运动，^②不仅如此，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甚至允许他们组建政治联盟。

在 1989 年 2 月初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认同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必要性。在这个关键的会议上，它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承认：它宣布，它认为 1956 年的事件不是一个反革命

在 1989 年 4 月，先是一个县的党组织，后来是中央委员会宣布取消干部任命制。这个决定也正式切断了控制非党结构的最重要的联系：这种依附连线是党与非党组织的决策者之间单向依附关系的最清楚明确的标志。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委员会 1988 年 10 月 4 日会议”，*Nepszabadsag*, 1988 年 10 月 5 日。

的事件，而是一次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也参与其中的人民群众的起义。^① 这个公告反过来使得 1956 年以来的体制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这个体制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血腥镇压了当年的起义；它也使得随后的政治恐怖成为问题，这个政治恐怖是通过宣称帝国主义者、前权力精英和匈牙利法西斯分子在 1956 年合谋操纵暴乱以推翻社会主义而合法化的。通过这个声明，中央领导层力图弥补当初它对伊姆雷·颇兹盖（Imre Pozsgai）（后来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重新考察最近历史的常委会的主席）的错误评论，他称 1956 年爆发的是一场“革命”。在 2 月中的这个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书面宣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放弃永久执政的权利，宣布它希望成为一个一般的政党。3 月，布达佩斯常委会表示将完全取消干部任命体制。^② 4 月，布达佩斯党委公开为党内各种改革集团建立横向组织辩护，^③ 尽管这与等级制的原则是相背离的。这又使得党很不情愿地认可了当初断然否决的纲领竞争原则。

1989 年 5 月，中央委员会完全取消了干部任命制。它宣布，它将只管辖党的职务。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决议是否决了早先关于党对工人纠察队的领导的决议——工人纠察队是 1956 年建立起来的党的武装力量。^④ 这些步骤的实施进一步削弱了各种组织内党小组的合法性，就像党组织在工人纠察队里

^① “中央委员会 1989 年 2 月 10 - 11 日会议”，*Nepszabadsag*, 1989 年 2 月 13 日。

^② “采访布达佩斯党委第一书记”，*Nepszabadsag*, 1989 年 3 月 18 日。

关于政治创新、批评、观点自由、评论自由后党内辩论的意见，以及关于建立纲领的自由的意见。党的论战（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宣传与调查部，1989 年，第 3 期）

^④ “中央委员会 1989 年 5 月 3 日会议”。*Magyar Nemzet*, 1989 年 5 月 10 日。

的合法性被削弱了一样。但是，把总部从企业转移到地区的建议还是遇到了阻力。在第 13 区，人们可以看到，虽然所有的党组织都逐渐地放弃了它们的干部任命权，但是每一份党的文件，尽管一方面承认在多元化的条件下地区组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都坚持认为党员应该继续在企业里组织起来。这可以从企业党委会议的备忘录和它们向上级递交的情况汇报里明显地看出来，但是同样的困境也反映在亚诺什·贝瑞齐（Janos Berecz）（后来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在几个月前向党的宣传工作者作的演讲里，第 13 区的一份报告记录了有关的讲话：

各种政治组织正在成立，选举和基层运动在各个居民区蓬勃发展，我们很难参与其中。……我们必须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在各个居民区开展斗争。在没有施加经济影响的条件下是否可能赢得政治胜利呢？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离开企业，我们也不能只呆在企业。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抉择。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团结起来，加强党在居民区的领导作用是符合我们利益的。①

党组织对转移阵地的最大担心（这样的担心是非常有理由的）是，在转变为地域组织的过程中，它们会失去大批党员。这个担心后来成了事实，党员数量大大减少。例如，第 13 区党员的数量到 1989 年下半年减少到了 145 000 人，而 1985 年

资料来源：关于 1988 年 9 月 12 日 Janos Berecz 对党的宣传工作者的讲话的注释。题目：党对革新和改变政治体制所作的努力（第 13 区党委，1988 年 9 月 12 日，第 4 页）（M. Cs.）。

这个数字是 20 000。党的文件显示，从 1989 年 1 月初开始，退党的人数每个月都在增加，^① 即使是那些留在党内的人也越来越不愿意交纳党费。因此，虽然 1989 年 1 月还有 90% 的党员交纳党费，但是到 8 月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 69%。^②

1989 年 4 月第 13 区终于召开了党代表大会——这已是前面提到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整整一年以后了。在 4 月的会议上，区党组织把它的双重机构合而为一（它在各种组织内也这样做）然后在 9 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新的第一书记。最后当选的是一家在本部门为最大型企业（也是该区最大型企业）的经理，他还是一名候选人时就宣布，如果当选，他也只能兼职从事这个第一书记的工作，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党内他的上级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保持了自己的诺言，把自己的职务看作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他几乎完全独立于权力中结构正在衰落的上级，尽管这个时候，第一书记的职位仍然在布达佩斯党委的干部任命花名册上，而且党内实行的仍然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新区委书记在衰落结构中的独立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他的相当重要的经济地位，以及他在差额选举的秘密投票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所得到的政治权力。

至此，上述的变化、党的机器的日益不起作用、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施加于党的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甚至促使其他的政治工作者退出第 13 区的党组织。结果，党部的工作人员从 26 人减少到 1989 年 10 月的 12 个人。除了一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区里找到了一份与自己以前的职业相关的工作。这个

① 1985 年以来组织状况的变化（第 13 区党委，1989 年 3 月 21 日）（M. Cs. ）。

② 1989 年 9 月 20 日的声明（第 13 区党委）（M. Cs. ）。

趋势在全国也非常明显，党机关的 6 000 名工作人员中有 1 200 人在那个时候辞职。^① 对非党职务的任命仍然遵循过去干部调动的常规办法，使用过去的依附联系。结果造成一些离职的人升迁到他们配不上的较高级职务，就任了一个与他们原先的职务不相容的职务，或者他们获得了与他们的能力看起来不相称的高工资收入。随着过去常规路线的合法性的消失，这些“奖赏”的给予遇到了公开的反。在琼格拉德爆发了一件这样的“移转”丑闻以后，^② 从 1989 年 6 月起，全国的新闻界发动了一场反对这种“保护伞”的运动。

下面的报告反映了公众的情绪，表明了政党—国家体制的混乱程度：

藻拉县警察系统的官员和普通警察都加入了藻拉县警察工会的请愿，表示他们不同意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官吏替换内务部专业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的措施。这些逆淘汰（counter-selective）的措施对重组警察力量的声誉是有害的，对内务部工作人员的职业前景是不利的，并且使得一个人的专业能力和竞争力变得不重要了。这个行动不是针对具体的个人，而是针对所采用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降低了职员士气，引起了不必要的矛盾，分散了对专业工作的注意力，从而对社会的利益也是有害的。

“匈牙利政治年鉴，1989” S. Kurtan, P. Sandor 与 L. Vass 主编（1990），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0（布达佩斯：AULA - OMIKK，第 324 页）。

② Magyar Nemzet, 1989 年 6 月 30 日。

(签名) 藻拉县 365 名参加抗议的警员。^①

在解体的过程中，权力精英变得对自己越来越不自信。政治领导一方面在衰落，另一方面又被迫要去解决越来越大的内部和外部矛盾。结果使得政治领导的改革意愿和妥协意愿不断增强。在日益强大的反对集团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反对派的要求下，1989年5月开始了政府与新政党之间的谈判。这些谈判变得越来越重要，合法性也逐渐从国会转移到这些谈判的现场。^②在几个星期之内，这里达成的协议成为国会议事日程上重要的事务。没有这些首先由这个国会外的论坛通过和（或）修正的法案，国会对任何法案的辩论都是不可能的。这些法案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宪法的修正案和通过谈判达成的所谓关键法律：信息自由法、政党法、选举法以及其他许多对现行法律的重要修正案。^③

协议达成以后，把结构整合在一起的剩余的连线与被人们接受的变革之间的矛盾变得非常醒目。这种矛盾导致企业里的工人纠察队和党组织的合法性急剧下降，因为协议和国会随后通过的法案使得党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和企业里政党组织及党委的存在与新秩序完全不可调和。这个矛盾的局面加剧了共产

^① 1989年10月17日。《日报》(1989)，摘自“12个月大事记”，《匈牙利政治年鉴1990》，第316页。Hankiss (1989)、Tarkowski (1990)与Winieczy (1987)的文章描述了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行为，这种转化的目的是把尽可能多的东西据为己有。

^② 参加全国圆桌会议的有：(1)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2) 新的反对党；(3) 工会；以及新老各种社会组织 (Vigh, 1990)。

关于1989年6月27-30日国会会议的报告，Magyar Nemzet与Nepszabadsag, 1989年7月1日。

党与其他政党的冲突，加剧了权力精英自身的内部冲突，而且也加剧了新的反对党内部的冲突。不仅如此，协议加强了在这些问题的全民公决中赢得胜利的政党的地位；动摇了国会（其合法性早已下降）；增加了党内在企业、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横向组织活动，其中既包括改革派的横向联合也包括保守派的横向组织。在 1989 年的前 8 个月里，有 68 000 人退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入党的只有 2 600 人，党员数量从上年的 790 000 下降到 725 000 人。^①

第 13 区的事件精确地反映了全国范围的发展。党机关剩下来的工作人员努力使党组织民主化，他们努力把党组织改造成一个一般的政党。他们的状况是很古怪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改造的成功将使他们成为多余的人，将使他们失业。但是，区也是其他活动的舞台。这个时候，区出现了一个初级的地区组织，它可以看作是全国改革纲领的一粒种子，这个派别很快就成为党代表大会上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居民区党集体由生活在当地的有改革倾向的共产党人组成，它后来成为类似的居民区改革集团在全国范围的横向组织的核心，成为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活跃的组织者。（这个集体同情区里的非共产党反对集团，对区党委的人非常敌视，认为他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同样在这个区里，另一个居民区组织也在这里活动：区党部的领导人在党部大楼里为一个小型的基层组织腾出了一间办公室。这个集团由保守派党员组成，像改革派一样，他们也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一个类似的、全国范围的横向组织：所谓的马克思

^① Nepszabadsag, 1989 年 10 月 4 日。

主义团结纲领。^①

1989年10月初举行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承认并宣布结束垄断的权力关系，消除过去的管理方法、过去的权力和控制。第四天，代表中的改革派，或者更具体地说，雷佐·聂尔什 Rezso Nyers，成功地主导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关系，把它的不稳定的情绪控制在有利于自己的状态。改革纲领把组织规则贯穿到了党的民主化，批准了一个简短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党纲，解散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党（HSP）作为前者的正式（合法）继承人（Bihari, 1990; Keri, 1990; L. Lengyel, 1990）。然后召开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的还有来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情匈牙利社会主义党的代表。那些被最近的失败所击垮的领导人落选了，聂尔什——1968年以来改革的象征——当选党的主席。

但是，为赢得内部斗争，改革派自己也筋疲力尽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解决一个新的政党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他们没有长期的战略或政治纲领，或者实际上没有为他们新成立的党制定一个框架。^②他们还把工人纠察队的合法性问题留给即将召开的国会去解决，并且强调有必要在企业里保持基本

后来他们甚至在区党部的大厅里举行全国性的会议。随着组织的扩大（在访问中人们都这样说）他们秘密占据了总部大楼里的其他房间，并且在没有告知大楼主管的情况召开了又一次全国会议。区委书记只是在开会的最后一刻才接到通知。为避免向马克思主义团结纲领的观点妥协，区党组织能做的惟一一件事是把他们请出大楼，用党委的经费为他们租用了一家企业的文化厅，在开会的当天（一个周末）党委书记把区党部大楼的钥匙揣在自己的口袋里。10月，党的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他们试图（但没有成功）把大楼占为新组建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办公楼（‘Cuckoo chicks in Angyalfold’ . Nepszabadsag, 1989年10月22日）。

^② Nepszabadsag, 1989年10月7-8日。

的政党组织。

随着匈牙利社会主义党的成立，改革派（正在解体的政党—国家结构的最初的“创造者”）在随后的几年里政治命运算是注定了（Bihari, 1990）。90% 的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退了党，但没有加入新的党，人们认为新的党与原来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一样的，而且也由于这个原因，反对党也不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伙伴。虽然它通过自由选举进入了新的国会（与再次组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保守派一样），但是它在好几年里都成了一个弱小的反对力量。

党代表大会结束后的一个星期，迫于内外反对派的压力，国会接受了关键的法律，取消了工人纠察队，取消了各种机构内的党组织（Jutasi, 1990）。

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迅速衰落的背后：（1）垄断体制内发展起来的强制路径消失了，（2）依附和利益在自我毁灭机制运转的过程中消失了，（3）权力精英的隐蔽力量减少了。这些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政治斗争中迅速撤退和愿意作出妥协的原因，是反对派取得迅速进步和成果的原因。^①

新的政党、利益集团之所以有力量以及改革派的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在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衰弱，在于党作为一个垄断的权力结构的迅速崩溃。横向组织起来的压力集团、反对党和改革派都极大地推动了这个过程

比如：关于进行全国圆桌谈判的协议，在谈判中作出的重大妥协（Bruszt, 1990; Vigh, 1990），反对派各种次要选举中取得的成功，党代表大会上改革派取得的胜利。

速发展，但它们不是这个过程发生的根本原因。^① 下面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即使在由于权力结构非常严密而没有合法的反对派或见不到反对派或反对派没有机会出现的地方（如罗马尼亚）也发生了崩溃，同时崩溃也在反对派力量相当强大的地方（如波兰）发生。如下事实也证明了自我毁灭机制的存在，即，各个政党—国家体制的在没有反对派或反对力量很小的情况下迅速崩溃，使得每一个国家里每一个受到影响的集团都很吃惊。不过，新兴的反对派尽管力量有大有小，但也都加速了解体的过程，同时，通过疏通积累的矛盾，它们也减轻了崩溃带来的剧烈震荡。

第 13 区党部的工作人员因激烈的斗争而筋疲力尽、士气低落，他们因自己在 10 月党代表大会上的成功而沮丧，在党代表大会的第四天，他们一边从自己的代表那里继续得到消息，一边总结自己的感受：“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收拾背包走人了。”他们立即加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党并且开始组织党的区级组织。为了抢在保守派的前头，他们径直发动了一场从第 13 区前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中招募新党员的运动。他们挨个地上门做工作，试图说服人们加入新的党。除了一个由退休人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以外（他们后来加入了保守派重新成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有党员都加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党。

^① 在刚刚从垄断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政治领域里，被原子化了的利益是作为原子化了的政党和原子化了的利益组织的观点浮出水面的。一开始，新成立的政党的党员数量都很少。它们的经济纲领很相似，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经济纲领在内容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经济政治纲领只能动员很窄的社会阶层。Laki (1989) 以它们的纲领为基础，分析了各个压力集团、利益组织和政党的观点。

有几个重要原因导致了这种极度仓促的行动。首先，匈牙利社会主义党想重新加强它已经动摇了的地位，增加自己的力量以战胜保守派可能发动的对抗性反应，因为在那个时候，要判断党机关、军事和半军事力量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内支持基础的实际规模是不可能的，要判断保守派的行动能力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个原因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党希望通过建立广泛的支持基础来使它们在法律上不明确的情形合法化，因为在 10 月份的党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改革派宣布匈牙利社会主义党是使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合法继承人，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政变的行动中“侵吞”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巨额资产。造成仓促行动的再一个原因可能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党不得不匆忙弥补自己在成立之时犯下的一个技术性的错误：它们没有宣布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自动成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如果愿意可以退党）；相反，它们呼吁从前的党员自己到新的党那里去登记。这就出现了一种古怪而危险的局面：一个有着 700 000 党员的党被宣布不存在了，另一个党宣布自己是它的合法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实际上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大会建立的改革纲领派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小集团。

第 13 区党机关的前工作人员完全出于忠诚组织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党积极分子的第一次会议，并选举了新的领导人。旧机关里这些最后的成员不想在新的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部分是因为他们对新的发展感到沮丧与失望，部分是因为新的党不像旧的党那样需要一个庞大的机关。所以他们开始紧张地寻找其他工作，但是他们的境遇比较早离开党的人更困难，因为那时展开了“反对保护伞”的强大运动。从前与依附连线有联系的那些人不能帮助这些人获得哪怕是较低级的职务。 12 月 1

日，整个国家前党机关里剩余的人员都解散了（Csanadi, 1990b, c）——总计有 4 400 名党务工作者。^①

为了与新成立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竞争，第 13 区前党部在整个通告期间都在不断地从旧党中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党招募党员。到 12 月底，该区社会主义党的党员数达到了 1989 年 10 月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党员数的十分之一。由旧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保守派组建的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招募了数量相近的党员。^② 曾经是区干部任命花名册上的企业经理中，大约 30% 的人加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党，20% 加入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余 50% 没有加入上述任何一个党。前党部的人员中，只有一人找到了新的工作，其他人无论在区里还是在区外都找不到工作。由于党机关的公共形象普遍很差，有些人甚至没有作出找另一个工作的努力。从而，他们当中有三人失业，两人在新的布达佩斯党部找到了事做，一人到了布达佩斯竞选办公室工作，其他人或者在自己原先的领域或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网络资本做起自己的小生意（Czako, 1995; Sik, 1992a, b）。总部大楼腾空了，家具或者卖掉或者捐给了当地的学校和当地的机构。老的党部大楼如今供宪法法院使用（Csanadi, 1990b, 1991a）。

下面的新闻报道表现了垮台的垄断权力结构的前代表们的情况，报道是 1917 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纪念日 11 月 7 日发表的，所以越发显得不可思议：

^① *Heti Világgazdaság*, 1989 年 11 月 4 日。“12 个月来的大事记”，《匈牙利政治年鉴，1990》，第 324 页。

^② 根据 1989 年 11 月 15 日 *communiqué* 的报告，匈牙利社会主义党有 45 000 名党员，根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数据，到 10 月 27 日为止，120 000 人已经表示他们有意加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同上，第 328 页和 321 页）。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管理局承认，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全职的、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者的工作已经被取消了，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失了业，许多人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新的工作，他们的未来很不确定。临时管理局要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新成立的地方组织竭尽全力帮助这些人找到工作。它要求企业经理、机构主管和国家组织的负责人帮助这些人获得适合他们能力的工作。它要求工厂和车间欢迎和帮助这些人适应新的环境。毫无疑问，通过他们的努力他们将赢得他们同事的尊重。临时管理局愿意邀请那些有兴趣的人到罗莎·费伦茨大街（Epitok Rozsa Ferenc）的总部参加 1989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6 点举行的十月革命 72 周年的庆祝活动。（国家新闻总署）^①

^① Heti Világgazdaság, 1989 年 11 月 4 日。“12 个月来的大事记”，《匈牙利政治年鉴，1990》，第 325 页和 326 页。

第四篇 遗产

几个关注点

这一部分的内容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1）政党—国家体制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2）它们的共同遗产正在强烈地影响着转型过程；（3）这些遗产的威力及其影响的后果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它取决于先前的政党—国家体制内权力分配的差异。

无论这些论点是多么的不言而喻，却极难被经验地证实。难以经验地定义一组最能说明问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指标来论证，来测量和比较前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运行及崩溃的后果，比如崩溃本身、累积的不确定性、动乱、持久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也很难从范围、水平、速度、方向、特征等角度测量这些后果，而这些后果最终是会决定各个转型社会在前进方向上的差异。

就是想从这些国家获得常规的统计数据也会遇到困难，正如联合国调查报告中所指出：“由于缺乏一些重要的统计资料，官方公布的数据可靠性普遍较低，并且国家统计机关发布信息在时间上又延误太久，因此，情况就更加搞不清楚了”^① 同样地，收集可以反应每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进程的国际

① 欧洲经济调查：1993—1994，日内瓦，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 51 页。

性的可比数据也很难。^①

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怎么样，在转型的后社会主义社会，有大量能说明问题而且非常规的社会学的数据可以实证地测量上面涉及的概念。^② 只是为了收集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全国和区域水平上与这样一些而非全部指标和过程有关的数据，就必须组织目标明确的、长期的、深入的调查。不仅如此，还必须构造一套方法来评价他们的联合效应，这些效应的演变方向，以及最后，如果可能的话，将转型中的这些效应上的区别与相应的前政党—国家体制内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

因此，在这一部分，我将试图仅仅描述一种方法，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所要采用的基础和理论框架，以便评价政党—国家体制对早期转型过程的影响。因此，下面的工作是建立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

谨记这些限制以后，我对转型过程早期阶段的分析将在两个相当有限的视角的基础上进行。首先，在它们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各种政党—国家体制中是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影响了转型的动态过程呢？第二，我要强调，由各政党—国家体制的结

^① 这些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是：所有权结构的演变，私有化的进程，外国资本的构成，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比率，利润汇出与进一步投资的比率，价格运动的速度和方向，逃税的发生率，外债的变化，破产的地区性分布，劳动力的地区性集中，失业的比率和分布，罢工的发生率，社会和教育结构，基础设施的条件和分布，无家可归者的比率，犯罪类型的演变和解决的与未解决的比例的变化，腐败类型的变化，公众健康的状况，最多发的疾病，自杀、酗酒、离婚等的发生率和分布，等等。

^② 它们有：增长和储蓄的驱动力，建立横向联系的愿望和能力，以前的干部任命制在政治生活中的存在和作用，制度化水平，制度变化的频度，法规的数量和性质以及实施的情况，法律修订和完全撤消的频率，制度程序的稳定性，法治对暴力统治的情况，过去的政治警察的作用，短缺的发生和类型，等等。

构性差异所引起的运行、解体和崩溃的差异对后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早期阶段不同遭遇产生影响的方式。

第六章 遗产的共同特征^①

第一节 随着解体而消失的

那么，随着政党—国家体制在中欧和东欧的崩溃，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简单说来，政党—国家，作为一种体制，是在 1989—1990 年瓦解的。由于同构（fractality）特征（相互交错）的存在，无论单个国家内部组织有什么样的具体特征，也无论每一个国家解体的程度如何，崩溃同时在各处发生，既在个别国家内部发生，也在集团内部发生。^② 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行原则的消失——表 6. 1a 给出了全部或部分特征的消失，以及他们作为其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消失，标志着崩溃已经发生。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列出了转型过程一些共同特征的表 6. 1b 和记录了一些事件的图 6. 1，我们将看到党的等级体系瓦解了，把非党组织里所有行为人与党等级体系连结起来的依附连线消失了。更具体地说：随着同构结构（fractal structure）的特殊特征的消失，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被政治所垄断的权力消失了，并且，那些跨越了国家和机构的边界、多面而

这章关于转型的共同特征的一些思想是我与 Valerie Bunce 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Bunce 和 Csanadi, 1993）。

^② 崩溃的影响已经传到苏联支持的西方共产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削弱了各个地方过去在政治上和财务上的支持网络。

单向的、涵盖了各种决策者的依附系统也消失了。对所有制的政治垄断也消失了：随着交叉连线的消失，经济利益和经济活动不再对政治产生直接的影响，或者换句话说，政党利益和决策的实现不再有直接的政治后果。（如图 6.1）

表 6.1 政党—国家体制的共同特征及其
对转型过程共同特征的影响

(a) 政党—国家的共同特征
国家等级体系
国家对经济的垄断
党等级体系
源于政党的等级体系延伸到非党等级体系中的个人的交叉依附连线
结构性的反馈
结构的主要连结原则
—交叉依附连线仅仅起源于党的等级体系
—跨越等级体系的反馈只是从非党到党的等级体系
政党—国家结构的运行原则
—依附是单向的
—只是党才掌握联系着所有其他决策者的依附连线，
—依附是被政治所垄断的
—决策者被原子化
—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交叉依附连线，资源被政治垄断了
—利益实施被政治垄断着
—系统被政治垄断着
决策者的两重性：他们既是结构内依附连线的控制者同时又是其
被控制者，从而引起
—干预的动力和能力
—适应的压力和动力
—乞求资源的动力和利益
—资源的开发和选择性的再分配
—政治上理性的行为
—数量驱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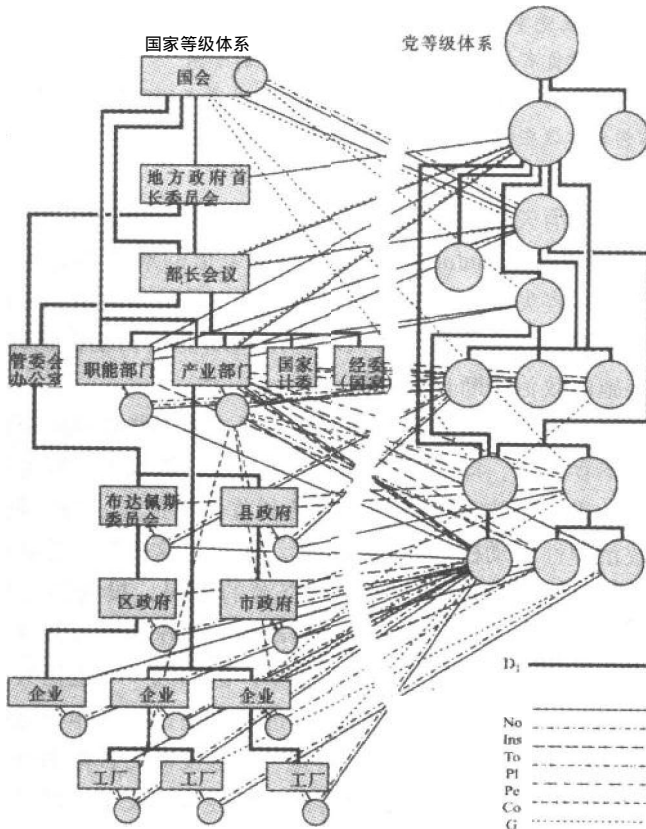
- 自我支持机制
- 体制适应机制
- 内聚力
- 体制陷阱：自我毁灭机制
- 体制适应机制
- 干预的驱动和实施
- 固定路径的再生
- 政治上理性的行为
- 数量驱动
- 控制效率机制的缺乏
- 改革

(b) 转型的共同特征

- 系统的崩溃
- 交叉连线的消失
- 党等级体系的解体
- 政治垄断的消亡
- 先前的结构性激励的消失
- 结构性行为的改变
- 结构的瓦解
- 残余
- 僵化的结构
- 限制
- 经济危机
- 国家负担过重
- 对资源开发的进一步驱动
- 紧张和矛盾
- 建立结构的努力和试验
- 相对缓慢的制度化
- 持续的紧张状态
- 开放系统
- 流动性
- 非系统性的因素
- 偶然性的作用过大
- 累积的不确定性

战略决策的困难
 使僵化结构空洞化的动力
 重新适应过程中的短期标准
 执政党威望的快速消失

图 6. 1 基本网络中消失的成分与残留的成分



泣：

D₁ 正式等级体系中的依附关系

No 干部任命制

Ins 指示系统

To 党的业务主管负责制

Pl 与党联络的体制：产业部门或它们的代表与地区党组织的例行协调和协商

Pe 党组织与产业部门的人事部门在干部问题上的联系

Co 企业党委书记与产业部门党委书记的定期协商

G 以党负有普遍监管责任的名义进行的干预

图中空白的一条带子表示从前的交叉依附连线的断裂，空圈及其相应的结构表示这些依附连线的制度背景的瓦解。

因此，消失的是干预和乞求的政治垄断的基础设施（politically monopolized infrastructure），由于渠道的解体和消失，他们中的许多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并且其少量的残余也消失在要求其他功能的环境里。作为被政治所垄断的结构崩溃的结果，利益实施的政治垄断也走到尽头。

这样，导致决策者政治理性行为模式的那些动机的结构背景也就不存在了，即干预的能力和被迫性，以及使尽可能多的决策者处于无力防卫和必须依附的利益都消失了。与此同时，适应政治理性的动机也随之消失了。再有，这些结构性动机造成的政治理性的行为模式——对资源的饥渴，投资的无尽驱动，增长取向，储备量的囤积，劳动力的积压，以及其他大量的造成旧体制最大特色的短缺的再生产的原因——也消失了。

随着由交叉连线组成的封闭渠道的废止，以及作为这些连线源泉的党等级体系的衰竭，原先一部分反馈的目标和寻求关系的行为也消失了，建立反馈的许多机会也消失了。因此，在某些领域里维持原子化的利益明显褪去，环绕着各种行为人的隐蔽力量也减弱。政治敏感的标准发生了转变，选择性的软预

算约束和选择性的分配被重新评价，导致讨价还价的内容和谈判的相对力量都发生了变化。

伴随交叉连线和内聚力的消散，早先的互相依赖改变了；并且随着结构性动机及其相关的行为模式的消失，非常特别的行为模式、行为结构，组织和职务秩序也都陷入混乱。所造成的一个总结是，被政治所垄断的制度结构分化成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所有这些意味着同构模式的终结，在这种模式里，从东欧集团国家与苏联的关系以及他们自身之间的关系，到各国内部发展出来的体制，到最小的政党的细胞，在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方向上都呈现出同样的基本元素、联系和运行原则。（Bounce, 1983; 1985; 1989; 1995; Csanadi, 1989; 1990a; 1991a; Walder, 1986; 1989; 1998。）

因此，崩溃造成了政党创造的机构（爱国人民阵线，工人纠察队，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农业合作社全国委员会，等等）一夜间消失了；在缺乏横向组织的条件下，利益的表达没有制度性的渠道。一方面是适应习惯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是预期，都失去了目标和参照系。这样，决策没有了制裁的威胁，利益和干预的实施没有了合适的渠道，分配没有了原先的选择性和过滤机制，谈判没有了坚实的参照系，决策者没有了明显的同盟者和敌手。早期由党垄断的职能如今被遗弃在一个没有制度背景的情况下，资源的流动没有协调机制，冲突没有人仲裁，信息、需求和技

能没有传播的媒介。^①如图 6.1，那些连线悬在空中，同时表明了他们的失效和残余。

没有了先前的动机和凝聚的背景，坍塌的系统持续解体为越来越小的部分。解体过程扩展到整个社会制度结构：国际经济和军事组织，国家、政权、民族，县、乡村、区、联盟，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功能（产品分配、价格形成、资本、劳动力和优先配置等等），部门、企业、合作社、社会阶层、互助会小组，所有这些都发生越来越大的分化，并且解体成越来越小的利益单位。

因此，社会和经济的运行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即，他们适应的理由，他们的参照系和取向，他们乞求资源的渠道，协调的可能性以及发展的动机，都发生了变化。然而，重组及其过程都强烈地受着以前体制的遗产的影响。

第二节 解体之后留下的

不仅前政党—国家体制中一些强有力的要素依然保存完整，而且它以政治理性为基础的运行方式造成的一些后果，实际上决定了转型期的特征。以下一些因素助长了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

1. 结构的僵化——这既是指其内容也是指其空间分布，

考虑一下，当财富、财产和工作消失时，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制度转型的初期，人们尖锐地感到在过去被原子化了的利益间缺乏横向联系。制度化与经济主体相联的活动消失了，市场制度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存价格不能有效地引导买者和卖者，没有资本活动，失业陡增，而处理这些问题的社会基础设施尚未建设起来。作为以前权力结构一部分的工会组织暂时地瘫痪了，利益的代表留给了既没有资金也没有社会支持的弱势机构。

因为这些结构是建立在由政治理性所激发的优先选择体制之上的。

从内容上看，结构的僵化体现在国家对财产所有制的垄断以及伴随而来的权力上；体现在在建设经济领域里的专业结构、组织结构、价格结构、工资结构、房屋成本结构和地区结构时政治考虑所起的显赫作用上；体现在以下事实上：受政治的激发，在补贴、贷款、原材料以及半成品和成品的来源和用途的配置上，特别是在国内供给与应对苏联的贸易义务方面都存在着僵化地限定的和不可更改的方向。

从空间的角度看，结构的僵化在它所引起的不平衡发展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把医疗保健、文化、公共设施、运输、住房、人力、教育和职业的结构和设施都集中到重工业部门，集中到政治上优先考虑的地区里文化单一的大型综合体里，因此，结构的僵化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结构的空间分布。

2. 维护优先选择体制的政治标准造成经济紧缩方案产生的社会负担自 70 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加重。

这些紧缩政策使得基础设施（健康、教育、文化、运输和通讯、公共建设工程，等等）被进一步忽视，使得物物交换的企业关系持久存在，导致人们力图用第二经济的发展和来自于隐蔽部门的收入来补偿紧缩，引起了潜在失业的增加，造成了隐性通货膨胀，造成了低工资结构以及引起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同时，基于自我破坏机制的政治理性之上的选择性分配，再生产了非竞争性的出口结构，造成了国内预算赤字和对外贸易赤字。

3. 我们也可以把作为重组障碍的受阻的资本流动，看作是僵化结构和紧缩措施的后果。

资本流动受限制的原因是体制的崩溃留下了难以或不可能

适应新要求的大型、僵硬的国家机构，职业结构，活动和生产能力；它也留下了难以再利用的资本存量、难以更改的财产结构、以及有限的交换机会。^①事实上，由于早期非受惠地区的衰落，资本的流动缺乏去向和基础设施，从而，转型过程遭遇了资本流动的冻结状态。这种状态由于劳动力和社会分化陷入困境，由于累积的破产、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累积的社会紧张状况而进一步恶化了。

4. 以往发展的结构和激励源泉的消失、上面提到的僵化结构、紧缩措施的后果、资本流动受到的限制、耗竭国家预算的基础设施网络，不断迫使国家维持其巨大的作用，^②迫使其进一步集中并重新分配收入。因此，国家等级体系的各个机构（部门、银行和其它机构）依然是僵硬的，这些僵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也依然僵硬不变。

在国家等级体系内，由于国家干预以及通过剩余的 D_1 依附连线而维持的原子化的、不平等的利益实施，依附状况和依附动机依然非常强。进行选择再分配的动机、从而选择性的软预算约束也变得持久存在（Voszka, 1993; Szalai, 1994）。早期阶段，国家等级体系内的 D_1 依附连线由于上述制约的存在，使得利益关系的不透明得以继续存在，正常客户关系的建立被推迟了，新型和旧型腐败的条件以及洗钱的条件持续发展^③，适应战略和政治与经济文化中传统的行为模式得以继续存在。

见累积的区域障碍和基础设施障碍与匈牙利的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Fazekas, 1989; 1996）

僵化结构的总体问题，陷入债务的大企业和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的过大作用，见欧州的经济调查 1993 - 1994，日内瓦联合国欧州经济委员会，第 10 页。

关于转型中各国的有利条件的细节，见 Fejes (1995)。

第三节 重新适应过程中的动态矛盾

政党的等级体系及其交叉连线的消失，与决策环境的改变一起，并不足以引发重组。重组较之崩溃更需要时间，由于遗产的缘故，资本流动的加速，僵化结构的转型，僵化引起的资本短缺的医治，由新的利益和制度所引起的处于过渡状态的功能的选择、重组、转型和呈现都需要时间。即使制度和立法在这些国家兴盛起来（Vajda, 1995），要产生新的制度结构、政府部门、企业、法律、工会、基金会、商会、银行、各种利益组织、俱乐部和政治团体，也有时滞。

这种兴盛本身尚不构成一个一贯的体系。它像是一个群岛，有待稳定的各种结构、实验性的行为、交互的作用和利益实施的模式就像其中分散的岛屿。这些岛屿象征着在新环境下进行制度化的努力：它们象征着迄今为止还不稳定的各种行为模式、依附关系、利益实施的方法、文化模式及其作用的试验。转变的领域及其中发生的解体、新行为模式的稳定或消亡都极大地受着先前体制的运行和解体遗留下来的环境（它是限制性的还是激励性的）的影响。

对转型初期新政治结构使自己稳定下来所作的努力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有：他们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他们发展一个经济和国家的委托人（state clientele），并使其逐渐进入权力网络中；权力中心经常性地转移，不断出现各种政治党派；新政治潮流汹涌向前，它们力图使其中一些制度化但在最后都被孤立或消失了，新行为模式和利益团体也在努力巩固自己的地位等等。

新制度的稳定比较缓慢，垂而不死的旧制度运行又带着

“拖曳”的效应，这使得发展过程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程度随稳定化进程的不同而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这是新的和未成熟的政治精英^①必须面对的环境（Bunce 和 Csanadi, 1993）。精英们没有遇到像崩溃本身那样迅速而显著的成功，相反却陷入了巨大的问题之中。就像上面提到的，它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个陷于深度危机的经济——债务充斥的国家、破产的企业、破烂的基础设施、失业和通货膨胀。尽管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政党—国家体系中长期的负面效应所致，但表面上看起来却是新精英们的政府无能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新精英都引发了幻想的破灭，从而动摇了他们的地位，引起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

紧张的另一个根源是新的精英容易在政治上摇摆不定，下面的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困难局面，即，新组成的各种党派没有获得选举人的稳定支持，这是因为它们缺乏传统，同时由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所有制关系在逐渐转型以及相关的利益关系在不断变化，它们没有在社会上扎下根。因此，初期的政治结构缺乏社会背景。正是因为没有根基，所以一方面，他们可以自由地（没有社会限制）精心制定最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创造大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以及推动所有这些新事物的运行，至于新的政治精英和专家集团的自由形成，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缺乏根基，他们缺少政治支持来执行这些决策或者使之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增加了他们在

根据 1992 年出版的国会年鉴，380 位下院议员中有 260 人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知识分子，只有 69 人曾经任过领导职务。（见匈牙利国会（1992），《1990 年国会选举年鉴》（Budapest），第 594 页）。

决策中波动的频率和幅度，^①从而导致了紧张状态的进一步加剧。

类似的问题发生于国家所有制比例过高，同时又缺乏清晰结构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虽然国家干预社会和经济的的能力很强，但是这种干预的效率由于强制路径的大量存在是相当低的。利益的表达受到扭曲，行为模式不可预知并且在许多方面不可控制。结果，一方面预期依然没有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干预造成了意外的发展，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状态。

因此，由于政党—国家留下的残余，转型过程非常复杂，充满了紧张和矛盾，并且极难预测。换句话说，它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状态中，因为结构还没有充分形成或稳定下来。因此系统在很多年里都是开放的。^②这种不固定的状态增加了累积的不确定性（Bunce 与 Csanadi, 1993）。开放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与发生在稳定结构中的不确定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前一种情况下，结构本身处于流动的状态中。^③所以，不仅结果是

① 在这方面的情况有，时常发生的党内斗争，不同观点的制度化 and 派性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团结；在政策的宣布和执行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在匈牙利以及其他地方矛盾的政治决策。或者再有，在俄罗斯叶利钦操纵国会，他以自由为名义搞集权；还有，俄罗斯国会进行了抵制，反对人士受到监禁，他们在国会的压力下获得了释放，另外如果叶利钦的权力再一次被置疑，他威胁说可能再次把他们关押起来。在后共产主义的波兰，政治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暴力的起伏也是这种最初趋势的很好例子。

② 我从动物行为学的进化论中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结构的“未安顿”的原因和条件：“组织……是特定力量出现的结果。在开放系统中，无组织的复杂性的根源混合着复杂的（分子）结构，作为体制的组件的结构全都存在，就是体制本身不存在。”（Csanyi, 1988: 27）。

如果我们宣布可以在政党—国家系统的决策体制的不确定性、自由经济的不确定性或多元政治体制的不确定性中找到共同的标准，来测量转型期中不确定性的程度，那么，我们将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

不确定的，而且过程也是不确定的。

第四节 出现的状况：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流动系统内，无论数量还是性质两个方面的变化，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就数量而言，个人、团体和机构的角色、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发生根本的变化。工人将要成为失业者；那些拥有中等生活条件的人们将要变得穷困潦倒或富裕起来；官僚变成企业家；知识分子成为政治家或官僚；从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影响力的机构变得落后而无紧要；新的关键机构登上舞台；新角色、规则、行为以及竞争规范发展出来，旧的一套变得过时或其权力发生了转换。

性质变化的本质也是新奇的：这些变化来得很突然而不是逐渐发生的，变化势不可挡，因为它不是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是环境变化使然。他们所影响的不仅是个人或小群体，而且是广大民众。重大的变化不仅在一个领域而且在多个领域发生，并且不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而是同时发生。许多事件的发展没有可预测的逻辑——它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方向。因此，这方面的波动也是巨大的。

变革的制度背景也是不确定的。制度的目标、任务、职位、角色和责任经常发生变化，它们的决策者以及它们的决策过程经常发生变化，具体的决策以及它们的内部组织方法和责任分工经常发生变化。程序机制很不完善，规则不完整并且多变。纠错和监管机制的发展很不规范并且相当原始。因为大多数利益没有表达出来，所以很难评价信息的可靠程度或者权力的实际分配。

由于上述变化，参照系也变得很不确定：过程与事件的反

复出现不一定表示它们是稳定的。

国际环境的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前政党—国家的崩溃在时间和地理位置上比较集中；另一方面，各国在国际联系的重新定位上恰好遇上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本身在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

不仅如此，决策者不得不在重叠的系统不确定性（*overlapping systemic uncertainties*）中操作，这进一步加剧了作为转型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典型特征的高度复杂性。这些重叠的系统不确定性是：

1. 在政党—国家体制崩溃以后，垂而不死的制度和运行造成的不确定性；
2. 在残余的结构里，个人实际掌握的剩余权力的不可预见性引起的不确定性；
3. 与自由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一般的不确定性。

这些累积的、重叠的不确定性造成决策及其成功的执行更多地取决于偶然事件，而非事先良好的准备。这种状况甚至影响到新的角色、规则、结构，从而影响到体制的形成。如此开放的系统里，可预见性的水平是很低的，因为非系统性的因素——个体行动的地点、技巧、态度、时间顺序、联系——的力量远比在有着稳定结构的系统中的力量大，在稳定的系里，这些因素的运动是有一定的制度框架的。但是，使行为超越结构的同样的因素也减少了个体影响的可控制性和可预见

性。^① 因此，系统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同时为个人提供了权力也使他们处于无力防卫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成功的空间既很大，同时个人成功的机会也很小。

因此，在转型的过程中，个人变得无力防卫：部分是因为环境不断改变，遵循新的或旧的行为模式、过去的经验、传统和惯例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或带来什么样的成功，已经失去了标准；部分是因为决策者的决策不可预测，不用说，他们自己决策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同时还部分地因为他们在变动和不确定的环境里是无力防卫的。有太多的事情要承受，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可是可以用来参照的太少，而且在太短的时间里出现的结果又太多了（*Bunce and Csanadi, 1993*）。

因此，在流动和不确定的环境里，个人和集团在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前只能不断地进行试验（*Grzelak, 1993*）。适应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个人而且取决于环境。因为一切都在变化，决策过程和决策后果常常是非理性的、很偶然的。很难用理性的推理来解释人们的获胜或失败，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他或她遭受了损失，很难解释他或她到底损失了什么。而且，获胜和损失的概念本身都没有很好的界定。很难说，在目前很重要或早已不重要的一个领域里取得的成功或遭到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会是持续不断的（*Bunce and Csanadi, 1993*）。

为了衡量制度形成的过程中特定因素所起的不同作用，已经制度化的和正在解体的政党 - 国家结构和把外部依附考虑在内的“权力精英”的自由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题目。不过在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强调指出，在形成和解体的过程中的“权力精英”比在制度化了了的政党 - 国家里的“权力精英”其决策的自由度较高，但其效率却较低，因为在制度化的条件下，决策执行的制度框架已经早就给定。关于结构背景的问题，类似的论辩可以适用于这个情形，即，在转型过程和系统结构稳定化的过程中，决策自由与执行效率存在着差异。

第五节 动态转型过程的后果

持续的、累积的不确定性对社会和权力都有多方面的影响。在流动的环境里，决策及其后果都是偶然的，战略性行为的激励面临困难，决策过程经常是非理性的，因为在这种流动的环境里，由于完全没有制度化的条件，或制度化的条件非常原始，所以非系统性的因素起着压倒性的作用，它们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偶然事件。因此，一方面，流动的状态给个人提供了无穷的决策机会和巨大的决策激励，另一方面，流动状态造成的累积的不确定性使得集团和个人变得无力防卫，并且严重阻碍了各个因素的灵活调整，阻碍了行为人在考虑合理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战略规划。

在这个由那些已经消失的、还残余的和新形成的东西联合造成的流动的环境里，展开着一个非常明确和特殊的适应过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动态的重组过程（Csanadi, 1996）。一方面，开始了一个摆脱僵化结构的过程，另一方面，新体制的结构开始形成。这些过程主要包括：

1. 更能干的专业人士带着他们的专业联系、客户、经验和技能离开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转到了私营企业；
2. 大型企业里更有活力和更独立的单位竭力自立门户，因为继续呆在大企业里对它们来说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种利益；
3. 企业出售自己的股票，把不盈利的单位和过多的人力资源甩出去

掌握国家所有权权利的决策者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国家希望摆脱效率低下的资产和活动。所以它把权力下放给没

有财经资源的各种组织从而摆脱它们，而无论这些组织是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医疗保健的组织还是科学组织，同时，它把还在亏损的国有财产售卖出去。

在这个解体过程的不同阶段上，^①私人资本极力吸收一切它能得到的还有用的货物和仍然有救的资源。但是，由于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无论私人部门还是国有部门都流行着短期行为，^②这对转型过程具有特殊的影响。流动的环境既给予了经济行为人获得短期利润的机会，同时也迫使它们必须这样做。

与追求短期利益相配套的行为模式鼓励人们通过分权化，或通过国家、企业或私人债务，或通过提高价格和（或）增加税收来卸掉负担。短期利益进一步鼓励了寻租行为：追求非法利润、隐瞒收入、逃避税收、洗钱、腐败、把利润用于消费或汇出而非用于国内投资、非法的毒品交易以及对环境的掠夺。不仅如此，短期的视角或刺激非正式或非法关系的形成，鼓励决策者绕过合法或制度化的渠道去处理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地下活动构成的严密网络（Vaksberg, 1991）。

因此，一方面，虽然短期行为的动机促使经济焕发新的活力，从而促进了重组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短期行为的动

通过使僵化结构空洞化的方式解体的过程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里大型企业中 1972 年指定为政府密切监管的企业（由于它们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命运。转型的过程中，从这 49 家企业里诞生了 620 家企业，其中一些成功地完成了转型，另一些则在此过程中倒闭了（Voszka 与 Major, 1996）。

^② 从讨论私有化和清盘过程中的幕后操纵和腐败、所谓的“自我私有化”、管理层收购、破产程序、补偿的分配、竞相获取优惠的结果、私有经济与政党的交易、犯罪的类型、非法贸易、新的环境问题等等的各种研究和文章中，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事实。

机也触发了逃逸行为、消耗了价值、阻碍了制度化的进程、刺激了腐败的发展、刺激了寻租行为和洗钱等等，从而它也限制了经济复兴的机会，并且在转型的过程中，使得衰退长期拖延下去（Greskovits, 1993a, b; Kornai, 1993）。

追逐短期利润刺激的经济繁荣将对重组的特征造成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影响了所有权结构和社会结构，它还将对社会的、特别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结构的演变带来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转型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党—国家体制的同构结构的影响。表 6. 1b 显示了自我相似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共同要素会对转型过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交叉连线的消失和党的等级体系的瓦解、党的政治垄断的消失和结构性激励的不复存在、以及结构性的行为的转型政党—国家主要因素的解体。其他因素还包括崩溃以后政党—国家留下的残余、累积的紧张状态和累积的不确定性。这种自我相似性必然导致相似的反应——僵化结构的空洞化、短期行为的弥漫和漫长的衰退。^①

但是，除了具有共同特征以外，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解体过程的速度和方式的不同、崩溃时暴力程度的不同、危机在深度上的差异，动荡程度上的不同，转型的速度和方向上的差异、^② 以及转型导致的不确定性水平的不

^① 例如，在 1990 年到 1994 年间，中东欧国家的 GDP 发展趋势，它们的人均出口和人均进口都是相似的。《转轨国家，1995：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乌克兰》，WIIW 统计手册，维也纳比较经济研究所，第 34—36 页。

^② 例如，中东欧国家之间，中东欧国家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在危机的深度和复苏的速度上存在着差异，它们的实际 GDP、人均 GDP、债务、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同上，第 35、37 页。

同，都表现了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差异（见表 7. 1b）。

第七章 转型过程中遗产的差异

第一节 一些问题

正如转型过程的共同特征可以看作是政党—国家体制共同特征的结果一样，转型过程在规模和效果上的差异往往也可以从各个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差异中找到原因。这些差异是由交叉连线的分布、程度、密度和类型的不同，反馈的起点、连接点和终点的不同，以及资源的集权化程度的差异造成的。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各个结构内部的权力分配是不同的，从而也造成了依附和利益实施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造成了原子化程度上的不同，造成了建于其上的自我支持机制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最后导致了各个政党—国家在推迟结构性资源短缺的发展的能力方面出现差异，即，导致它们的自我支持能力、重组战略、行为战略以及在自我毁灭机制方面各不相同。这些内在的差异及其后果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转型过程的差异。

由于各个政党—国家的遗产不同，所以很难对转型过程的差异进行实证的比较。这是因为，尽管对政党—国家体制的各个方面已经有了高水平的分析，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僵化，在匈牙利进行的这种实证研究在其他政党—国家体制里无法开展。因此，为了能够应用匈牙利的方法对权力分配的差异进行

实证的比较，还需要作大量的文献研究工作。

如果这样的研究开展起来，那将会是富有成果的，因为在本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我已经为研究数据的评估提供了分析工具。在这两个部分，我已经实证地指出了政党—国家体制的共同构成要素（党、国家、国家所有制、 D_2 交叉连线和 I_3 反馈），指出了各个政党—国家体制存在差异的结构原因。这项研究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里，大量的文件和数据正在销毁，各个国家剩下的材料已经不太连贯了。

即使文件研究的工作是完备的，在把上述实证地揭示的指标与通过文件研究推导出来的具体的政党—国家结构直接联系起来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搞清楚偶然因素在既定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这些因素包括时机、决策的顺序、决策过程中某个可能出现的因素、文化、传统行为、历史、政治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以及这些因素与特定结构的结构性结果和动态结果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Janos, 1989）。

因此，如果要用结构方法作为分析的工具，那么只有在完成了这些复杂的调查和分析以后，我们才能根据其本来面目对不同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以及它们的动态过程开始进行可靠的实证比较。这显然是一个仍然有着广阔前景的领域，其中可以产生非常有用的成果。下面是一个逻辑推演，阐述政党—国家的共同特征之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结果。

第二节 政党—国家的两个理论结构的比较

让我们通过两个假设的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阐述其中的差异及其后果。如前文所述，它们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内部的权力分配上，内部权力分配的不同是由交叉依附连线和反馈系统

结成的复杂网络的差异，以及集权程度和资源分配上的差异联合造成的。其中之一较为接近斯大林模式，另一个是基本根据匈牙利型的结构建立起来的。^①图 7.1 的体制 (A) 与体制 (B) 显示了这两个体制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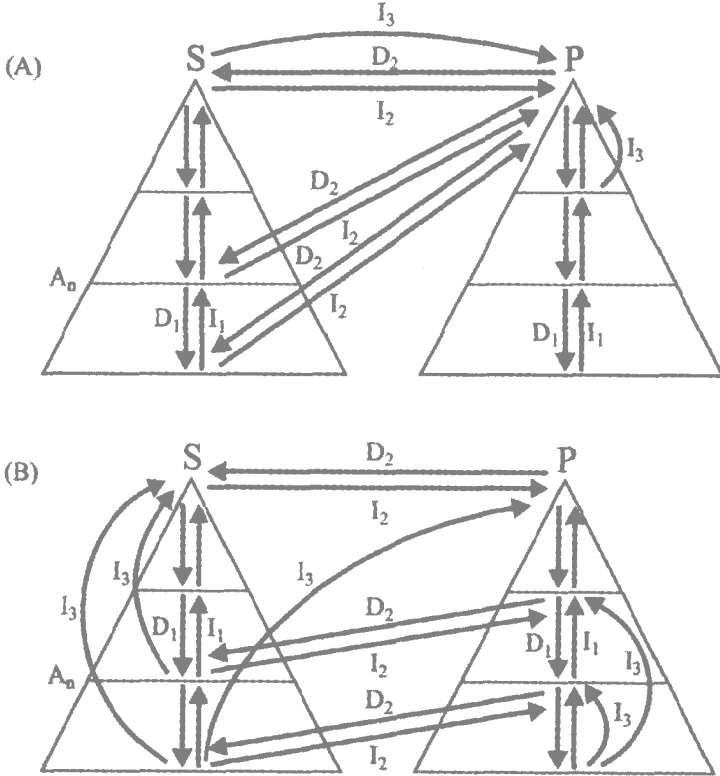
在体制 (A) 里，党等级体系里交叉连线的起源是高度集中的；这里，权力集中在最高层。连线尽可能多地延伸各种行为、组织和职位上的个体决策者。在国家等级体系里，权力和职能也是高度集中的，决策高度集中地作出，资源高度集中地进行分配。等级体系里的反馈几乎都是起源于党或国家的中上层。起源于等级体系下层的反馈非常少，到达等级体系最顶峰的反馈也非常少。有直接经济力量的决策者（例如，一家企业或一个合作社的决策者）建立的跨等级的反馈也很少。这就意味着经济决策者的政治谈判力是比较弱的。

为了能够对体制 (A) 和体制 (B) 进行分析和比较，我不得不依靠描述政党—国家体制集权化程度不同的资料。在联合国 1970 年作的题为《若干东欧国家和苏联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纽约：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实证调查以外，还要加上一些研究者关于罗马尼亚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所作的描述和分析（Hough, 1969; Fainsod, 1958; Fejto, 1991; Rittersporn, 1983; Verdery and Kligman, 1990; Kligman, 1990; Pacepa (ed.) 1989; Henya, et al. 1990; Burns, 1987）。我还分析和应用了下列材料中关于党中央委员及其各部门负责人的职业和工作经历的数据：1957 与 1960 年党代表大会纪要，1960 年到 1963 年间 IPHA 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及其机关的干部任免权限（干部任命花名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关于中央委员会干部任免名单的决议”，1960 年 2 月 23 日，IPHA 31A/211；“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关于中央党组织干部任命花名册的决议”，1963 年 2 月 5 日，IPHA 20/257. s. u.）。

图 7. 1 政党—国家体制权力结构的两个假想模型：

(A) 结构性反馈稀少的集权结构；

(B) 结构性反馈密集的相对分权的结构



注

D₁, D₂ 依附连线

I₁, I₂, I₃ 利益实施

图 7. 1 的体制 (B) 代表了第二种假设的政党—国家体制。这里, 交叉连线的起源比较分权化, 这意味着党中央的统治不直接, 权力和职能不是那么集中, 资源倾向于较不集中, 因此分配倾向于更加分权化。国家的间接管理得到更广泛的采用。起源于有直接经济力量的决策者到达党和国家等级体系之中上层的等级体系内和跨等级体系的反馈比较多。这就意味着经济领域内的某些决策者的谈判能力比较大。

表 7. 1b 显示了对体制 (A) 和体制 (B) 进行比较时政党—国家体制的各个特征与两个假想例子相近的程度。接近的程度分别用弱 (w)、一般 (f) 和强 (s) 来表示。表 7. 1a 中两种体制在各项上的差异不能与表 7. 1b 中显示的转型差异进行直接的一一对应的比较, 因为转型过程的任何一个特征都不是政党—国家体制中某个因素造成的结果, 而是几个因素相互作用共同的结果。

让我们更详细地分析这些数据。从权力、所有权和资源是高度集中的角度看, 在体制 (A) 里, 单向依附是很强的。资源的再分配通过长期、中期和短期计划以及执行计划的严格的责任系统来实现 (Kornai, 1957)。最后期限的保证和经济计划的执行是通过运动、紧缩和来自政治警察的压力来达成的。利益实施的渠道较间接也较少, 因为通过等级体系内或跨等级体系的依附连线进行的利益实施只可能到达上一级的决策者。因此, 找到同盟军是很难的, 因为经济行为人很少会晤其他等级体系不同层级上的决策者, 或者很少见到本等级体系内其他层级上的决策者。由于反馈稀少, 依附的基本网络很集权, 利益实施很集中, 所以行为人被原子化的程度更大。干预时常发生并且往往到达最下层, 因为原子化的程度和资源集中的程度是那么高。决策者之间的请求和需要都只能通过“中央”的调节

才能实现。因此，决策者的自主自治极其有限。

表 7. 1a 政党—国家 (A) 与 (B) 的不同特征

政党—国家体制的特征	A	B
交叉连线的集中程度	强	弱
来自经济领域的反馈	弱	强
原子化的程度	强	中
通过依附连线 直接实现的利益实施		
D_1 (等级体系内) 与 D_2 (交叉连线)	强	中
干预的深度	强	中
产权集中的程度	强	中
再分配中权力的集中度	强	中
中央指令的作用	强	中弱
计划指令的作用	强	中弱
为了弥补内聚力的削弱：		
—— 组织运动	强	中弱
—— 进一步紧缩	强	中弱
—— 加大压力	强	弱
—— 进行改革	弱	强
决策者找到同盟军的能力	弱	中强
对资源开发的相对限制	弱	中强
对权力集中的制约	弱	强
对资源集中的制约	弱	强
决策者的反抗能力	弱	中强
秘密警察和警察的力量和调动	强	弱
把各种利益考虑进去的压力	弱	中强
利益、行为和活动的日益复杂性	弱	中强
经济的适应能力	弱	中强
持续的过度运行的可能性	弱	强

表 7. 1b 政党—国家 (A) 与 (B)
对转型过程不同特征的影响

转型过程的特征	A	B
结构松弛的渐进性	弱	强
突然崩溃	强	弱
交叉连线的解构	弱	强
党内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裂	弱	强
持续原子化	强	中
基本要素的解体	弱	中
前秘密警察的解体	弱	中
政党之间冲突的程度	强	中
社会利益的复杂性	弱	中
经济利益的复杂性	弱	强
各领域的分离 (政治、经济、文化等)	弱	中
经济自由化的程度	弱	强
政治自由化	中弱	强
经济的适应性和宽容度	弱	中强
经济危机的程度	强	中
混乱的制度系统	强	中
资源短缺	强	中
负债	弱	强
市场的损失	强	中强
社会与政府的冲突	强	中
社会内部的冲突	强	弱

转型过程的特征	A	B
新结构岛屿的出现	中	强
新结构的稳定化（制度化）	弱	中
动态过程中形势的紧张程度	强	中
经济政策的激进手段（试验）	强	中
紧张状态与矛盾的程度	强	中
不确定性的程度	强	中
重组中的经济与政治困难	强	中
特殊因素的作用	强	中
经济与政治波动的频率与幅度	强	中
对强力领袖的渴望	强	中
社会激进化的可能性	强	弱

即使受到了资源短缺的削弱，体制的内聚力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资源集中、运动、政治压力、威胁和对现行权力结构的重新组织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得到再生。在结构内原子化程度很高的情况下，这种重新组织不会有遭到强烈抵抗的风险。或者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反抗，党也很容易就能把它压制住。因此，这种权力结构中的资源开发在很长的时期里基本上是不受约束的。然而，持续的、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将增加交叉连线的密度，使它们向结构的深处不断延伸，并将增强警察控制的强度以便在尽可能多的方面把事务的发展掌握在手中。由于同样的原因，体制不会紧迫地感到有对外部世界开放的需要；即使对外债的偿还也可以在不必进行政治与经济开放或适应的情况下得以完成。

由于这个结构能够把资源储备中尚存的资源都挤出来，从

而为自我支持机制提供新的输入，所以它没有必要通过不仅创造新的资源而且创造新的职能、组织、职位、行为模式和利益的改革（Szamuely, 1986）来进行调整的紧迫感。这就是为什么最初建立的、简单的行为结构、组织结构和职务结构（交叉连线涵盖的东西）基本保持不变的原因。此外，在复杂程度日渐发展的情况下，它还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职能的合并和职位的重组来保持简单的特点，从而进一步使权力集中化（Bauer and Szamuely, 1979; Voszka, 1980; Schweitzer, 1982）。

在这样的权力分配下，结构不会松弛和瓦解。但是，这种形势也隐藏着一个陷阱：连线延展得越深，系统就变得越不透明与模糊；紧缩越强烈，实现要求的难度就越大，从而决策者就越愿意使别人腐败，也越可能被腐败。

连线对决策者的束缚越紧，干预就越经常发生，自由行动的空间就越小，权力斗争就越隐蔽，公开的政治派系不会形成。在信息不能自由流动、又没有可行的替代（例如，有效的利益调解机制^①）的条件下，被原子化的垄断结构内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都不可能出现横向联系与集体的反对，与此同时，政治与经济压迫使得内部的紧张状态逐渐加剧。

正是因为类似于体制（A）的系统内的权力结构没有对资源的掠夺设下限制，所以，这些系统（在政治理性基础上运行的过程中）实际上“啃掉了一切直到自己的骨头”。因此，与体制（B）相比，体制（A）的运行远远超出了效率的考虑所能允许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在出现替代的可能时体制（A）的崩溃是如此迅速和容易的原因，它的崩溃显然没有受到任何

^① 这里我特意排除了制度化但非法地协助资源非正式再分配和私人财富积累的网络（Brown, 1992; Vaksberg, 1991）。

的阻碍，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隐藏在政党—国家权力保护背后的威胁性的隐蔽力量消失了，体制合法性所依赖的服从与合作不见了，偶然或刻意采取的行动导致累积的紧张状态浮出表面。人们小心翼翼的心态消失了，社会出于强迫的忍耐和受到压制的不满爆发了出来，形成了群众性的集体反对（Kligman, 1990）。但是，必须指出，导致体制（B）崩溃的同样也不是经济效率的缺乏，而是权力结构本身造成的无法进一步掠夺资源的障碍。

与体制（A）不同，体制（B）的解体是通过一度为体制鲜明特征的内聚力的逐渐削弱而进行。这种削弱是由资源短缺引起的，由强制路径的维系引起的，由改革的加速所造成的与体制不相适应的利益、社会阶层和行为模式的持续分化引起的。

体制（A）没有逐渐解体的过程，在崩溃的时候，利益、行为模式和社会与财产结构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分化，而国有产权包含的范围广得多，集中的经济力量也大得多。

不仅如此，这个体制的现代化水平低得多，基础设施较不发达，资源掠夺的程度大得多，面向新技术的调整难得多，因为体制（A）里的规范和预期与发达市场经济里的规范和预期^①相近的东西比体制（B）的少得多。调整的机会受限得多。因此，经济与社会危机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刻，而衰退的时期拖得更长。结果，国家想进一步集中收入的动机更大了。而且，在几十年前体制（B）就进行的改革在体制（A）里很晚才进行或者根本没有进行。所有这些都表明，后者的国家官僚机器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与体制（B）相比，对体制（A）

见 Verdery and Kligman, (1990); Verdery, (1991).

形成新政治组织的时间约束也紧得多。由于原子化，及其造成的弱小的谈判能力和弱小的妥协意愿，转型过程中新政治组织和利益组织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孤立的状态，无法成长起来和进行合作。

由于基础设施不发达，资源短缺和时间与经验的缺乏，选民甚至没有机会去熟悉新的政党。因此，对那些所主张的目标与人们熟悉的政党不同的党的信心在体制（A）里的发展比在体制（B）里缓慢得多，因为公众没有意识到这些新政党在过去的活动，甚至可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A）型体制的前共产党国家，共产党“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党，然后在首次自由选举中赢得胜利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比（B）型体制的大得多的原因。前一种体制里，冲突没有公开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保守派没有公开失去他们的可靠性，意味着不能清楚地把他们与改革派区分开来。结果，前者的组织还能够很容易地利用它所熟悉的政党机器之外的基础设施（包括国家官僚机器的某些部分以及从前的强制机构）。同时，在它们的政府任期内，紧张的程度和不确定性的水平高得多，流动效应造成的学习和适应困难也大得多。打破原子化的锁链的困难更大，因为对不同事物和伴随转型过程而来的艰难的忍受力较低，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低。阻碍决策战略发展的障碍很多，因为决策结构内非系统性的因素的作用很大，实现利益有效沟通的传送带的形成非常慢。另一方面，由于感到未来没有希望，社会弥漫着失望的情绪——格泽拉克（Grzelak）（1993）称之为“集体无助感”的发展。这反过来阻碍了制度化的逐渐加强，使社会很容易转向激进主义

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危机促使大众支持极端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党派。结果，在更大的动乱和行动出现的同时，促使残余

结构更迅速地消亡和调整的实际激励更小了。体制 (A) 的更大特征是缺乏内部激励, 这意味着在众多的行为中, 有效重组的行为很少, 联合的速度很慢。

紧张程度高得多同时内部激励的水平很低产生的了一个直接后果, 即, 一个替代性的有组织的力量可能很容易切入被从前的制度所遗留下来的行为、功能和制度的废墟之中, 成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基础设施, 重新激活这些残余 [见, 例如, 前苏联共和国许多地区黑手党的活动 (Brown, 1992; Derlugian, 1993; Vaksberg, 1991) 或者罗马尼亚极右翼获得的支持]。

另一方面, 随着集中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动机逐渐增强以及对资源的控制不断集中, 形成威权体制、经济继续停滞不前、危机继续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伴随着危机的拉长, 强烈的内部压力不仅增加了社会激进化的可能性, 而且就该事实而论很可能造成动荡、内部冲突的激化, 以及因此而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体制 (A) 里的政府会迅速失去他们的社会支持, 因为社会经济危机很容易被新成立的有大批群众支持的极右党派指责是他们造成的。

在体制 (B) 里, 转型开始后的首届政府的支持率也会迅速下降, 并且由于执政党的内部危机, 极右翼也会出现, 但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因, 它们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要小得多:

我们可以分别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作为体制 (A) 与 (B) 的例子来说明上述内容。在罗马尼亚, 乔治·福纳尔和其他极端势力在国会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 在匈牙利, 1992 到 1994 年间, 尽管条件非常有利, 但是伊什特万·楚尔卡想要夺取多数执政联盟领导权的努力还是归于失败, 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因此，由于结构性的因素，体制（A）里极右翼的势力是在社会危机的框架下发展的，而在体制（B）里极右翼的势力只是在政党危机的框架下发展的。（Csanadi, 1994）

那么，关于政党—国家体制的差异对转型期间制度化过程的影响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同构模式内的结构差异不仅表现在政党—国家体制运行方式的不同上，而且表现在它们的解体、崩溃和转型的速度和方式的不同上。造成政党—国家体制大量差异的那些特征也将对转型的起点、伴随转型过程的动荡、制度化的方向以及政治结构之间的差异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们也将强烈地影响残余的僵化程度、紧张状态的水平、解体和重组的速度和深度、破坏和暴露的水平，以及适应的强迫程度。这些因素还将强烈影响新兴结构稳定下来的机会、转型期间不确定性的水平、社会动乱的可能性、极端运动和党派的社会基础及其获得成功的机会。不仅如此，不仅体制层次上的同构性会影响转型和制度化的过程，而且不同层次上有着不同的权力分配的同构单位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这些单位不同的转型过程 [不论是联邦还是较小的区域单位（Bunce, 1995）工会、企业、地区等等] 取决于它们先前的权力分配，并增加了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①。

尽管转型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重大差异不仅仅取决于政党—国家结构的遗产这一点是清楚的，转型受到其他一些一般和具体的因素的影响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但是理解它们的影响将大大地有助于解释其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①

关于文化、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对东欧发展的影响，见 Janos, (1989)。

第五篇 结 论

第八章 结 论

第一节 思想和结果

让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本书的一些重要思想，因为它们与下面的论述甚为相关。本书最根本的论点是，政党—国家体制是建立在一个共同原则的基础上的，即，自我相似或同构式（Mandelbrot, 1983）的模式。也就是说：（1）直到最小的单位，政党—国家体制都是由自我相似的要素组成的；（2）这些要素是根据同样的原则互相联系起来的；并且（3）在这种自我相似基础上的政党—国家体制的主要运行原则也是相同的。

政党—国家体制的要素有：党等级体系；国家（非党）等级体系；垄断的国家所有制；把党等级体系与国家等级体系连接起来的依附连线，超越制度障碍连接到各个决策者的依附连线和反馈体系。更具体地说，依附连线是党的权力的政治工具，^①党通过它实现对国家的控制。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个连接原则的背景：政党—国家体制里交叉依附连线只能起源于党等级体系；反馈系统跨越了党等级体系、国家等级体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依附连线。这里我们有了第二条连接原则：利用交叉依附连线的越级反馈只能起源于非党等级体系。

这些工具包括：涵盖非党结构重要职位上的个体决策者的干部任命体制，通过组织达到决策者的指示系统，通过其活动到达决策者的业务主管责任制，以及党员执行党的决议的义务。

这张复杂的网构成了一个极其微妙、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并对等级制的传统规则提出了挑战。这种共同的模式在政党—国家体制中的存在是不论时间（例如，1923年的俄国或1985年的匈牙利）、空间（例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苏联或如一些研究认为的——也包括中国在内）与深度 [例如，苏联与东欧集团、苏联自身、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 (Bunce, 1985; 1989; 1995)]，不论一个省 (Qian Y. and Xu Ch., 1993)、一个区、一家企业 (Csanadi, 1990a; 1991a) 或该企业的车间 (Walder, 1986; 1989) 的。不仅如此，政党—国家体制的自我相似性还与各个体系所处的条件无关，即，与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或解体阶段 [例如，以苏联创立干部任命制为标志的苏联体制的形成 (Rigby, 1988) 或1956年革命以后的匈牙利体制及其80年代后半期崩溃之前的体制 (Csanadi, 1991a)] 无关。

本书前面各章节的分析表明，政党—国家体制运行中的共同特征及其行为后果，一方面为结构提供了自我支持的机制，另一方面也同时构成了最终导致体制解体和崩溃的陷阱。这些体制的政治理性运行原则构成了这些陷阱的基本要素。它给创造了内聚力和使结构的自我再生产成为可能的行为的基本动机埋下了毁灭的种子。这是因为，在一个被政治所垄断的体制内，政治理性预期导出了同样理性的一套适应政治的行为模式，它反过来在经济上破坏了这个体制，不论权力分配有什么

样的差异从而运行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都是如此。^① 这种行为模式为经济和社会创造了建立在政治基础上的固定路径和僵硬结构，它反过来推动了软预算约束的发展。在为了重新创造内聚力而进行改革时，这种行为驱使改革去适应体制而不是使体制发生转变。同时，由于改革的复杂性，改革逐渐瓦解了体制的行为结构、利益结构、职位结构、活动结构和组织结构被垄断的状况。因此，政党—国家体制里经济危机、崩溃和转型的发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②

尽管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式是自我相似的，但是各个政党—国家的权力分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交叉依附连线的密度，它们到达的地方，资源集中的程度，反馈的频率，反馈起源的层次和地方以及反馈的终点，以及接受这些反馈的行为人的地位和身份。这些因素反过来决定了即定结构内的特殊性和细微差别，即，决定了它们在集权程度、运行和再生产以及解体过程的持续时间和崩溃的暴力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结果显示，自我相似的特征以及在此之上的内部权力分配上的差异，二者都对转型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已经在考虑（1）政党—国家结构的自我相似性（2）它们之间的差异的

这些行为模式的要素是：通过对资源的垄断开发和垄断的再分配来干预生产，同时，为了从基于经济单位在政治上的战略地位（规模巨大、工人数量众多、地理位置重要、某些物品对国内的特殊供应或对苏联要求的供应、党的不同等级的机构的一员）进行的政治理性的选择性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就有相应的适应动机。出于对再分配的关注而进行的适应驱使生产注重的是数量而非质量，驱使行为人去满足政治期望，驱使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增长和政治职位，以及驱使行为人为人储藏资源。

^② 这些特征在多家杂志的很多文章中都有详细的描述（Csanadi, 1989; 1990a; 1991a, b; 1993; Csanadi and Lorincz, 1992）。

基础上，粗略地勾画了转型期间制度化过程可能走的路线。

(1) 政党—国家体制的自我相似模式也给转型过程引入了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是政党—国家崩溃后留下的残余以及累积的紧张状态和不确定性。它还使得这些要素引起了相似的反应——僵硬结构的空洞化、重新适应的短期行为以及久拖不绝的衰退。

(2) 政党—国家体制之间的结构差异表现在解体、崩溃和转型过程的速度和方式的不同上。这是因为造成政党—国家结构巨大差异的特征也会对转型的起点、伴随转型过程的动荡、制度化过程采取的方向以及政治结构将会出现的差异产生影响。此外，这些特征将强烈地影响残余的僵硬程度、紧张状态的水平、解体和重组的速度和深度、破坏的程度和无力防卫的程度，以及适应的压力。这些特征将进一步影响新兴结构稳定下来的机会、转型期间不确定性的水平、社会暴乱的可能性，以及极端社会运动和党派的支持基础及其成功的机会。

在这个简短总结的基础上，我将对已经被科学界认为是公理的有关政党—国家体制及其转型的一些观点进行反思，本书的结论可能对这些问题提出不同的解释。

第二节 对一些“传统”论点的反思

1. 单一角度的方法足以描述政党—国家体制的运行吗？

我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证发现支持的出发点是，国家与政党、经济与权力以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放在一起进行分析，才能揭示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和发现它们运行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对所有制关系、组织体制、决策者的利益和行为模式，以及他们的依附关系和利益实施关系进行

同时的考察。

2. 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实际上是等级制的吗？

我已经力图证明，政党—国家体制的权力结构可以用党的垄断地位及其权力工具来描述。在此基础上，政党—国家结构是由以下基本要素组成的：国家（非党）等级体系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党等级体系，起源于党把非党等级体系与党连接起来的交叉依附连线，以及结构性的反馈。在这样的政党—国家结构里，等级制的规则及其运行结果只是部分适用的：它仍然具有韦伯式等级制规则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即，依附的单向性，但是其他特征却消失了：

(1) 由于反馈体系的存在，很难分辨出结构的最高点；

(2) 等级体系内的单线（single-threaded）依附削弱了，因为党的权力工具穿透了非党机构的界限，直接连接到个人，从而依附变成了多线的（multi-threaded）（见 D_1 与 D_2 ）；

(3) 随着交叉连线的应用，等级体系内的依附连线以及等级体系的不同层级都变得可以规避的了；

(4) 在序列和级别方面正规等级制的规则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损害：一方面，在正规的等级制里，越往上决策者的级别就越高、权力就越大；另一方面，同一级别的决策者应该在同一个层级上。这两个方面的规则受到扰乱的原因是交叉连线和结构性反馈的存在，因为由于二者的作用，某些决策者的实际谈判能力与他们在正规等级制里的地位是不能划等号的。因此，在正式等级体系的不同层级上，我们都会发现决策者的正式级别是一样的，但他们的谈判力量却不同。如果我们把视野限制在一个等级结构的运行上，我们将不能理解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后果，我们将因为缺乏必要的分析工具而无法对它们进行分

析。

3. 政党—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独裁（**Monolithic**）的单位来处理吗？

由于在利益实施方面基本要素有很大的差异和选择性，会出现巨大的不平等，即使最简单的政党—国家体制也可以有很强的构成性。这个论断与传统的观点不同，传统的观点把政治垄断与利益和行为模式的一致性混淆起来了，从而把这些体制看作是独裁的。

4. 如果我们孤立地分析政党—国家体制内的各个因素，我们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吗？

通过政党—国家结构的特殊性质，党与国家、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社会与权力、决策与权力结构，以及决策与行政权力都变得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并清楚地意识到用孤立的方法分析政党—国家所具有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记住决策是在这样一个领域内作出的、必须记住制度或集团之间都有联系和权力关系，记住事实上任何一个集团与另一个社会集团或制度之间都有关系。如果要分析的问题是放在依附和利益实施关系的背景下，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够理解如社会与权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经济管理与企业、苏联与东欧关系等等双方关系的演变。这个方法也同样应该应用到那些看起来与体制的运行无关的子系统里去：特定地区小市场的运行、私人领域、非正式的互利互惠网络、物物交换关系的网络，等等。

5. 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宣布建设社会主义是否足以区

分政党—国家体制的特征？

我认为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有一种同构模式，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它们的结构的基本要素、它们的相互连接的原则以及它们运行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我已经强调指出，不论一个国家起初的发展水平如何，政党—国家体制演变的环境如何，政党—国家结构的发展路线如何，它（当前）的条件和地区差异如何，这些共同的标准都是存在的。自我相似性既存在于一个企业内某个部门与企业党委的关系之中，也存在于苏联与苏联集团的东欧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之中。换句话说，自我相似性的存在与时间、空间、深度和结构所处的条件是没有关系的。自我相似性使得政党—国家体制有一种同构式的模式。我认为这些因素合起来已经构成了一种可以清楚地把政党—国家体制与其他体制区分开来的结构性标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是体制的一个因素但仅仅是基本因素之一，而从体制运行的角度看，宣布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标准。

6. 不同政党—国家体制之间的差异是否可以理解为纯粹是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造成的结果？

尽管有同构的特征，但是认为所有政党—国家体制的制度安排都是一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自我相似性并没有排除在各个集合体（从商店到省到联邦或集团）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结构性差异的可能性。差异取决于交叉连线和反馈的位置、它们的程度和密度、它们在等级体系里起源的位置和它们连接的层级，以及资源再分配的集中程度。是所有这些要素上的差异的总和才构成了具体的政党—国家结构的内部权力形态（即，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的差异影响了这些结构在条件、时间和运行上的差异。但是，给定体制里最终演变出来的特殊总和决定

于许多特定的因素，如体制演变时刻的历史形势、该国的发展水平、它的文化与历史传统、它的地理形势，等等。

7. 集权结构是政党—国家体制的普遍标准吗？

在内部权力分配存在巨大多样性的各个方面，作为政党—国家体制特征的集权化也具有巨大多样性。把集权结构当作普遍特征将限制我们解释政党—国家结构的运行和解体存在巨大差异的能力。如果我们无视政党—国家结构的特殊特征而把集权的基本网络视为惟一的等级结构，那么我们将无法揭示现实。

8. 政党—国家体制里的党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组织吗？

如果我们把政党—国家体制看作是其他种类体制里垄断的政治领域，那将是误导人的，因为由于有了那些权力工具，政党—国家体制里的党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组织了，它本身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经济权力系统。因此，作为被政治所垄断的系统的政党—国家——无论是否集权，不能与其他体制的垄断的政治领域等量齐观，或者与垄断政治领域的政治组织本身相提并论。

9. 是否可以将政党—国家体制内发生的分权化看作是多元化的前兆？

在上述论点的基础上，由于早已指出的基本体制差异，垄断政治领域的多元化与被政治所垄断的体制内决策的分权化、职能的分权化或交叉依附连线的分权化是不一样的。后者的政治垄断并不因分权化而消除了，只是被政治所垄断的结构里内部权力分配发生了改变，由此依附和利益实施模式发生了重

组。与此同时，分权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前的内部权力分配、它的条件以及在即定权力结构内可以取得的资源。

10. 软预算约束是政党—国家体制的一个普遍特征吗？

起源于党的交叉连线和反馈造成的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结构化是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发展的。又是政治理性造成了决策者在正式等级制里的地位与他们谈判地位的实际力量之间出现了差异。也正是政治考虑在获得被政治所垄断的资源方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政治考虑的选择决定了再分配。所以，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并不是政党—国家的普遍特征，软预算约束的选择性才是普遍特征。选择性的软预算约束是由体现在资源分配中的基于政治理性的选择性造成的。

11. 强制、意识形态和奉献精神是否能够充分解释政党—国家体制的内聚力？

分析表明，即使是“路线最强硬”的政党—国家体制里，体制的内聚力也不仅仅是建立在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强制、意识形态或奉献精神上的，而是结构性的动机和与这些动机相一致的体制适应的行为模式产生的利益使然。维持内聚力的行为模式同时也创造了一种自我支持的过程。在没有结构性动机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强制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是很难长期运行下去和维持下去的。

12. 政党—国家体制内增长驱动的原因是否是决策者的内部（返祖）动机？

在被政治所垄断的关系里，作为一个乞求者，决策者对于通过依附连线加在他（她）身上的期望来说是无防力的，但

是，与此同时，满足这些期望以便获得资源是符合他（她）的利益的，因为除了通过依附连线以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获得资源。因为基于政治理性的和体现在再分配模式中的选择性的考虑主要是根据企业的政治战略规模作出的，根据它们在本地区的规模和它们的政治地位作出的，所以，对资源的追求是受着满足这些分配条件的驱使的。要满足这些条件就要拼命扩张、储存、投资和消耗资源，因此，这些反应是体制适应的行为模式造成的，不是由决策者的什么天生特性造成的。

13. 资源约束的经济是否可以仅仅用经济的观点来解释？

资源约束的经济其背后的原因是被政治所垄断的结构特殊运行，在其运行过程中，反复乞求的目标和权力运用的基础是资源的获得、汲取和再分配。在被政治所垄断的结构框架下演变出来的资源约束的经济出现短缺，是由被政治所垄断的关系所创造的动机和与此相联的体制适应的行为模式造成的，并由它们再生产的。下面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即，随着体制的崩溃，这些行为模式实际上也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根源于此的短缺也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不会因为其他原因而出现短缺。）

14. 缺乏对效率的追求和软预算约束是否直接源自对方？短缺的存在是否只是起到了维持这种状况的作用？

是体制运行的基本原理造成了，在自我支持的机制内，对资源的汲取是不存在经济效率约束的，因此在政治理性基础上的选择性再分配是没有经济效率约束的，从而在自我支持的过程也是不存在经济效率约束的。与资源分配相关的利益和行为模式是无效率的考虑的。这种约束的缺乏是体制的特性，不

是行为的特性；这（缺乏）反应在体制适应的行为模式上。因此，软预算约束和对效率缺乏兴趣不能相互解释，只能用体制运行的特征来解释。恰恰是体制运行造成的效率约束的缺乏解释了为什么自我支持的机制变成了自我毁灭的机制。部分是由于这个后果，所以体制的崩溃在各个地方都一样总是伴随着经济的危机。

15. 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特定行为和决策决定了政党一国家体制内进行的是真正的改革抑或仅仅是一场重新组织吗？

是内部权力分配而不是经济效率考虑决定了结构性资源约束的定期出现。结构性资源约束出现的时刻，是即定的结构下不可能进一步汲取资源的时刻。换句话说，自我支持的机制“运转过了头”。在这样的时刻，体制的内聚力削弱了，权力关系发生改变。对更多资源的汲取，以及伴随而来的内聚力的重新建立，使通过权力关系的改变或者说权力结构的内部重组才成为可能的。重组的工具是结构给定的。内部权力分配的集权程度越高，与经济相联的反馈越弱，发掘额外资源的手段就会采取运动和直接的重新组织。基本网络内分权化的水平越高，其中强有力的经济反馈越多，运动和重新组织从而通过它们进行的资源调配遇到的障碍就越多。在中央运动的效率受到阻碍的条件下，权力关系的重组和对资源的需求都促成了改革的发生。因此，改革措施的采纳主要不是一个经济政策选择的问题，它是取决于权力的内部分配的。从自我支持机制的观点看，在给定的权力分配下，改革与可用的资源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如果有可用的资源，改革就不会发生；如果没有可用的资源，就会发动改革。这也意味着，即定背景下改革的作用不一定是进化性的（即，导向市场化的）因为在一个长时期里它们

帮助了现存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再生产。

16. 是反改革力量出现造成了半途而废的现象，造成了改革的失败和一次又一次的倒退吗？

基本结构、运行和连接原则的自我相似性创造了自我相似的内部规则，它们也体现在认知、决策、处置和体制适应性的过程中。这些自我相似性的体现方式非常丰富：它体现在个人精神分裂的行为模式里，体现在决策的过程中、在决策的手段和工具中、在制度的行为模式里、在各种改革措施的命运里、在结构的自我支持过程里、也在它的陷阱里。因此，为了积极促使改革失败，一个人并不需要反对改革。正是这种内部规则把它们的影响施加到每个人身上从而导致重复出现改革的倒退。反改革力量只是加快了体制适应的过程。所以这些也表明，从进化的观点看，政党—国家作为一种系统其学习能力是很有限的，因为，它的投入（例如改革）是按照它们对维持这个系统是否有用来进行的，而不是根据它们对改善这个系统是否有用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它逐渐地对它们作出调整使之适应体制。

17. 真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人们的信仰导致了政党—国家体制的解体吗？

解体的不同程度和速度是结构内权力分配的特性造成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结果。这是确实的，因为信仰的消失（它是一个与优先目标的消逝和替代选择的出现相平行的逐渐展开的过程，不是一个突然的事件）既发生在那些展开了逐渐解体的政党—国家体制里，也发生在那些只发生了崩溃的地方。在一个逐渐解体的结构里，解体的环境和信仰的消失会有一个互相加

速的影响。在那些没有发生解体（缺乏可替代的选择）的政党—国家结构里，信仰的消失将较为缓慢，它将激化结构内的紧张状态，使得后来的崩溃更加的暴力。

18. 每一个政党—国家体制崩溃前都必然有一个解体的过程吗？

持久的过度运行（同时伴随着改革的加速和解体的过程）不一定会在每一个政党—国家体制发生。其原因在于内部重组的可能性是结构特点给定的。在有着大量反馈的体制里，持久过度运行的阶段才会出现得早一些，也正因为此，才引起体制内聚力的稳步下降。在反馈较少较弱的政党—国家体制里，权力结构使得重新安排的进行比较容易，从而推迟持久过度运行的来临。因此，在同构状态下，权力分配和对适用手段的应用上的差异对崩溃之前是否有逐渐解体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由此，它们对崩溃（这是任何政党—国家体制都必然会发生的）的暴力或和缓程度也产生了影响。

19. 政党—国家体制的崩溃和存续可以归因于外生因素吗？

在同构结构的各个自我相似的单位内，一方面，在发生着类似的自我支持和自我毁灭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互相交织的状态，各个单位的运行和解体的方式对整个结构体系都产生影响。因此，同样也是由于政党—国家体制的同构性质，造成了结构的特征、运行、解体和崩溃不是出于内生或外生的因素，而是出于同构结构本身造成的机制。不过，从被观察的单位的角度看，推动运行和导致崩溃的机制既可以是外生的也可以是内生的。

20. 转型的基本特征可以用自由主义民主的特征和市场经济来揭示吗？

用理想体制去回述，我们将只能发现缺点和偏离，而不会发现实际发生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一个体制并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考察它的残余，就会发现，政党—国家体制共同的结构特征极大地影响了伴随着转型过程共同特征。不仅如此，在结构特性里，不同的政党—国家体制在权力分配上的差异对转型的暴力程度、对构建与制度化的方向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会对正在演变中的各个政治结构之间的差异产生深远的影响。

21. 关于转型和促进经济增长有共同的药方吗？

政党—国家体制的同构性质使得在崩溃的余波中将出现一些共同要素——残余、紧张状态和不确定性。它还导致了这些特征引起的反应是一致的：传统的僵硬结构的空洞化，短期适应和久拖不绝的衰退。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同构性及其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是有可能为增长的发动开出一个相似的处方的。但是我们知道影响转型的并不仅仅是共同的要素，而且同构特征上的差异甚至在崩溃以后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共同特征影响转型的水平，对转型起点的发展水平，对过程的有序程度，对政治极端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对掌握权力的人的特点，对转型的方向，对它们是和平的、暴力的还是起伏不定的，等等，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试图强迫实施一个共同的处方，无论它是休克疗法、限制、资本注入还是韩国模式，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甚至反而会产生危险的后果。

22. 转型有倒退的可能性吗？

在转型过程的第一步我们可以说它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那个阶段，新制度的基本要素还没有成型，事实上，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的组织原则也还没有成型；在这个时期，与旧体制的连续性还是很大的。即使我们相信这个假设，即，转型倒退的可能随着对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的增加而增加，但是由于结构性的因素，倒退的机会还是各不相同的。其中的原因在于，由于政党—国家体制内部权力分配不同的缘故，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构成、他们获得的支持、他们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机、长度和后果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体制越涣散、解体越剧烈，共产党型的社会主义党在首轮自由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就越大。在竞选运动中，与他们竞争的是仍然被原子化的、内部在互相斗争的、形象和结构都还没有成型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参加竞争的党派并没有成为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倒退的潜在危险，但是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相反，倒是存在着另一个大得多的危险。

由于转型具有的特征，首届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不论它们的政治取向如何）的支持率总是迅速下降的，同时新的政治组合匆忙地走上权力的舞台。在政党—国家体制的基本网络是集权化的情况下，由于结构性的因素，这两个趋势很容易还伴随着社会的激进化。这两个进程总和起来增加了极右势力作为日益不受民众欢迎的保守的共产党人的伙伴登上权力宝座的机会。通过对政党—国家残余要素的利用，这可能导致在社会激进化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进攻性的威权体制。

社会主义者在第二次或以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情况只可能在这样的国家出现，即，在第一次的选举中，由于政党—国

家结构的复杂性和逐渐解体，各种政治潮流、集团和党派演进成长起来从而为选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在这些国家，首届政府支持率的迅速消失增加了在解体过程中分裂出来的共产党改革派赢得胜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倒退的可能性就潜在说来都是很小的，其原因恰恰在于过去体制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非常复杂，转型所处的运行环境不同，他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经验，他们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动力强大，外部环境已经不同，等等。这些因素同时减少了在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威权体制的可能性。

第三节 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其他在地理位置上比较远的，内部权力分配极其不同的同构体制没有崩溃呢？是因为不同的内部权力分配、地理环境、文化等等造成了仍然有大量的资源可以使用？或者，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即，这些体制从苏联和东欧体制遇到的困难中吸取了教训，利用了它们的积极经验，加上它们本身独特的权力分配，它们（与欧洲的政党—国家体制相反）能够把个人的知识和学习能力提高到体制的水平？

一个权力结构是否能够通过把体制内聚力的保障建立在以经济理性而非政治理性的基础上来改变它的基本理性？政党—国家体制是否可能在不崩溃的情况下改变它的运行原则，在不放弃对权力的政治垄断的情况下从体制的政治理性转到经济理性？换句话说：它是否可能在不消除自己权力的基本要素的情况下放弃或取消被政治所垄断的依附、被政治所垄断的利益实施、被政治所垄断的国家产权、通过交叉依附连线对个人的原子化，以及决策者的政治理性行为——在不失去建立于政治垄

断基础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得到生存发展的长期利益？

政党—国家体制里是否存在一种特殊的权力分配，使得其上的体制具有学习和适应的能力？中国的演进特征是否表明体制的“学习”能够达成顺利的过渡？政党—国家体制是否有能力区分各种输入使之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仅仅有利于自身的维持？权力的逐渐下放将导致南斯拉夫式的解体和崩溃，还是为进一步创造地区的内聚力奠定基础？在哪一种结构模式里，政治转型可以和平完成？在哪一种结构里，分权化将促使下级行政区域进一步解体？

只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复杂的政党—国家与转型的动态模型为我们探讨同构模式内中国的、苏联的和东欧的政党—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结构差异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方法。它将提供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从而可以把中国的权力、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中看起来独立的零散现象收集起来，与模型的标准以及从苏联和东欧路线的经验中得出的标准进行比较。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也可以检验根据该模型作出的诊断，或者说检验并确定模型的有效范围。研究的结果不仅能够促进我们对政党—国家的理解，而且也为我们用复杂的结构和动态分析模型考察政党—国家同构模式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共同的分类标准，从而有助于我们预见中国转型在未来的可能发展。不仅如此，它也将普遍地提高体制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

附 录

附录 1：1975 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中央党组织的干部任免权限

人事任免权属于中央委员会，但实际上这个权力的操作是有选择的：一部分是直接属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任免的干部，余下的干部委托相应的中央党组织，即，政治局与书记处任免。这两个机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执行一部分干部任免权。中央书记与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也有一个职位清单，对这些职位上的干部进行任免必须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

中央委员会

a. 在组织章程的基础上选举：

- 政治局委员；
- 中央委员会书记；
- 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的委员与主任委员以及中央委员会各工作组的负责人。

b. 任命：

- 中央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

- 政治学院的院长；
- 社会研究所的所长；
- 党报 *Nepszabadsag* 的主编；
- 月刊 *Tarsadalmi Szemle* 编委会的主任；
- 月刊 *Partelet* 的主编。

c. 对下列职位人选的提名和解职提供意见：

- 布达佩斯党委第一书记；
- 地方政府首长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书记及成员
- 国会议长；
- 部长会议主席、副主席及成员；
- 匈牙利总检察长；
- 最高法院院长；
-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经济互助委员会代表；
-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 布达佩斯委员会主任；
- 全国总工会主席；
- 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一书记；
- 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与总书记；
- 全国工人纠察队总司令。

政治局

a. 决定：

同意有关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控制委员会委员的初步任免（关于中央控制委员会委员，应考虑中央控制委员会的意见）；

·中央委员会各工作组以及 Tarsadalmi Szemle 和 Partelet 编委会的任命；

- 国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议员团领导人的提名；
- 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副职的任免。

b. 公布它在下列职位的选举、任命或免除职务问题上的意见：

- 县与县级党委第一书记；
- 国会副议长及国会的记录秘书；
- 国会各委员会的主任和书记；
- 副部长级的国家级办公室的主任助理；
- 县级委员会的主任；
- 国际组织中大使级的大使和代表；
- 匈牙利人民军总司令；
- 匈牙利人民军政治部主任；
- 联合武装力量的匈牙利总司令；
- 对武装力量将军提名的批准；
- 内务部的政治部主任；
- 合作社全国委员会主席；
- 农业合作社全国委员会主席；
- 合作社全国联盟主席；
- 小工商业者全国联盟主席；
- 匈牙利科学院主席团的主席、第一书记及成员。

c. 认可国会党员议员的提名并表达对非党员议员的提名的意见。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a. 决定：

- 中央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政治工作人员、不领薪工作人员、Tarsadalmi Szemle 与 Partelet 的副主编和政治工作人员、政治学院副院长与系主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及党史研究所的副所长的任免；
- 党的日报 Nepszabadsag 的副主编的任命；
- 哥舒特出版社社长的任命；
- 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学院、社会科学院选派学生并给他们分配岗位；
- 对战前党员的认可，及在外国兄弟党中登记的党员的认可。

b. 发表关于下列职位的选举、任命和免除职务问题上的观点：

- 布达佩斯党委书记；
- 副部级全国性办公室的副主任和领导人；
- 匈牙利国民铁路公司总经理；
- 匈牙利驻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副代表；
- 旅游委员会的主席；
-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副主席；
- 匈牙利商会的主席；
- 合作社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
- 小工商业者全国联盟的副主席；
- 农业合作社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
- 全国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席；

- 国家发展银行行长；
- 国民储蓄银行行长；
- 匈牙利外贸银行行长；
- 海关警察总长；
- 主要的旅游办公室，IBUSZ，的总经理；
- 国家保险办公室总经理；
- 零售商自由组织的主席；
- 小工商业者全国组织的主席；
- 国家自然保护办公室主任；
- 科技劳动者协会联盟的第一书记；
- 匈牙利航空公司总经理；
- 匈牙利船舶公司总经理；
- 吉奥尔—舍普隆—艾本福尔特铁路公司总经理；
- 国家土地与绘图办公室主任；
- 匈牙利度量衡办公室主任；
- 国家专利办公室主任；
- 联合武装力量匈牙利副总司令及其技术委员会主任；
- 匈牙利国防联盟第一书记；
- 内务部前卫队总司令；
- 军队和军团司令；
- 内陆防卫司令；
- 地对空部队总部司令；
- 内务部政府安全卫队；
- 匈牙利游击队员联盟第一书记；
- 布达佩斯警察局局长；
- 全国总工会、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主席团成员，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 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
- 匈牙利童子军联盟书记；
- 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书记；
- NHUW 主席；
- 国家和平委员会主席；
- 匈牙利—苏联兄弟公司主席、第一书记和书记；
- 匈牙利科学院第一副书记；
- 文化关系研究所所长；
- 匈牙利记者联合会主席；
- Nepszava, Magyar Hirlap, 及 Esti Hirlap 的主编；
- 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 匈牙利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科学研究所所长；
- 匈牙利哲学研究所所长；
- 匈牙利历史学研究所所长；
- 匈牙利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 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 匈牙利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
- 派驻 Beke es Szocializmus 评论的代表。

中央委员会书记与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一些组织在作出任免下列职位的干部的决定之前，必须先得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的同意：

a. 党的领域：

- 政治学院的教师及政治学院经济系的主任；
- 党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政治工作者；
- 部委与国家级办公室的党委书记；

- 县党委书记及县级单位的党委书记；
- 驻苏联和东德的匈牙利组织的党委书记；
- 政治学院学生的选派；
- 工人纠察队副总司令和总司令的助理；
- 匈牙利驻外使馆党组织的书记。

b. 国家、行政管理和经济领域：

- 中央地理办公室主任；
- 国家国营农场中心总经理；
- 国家能源办公室主任；
- 国家地矿资源办公室主任；
- 银行企业中央合作社总经理；
- 国家计划研究所所长；
- 国家贸易监督委员会主任；
- 市场研究所所长；
- 国家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
- 全国经理人员教育中心总经理；
- 建筑师联盟主席与第一书记；
- 国家计划总署、外贸部、财政部、国家物资与价格办公室以及匈牙利国民银行的司局长；
- 各部门产业政策司、经济司、技术司、长期发展司和国际事务司的司长；
- 外贸公司经理；
- 匈牙利驻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
- 贸易代表委员会主任；
- 合作社全国联盟管理与监督委员会委员；
- 农业合作社全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 合作社全国联盟主席；
- 小工商业者全国联盟主席团成员；
- 匈牙利铁路公司副总经理；
- 匈牙利邮政局副局长；
- 匈牙利商会副主席和第一书记；
- 40家大型企业和托拉斯的总经理；
- 木材工业联合会总经理；
- 国家牲畜饲养检测局局长；
- 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长；
- 特殊大型民用机械建设项目的党组织者；
- 匈牙利国民银行分行经理；
- 国际经济关系委员会书记处副书记长；
- 人口统计办公室主任；
- 国家计划总署计算中心主任；
- 财政研究所所长；
- 匈牙利汽车俱乐部第一书记；
- 小工商业者全国组织副主席；
- 零售商自由组织副主席；
-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 匈牙利城市学会主席；
- 国会办公室主任；
-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首长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长；
- 首都与县首席律师；
- 首都与县法院院长；
- 首都与县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书记；
- 国会委员会委员；
- 委员会学院（为各委员会委员提供继续教育）院长；

- 外交部主要司局司局长；
- 外交部地区政策司、国际组织司、新闻司与礼宾司司长

- 部委和国家级办公室人事司司长。

- c. 武装力量领域：
 - 25 个职位上的分部门主任、副主任、司令、副司令。

- d. 群众组织、群众运动与社会组织领域：
 - 12 个国家级组织的第一副书记、主席及成员。

- e. 新闻出版界、科学界和文化界：
 - 主席、第一书记、副主席、副总经理、副主编、编辑、编委会委员、部门负责人、院长、办公室主任和记者等大约 100 个职位。

附录 2：正规等级制的决策背景

图 A. a—A. f 是由图 1. 2 衍生来的，它们从正规的党等级体系的角度展现了决策过程中信息流动和整合的结构背景。我们把图 1. 2 中正规的党等级体系里的决策层级具体化，可以看到谁参加了哪一个层级上的决策机构，从而看出他对决策的影响。

让我们首先考察政治局，它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定期开会，并可以在此期间的任何时候召开会议。

政治局是由中央委员会从中央委员中选举产生的，在 1970—1980 年期间有 13 名成员。它的部分职能是召集中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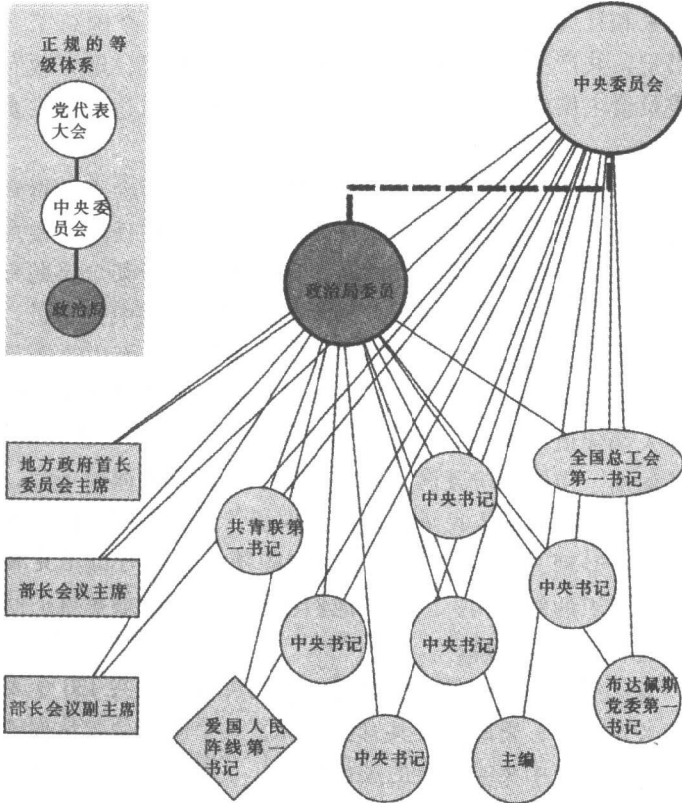
记议事，这些中央书记绝大多数主管着中央委员会各机关的管理和监督工作。除了主管党的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来自国家和社会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员（图 A. a）：全国总工会第一书记，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地方政府首长委员会主席或国会议长，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布达佩斯党委第一书记。

信息还通过另一个渠道传播，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得到关于政治局会议日程的正式通报。中央委员获准在任何时候查阅政治局会议纪要；事实上，在某个中央委员关于某个议题有专门知识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的干事还要咨询该中央委员。

由于中央委员同时有多重身份（图 A. b），而中央委员又有权获得信息，所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比较重要的各级部门的领导人都知道相关的议题（政府、部委、委员会、县级单位、布达佩斯、市级单位及区级单位党委、总工会和部门工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人民阵线、国营农场、合作社的最高代表机构、企业经理，等等）。按规定，这些领导人同时也是党和国家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因此，他们在这些地方的最亲近的同事也知道了保密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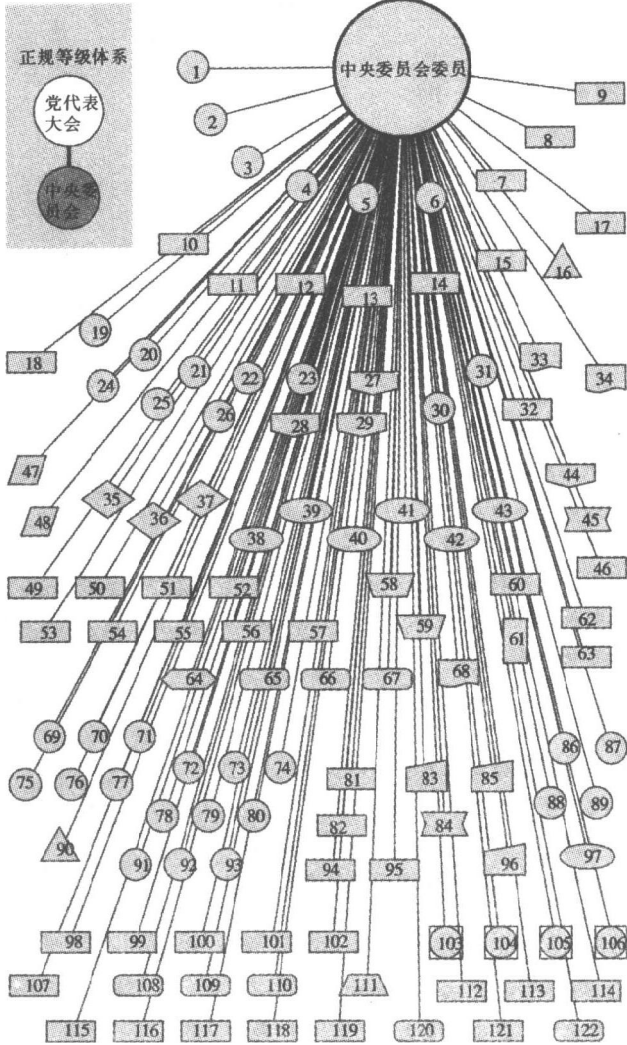
为了说明国家领导层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总共 130 个委员会中考虑一下，财政部及其官员参加了几个委员会，从而知道有多少官员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图 A. a 通达政治局的反馈



资料来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2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第 506 页

图 A. b 通达中央委员会的反馈



资料来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2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第 500—504 页。

注：

- 1 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 2 中央委员会书记
- 3 中央委员会书记
- 4 中央委员会书记
- 5 中央委员会书记
- 6 中央委员会书记
- 7 地方政府首长委员会主席
- 8 地方政府首长委员会秘书
- 9 部长会议主席
- 10 部长会议副主席
- 11 部长会议副主席
- 12 部长会议副主席
- 13 部长会议副主席
- 14 部长会议副主席
- 15 部长会议副主席
- 16 苏联大使
- 17 匈牙利人民军副总司令
- 18 国会议长
- 19 中央委员会文化教育部部长
- 20 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部部长
- 21 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部长
- 22 中央委员会党的经济问题部部长
- 23 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部长
- 24 中央委员会宣传与调查部部长
- 25 中央委员会外交事务部部长
- 26 中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 27 无线电广播主席

- 28 电视广播主席
- 29 无线电与电视广播主席
- 30 Nepszabadsag 报主编
- 31 Nepszabadsag 报副主编
- 32 全国工人纠察队总司令
- 33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一书记
- 34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书记
- 35 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
- 36 爱国人民阵线主席
- 37 爱国人民阵线书记
- 38 全国总工会总书记
- 39 全国总工会书记
- 40 全国总工会副书记
- 41 建筑工业工会总书记
- 42 钢铁工业工会总书记
- 43 公用事业工会总书记
- 44 无线电与电视委员会主席
- 45 匈牙利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
- 46 全国水资源局局长
- 47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
- 48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前任主席
- 49 内务部部长
- 50 轻工业部部长
- 51 贸易部部长
- 52 农业部部长
- 53 邮政通信部部长
- 54 文化部部长
- 55 财政部部长
- 56 外交部部长
- 57 国防部部长

- 58 国家技术发展委员会主任
- 59 国家技术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 60 国家物资与价格办公室副主任
- 61 匈牙利国民银行主席
- 62 内务部部长助理
- 63 国防部副部长
- 64 国家铁矿研究所所长
- 65 合作社全国联盟主席
- 66 小工商业者全国联盟主席
- 67 农业合作社全国联盟主席
- 68 匈牙利童子军联盟第一书记
- 69 松莫吉县党委第一书记
- 70 维斯普雷姆县党委第一书记
- 71 扎莱县党委第一书记
- 72 琼格拉德县党委第一书记
- 73 巴齐一基什孔县党委第一书记
- 74 佩斯县党委第一书记
- 75 贝克什县党委第一书记
- 76 诺格拉德县党委第一书记
- 77 包尔绍德—阿布乌—岑普伦县党委第一书记
- 78 哈伊度—比哈尔县党委第一书记
- 79 布达佩斯党委第一书记
- 80 布达佩斯党委第一副书记
- 81 费叶尔县委员会主席
- 82 布达佩斯委员会主席
- 83 匈牙利科学院院长
- 84 匈牙利全国作家联盟主席
- 85 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 86 布达佩斯第 3 区党委第一书记
- 87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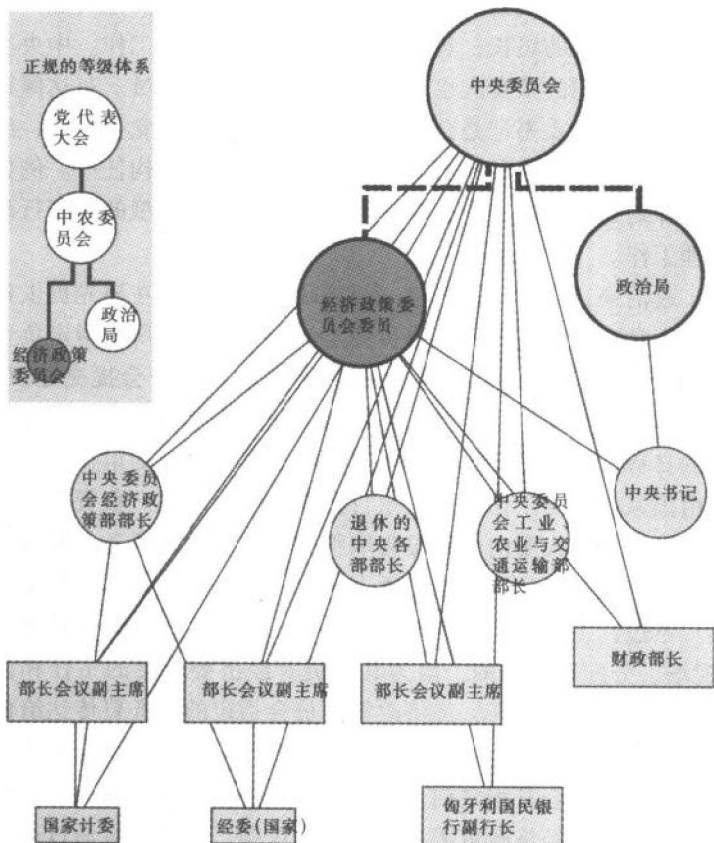
- 88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学院院长
- 89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史研究所所长
- 90 驻联合国代表
- 91 中央委员会前任书记
- 92 亚诺什哈尔玛 (Janoshalma) 村党委书记
- 93 布达佩斯第 7 区前任党委第一书记
- 94 外交部前任部长
- 95 劳动部前任部长
- 96 萨伯·俄温 (Szabo Ervin) 全国自由社前任社长
- 97 全国总工会前任主席
- 98 厄杰苏尔特·伊佐 (Egyesult Izzo) 厂厂长
- 99 马扎尔瓦贡与格普加尔 (Vagon es Gepgyar) 厂厂长
- 100 哈布舍叶马卢加尔 (Habselyemarugyar) 厂厂长
- 101 费尔绍索尔诺克 (Felsoszolnok) 小学校长
- 102 贝洛伊安尼什 (Belloiannis) 厂厂长
- 103 德布里岑 (Debrecen) 糖果糕点厂党委书记
- 104 乌佩什狄·扎普乌所沃扎尔 (Ujpesti Gyapjuszovogyar) 厂党委书记
- 105 多瑙河铁厂党委书记
- 106 彻佩尔 (Csepel) 钢铁厂党委书记
- 107 奥拉伊与伽资帕里·特洛斯特 (Olaj- es Gazipari Troszt) 厂厂长
- 108 巴伯纳 (Babolna) 国营农场场长
- 109 马特萨尔卡 (Mateszalka) 国营农场场长
- 110 赫维什 (Heves) 农业合作社主席
- 111 雕刻家
- 112 诺格拉德煤矿前任矿长
- 113 陶塔 (Tata) 煤矿技工
- 114 美彻克 (Mecsek) 煤矿采煤工
- 115 马尔夫 (Marfu) 鞋厂技工
- 116 尼尔巴托 (Nyirbator) 鞋厂技工
- 117 彻佩尔汽车厂技工

- 118 迪奥什吉奥里·格普加尔 (Diosgyori Gepgyar) 厂技工
- 119 杰尔国家建筑公司技工
- 120 纳吉森纳什 (Nagyszenas) 农业合作社仓库管理员
- 121 阿伊卡 (Ajka) 玻璃厂技术员
- 122 赫维希·拉科西 (Hevesi Rakoczi) 农业合作社主席

财政部参加的委员会和根据 1954 年到 1982 年间的高层决议和命令建立 (并在 1983 年继续运作) 的委员会总共达 130 个。其中 10 个有部长 (中央委员) 参加, 30 个有部长助理和副部长参加。司局长同时参加许多委员会: 国际事务局局长参加了 12 个委员会, 工业局局长参加了 9 个, 建筑工业局局长参加了 7 个。在财政部高层领导参加的组织里, 财政部各司局甚至财政部秘书处要派出官员协助他们参加其中的活动。在 130 个委员会里, 财政部从部长到专家有 51 人参加了各种委员会。至于谁是哪一个委员会的成员, 主要取决于委员会的重要程度, 专业要求是第二位的考虑。司局长以上, 职位越高, 累积的头衔就越多, 这是明显的规律。因此, 反馈的累积也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一个人参加的委员会越多, 他与正规等级体系里各个职位上的人交流的机会就越多。信息通过这些委员会扩散就像在财政部里扩散一样。当然, 其他机构的人员也参加很多委员会。因此, 同样的组织和同样的个人有许多方向上的联系, 有许多方向的交流信息, 有许多方向的实施利益机会, 而这些联系、交流和利益实施与委员会的实际议题是不一定相关的。中央委员作为委员会暂时或永久客人的情况进一步增加了这些机会。这些联系、交流和利益实施情况不仅适用于永久性的委员会, 而且也适用于暂时性的委员会。

图 A. c 通达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反馈



资料来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12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要》，如前引，第 506 页。

决策机制链上下一个连接衍生的网络在这个信息网络上扩

散开来（图 A. c）。经济政策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为政治局议程上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提供意见。经济政策委员会的主任是政治局的委员，同时是中央书记。他（她）是经济工作小组的组长，负责中央机关的经济政策工作。中央委员会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是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布达佩斯和一些县的党委书记是会议常规的列席客人。与党委相比，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中有更多的人同时在国家机构任职。例如国家计划总署署长和副总理，他们负责各种较大型的国家行政管理工

作。

政治局日常讨论的日程（经济政策委员会应在事先提供建议）常常变成了经济政策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所有指定负责或主持协调工作的国家机构都要向经济政策委员会提交建议。分派的任务会安排在相关的国家机关和经济单位内运行的党组织的日程上。任务要受到党委建立的工作委员会的审核，其成员由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或来自企业的专家组成。负责具体工作的经济领导人要向他们报告取得的成就。关于任务的完成情况，负责该工作的机构的党委书记要向相关的上级党组织作汇报。不过，上级党和国家规定的一些任务是经济政策委员会在“现场”分配和协调的，因为其成员有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任，经济政策委员会指定的任务要传达给他们，并从他们那里把任务分派下去。不仅如此，在议题安排进经济政策委员会日程之前，经济委员会或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详细地讨论了经济政策委员会指定的议题，而且只有通过这一层的梳理议题才能进一步提交到经济政策委员会。另外，这些论坛与党不是隔离的，因为，除了最高经济机构的领导人是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以外，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的领导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列席委员，同时也是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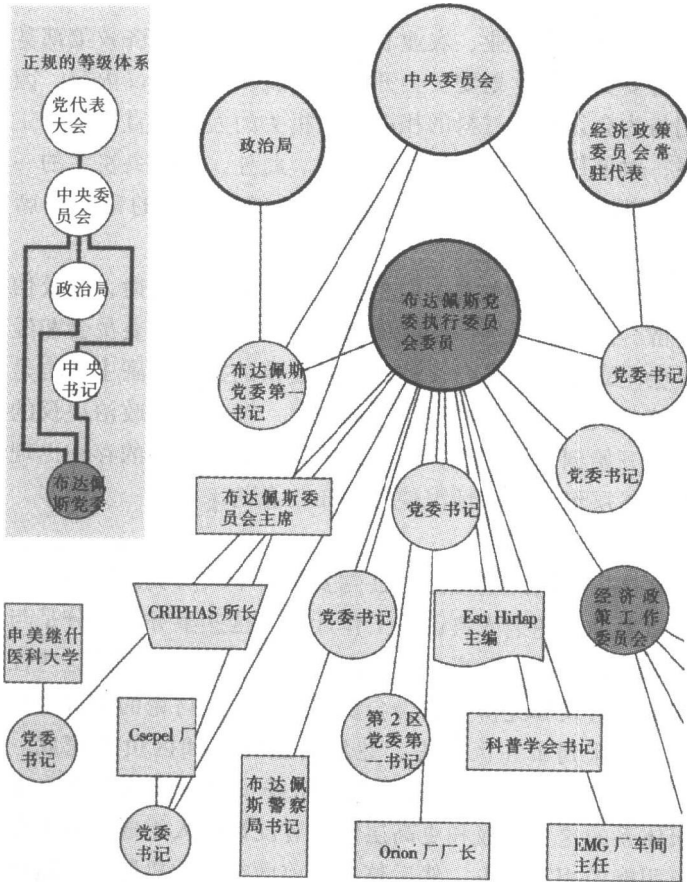
员。因此，经济政策委员会也从许多渠道立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会议的内容。

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部以及经济政策部甚至在经济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开会之前就知道了会议内容，因为他们与为会议准备材料的相关国家机关的人员一直保持着工作联系，对他们的准备工作进行协调。此外，党中央机关的一些官员是部委部长级会议或严格受限的部级会议的常规列席人员。

职能上和个人关系上的相互交织所形成的反馈，以及信息的扩散，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因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是隶属于部长会议的，部长会议的主席和副主席也是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和政治局的委员。随着高层政治决议的执行过程开始到达党等级体系的较下层，由于反馈的存在出现了新的网络层级。这些情况使得发布信息的来源进一步增多，从而加快了信息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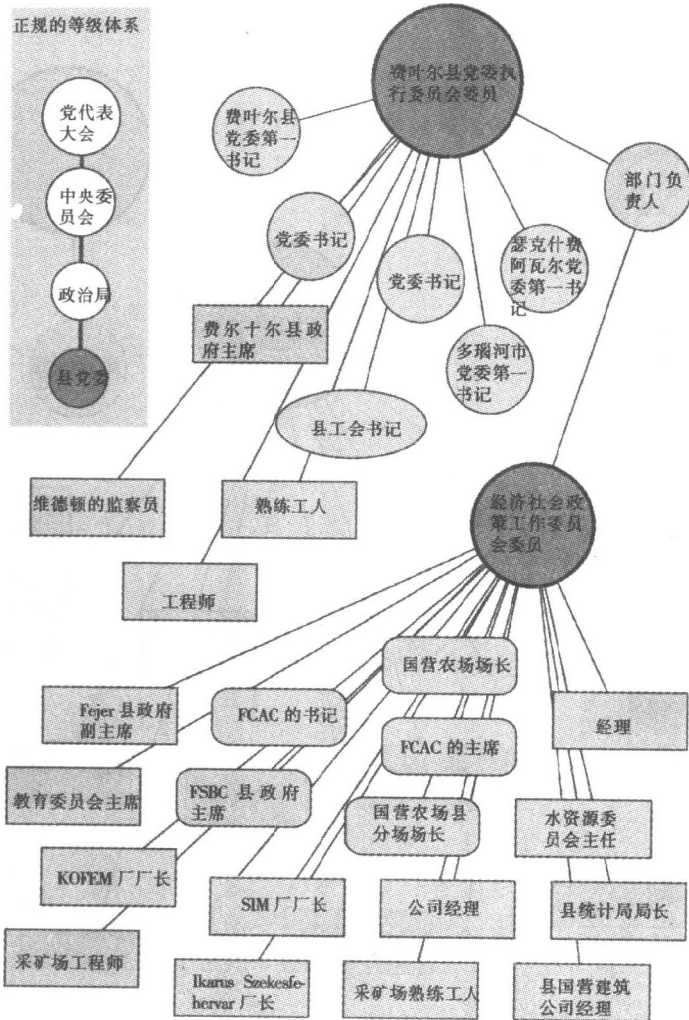
在高层决策的基础上，县党委指定个人负责具体的工作并把更重要的议题纳入自己的工作计划。这些事务一部分是与他们的地区相关的实际事务，一部分是一般性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在党委会议和经济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讨论的内容是把这些任务分派到市和区里去，然后由这些市和区负责完成。县（布达佩斯）和市（区）党委和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由那些在党等级体系的这个层级和更高层级上有反馈的人组成。由于党和国家职能的相互交织，然后整合在前面描述的机制里，这进一步增加了网络层级和信息的传播（图 A. d—A. f）。

图 A. d 通达布达佩斯党委执行委员会的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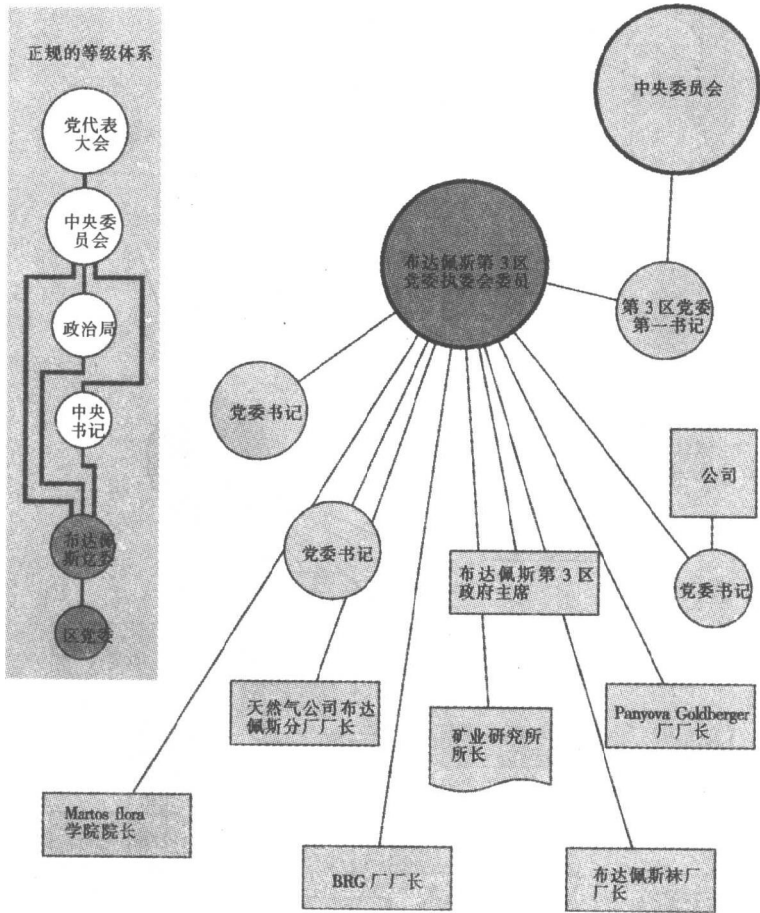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Nepszabadsag, 1980 年 3 月 11 日。

图 A. e 通达县党委执行委员会的反馈



资料来源: Fejer Megyei Hirlap (县报), 1975 年 2 月 23 日。

图 A. f 通达区党委执行委员会的反馈



资料来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史研究所编写的关于 1975 年党的选举的资料。

附录 3 : 表 A. 1

表 A. 1 1970 年到 1979 年间机械工业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被选中的机会*和谈判能力的差异(单位:百分数)

按规模 分组	P+ R+	P+ R-	P- R+	P- R-	P+	R+	P-	R+	合计
1.	100.0	85.7	100.0	-	98.6	100.0	100.0	85.7	98.7
2.	90.5	100.0	85.7	50.0	94.3	89.3	57.1	66.7	
3.	61.9	65.3	35.7	37.1	64.3	51.4	36.9	48.7	49.4
I.	90.5	74.3	64.3	40.8	84.0	85.0	46.0	57.8	68.1
4.	71.4	42.9	42.9	42.9	49.2	54.3	42.9	42.9	46.0
5.	42.9	42.9	64.3	37.1	42.9	57.1	40.3	38.8	41.1
6.	14.3	46.4	35.7	33.0	35.7	28.6	33.3	34.6	33.7
7.	-	-	17.9	16.4	-	17.9	16.5	16.4	16.5
II.	42.9	43.7	36.3	27.7	43.5	38.1	28.9	30.4	31.6
8.	-	-	-	5.5	-	-	5.5	5.5	5.5
9.	-	-	0	4.1	-	0	3.8	4.1	3.8
10.	-	-	-	2.5	-	-	2.5	2.5	2.5
11.	-	-	0	0.13	-	0	0.13	0.13	0.13
12.	-	-	-	0	-	-	0	0	0
III.	-	-	-	1.4	-	-	1.4	1.4	1.4
合计	78.6	55.0	36.4	8.6	65.0	57.5	10.0	11.6	15.6
企业数	21	27	20	385	47	40	406	413	453

注:* 见正文关于谈判能力指标的计算方法的叙述。

附录 4 缩略语

(为了查阅的方便 有些在匈牙利长期使用的缩略语在括弧里也给出了匈牙利语的缩写)

AC	农业合作社
AFD	自由民主党人联盟 (SZDSZ)
BPD	布达佩斯警察局 (BRFK)
BRMW	布达佩斯无线电技术机器厂
CC	中央委员会 (KB)
CC DEP	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部 (GPO)
CC DIAT	中央委员会工业、农业与交通运输部 (IMCO)
CC DPC	中央委员会宣传与调查部 (APO)
CC DPMO	中央委员会党与群众组织部
CC EPC	中央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 (GPC)
CCTU	县工会委员会
CDPP	基督教民主人民党 (KDNP)
CFTU	县工会联盟
CIER	国际经济关系委员会 (NGKB)
CISW	切佩尔钢铁厂
CL	中央领导
CM	部长会议
CMEA	经济互助委员会
CMW	切佩尔冶金厂
CND	国防委员会
co	协调作用：邀请副部长到地区党委进行协调
CPSC	中央人民监督委员会 (KNEB)

CRIP HAS	匈牙利科学院中央物理研究所 (MTA KFKI)
CSO	中央统计署 (KSH)
CYF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KISZ)
dh	部门主任
DIW	多瑙铁厂
DP	有党员身份的代表
ec	企业委员会
EC(S)	(国家)经济委员会 (GB)
EMRI	经济与市场研究所 (KOPINT)
FCAC	县级农业合作社联盟
FSBC	小商业合作社联盟 (KISOSZ)
fu	工厂单位
FYD	青年民主党人联盟 (FIDESZ)
GCSC	消费者与销售合作总社 (AFESZ)
gm	总经理
GRCC	零售与消费者合作总社 (AFESZ)
HAS	匈牙利科学院 (MTA)
HDF	匈牙利民主论坛 (MDF)
HNB	匈牙利国民银行 (MNB)
HSP	匈牙利社会主义党 (MSZP)
HSWP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MSZMP)
IE	经济学研究所
IERC	国际经济关系委员会 (NGKB)
IMPPDC	部门间价格和生产分配委员会 (TATB)
Ins	指示体系 (党的组织责任)
IPHA	党史文献研究所 (现称 政治史研究所)
ISP	独立小业主党 (FKgP)

KMUE	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现称布达佩斯经济大学)
LMW	轻冶金厂
m	经理
M	有地区党委书记参加的部门会议
MC	部门委员会
MD	国防部
MDT	国内贸易部
MF	财政部
MFA	外交部
MFI	食品工业部
MFT	外贸部
MHI	重工业部
MI	工业部
MIA	内务部
MIER	国际经济关系部
MIW	机械工具工业厂
ML	劳动部
MLI	轻工业部
MMMI	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NCAC	全国农业合作社委员会
NCC	全国合作社委员会
NCTD	全国技术发展委员会(OMFB)
NCTU	全国工会委员会
NEM	新经济机制
NFBIW	全国建筑工业工人联盟
NHCA	新匈牙利中央文献

NMPO	全国物资与价格办公室 (OAAH)
No	干部任命花名册制度
NPD	全国警察总署 (ORFK)
NSRF	国家科学研究基金 (OTKA)
OC	组织委员会
P	党员
PB	政治局
pc	非党组织里的党委会
PC	党委会 (地区级)
PCC	附属于中央委员会
PCRP	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
pd	代表中的党员
PEB	临时执行委员会
PEC	党执行委员会
pl	党的联络体系
PL	临时领导
PMWE	生产物资批发企业 (TEK)
PPF	爱国人民阵线 (HNF)
PSA	科普协会
REA	不动产管理局
RMPWCE	原材料采购批发商业企业 (MEH)
SBIE	国家建筑工业企业
ScPC	科学政策委员会
SDB	国家开发银行 (AFB)
SF	国家农场
SPC	国家计划委员会 (ATB)
SPO	国家计划办公室 (OT)

SSS	国家安全署
s. u.	存档单位
SUMS	申美维什 (Sommelweis 医科大学 SOTE)
sw	熟练工人
To	业务 归口管理 责任

致 谢

多年来，我的朋友和同事提供的学术环境对我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理清自己的论证帮助很大。他们无私地经常就我写得不好草稿反复琢磨，耐心细致地倾听我不得要领或繁琐的思想，然后一针见血地提出如何修改的批评和建议。我特别要感谢安德拉什·洛林茨 (Andras Lorincz)、瓦蕾丽·邦斯 (Valerie Bunce)、亚诺什·科勒 (Janos Kollo)、米哈伊·拉科 (Mihaly Laki)、卡洛伊·哈尔莫什 (Karoly Halmos)、和伊尔笛克·萨伯 (Ildiko Szabo) 感谢我过去的上司，后来的左尔特·帕普 (Zsolt Papp) 和他的小组成员——伊什特万·鲍罗格 (Istvan Balogh)、彼得·格德温 (Peter Gedeon)、乔包·果姆巴尔 (Csaba Gombar)、鲍拉什·基什 (Balazs Kiss) 和亚诺什·西蒙 (Janos Simon) 感谢他们的兴趣、理解、帮助和鼓励，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出思想的环境。我与他们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有收获的 18 个月。我也非常感谢拉斯洛·奥斯塔洛什 (Laszlo Asztalos)、考陶林·鲍拉什 (Katalin Balazs)、陶马什·鲍尔 (Tamas Bauer)、吉奥尔吉·本策 (Gyorgy Bencze)、劳约什·伯克洛什 (Lajos Bokros)、安德拉什·布罗笛 (Andras Brody)、阿格内什·曹科 (Agnes Czako)、贝拉·格雷什科维齐 (Bela Greskovits)、高伯尔·古拉齐 (Gabor Gulacsi)、安德鲁·C. 亚诺什 (Andrew C. Janos)、亚诺什·马基亚什·科瓦什 (Janos Matyas Kovas)、高林瑙·兰贝尔格 (Galina Lamberger)、高伯尔·欧布拉特 (Gabor Oblath)、莎拉·帕斯托尔 (Sara Pasztor)、伊万·佩图 (Ivan Peto)、吉奥尔吉·佩托茨 (Gyorgy Petocz)、恩德雷·席科 (Endre

Sik)、厄吉贝特·萨莱伊 (Erzsebet Szalai)、马尔顿·陶尔多什 (Mar-ton Tardos)、吉乌劳·特勒尔 (Gyula Teller)、伊·沃斯考 (Eva Voszka) 以及安德鲁·C. 瓦尔德 (Andrew G. Walder)。

在案例研究准备过程中展开访谈的时候 我从尤舍夫·卡达尔 (Jozsef Kadar) 那里得到了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很大帮助, 我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的采访, 他先是冶金与机械工业部 (MMMI) 的高级官员 后来是工业部 (MI) 的高级官员。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 (KMUE) 现名 布达佩斯经济大学 的劳动经济系、农业合作社研究所和拉斯洛·劳伊克经济学院学生学术俱乐部饶有兴趣地就我的思想展开了辩论, 这对我意义重大。财政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兴趣、怀疑精神和挑战精神为我奠定了艰苦的训练基础, 这对检验我的思想和理清我的思路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提供给我的科学研究氛围和出版机会方面, 研究所的所长伊什特万·哈格尔德耶 (Istvan Hagelmayer) 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在感谢瓦蕾丽·邦斯的建议和批评之外 我要强调对她为本书撰写序言表示深深的谢意。我对她的著作非常景仰, 她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我还要对彼得·卡岑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表示深深的感谢 他在阅读了我的手稿以后, 坚定而友好地鼓励我拿到西方的科学图书市场上去出版。在这方面 我极为感谢哈维·H. 申克尔 (Harvey H. Shenker) 和爱德华·艾尔伽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本书匈牙利文版的编辑过程中 安娜·帕特科什 (Anna Patkos) 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和批评性的工作 在使本书的结构和内容都完善起来方面 她起了重要的作用。厄吉贝特·瑟贝尼给了我巨大的帮助 她热情地、不倦地、费心地和忠实地整理打印了访谈录音的全部内容, 在匈牙利的研究人员还没有计算机的时候 伊娃·特什 (Eva Tesy) 和吉姬·策内尔 (Gizi Czeiner) 耐心地、完美地誊抄了我天书般的手稿。在看

来无止境的编辑与核对工作中，伊娃·乔纳蒂 (Eva Csanadi) 和阿尔帕尔·马利查 (Alpar Maricza) 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匈牙利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为本书匈牙利文版的出版提供了绝大多数的经费，没有它的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出版的。科平特·达托尔格·孔朱图拉研究基金会 (KOPINT Datorg Konjunktura Research Foundation)、亚当·斯密基金会和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 (OKTA) 提供了剩下的经费。英文版的翻译经费是由匈牙利的绍罗什基金会资助的。我非常感谢弗兰克·洛熊斯基 (Frank Losonski)，他承担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由于他对这个领域很熟悉，他能够理解并很好地把握我想要表达的思想。通过我们对原文多次漫长的讨论，我自己的一些思想也进一步清晰起来。他不仅成为我的一个好友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他善于折衷 坚定地忠实于原文。

玛丽亚·乔纳蒂

参考文献

A. Gergely, András (1989), “*A politikai érdekszervezetek és a lokális érdekcsoportok viszonya három megyébe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tical interest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interest groups in three counties”) (Budapest: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A. Gergely, András (1991), “*A pártállam varázstalánítása*” (“*The demystification of the party – state system*”) (Budapest: Politikatudományi Intézet).

Andorka, R. (1990), “*Társadalmi szerkezet*” (“*Social structure*”), in Andorka R., Kolosi T., and Vukovich Gy. (eds.) *Társadalmi riport (Social Report)* (Budapest: TáRKI).

Andorka, R. (1992), “*A rendszerváltás szociálpolitikai problémái*” (“*Social policy problems stemming from the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Valóság* No. 2.

Andorka, R. and Harcsa, I. (1992), “*Deviant behaviour*”, in Andorka R., Kolosi T., and Gy. Vukovich (eds.) *Társadalmi riport (Social Report)* (Budapest: TáRKI).

Antal, L. (1979), “*Fejlődés kitérővel: A magyar gazdaság mechanizmusa a hetvenes években*” (“*Development with a detour: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in the 1970s*”), *PKI Közlemények*, No. 2. (Budapest: Pénzügykutatási Intézet).

Antal, L. (1983), “*Pénzügyi tervezés és szabályozás konfliktusai*” (“*The conflicts between financi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Gazdaság*, No. 2.

Antal, L. (1985), *Gazdaságirányítás és pénzügyi rendszertink a reform útján (Our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ystems on the path of reform)*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Antal, L. and Gy. Surányi (1987), “*A bankrendszer átalakításának*

előtörténete” (“Prelud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Külgazdaság*, No. 1.

Antalóczy, K. (1994), *A KGST es a magyar gazdaság mechanizmusa (The CMEA and the Hungarian economic mechanism)*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Budapest: Pénzügykutató Rt.).

Balbus, I. (1971), “*The concept of interest in Marxist and pluralist analysi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No. 1.

Balcerowicz, L. (1993),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Poland, 1989 – 1993*” in *Economic Policy*, 1994. Supplement.

Baló, Gy. (1993), “*Interjú Pet- Ivánnal, az SZDSZ elnökével*” (“An interview with Iván Pet-,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Free Democrats”), in *Mozgó Világ*, No. 7.

Bauer, T. (1983), “*A második gazdasági reform és a tulajdonviszonyok*” (“The second economic reform and ownership relations”), in *Mozgó Világ*, No. 11.

Bauer, T. and L. Szamuely (1979), “*Minisztériumi átszervezések*” (“Ministerial reorganization”),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2.

Bence, Gy. and J. Kis (1981), “*A szovjet típusú társadalom Marxista szemmel*” (“Soviet – type society through Marxist eyes”), in *Magyar Füzetek* (Paris).

Bihari, M. (1985), “*Politikai rendszer és szocialista demokrácia*” (“Political system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in *Politikatudományi Füzetek*, No. 6.

Bihari, M. (1989), “*Egy pártkongresszus szociológiája*” (“The sociology of a party congress”), in S. Kurtán, P. Sándor, and L. Vass (eds.) (1990)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0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90)* (Budapest, AULA – OMIKK).

Bodó, P. (1985), “*Kampány és szövethetesi összevonás*” (“*Campaign and cooperative amalgamation*”) Unpublished (Budapest: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ossányi, K. (1986), “*Érdeklütközések: Az új vállalati formák bevezetéséről*” (“*Conflicts of interest: O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enterprise forms*”) (Budapest:

Munkatudományi Intézet).

Brada, J. (1991),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Czechoslovakia, Hungary, and Poland", in Report on East Europe, December 6.

Bródy, A. (1979), "Gazdaságunk hatékonyságáról és növekedésének lehetőségéről" ("On the efficiency of our economy and its growth possibilities"), Unpublished, (Budapest: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Brown, K. (1992), "Khabarovsk: Restructuring the nomenklatura – Russia at the grass – roots", in Radio Free Europe, RL. Research Report.

Bruszt, L. (1989), "Magyarország tárgyalásos forradalma"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in Kurtán S, P. Sándor, and L. Vass (eds.) (1990)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0*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90) (Budapest: AULA – OMIKK).

Bruszt, L. (1991), *Transformative politic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Obstacl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viet – type Societies in Eastern Europe*, (Vienna: Institut für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July.

Bruszt, L. and J. Simon (1989), "Hogyan élük meg a demokratizálódást a magyar állampolgárok es a MSZMP apparátusi csúcsvezetése" ("How do the Hungarian public and the chief executives of the HSWP's apparatus relate to democratization?") (Budapest: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Bruszt, L. and J. Simon (1992),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ent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90 – 1991" (Budapest: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ruszt, L. and D. Stark (1991),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5, No. 1.

Bunce, V. (198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rezhnev era: Decline of a nation – state", 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3, January.

Bunce, V. (1985),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The evolution of the Eastern bloc from a Soviet asset to a Soviet li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Vol. 31, Winter.

Bunce, V. (1987), "Decline of a regional hegemon: The Gorbachov regime and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in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1, No. 3.

Bunce, V. (1991), "Once burned, twice assertive", a paper delivered at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ecurity conference, 24 – 25 April 1991,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unce, V. (1993), "Domestic reform and internal change: The Gorbachev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1.

Bunce, V. (1995), "State Collapse After State Socialism: A comparison of the Soviet Union, Yugoslavia and Czechoslovaki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Nationalism, Post – Commun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April 21 – 22). Unpublished.

Bunce, V. and M. Csanódi (1993), "Uncertainty in the Transition: Post – Communism in Hungar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7. No. 2. Spring;

Burns, J.P. (1987), "China's nomenklatura system",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6, No. 5.

Campeanu, P. (1990) "Democracy and power",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organized by The 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and Budapest). July.

Comisso, E. (1988), "Market failures and market socialism: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2, No. 3.

Curry, J. (1988),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reform in Poland", in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2, Autumn.

Czakó, Á. and E. Sik (1987), "A 'megszemélyesült' szervezetközi cseretülgyletekről a mezőgazdasági nagyüzemek példáján." ("The 'personified' reciprocal deals among organizations – on the example of larg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Közgazdasági Szemle* Vol. 43. No. 12.

Csaba, L. (1985), "érdekegyeztetés és közös útkeresés" ("Interes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common path"), in *Valóság*, No. 10.

Csaba, L. (1988), "Mi történt a magyar reformmal?" ("What happened to the Hungarian reform?"),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9.

Csaba, L. (1991), "First less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s in Central Europe", in *Acta Oeconomica*, Vol. 43, Nos. 3 - 4.

Csanádiné D., M. (1979), "A vállalatnagyság, a jövedelmezőség és a preferenciák néhányösszefüggése" ("So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terprise size, profitability, and preferences"), in *Pénzügyi Szemle*, No. 2.

Csanádi, M. (1980), "A differenciált erőforrás elosztás és a támogatások újratermelődésének néhányösszefüggése" ("Some inter -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fferentiated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subsidies"), in *Pénzügykutatási Intézet Tanulmányai*, No. 6.

Csanádi, M. (1984), "Függőség, konszenzus és szelekció" ("Dependence, consensus, and selection"), in *Pénzügykutatási Intézet Tanulmányai*, No. 3.

Csanádi, M. (1985a), "Az új vállalatirányítási formák kialakításának folyamata" (Budapest: Institute of Financial Research) (Unpublished).

Csanádi, M. (1985b), "Döntések kényszerpályán: Az Ipari Minisztérium kialakítása és működésének első éve" ("Forced path decisions: The form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ts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Budapest: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Csanádi, M. (1987a), "Szövevény és szelekció a döntési mechanizmusban" ("Network and selection in the decision - making mechanism") (Budapest: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Csanádi, M. (1987b), "A döntési mechanizmus szerkezetéről"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decision - making mechanism"), in *Társadalomkutatás*, No. 4.

Csanádi, M. (1989), "A pártállamrendszer szerkezete, kohéziója és szétesése Magyarországon példáján" ("The Hungarian exampl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party - state system, its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Gazdaság*, No. 4.

Csanádi, M. (1990), "Beyond the image: The case of Hungary", in *Social Research*, Vol. 57, No. 2.

Csanádi, M. (1990a), "Pártösszéközház" ("Party headquarters"), in *élet és*

Irodalom, 23 February.

Csanódi, M. (1990b), "államfejtés", *Heti Világgazdaság*, 15 May.

Csanódi, M. (1990c), "Tanpólya", *Heti Világgazdaság*, 13 October.

Csanódi, M. (1991a), "The diary of decline: The case study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in one district in Hungary", in *Soviet Studies*, Vol. 43, No. 6.

Csanódi, M. (1991b), "Kinek a legitimációja?" ("Whose legitimation?"), in *Magyar Narancs*, No. 17.

Csanódi, M. (1993), "Az érdekérvényesítés strukturális eltérései a pártállamban"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interest enforcement within the party – state system"), 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a conference entitled "The élite following the system – change" organized by the Goethe Institute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Policy, Eötvös Lóránd University, December.

Csanódi, M. (1996), *A privatizáció környezetvédelmi vonatkozásai (Privatization process and its connotations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udapes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published)

Csanódi, M. and A. L-rincz (1992), "Neural network formalization of the Hungarian party – state system", in *Behavioral Science*, Vol. 37.

Csányi, V. (1988), *Evolúciós rendszerek: Az evolúció általános elmélete (Evolutionary system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 (Budapest: Gondolat Kiadó).

Csendes, L. and T. Gellért (1993), *Katonai titkok, események nyomában, I: Adalékok a hadsereg történetéből, 1950 – 1955 (On the trail of military secrets and events, I: Extracts from military history, 1950 – 1955)* (Budapest: Katonai Akadémia).

Csizmadia, E. (1991), "Rendszerbomlás és ellenzékliség: A magyarországi ellenzék, különös tekintettel az 1985 – 1990 – es évekre" ("System decay and dissident politics: The Hungarian opposi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between 1985 – 1990") (Budapest: T – Twins Kiadó).

Deák, A. (1972), "A pénzügyi megkülönböztetési rendszer". Az anyagi

érdekeltség jövedelemszabályozás, az állami pénzügyek fejlesztési kérdéseivel foglalkozó munkabizottság IV. sz. albizottsága ("The system of financial differentiation". Sub-committee No. 4 of the work committee dealing with material incentives, income regulation, and with issu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s finances).

Derlugian, G. H. (1993), "The tale of two resorts: Abkhazia and Ajaria before and since the Soviet collap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Unpublished.

Darvas, P. (1986), "Stratégia - megegyezés - alkalmazkodás" ("Strategy, consensus, adaptation") (Budapest: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Ekriert, G. (1991), "Democratizing process in Central Europe: A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Autumn.

Er-s, F. (1993), *A válság szociálpszichológiája* (*The social - psychology of the crisis*) (Budapest: T-Twins Kiadó).

Fainsod, M. (1958),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lubíró, V. and L. Gólik (1981), "A nyereségrészarányok visszarendezési tendenciájáról" ("On the tendency of the return of former profit relationships"), in *Pénzügyi Szemle*, No. 12.

Farkas, E. J. and á. Vajda (1991), "Az 1990 - es magyar parlamenti választások képviselőinek társadalmi jellemzői"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1990 Hungar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Kurtún S. and Vass L. (eds.), *Political Yearbook of Hungary 1991* (Budapest: AULA - OMIKK).

Fazekas, K. (1989), "Regionális foglalkoztatási problémák" ("Problems in regional employment"), in *Munkatgyi Szemle*, special edition, supplements I - II.

Fazekas, K. (1996), *Types of microregions, dispersion of unemployment and local employment development* in Hungary in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Vol. 34, No. 3.

Fazekas, K. and J. Köllő (1986), "Munkaerő - piaci kampány a 70 - es

években” (“Labour – market campaign in the 70s”)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5.

Fazekas, K. and J. Köllő (1987), *Munkaerőpiac és piac nélküli (Labour market without a capital marke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Fazekas, K., J. Koltay and J. Köllő (1990), *Innovation et emploi a l'ouest: Crise d'entreprise et crise d'emploi dans deux bassins industriels. Etude comparative: 6zd (Hongrie), Le Creusot (France)*, (Paris: L. Harmattan).

Fejes E. (1995): *Money Laundering Base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NBH Discussion Papers, No. 2, National Bank of Hungary.

Fejtő, F. (1991), *A népi demokráciák történetéről (O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Democracies)* (Budapest and Paris: Magvető – Fehér füzetek).

Fekete, J. (1984), “*Adalékok a kisvállalkozás jelenségrendszeréhez*” (“Contributions to the small business phenomenon”) (Budapest: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June.

Fekete, J. (1987), “*Kriszkezeletünk lértáse*” (“Crisis in our crisis – handling mechanism”) (Budapest: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Fishman, R. (1990), “Rethinking state and regime: Southern Europ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World Politics*, Vol. , 42; April.

“Fordulat es Reform” (“About – turn and reform”) (1987), in *Medvetánc*, Supplement No. 2.

Frentzel – Zagorska, J. (1990), “Civil society in Poland and Hungary”, in *Soviet Studies*, Vol. 42, October.

Gati, C. (1990), *Magyarország a Kremli árnyékában (Hungary in the Kremlin's shadow)* (Budapest: Századvég Kiadó).

Gazsó, F. (1990), “A kóderbtirokrácia és az értelmiség” (“Cadre bureaucracy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Társadalmi Szemle*, No. 11.

Gazsó, F. (1993), “Elitváltás Magyarországon” (“elite shift in Hungary”), in *Társadalmi Szemle*, No. 5.

Gábor, R. I. (1986), “Reformok, második gazdaság, államszocializmus” (“Reforms, second economy, and state socialism”), in *Valóság*, No. 7.

Gábor, R.I. and P. Galassi (1981), *A “második” gazdaság (The “sec-*

ond" economy)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es Jogi Könyvkiadó).

Gács, J. (1980), *Importkorlátok, hiányjelenségek és vállalati alkalmazkodás* (*Import barriers, shortage phenomena, and enterprise adaptation*) (Budapest: Kopint).

Gönczöl, K. (1988), "Gazdaság – bűnözés – társadalom" ("Economy, crime, and society"), in *Valóság*, No. 10.

Gönczöl, K. (1991), *Bűnös szegények* (*The guilty poor*)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es Jogi Könyvkiadó).

Gönczöl, K. (1993), "A bűnözés társadalmi összefüggései" ("The social inter-relationships of crime"), in *Társadalmi Szemle*, No. 3.

Greskovits, B. (1986), "A 45 milliárdos exportfejlesztőhűtelprogram". *Megjeleni: A beruházási rendszer, exportfejlesztés, importhelyettesítés.* ("The 45 billion export – developing credit programme"), in *The investment system, export development, import substitution* (Budapest: Kopint).

Greskovits, B. (1993a), "Dominant economy, subordinated politics: The absence of economic populism in the transition of Central – East Europ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Populism in politics and in the economy" (Budapes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EU), March.

Greskovits, B. (1993b), "Politika – gazdasági szükséghelyzetben" ("Politics in a state of economic emergency"),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July – August.

Grossman, G. (1983), "The party as manager and entrepreneur, from entrepreneurship in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Eds. by G. Guroff and F.G. Carstensen. Princeton Univ.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Gzrelak, J. (1993), "Social helplessnes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Project manuscript, Institute for Social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Warsaw.

Gulácsi, G. (1987), *Egy struktúrafejlesztő kicsiny intézmény és egy országos politikai kampány a nyolcvanas években: a TEHO* (*A tiny structure developing institution and a nationwide political campaign in the 1980s: the TEHO*) (an early form of local taxation to be used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purposes) (Budapest:

Tervgazdasági Intézet).

Györi, P. (1990), "Gyorsjelentés a hajléktalanságról" ("Emergency report on homelessness"), in Andorka et al., (eds.) op. cit.

Hagelmayer, I. (1975), "A külső infláció és a cserearányromlás belső hatásai" ("External inflation and the internal effects of the worsening terms of trade"),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s. 7-8.

Hankiss, E. (1989), "A nagy koalíció, avagy a hatalom konvertálása" ("The grand coalition, or the conversion of power"), in *Valóság*, February.

Havas, A. (1986), "A gazdasági mechanizmus szervezeti rendszere és az új vállalatvezetési formák"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the economic mechanism and the new form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Budapest: Ipargazdasági Intézet), Unpublished.

Hegedűs, A. (1990), *Oknyomozás válságügyben (Investigation in crisis matter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Herczog, L. and L. Pál (1991), "érdekegyeztetés és konfliktuskezelés Magyarországon" ("Interest conciliation and conflict - handling in Hungary"), in *Europa Fórum*, No. 3.

Hibbing, J. and S. C. Patterson (1992), "A democratic legislature in the making: the historic Hungarian elections of 1990",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No. 82, May.

Horváth, A. and A. Szokolczai (1989), "Senkiföldjén: A politikai munkatársak tevékenységéről budapesti kerületi szinten" ("In no - man's land: On the activities of political officials at the Budapest district level ") (Budapest: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Horváth, T. (1988), "Hogyan működnek együtt: Tanaács és pártbizottság viszonya a városokban" ("How do they work tog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cils and the Party committee in the cities") (Budapest: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Holló, A. (1987), "A kormányzati munka alapkérdései - miniszteri nézőpontból" ("The basic questions of government work - from a ministerial point of

view”) (Budapest: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Hough, J (1969), *The Soviet prefec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ugh, J. and M. Fainsod (1979),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nya, G., T. Réti, A. R. Stüle, and L. Tóth (1990), *Románia 1944 – 1990: Gazdaság és politikaiörténet* (*Romania 1944 – 1990: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Budapest: Atlantisz and Medvetanc Kiadó).

Janos, A. C. (1986), *Politics and Paradigms, Changing Theories of Change in Sociat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Janos, A. C. (1989), “The politics of backwardnes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780 – 1945” *World Politics*, Vol. XLI. No. 3.

Jutasi, Gy. (1989), “A törvényhozás 1989 – ben: nagy módosítások és sarkalatos törvények” (“*Legislating in 1989: Big changes and crucial laws*”), in S. Kurtán et al. (1990)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0*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90*) (Budapest: AULA – OMIKK).

Kéri, L. (1990), “Az egypártrendszerrel a szabad választásokig Magyarországon: A Kádár – korszak felbomlása 1985 – 1990” (“*From a one – party system to free elections in Hungar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Kádár era, 1985 – 1990*”) (Budapest: Társadalomtudományi Intézet), May – June.

Kilényi, G., K. Kulcsár, and T. Sárközy (1987), “Javaslat az államszervezetnek a gazdasági reformmal összefüggésben való átalakítására, különös tekintettel a kormányzati irányításra” (*előkonceptió, vitaanyag*) (“*Proposal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in line with the economic refor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government*” [*Preliminary ideas; discussion material*]) (Budapest: Nem – termel- területek korszerítésével foglalkozó programiroda [*Programme office dealing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non – productive areas*]).

Kiss, Gy. Cs. (1993), “Közép Európa, nemzetek, kisebbségek. Tanulmányok, publicisztikai írások” (“*Central Europe, nations, minorities: Studies and journalistic writings*”) (Budapest: Pesti Szalon Könyvkiadó).

Kligman, G. (1990), "Reclaiming the public: Reflection on recreating civil society in Romania", in *Easter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4, Autumn.

Kolarska – Bobinska, L. (1991a),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Warsaw), Unpublished.

Kolarska – Bobinska, L. (1991b), "The changing world of meanings" (Warsaw: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December.

Kolosi, T. (1988), "Tendenciák a társadalmi szerkezet alakulásában a 80-as években" ("Trends in the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1980s") in Kurtún S. et al. (eds.)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88*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88) (Debrecen, R – Forma Kiadói Kft).

Kolosi, T. and B. Szabó (1973), "Kerületi döntés és munkamegosztás" ("District decision – making and division of labour"), in *Szociológia*, No. 3.

Kolozsi, B. (1993), "Az öngyilkosság és más deviációformák arányának alakulása a rendszerváltozás időszakában"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s of suicides and other forms of deviance during the system change period") in Kurtún S. et al. (eds.)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3*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93) (Budapest, Demokráciakutatók Magyar Központja Alapítvány)

Kornai, J. (1957), *A gazdasági vezetés túlzott központosítása* (*Over centralisation of economic managemen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2nd edition [1989]).

Kornai, J. (1980), *A hiány*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Kornai, J. (1989), *A puha költségvetési korlát: Régi és új ellentmondások és dilemmák*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l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Budapest: Magvető).

Kornai, J. (1989a), *Bürokratikus és piaci koordináció: Régi és új ellentmondások és dilemmák*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ld and new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Budapest: Magvető).

Kornai, J. (1992), "A postszocialista átmenet és az állam: Gondolatok fiskális problémákról" ("Post – socialist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Some thoughts on

fiscal problems”),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6.

Kornai, J. (1993), “Transformációs visszaesés” (“Transformational relapse”),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s. 7 – 8.

Kornai, J. and ú. Matits (1983), “A költségvetési korlát puhaságáról – vállalati adatok alapján” (“On the softness of the budget constraint – on the basis of enterprise data”), in *Gazdaság*, no. 4.

Kovács, J. M. (1980), “Alku, asszimiláció, alku” (“*Bargaining, assimilation, bargaining*”), in M. Tardos (ed.) *Vállalati magatartás, vállalati környezet (Enterprise behaviour, enterprise environment)*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Kovács, J. M. (1984), “A reformalku sörtyében” (“In the thick of reform – bargaining”), in *Valóság*, No. 3.

Kovács, J. M. (1988), “*Compassionate doubts about ‘refonomics’ in Hungary*” (Budapest: Institute of Economics; Vienna: 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n Menschen) (Unpublished).

Köves, A. (1991), “A kifele fordulás gyötrelmes útjai” (“The agonizing paths of turning outward”),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3.

Köves, A. and G. Oblath (1981), “A magyar külkereskedelem a 70 – es évtizedben” (“Hungarian foreign trade in the decade of the seventies”), in *Gazdaság*, No. 4.

Kurtán, S. (1988), “Tizenkét hónap krónikája” (“A chronicle of twelve months”), in S. Kurtán et al. (eds.)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88 (Political Yearbook of Hungary, 1988)* (Debrecen, R – Forma Kiadói Kft).

Laki, M. (1983), *Vállalati megszűnés és összevonás. (Liquidation and mergers of enterprise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Laki, M. (1985), “Gazdaságirányítás és vállalati válság”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crisis in enterprises”), in *Külgazdaság*, No. 5.

Laki, M. (1988), “A területi párt – és állami szervek szerepe a magyar ipar centralizálásában” (“Role of the party and state bureaucracy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Hungarian industry”), in *Medvetánc*, No.

Laki, M. (1989), "Az új független szervezetek a gazdaságirányításról és a gazdaságpolitikáról" ("The new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s on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ervgazdasági Fórum*, No. 5.

Laki, M. (1991), "Barriers to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 in Special issue of *Review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pp. 38 – 45.

Laki, M. (1993), "Vállalati viselkedés elhúzódó visszaesés idején" ("Enterprise behaviour in times of prolonged economic contraction") (Budapest: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Laky, T. (1980), "A recentralizáció rejtett mechanizmusai" ("The hidden mechanisms of recentralisation"), in *Valóság*, No. 2.

Laky, T. and L. Neumann (1990), "A nyolcvanas évek 'kisvállalkozói'" ("The small 'businesses' of the 1980s"), in Andorka R., Kolosi T., and Vukovich Gy. (eds.) *Társadalmi riport (Social Report)* (Budapest: TáRKI).

Lamberger, G. (1988), "Nagy kompromiszumok, csekély sikerek" ("Big compromises, shallow successes"), in *Külgazdaság*, Nos. 2 – 3.

Lázár, G. (1993), "Jólét vagy szabadság? A gazdasági és politikai átmenet problémái a Medián közvélemény – kutatásainak tükrében" ("Welfare or freedom?: The problems of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Medián public opinion survey"), in *Mozgó Világ*, No. 8.

Lengyel, Gy. (1990), "The small transformation: Changing pattern of recruitment of managers and entrepreneu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Madrid, July 9 – 13.

Lengyel, Gy. (1992a), "Crisis, expecta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inclinations" (Unpublished).

Lengyel, Gy. (1992b), "A gazdasági elit a 80 – as években és az átmenet időszakában" ("The economic élite in the 1980s and at the time o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Andorka R., Kolosi T., and Vukovich Gy. (eds.) *Társadalmi riport (Social Report)* (Budapest: TáRKI).

Lengyel, L. (1988), *Végkifejlet (Final development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Lengyel, L. (1989), "Ezerkilencszáznyolcvankilenc" ("Nineteen eighty - nine"), in S. Kurtán, P. Sándor, and L. Vass (eds.) (1990)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0*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90) (Budapest: AULA - OMIKK).

Lengyel, L. (1993), "Útközben: Magyar politika az ezredfordulón" ("En route: Hungarian 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ium"), in *Politikatudományi Szemle*, No. 2.

Magyar, B. (1986), "Dunaapóti, 1944 - 1958". I - III ("Dunaapóti, 1944 - 1958", Vols. 1 - 3.) (Budapest: Művelődéskutató Intézet and Szövetkezeti Kutató Intézet)

Major, I. (1991), "Credibility and shock therapy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Hungary", in *Communi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3 (4), 439 - 54.

Mandelbrot, B. B. (1983), *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 (San Francisco: Freeman and Co.).

Marawall, J. (1991), "Economic reforms in new democracies: The southern European experience", in *East - south system transformation working paper*, No. 3.

Marody, M. (1991), "New possibilities and old habits", in *Sisyphus*, unpublished.

McAdams, J. (1993), *Germany divided: From the wall to reunific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cFalls, L. (1991), "The modest German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ast Germans' revolution" (Montreal: University of Montreal), 29 October (Unpublished).

Mezei, G. (1989), "Stettintől Triesztig: Kelet - Közép - Európa és a szovjet modell" ("From Stettin to Trieste: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the Soviet model"), in *Valóság*, No. 8.

Minkenberg, M. (1992), "The wall after the wall: On the continuing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uropeanists, Council of European Studies, Chicago, 27 – 29 March.

Miszlivetz, F. (1991),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of 1989: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 – state", November, (Unpublished).

Mizsei, K. (1990), "Shock therapy: Poland, Yugoslavia, Hungary", in *The New Hungarian Quarterly*, 31 (119), 73 – 78.

Moe, T. (1990),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8, November, pp. 739 – 75

Mohos, A. (1981), "Differenciálódási helyzetkép az iparban" ("The state of play in industrial differentiation") (Ellenőrzési Főosztály, Financial Ministry, Department of Controll) (Unpublished).

Murrell, P. (1990),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f reform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College Park,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urrell, P. (1991), "Big Bang versus evolution: East European reforms in the light of recent economic history", in *PlanEcon Report*, June

Nagy, M. (1987), "A városi tanács és a pártbizottság kapcsolata a kisvárosi modellben – A várospolitika alakításában játszott szerepü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council and the party committee in the small city model: Their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city policy") (Budapest: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Unpublished).

Noel, A. (1989), "The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Annual meeting of th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Laval University.

O'Donnell, G. and P.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i, J. (1986), "Commercializing China's rural cadres",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35 (September – October), 1 – 15.

Ost, D. (1991), "Shaping a new politics in Poland: Interests and politics in post – Communist East Europe", in *Programme o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orking Series*, No. 8.

Pacepa, I. M. (ed.) (1989), *Vörös horizontok: Egy román kémfőnök*

vallomásai (I.H. Printing Enterprise).

Palócz, E. (1992), "Some major difficulties on economic transition: Hungary's examp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dam Smi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Paris, 11 – 12 May.

Pál, L. and L. Pál (1991), "érdekegyeztetés és konfliktuskezelés Magyarországon" ("Interest reconciliation and conflict – handling in Hungary"), in Európa Fórum, Vol. 3.

Pósztor, S. (1983), *A külgazdaság és a fejlesztési politika*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Pósztor, S. (1987), "A gazdaság nyitottságáról" ("On the openness of the economy") (Budapest: Ipargazdasági Intézet) (Unpublished).

Pető, I. and S. Szakács (1985), *A hazai gazdaság négy évtizedének története I* (A history of four decades of the Hungarian economy, Vol. 1.)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gby, T.H. (1988), "The origins of the nomenklatura system", in *Soviet Studies*, Vol. 40, No. 4.

Rittersporn, G.T. (1979), "Staline en 1938: Aposee du verbe et defaite politique", in *Libre*, No. 6.

Rittersporn, G.T. (1983), "Uneasy alliance: Soviet judiciary apparatus and penal policy in the 1930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Seminar on 20th Century Russian Society, Philadelphia.

Rychard, A. (1991a), "Passive acceptance or active participation?: The ambiguous legacies of societal opposition in Poland", Working Papers on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 (No.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Rychard, A. (1992), "Politics and society after the breakthrough: The sources and threat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post – Communist Poland", in G. Sanford (ed.) *Democratization in Poland* (London: Macmillan).

Salgó, I. (1989), "Eladósodás és reformtörekvések: Kelet – Európa az 1980

– as évek második felében” (“Indebtedness and the pursuit of reform: Eastern Europ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80s”),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2.

Sándor, L. (1989), “Szántfelmérés” (“Level Evaluation”), in *Heti Világgazdaság*, November 4.

Schmidt, P. (1992), “*A magyar parlamentarizmus alkotmányos ellentmondásai*” (“*Co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of Hungarian parliamentarianism*”), in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Budapest: Economix).

Schmitter, P. and T. Karl (1992), “*What kinds of democracies are emerging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Stanford University), January, (Unpublished).

Schapiro, L. (1970),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Schusztar, E. (1983), “*Az Ipari Minisztérium szervezetének kialakulása*”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Budapest: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Schweitzer, I. (1982), *A vállalatnagyságról (On enterprise size)*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Seres, A. (1987), “Regional party regulation in domestic trade” (Budapest: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 (Unpublished).

Sik, E. (1991), “*The vulture and the calamity, or why Hungarian taxi drivers were able to rebel against increased gasoline prices*” (Budapest), January, (Unpublished).

Sik, E. (1992a), “Networking in capitalist, communist and post – communist societies” (Budapest: Budapes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Unpublished).

Sik, E. (1992b), “From the second economy to the informal economy” (Budapest: Budapest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Simon, J. (1992), “The ‘hangover’ of Hungary’s democracy, or how exactly are we democratizing in 1991?” in S. Kurtán, P. Sándor, and L. Vass (eds.) (1992)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2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92)*

(Demokráciakutatók Magyarországi Központi Alapítványa, Economix Rt).

Simon, H. (1982), "állampolgár és politikai viszonyok" ("Citizen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and Késuth Könyvkiadó).

Simon, M. (1990), "Tizenkét hónap krónikája" ("Chronicle of twelve months"), in S. Kurtán, P. Sándor, and L. Vass (eds.) (1991)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2*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91) (Budapest: AULA – OMIKK).

Soós, K. A. (1985), "Reform és restrikcio Jugoszláviában és Magyarországon" ("Reform and austerity in Yugoslavia and Hungary"), in *Tervgazdasági Fórum*, No. 1.

Soós, K. A. (1986), *Terv, kampány, pénz* (*Plan, campaign, money*)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és Kossuth Könyvkiadó).

Staniskis, J. (1992), *The dynamics of the breakthrough*, in K. Poznanski (ed.) *Decline of communism, rise of capit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tark, D. (1992), "A rendszerazonosságtól a szervezeti sokféleségig: A kelet – európai változások elemzése" ("From systemic identity to organisational diversity: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12.

Such, Gy. (1986), "A párt szerepe a Belkereskedelmi Minisztériumban 1963 – 1964" ("The role of the party in the Ministry for Domestic Trade, 1963 – 1964") (Budapest: Karl Marx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waan, W. (1993), *Behaviour and institutions under economic reform* (Amsterdam: Thesis Printers).

Szabó, I. (1990), *Az ember államosítása* (*The nationalisation of man*) (Budapest: Tekintet Könyvek).

Szabó, I. (1994), "Minden másképpen van. Politikai szocializáció Magyarországon" ("Everything is arranged differently: Political socialisation in Hungary"), in *Világosság*, No. 3.

Szakadát, I. (1990), "A párt szervezeti felépítéséről". Politikai szociológiai tanulmányok a kommunista bürokrácia vezérkaráról. ("O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

ture of the party" [Polit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ies on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communist bureaucracy] Nyirő A. (ed.) Discussion papers (Budapest: Karl Marx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zalai, E. (1982), "Reformfolyamat új szakasza és a nagyvállalatok" ("A new phase of the reforms and the large enterprises"), in *Valóság*, No. 5.

Szalai, E. (1987), "Válság és reformalternatívák" ("Crisis and reform alternatives"), in *Társadalomkutatás*, No. 4.

Szalai, E. (1988), "A gazdasági válság természete" ("The nature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Valóság*, No. 6.

Szalai, E. (1989), *Gazdasági mechanizmus, reformtörekvések és nagyvállalati érdekek* (*Economic mechanism, reform aspirations and large enterprises' interest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Szalai, E. (1991), "A hatalom metamorfózisa?" ("The metamorphosis of power?"), in *Valóság*, No. 4.

Szalai, E. (1993), "Technokraták, kliensek, yuppik. A gazdasági elit szerkezete és viselkedése" ("Technocrats, clients, and yuppies: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ur of the economic élite") in *útélágazás. Hatalom és értelmiség az államszocializmus után* (Road junction: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after state socialism) (Szombathely, Pesti Szalon Könyvkiadó).

Szalai, E. (1994), *útélágazás. Hatalom és értelmiség az államszocializmus után* (*Road junction: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after state socialism*) (Szombathely, Pesti Szalon Könyvkiadó).

Szamuely, L. (1986), "Az európai KGST - országok gazdasági reformjainak kérdéséhez a 80 - as évek derekán"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CMEA countries"),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s. 7 - 8.

Szanyi, M. (1993), "Mi is történt?" A magyarországi átmenet kérdései a vállalati menedzsment szemszögéből ("What did actually happen?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Hungarian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2.

Szász, I. (1984), *Ez elment vadászni* (*This one went hunting*) (Discovering

Hungary series) (Budapest: Szépirodalmi Könyvkiadó).

Szerb, L. (1991), "Max Weber's theory of bureaucracy and the Hungarian bureaucracy", in *Társadalom és gazdaság*, No. 3.

Tardos, M. (1975), "A vállalati önállóság és a központi irányítás" ("Enterprise independence and central regulation")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s. 7–8.

Tardos, M. (1985), "A szabályozott piac kialakításának lehetőségei"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creation of a regulated market") in *Közgazdasági Szemle*, No. 11.

Tardos, M. (1987), "A gazdaságpolitika és a társadalmi – politikai feltételek szükséges változtatásának fő irányai: Az MTA Közgazdaságtudományi Intézetében kidolgozott tézisek. Válasz az MSZMP KB tudományos, kulturális osztályának 1987. január 7 – i levelére"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main directions of the necessary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s of social policy: The propositions formulated by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 reply to the 7 January, 1987 letter from the HSWP CC 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Culture") Compiled by M. Tardos.

Tarkowski, J. (1990), "Endowment of nomenklatura, of apparatchiks turned into entrepreneurs, from communist ranks to capitalist riches", in *Innovation*, Vol. 14, No. 1, (Vienna).

Tellér, Gy. (1984 – 85), "Ómechanizmus. újmechanizmus, ipari szövetkezetek" ("Old mechanism, new mechanism,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in *Medvetűnc*, Nos. 4 – 1.

Tellér, Gy. (1987), "Adalékok a szövetkezetek gazdasági, szervezeti és jogi reformjához"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al reforms of cooperatives") (Budapest: MTA államtudományi Kutatások Programirodája).

Ungvárszki, Á. (1989), *Gazdaságpolitikai ciklusok Magyarországon* (*Economic policy cycles in Hungary*)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Urbán, L. (1988), "A területi pártszervek döntésbefolyásoló szerepe vállalati ügyekben" ("The role of regional party organizations in influencing enterprise affairs") (Budapest: University of Law and State Affair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

ence), (Unpublished).

Vajda, Á. (1995), "Foundations, associations, and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cta Oeconomica*, Vol. 47. No. 3 – 4

Vaksberg, A. (1991), *The Soviet Maf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Várhegyi, É. (1986), "A bankhitelek működése restriktív időszakban" ("The functioning of bank credit in a period of austerity"), in *Gazdaság*, No. 2.

Verdery, K. (1991), "Theorizing socialism: A prologue to the transition", in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8, August.

Verdery, K. and G. Kligman (1990), "Romania after Ceausescu: Post – communist communism?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Conference paper, Yale University, November).

Vigh, K. (1989), "Az ellenzéki kerekasztaltól a Nemzeti Kerekasztalig" ("From the opposition's round table to the National Round Table", in S. Kurtán, P. Sándor, and L. Vass (eds.) (1990) *Magyarország politikai évkönyve 1990* (Hungary's political Yearbook 1990) (Budapest, AULA – OMIKK)

Voszka, E. (1980), "Szervezeti változások és vállalati növekedés" ("Organizational changes and enterprise growth"), in *Gazdaság és Jogtudomány*, Vol. XIV, Nos. 1 – 2.

Voszka, E. (1984), *érdek és kölcsönös függőség* (*Interest and mutual interdependence*)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Voszka, E. (1988), *Reform és útszervezés a nyolcvanas években* (*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in the 1980s*) (Budapest: Közgazdasági és Jogi Könyvkiadó).

Voszka, E. (1991), "Homályból homályba" ("From gloom into gloom"), in *Társadalmi Szemle*, No. 5.

Voszka, E. (1992), "Az ellenkezője sem igaz: A központosítás és a decentralizáció színváltásai" ("Even the opposite isn't true either: The changing tones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Külgazdaság*, No. 6.

Voszka, E. (1993), "*Két úr szolgálja. (Az önprivatizáció). Jelenések az alagútból*" ("The servant of two masters ['Self – privatisation']: Reports from the tunnel") (Budapest: Pénzügykutató Rt.).

Voszka, é. I. Major (1996), *Privatizáció és szerkezetváltás: a nagyipari struktúra átalakulása a kiemelt vállalatok körében.* (*Privatiz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s: the transformati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t the group of the largest enterprises*) Directed by éva Voszka. Financial Research Ltd.

Volensky, M. (1984), *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 an insider's report*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Walder, A.G. (1988a), *Communist neo – 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der, A.G. (1988b), "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 in *China Quarterly*.

Walder, A.G. (1988c), "Bargaining relationships in urban industrial bureaucracies", in K. Lieberthal and D. M. Lampton (eds.) *The Evolving Structure of Authority in China*, (Unpublished).

Winiarczyk, J. (1987), "Pourquoi les reformes économiques echouent – elles dans les systemes de type sovietique", in *Extrait de la revue d'etudes comparatives est – ouest*, Vol. 18, No. 3.

Wochlchik, Sh. L. (1988),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in Czechoslovakia"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April 14).

Wochlchik, Sh. L. (1990),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Czechoslovakia", in *Current History*, No. 12.

Zemtsov, I. (1985),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Soviet elite* (New York: Craine Russac).

Zsille, Z. (1972), "Munkamoról a mesterséges szerveztelenség viszonyai között" ("Work morale amidst organized disorganization") (Műszaki és Természettudományi Egyesületek Szövetsége. II. tizemszociológiai konferencia előadásai közül. Balatonfüred) (in II. Conference on shop – floor sociology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Technical and Natural Sciences), (Unpublished).